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美〕谢尔顿·B·利斯著

林爱丽译

章晓珊校

東方出版社

Sheldon B. Liss

MARKIST THOUGHT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英文版译出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LADINGMEIZHOU DE MAKESIZHUYI SICHAO

作者/[美]谢尔顿·B·利斯

译者/林爱丽

校者/章晓珊

封面设计/王师韻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文字六〇三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2 字数/246,000

版次/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1—1,000

---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9017-2/D·25 定价 2.70 元

社会主义作为思想、运动和制度，在当代世界上正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中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冲破了过时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思想观念。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同时推动着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本丛书选译国外较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向读者介绍世界上出现的这一断的情况和有关的成果，以便了解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新思潮，供读者研究并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

## 译者前言

马克思学说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传入拉丁美洲的，至今已有 130 年的历史了。100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如何为人们所理解、研究、宣传和运用，这是关心和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人都很想知道的。由美国学者谢尔顿·B·利斯著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书，至少可以从思想和理论方面相当地满足这种需要。

本书用了大约 20 万字即 80 % 以上的篇幅，分别论述了拉丁美洲 10 个国家(按照西方学者对拉美区域的传统划分方法，占这一地区 20 个国家的半数)的将近 60 个人物。象著者这样，纯粹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角度，以整本专著或者如此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如此众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人物，还未见过。而且他所评介的人物多半仍然在世，这又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诚然，正如作者自己表明的，他所论述的不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者。但唯其如此，对于了解马克思学说在拉丁美洲的命运也许更有帮助。

由此可见，本书是值得一读的。所以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奉献给关心和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人们。

译本删去了原书正文前的致谢词以及正文后的四个附录

即“外来语词汇表”、“缩写词汇表”、“参考书目”和“索引”。原书的另一个附录即“注释”基本上是资料来源，译本只保留了很小一部分并且改为脚注。为了方便读者，译者又加了一些注解，均标明“译者注”以别于原注。

囿于译校者水平，译本中错谬与欠妥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

#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政治思想	5
社会思想	7
作家们的研究方法	9
本书著者的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19
马克思学说的主要阐释者	34
历史背景	44
第三章 阿根廷	55
胡安·包蒂斯塔·胡斯托(60) 阿尔弗雷多·L·帕拉西奥斯(64) 阿尼瓦尔·庞塞(68) 吉奥尔迪兄弟——鲁道夫和阿梅里科(72) 维多利亚·柯都维亚(79) 西尔维奥·弗朗迪西(83) 利沃里奥·胡斯托(88) 豪尔赫·阿韦拉多·拉莫斯(94)	
第四章 智利	100
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105) 胡利奥·塞萨尔·霍韦特(109) 奥斯卡·韦斯(113) 路易斯·比塔莱(117) 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123) 路易斯·科尔巴兰(126) 劳尔·安普埃罗·迪亚斯(128) 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梅迪纳(131) 萨尔瓦多·阿连德(135)	

<b>第五章 巴西</b> .....	<b>140</b>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145) 莱昂西奥·巴斯包姆(152) 小卡约·普拉多(157) 卡洛斯·马里格拉(160) 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165)	
<b>第六章 秘鲁</b> .....	<b>170</b>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72) 伊尔德布兰多·卡斯特罗·波索和里卡多·马丁内斯·德拉托雷(185) 乌戈·布兰科·加尔多斯(187) 阿尼瓦尔·基哈诺(192)	
<b>第七章 玻利瓦尔国家</b> .....	<b>199</b>
哥伦比亚 .....	<b>199</b>
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203) 何塞·孔苏埃格拉·希金斯(205) 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207)	
委内瑞拉 .....	<b>214</b>
多明戈·阿尔韦托·兰赫尔(217) 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221) 特奥多罗·佩特科夫(225)	
玻利维亚 .....	<b>232</b>
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236) 特里斯坦·马罗夫(240) 吉列尔莫·洛拉(245)	
<b>第八章 乌拉圭</b> .....	<b>251</b>
埃米利奥·弗鲁戈尼(253) 罗德内·阿里斯门迪(257) 弗朗西斯科·R·平托斯(261) 阿夫拉姆·纪廉(262)	
<b>第九章 墨西哥</b> .....	<b>270</b>
纳西索·巴索尔斯(278) 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282) 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288) 阿隆索·阿吉拉尔·蒙特韦德(296) 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299) 鲁道夫·斯塔文哈根(305) 阿道弗·希利(307)	



第十章 古巴 .....	310
卡洛斯·B·巴利尼奥 (315) 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 (317) 胡安·马里内略 (323) 布拉斯·罗加 (327)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 (330)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334) 菲德尔·卡斯特罗 (344)	
第十一章 结论 .....	352

## 第一章 导 论

比起过去的任何其他伟大人物来，马克思更加与众不同地做到了冲破那些在地理上、文化上、职业上以至意识形态上通常使人们不能够声名远扬的障碍。……他不仅成了知识分子生活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通过他的思想所激起的运动，成了世界上广大人群生活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的名望真真正正是全球性的。

——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一个多世纪以前，卡尔·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了一种作为认识论的、研究逻辑和普遍解释社会的世界观。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及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用来变革目前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纲领与战略。

马克思的思想发源于欧洲固有的思潮，而把犹太基督教的历史观念和文艺复兴时期改造自然的愿望结合了起来。他主要不是研究拉丁美洲，但确实展望了终于会卷入到世界革命中去的欧洲以外的地区。后来，正如下一章将要说明的，幻想家弗·伊·列宁为把马克思的思想灌输到第三世界中去开辟了道路，今天马克思的思想在第三世界采取了多种形式。

在这本著作里我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是怎样影响了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并为他们所应用的。

马克思主义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这是一个引起了很多一致的看法，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不同看法的问题。雷蒙德·阿隆指出：

马克思主义也许是指：第一，历史学家根据对人类及其时代的认识所想象和理解的马克思的思想；第二，各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就其自己的时代、问题和客观现实而加以阐释的马克思的思想；第三，自称按马克思主义思想办事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政党。

我的非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常常不同于我所考察的那些著作的作者的看法，而屡屡与已故的赖特·米尔斯<sup>①</sup>的见解相平行，而他是把马克思主义者分成四大类的：第一，“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典据，对一切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第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某些具体部分的思想内容当作整体来加以应用；第三，“辽阔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模式，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想法加以定型化，使之适用于新的情况，替每件事情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答案，他们的冥顽态度有时妨碍了自己的分析，而以教条主义来代替思考与探究；第四，“坦率的”

---

<sup>①</sup> 美国社会学家(1916—1962)，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与上述的相反，放开手脚而又机动灵活地进行工作，就象卡尔·马克思本人那样，并且相信马克思的思想适用于当前的情况，他们不硬要各种现实事物去符合那些牢不可破而一成不变的准则。

没有别的学派（也许实证主义除外）比马克思主义对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更为普遍的了。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得到解决，而当地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们的种种对策，也从未得出一个彻底改革的纲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式的许诺，它那以改善社会状况为己任的科学认识方法，对于几乎不相信现行制度的许多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来说，就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自从独立<sup>①</sup>以来，拉丁美洲就有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而这些知识分子则经常善于接受外来的政治学说。在本地区内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通常超越国界，而其形式和内容又往往是共通的。

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尤金·戴维斯把拉丁美洲的思潮，看成是基本上革命的 and 民族主义的；而他的墨西哥同行莱奥波尔多·塞亚则认为，它所遵循的是辩证法的模式，原因是它力图否定沦为殖民地的过去。因为许多思想家都信奉革命的民族主义，并且采用辩证的方法来进行社会分析，所以常常难于识别谁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谁又是更多地采取折衷手法的民族主义者或黑格尔主义者。因此，鉴别马克思主

---

① 指19世纪初叶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先后摆脱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获得的独立。——译者注

义思想家并加以分类一事，就成了困难的问题。例如，尽管塞亚也应用辩证法，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拒不接受他的见解，理由是他的基本思想体系和所持的方法论在考虑拉丁美洲特有的各种哲学体系时，是着眼于它们自身的演变以及各种思想的关系的，这就势必把各个集团和阶级的斗争缩小为单纯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在本书里，我所考察的是从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拉丁美洲思想家中挑选出来的一批人的主要思想，尽管他们所代表的常常是这一哲学体系的不同流派。我特别指明了，拉丁美洲各大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长期以来一直比美国同类院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显然大得多，借以强调这批人所坚持的这一思想传统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通常大于更广大的阶层对它的接受程度。我们将会看到，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是从格兰德河以南的地区<sup>①</sup>产生出来的。

拉丁美洲的政论文作家一向象马克思那样，信奉利用思想意识来提高觉悟。力求更好地理解本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状，历来是以其著述直接或间接地供人了解阶级意识在其各自国家历史中的作用的作家和思想家们的职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拉丁美洲的知识界日益转向了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显然不符合大多数人民的需要了。马克思主义使得它的阐释者们能够把他们各自的社会、政治和

---

<sup>①</sup> 格兰德河是墨西哥和美国的分界河，其以南地区即拉丁美洲。——译者注

经济理想，同他们自己的有缺陷的社会现实作一番对比。对于不愿意放弃过美好生活的希望的那些拉美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它总是在生产力同生产制度的辩证斗争中站在代表未来的进步阶级和政党一边）已经象征着可供替代资本主义的唯一的选项，而资本主义自从400多年以前第一批西班牙人的到来<sup>①</sup>，就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无穷的绝望。

## 政治思想

19世纪末，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思想能够支配历史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行时了。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思想终于被认为是了解人类活动历史的线索，而不是社会变化的基本成分。按照赖特·米尔斯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包含着肯定和批判各种制度与看法的思想观点、一种道德观或一套精心设计的理想和信条、一些变革的手段和一种说明人们如何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政治运动的理论。我们还可以注意迈克尔·哈林顿的解释。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立场之间，并不是非得有一定的关系；对方法论抱一致意见的人们，也可以应用它来得出对立的政治观点。

我们越是研究马克思其人以及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我们就越了解到他的信徒们的观点离开他有多远，他

---

<sup>①</sup> 指15世纪末西班牙人在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约1451—1506）横渡大西洋到达拉丁美洲后开始对该地区的殖民侵略。——译者注

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又有多大。因此，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供的一些理论，尽管源于马克思，却并不正好反映了他的思想。

不管他们与马克思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如何不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作家都渴望根本的政治变革，并认为自己的工作严肃的政治行为。他们自豪地表示，他们的思想影响已经作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规划，作用于国家对工农业发展的集中控制，并且波及到文艺界知名的同志如巴勃罗·聂鲁达和迭戈·里维拉<sup>①</sup>所经常领导的抗议运动。

在本书的各章里，我不时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主要原理，并且以这些原理的思想渊源为历史背景来加以考察。我试图要做的是：说明不同的作家怎样把人道主义的传统同政治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哲学如庇隆主义或阿普拉主义<sup>②</sup>的关系，研究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评论个人自由和中央集权的兼容性，指明反权贵势力的兴起如何反映出人们已经意识到需要对各种问题采取新的政治解决办法，并且指出各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对政治变革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旨在影响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革命思想，长期以来就是拉

---

① 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里维拉(1886—1951)，墨西哥画家。墨西哥壁画运动主要成员之一。——译者注

② 庇隆主义即阿根廷前总统庇隆(1895—1974)主张的“正义主义”。阿普拉主义是秘鲁思想家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提出的理论。“阿普拉”是他创立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西班牙文缩写的译音。在其影响下形成了被称为“民众主义”的运动。——译者注

拉丁美洲社会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主义的思想家如西蒙·玻利瓦尔和何塞·马蒂<sup>①</sup>，都赞成这样一个几乎为拉美人所普遍信奉的思想，即人类理所当然地要通过革命走向社会正义的更高目标。这一信念使拉美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尽管他的理论有别于玻利瓦尔和马蒂的思想。我将说明并试图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革命变种（论述它们怎样形成及其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而且阐明为什么在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

## 社会思想

卡尔·马克思这位研究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古典著作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成果的专家，创立了一个使我们能够判断社会现状，并力图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法来纠正社会弊端的社会批评的范例。尽管他从不认为可能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情况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一把打开所有锁头的钥匙”，但他认为，找出创造历史的社会力量是可能的。在他看来，思想本身并无生命，而是由处于历史上某种社会关系结构内部的一些个人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可以通过对历史和对人们塑造世界

---

① 玻利瓦尔(1783—1830)，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获“解放者”称号。在其领导下取得独立的国家即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统称玻利瓦尔国家。马蒂(1853—1885)，古巴民族英雄、独立战争领袖、诗人。——译者注



的方式的自觉认识来加以支配的。他认为，人类可以指引历史；同时，人类为达到自觉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导致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什么也不是预先注定的。在他看来，变化就是历史，而对一切社会关系都必须进行历史的分析。有两个特点使他的社会理论与其他的相区别：第一，坚持对社会现象作等级制的分类；第二，认为一切社会都存在着内部的紧张关系或矛盾，并与现存制度要保持不变的倾向相抗衡。

马克思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是注定要变的，人们可以调整和剥夺其各种组织机构及制度的权力。他预言，社会阶级将会消灭，竞争性的生活和压制行为将由人的完满和解放所取代。对马克思来说最基本的，也是对我们的拉美社会思想家来说极为重要的，乃是解放的观念，或者说，免受更强大利益所控制以及免于各种形式的恐惧、迷信、贫困、敌视和奴役的人权观念，亦即无拘无束地和别人共同生活的想法。

马克思并没有把形成各种社会结构的动力仅仅归诸于某些单个的因素，例如经济决定论或阶级关系之类。他仔细地注意到了，各个社会都具有互相交迭的性质和复杂情况。我所论述的大多数作家，都没有他那种广阔视野，而表现出不如他那样考虑到多方面。不过，他们也信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一种与生物的普遍规律截然不同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哲学理论，这就使得历史更具有科学性，而避免了他们企图取而代之的实证主义的某些过分简单化的做法。他们认为，历史由较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进入到较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旧的形式已经过时，妨碍了发

展。他们力图揭示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相互之间的新关系，并在一定的历史和地理范围内考察各种社会问题。他们认识到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除了别的因素以外，还需要理论上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只有在历史条件业已成熟并能加以估量时，才逐渐形成起来。

## 作家们的研究方法

研究各种思想的历史，通常采取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内在的研究方法撇开社会根源的问题来考察各种思想，认为各种思想本身都有其超出普通经验和不符合任何体系的活力。外在的研究方法则探索各种思想同各种事情的联系，而不是这些思想的相互关系。主张外在分析的人，把各种思想看作变化和生存的催化剂。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内在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总是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各种思想都同人类经验的物质方面有关；而同物质条件无关的思想，则是不可捉摸的，也不符合历史的某个科学的体系。

除了采取外在分析的方法研究各种思想的历史面外，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作家还认为，他们对人类负有特殊的责任，必须毫无拘束地进行批判，以便在他们有阶级层次的社会中实现社会正义。与此同时，他们力图保持诸如多元文化和个人自由这样一些传统。他们一方面而促进一种拉丁美洲意识，即西半球共同利益感，同时又努力维护本地区或本国所独有的特点。

对于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来说，为生存而斗争

常常比从容不迫的抽象思维更重要。有时候，连他们当中最有才能的一些人也感到，要进行宣传而不去从事为少数人服务的科学理论研究。本书试图把宣传和理论分开，并集中于介绍后者。我主要的论述对象是那些旨在对社会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的、对各国进行历史分析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情况下的应用的概括性著作。

我所考察的那些著作的著者，常常受到了仍然盛行于拉丁美洲的中世纪思想的毒害，例如，认为作家不应计较报酬，他们是属于象牙之塔中的人，倘若写作批评社会的文章必担个人风险，等等。他们往往只好靠写作以外的职业为生，而利用业余时间写出文章和著作，却总是很少希望找到出版的地方，并且明知其著作的读者、稿酬和所得到的重视都有限。

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涌现出来。他们虽然往往来自不同的社会，但总的说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其出现都是基于那么一些类似的原因。他们并不全都抱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我不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下一成不变的定义，我就决不使自己在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陷入宗派主义的琐碎争论中去。我对本书所分析的一些著作的著者，有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又称之为社会主义者。我之所以经常不严格地使用这些称谓，既是为了方便，也是由于知道读者对这些称谓的准确性有时是能够正当地加以规避的。应该说，对于我所论述的那些人，有的叫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激进分子或进步分子，也许更好；其余则可以更精确地划分为列宁主

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毛主义者、葛兰西的信徒，以及另外一些什么的信奉者。我在很大程度上信赖著者的自我感觉。因此，象秘鲁的维克托·劳·阿亚·德拉托雷和墨西哥的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这两位很有智慧的思想家，虽然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却分别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常常相信他们自己的话。

在拉丁美洲，对马克思主义思潮接受得最快的，一向不是无产者，而是学生、教授、新闻工作者、专业人员和艺术家。尤其是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如若热·亚马多、胡利奥·科塔萨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sup>①</sup>、巴勃罗·聂鲁达等人接受了它，它在这一地区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尊重。

尽管我所分析的著作的著者中有少数人创作过小说或诗歌，但大多数不是文学家，也不是超越世事思考问题的哲学家。总的说来，他们都是力图解释社会现实的思想家。当然，各人的分析水平大不相同。不过，他们全都考察事实，多数人评价了其间的因果联系，而其中的佼佼者则提出了理论或者抽象的概念。他们所写的基本上是两类著作：有些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来探讨具体问题，另一些人则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些思想家代表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持“温和”或“强硬”态度的不同看法。赞成“强硬”态度的人采取比较刻板的看法，即生产进程决定政治和思想；而主张“温和”态

---

① 亚马多(1912—)，巴西作家。科塔萨尔(1914—)，阿根廷作家。马尔克斯(1928—)，哥伦比亚作家，1982年以其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度的人则遵奉卢卡奇·捷吉尔的意见，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一书中论证说：马克思后期的、也就是没有那么多黑格尔学派色彩的理论，把社会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以物质的因素而不是以思想意识为基本的一方。换句话说，“温和”态度认为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个人道主义者，因为他认识到思想意识也可以影响物质的生产过程。

这些思想家中的一些人可以归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一类，对于他们来说，改善人的处境是首要的目标。为了给本书以更大的游刃有余地，我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归入马克思主义者一类，其根据是他们都以马克思的著作为出发点，而且应用他的方法来分析社会<sup>①</sup>。

这些作家的大多数，不属于思想史上的“贵族”学派；这一派认为，思想和意见来源于知识界的上层人物而向下流传。与此相反，他们大都来自所谓的“平民”学派；这一派认为，上层人物的思想和出自社会中其他阶层的思想是一样的。不过，他们全都情愿把自己看作有义务运用各自的批判能力来非议当局和现行制度、否定传统知识的合理性、探求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思想领域充当领导的知识分子。

为了给下面各章有关部分中所出现的“知识分子”一词下定义，我求助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按照他的“纵”的看法，知识分子就是社会上所有起技术或管理作用的人，如经理、行政人员、官僚、政治家，以及诸如艺术家

---

①. 美国哲学教授伊纳德·霍奇斯和匈牙利籍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由来，意见有点不同。

和学者之类的文化的组织者。按照他的“横”的看法，葛兰西区分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前者认为自己具有本身的特性而独立于居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之外（他们代表着“连最激进和最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中断不了的历史连续性”）；而后者则同他们所在的社会经济结构有更直接的关系，并更自觉地为自己所属的社会阶级效力，其目的常常在于使群众对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表示合意，同时他们也相信这个国家在其一定时刻具有历史所赋予的权利。葛兰西在论述“传统的知识分子”时，认为他们的独立感是一种错觉，并且看到他们不可避免地同其所在社会的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他们真正的使命应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所提出的，与统治阶级脱离而加入革命的阶级<sup>①</sup>。另一方面，葛兰西认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团包括了解历史发展方向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和由革命阶级推举为自己领导人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历史从来不是由有知识的上层人物，而是由意识到自己同人民大众保持有机联系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是一批具有许多共同特点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专门知识，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分析。他们有一种懂得历史甚至或许创造历史的意识。他们的激进主义是理想主义的和行不通的，而不仅仅是叛逆性的产物。他们的兴趣及于两类知识。首先，他们

---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译者注

通过对社会行动作解释性的研究来求得认识，就象那些把各种社会同其前一时代联系起来再现其传统意义从而使这些社会为人们所理解的历史学家那样。其次，他们力求用批判的见解使我们摆脱错觉和无法自取的各种力量的支配。他们否认“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信条，即认为正当的做法是进行中立的分析。然而一般说来，他们也跟自己的资本主义同行一样地客观，而且往往批评这些同行没有认识到一切思想都产生于某种思想基础。

尽管在思想的广度方面，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超过了马克思，但他们都象马克思一样是决定论者，相信人有能力摆布社会，进步乃事物之必然，人性原本善良，同时相信辩证法。首先，他们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当今拉丁美洲的斗争，如同适用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 19 世纪世界条件一样。他们为自己的人民解释马克思的学说，使用历史来作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一种手段。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他们想实现一种“典范性的转变”，即用思想意识来为人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象马克思一样，他们要向工人说明，人们并不是非得贫困不可，贫困决不能归咎于人们的过失或上帝的意旨，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并且能够通过废除这种靠剥夺他人来取得利润与享乐的制度而将它消灭。

## 本书著者的研究方法

需要简略地讲一讲本书的体例。由于我认为，当一代人决定如何对待各种事情时，他们在想些什么，较之他们从哪里

获得自己的想法更为重要，所以我既运用内在分析，也运用外在分析，并着重于后者。我力图确定每个作家同生产资料、某种思想体系以及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关系，同他前后期的各种学说、各种对马克思的态度、各种独特的社会理论以及各种对权力与制度的看法的关系。只要可能，我就考察每个思想家的工作作风，他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概念、对革命的想法、对社会的探究，他同社会运动的关系、组织工作上的成就、在本国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他的思想如何得到贯彻和是否得以持续，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历史意义，等等。

本书触及拉丁美洲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为了避免重复，有些本地区所特有而不止一个思想家分析过的问题，则置于个别国家和某位作家之列顺带加以论述。尽管这些思想家中有许多人是把拉丁美洲作为整体来研究的，但为了方便起见，他们的思想仍然出现在与其出生地或国籍相应的各章里。对于他们的思想，首先是同其国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然后再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考察。我力图断定，这些作家是否因马克思主义而掌握了全局观，因而更喜欢从全世界而不是从美洲的角度来阐述拉美。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向来有一种倾向，即一般都忽视拉丁美洲所特有的思潮，而尤其忽视这一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对马克思的著作谈论和误引多于阅读的美国，从来也没有人写过这类书籍，而且几乎没有翻译和出版过本书所研究的那些材料。在美国的许多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以否定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反理智倾向，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持有异议，认为它不是一种社会哲



学,而仅仅是一种表达不满的手段。我不无遗憾地注意到,在美国历史学会最近的一次集会上,当我公开宣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加考虑的学者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视为定论的学者同样不对时,有两位年轻的会员抱怨我的说法不妥当,并声称他们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毫无所知,却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今后即使没有它也可以照样吃得开。因此,本书的首要目的就是写给那些对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知之甚少的人看的。

与美国已经出版的少数几本以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为论题的著作不同,本书所涉及的主要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和有组织的劳工。这是一部探索性的著作,旨在作为更详细分析的出发点,其中主要是理论和历史的阐述。它提供给读者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地方的广阔而又粗略的面貌,并把集中点主要放在年过半百而其主要著作在1970年以前已经出版的思想家身上。为了不使本书的写作成为毕生的工作(如果这样做,其篇幅之大也难以出版),有些作家如阿根廷的鲁道夫·普伊格罗斯等,就始终略而不提。有几位国际知名的、很有才能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例如秘鲁的阿尼瓦尔·基哈诺(他起了连接新老两代马克思主义维护者的作用),则加以论述。不过,要把象玻利维亚的西尔维亚·里维拉、巴西的瓦尼亚·班比拉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智利的玛尔塔·阿内克尔等等这样一些当今杰出的年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都写成书,那就还有待于另一本专著,也许得在10年以后才能出版。

下面一章所论述的,更多是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

他们的欧洲同行的异同，而不是这些欧洲同行和马克思本人的异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讲的是一种广义的马克思学说，而不是早期或晚期的马克思学说。我的分析本身力图避开马克思主义思潮各个流派的内部争论，但也加以指出并且说明我所论述的那些作家如何对待这些争论。任务是艰巨的，因为这些作家的思想就象马克思的思想一样，在其一生的各个时期中常有变化。他们的早期著作，经常反映出其所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思想，有时只有他们的后期著作才显露出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心理。

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本书不予置评；它所要表明的，倒是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如何阐释这一学说。例如，关于“国家”和“自由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是占有很多篇幅的，而本书却丝毫不予理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尽管可能作为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评注，却非本书的范围；本书也不论述纯粹的经济思想，尽管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作家象马克思那样，都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下面的各个章节都是一般的文字，而不是正正经经的历史，也不是对每个地区或者每个思想家身上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样进行有结构的分析。要完完全全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他的所有拉丁美洲的阐释者的思想了。要研究本书所提到的每一套思想或每一个人，可以花费毕生的精力。我知道，难免有许多疏漏和更多的错误。我也知道，观念学决不能代替批判性的分析，而且需要对观念学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我尽力把下面的各个章节用明白易懂的文体写出来，同

时尽量不背离我所考察的那些著作的著者的语言和思想。本书的一些段落，包含有为数不等的晦涩的表达方式和措词，这多半是反映了我试图准确地再现本书所论述的那些著作的风格。

## 第二章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仅是现存各种关系的综合体，而且是这些关系的历史的综合体。体制不再是压服人，使之与自己同一并处于被动状态的外部力量，而被改造成为自由的手段，成为造就新的伦理政治结构的工具和新的首创精神的源泉。

——安东尼奥·葛兰西

在分析拉丁美洲的马克思学说阐释者们的著作之前，必须了解马克思受到了什么影响以及他如何思考。象他一样，拉丁美洲的马克思学说阐释者们大都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使人能自由思考，也就是使人的思想摆脱教条和一本正经的权威。但和他不一样的是，拉丁美洲的马克思学说阐释者们至今还没有人靠单纯的智力创造出整个的运动。

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认为，他的思想是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容违反或改变的。他改变过他的想法，犯过错误，而他那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智力活动也表明了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有着种种矛盾的。他在不同的时候对社会的不同方面感兴趣。人们不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采取“强硬”还是“温和”的态度，都会同意政治学家伯特尔·奥尔曼的看法。他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很大的不同，在马克思

的思想上没有发生过任何深刻的“决裂”；相反地，在马克思的思想上所发生过的是进化，其趋向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可以用非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把马克思称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这可以取决于读过他的哪些著作和这些著作是什么时候写的。他也许还可以被列为哲学家、人道主义道德家，或者宣传家。按他的思想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民主主义者或权力主义者、渐进社会主义者或革命者、博爱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决定论者或唯意志论者、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等等。况且他的著作涉猎甚广，以致人们可以从中找到或者硬塞进几乎任何并非其本意的东西。

要理解马克思的拉丁美洲信徒们如何阐释甚至歪曲他的思想，就必须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原原本本的实质。我在说明这些实质之前，需要提一下他的一位同胞、同事和财政资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许把这本著作叫做拉丁美洲的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思潮更为适当，因为恩格斯曾不断参与并有助于开扩马克思的思想。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8）一书中就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他论断说：把一切存在的事物都看作物质并且应用辩证逻辑，就可以认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而辩证逻辑则把各种矛盾看作各种思想的富有成果的冲突，从这种冲突中可以辨别出来更加完全的真理。

恩格斯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才华横溢的学生。在本书中，为了方便起见，他的思想经常被认为是可以同马克思的思想互相替换的。恩格斯宁愿把他和马克思共同提出的理

论归功于马克思，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一直有这样的倾向。他在为自己的朋友发表葬礼演讲中特别提到，正如牛顿发现了行星运动的法则，马克思发现了哺育出中产阶级并为其服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运动的法则。恩格斯于是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进化法则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界进化法则的发现，看作有同等意义的大事<sup>①</sup>。

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认为，他提出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而是认为，他把新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各种复杂的情况，以便产生新的认识。他强调说，理论要加上行动，才能引起变化；换言之，仅仅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说明历史的变迁是不够的。他认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取决于不受人类支配的自然法则，而取决于人类如何体察情况和采取什么行动。他辩证地看待社会，不认为它永远不变，而认为它在不断发展，并且找出了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同性质的各个阶段，即其社会经济形态。他是有独创性的，因为他断言，历史是辩证的，同时又取决于经济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发展持有一种决定论的见解。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一成不变的社会学法则，使人们得以预言社会主义必然到来。他们抨击了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但很少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头一步不能不是理论阶段；他们宣称，在采取行动来纠正有害的现存局面之前，就得研究和了解这种局面。

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是争取人类自由以及为实现这种

---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379页。——译者注

自由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持续斗争。他的历史理论以四大要素为基础，即生产方式、社会动力原则或辩证法、阶级斗争、思想根源。他认为，通过运用这四种手段，就可以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评价，还可以用历史来为建设新制度提供理性的指导。

马克思把一切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变化都纳入历史的法则。他的历史理论是乐观主义的，也不建立在搞阴谋的基础之上。他认识到，大多数人只能而且只是在所处时代的范围内进行思考；但他强调说，必须想想过去，也想想未来。象他的拉丁美洲信徒一样，马克思认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凭空捏造”<sup>①</sup>；个人在社会中起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聚合即集体的作用。

我在探讨本书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成分之前，需要先就术语问题讲几句。马克思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然而遗憾的是，他不时用了一些字眼，既不得体，又不精确和明晰。他的阐述，往往是用自己的论据来说明自己的想法。例如，他在谈论社会关系时，就既提到了人，也提到了机器。他缺乏准确性和独特的表达方法，这使得他的门徒几乎可以放开手脚来解释他，或者以自己的想法来填补他思想上的空白。其结果就是，现今马克思主义词汇中的许多语言，马克思本人怕是认不出来了。例如，他从来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说法，而且总是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

① 马克思原话出处不详，此处按原书引文翻译。以下未加注出处的引文皆同此。——译者注

义”这两个词交替使用，就象我在本书中有时也采取这种做法那样。

恩格斯充当了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阐释者，力图使他的朋友以及他自己的思想得到公认。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他证明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在这本著作中，他力图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变为无产阶级的生活哲学。恩格斯推广了他的同事的成果，使得当时的其他富有经验的思想家很快就了解到，马克思抛弃了形而上学的认识基础；他把黑格尔的先验的辩证法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社会关系和唯物主义，从而主张一切社会现象是一个互有紧密联系的科学的综合体；他从考察社会诸因素的相互联系着手，来发现各种历史关系，并借以分析各种问题；他力图了解解放工人阶级和促成社会革命或建立新社会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提出的思想的感染力，已经超出了知识分子上层人物的圈子。他的一套想法吸引了对资产阶级社会不满的一切类型的人们，而且鼓励他们倾诉自己的苦难和努力采取旨在翻身的行动。他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控诉表明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转的，以及由于从事生产的工人经常不断地同生产资料所有者及其控制的国家在组织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上发生冲突而如何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马克思认为，社会和政治关系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以及他们为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建立的生产方式；而人们了解了变化所由发生的途径，并且理智地参与社会的各种行动，就可以合理地安排世界，并满足自己的需求。在马克思看来，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也不



是按照直接面临的、具备的和留传下来的情况进行创造。世世代代的传统有如梦魇，压在活人的脑子里。”

他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论证了社会诸关系在一定的情况下起决定的作用，但人们在其他时候和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打破这些关系而调整社会现实。

马克思声称，他无法提出一套方法来解释不断运动的社会，他的想法也不得不经常修改。因此，他提供给后来的思想家的，基本上是一种模式，连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能把它当做一种有助于认识事物的方法而加以应用。

在这里，讲一讲马克思所不相信的几件事，也许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记住，他在晚年的时候经常批评他的一些门徒的教条主义。他并没有设想自己的思想是一种新的哲学，而认为是一种看法，其中包含着对人类及其世界的见解。他并不认为自己创立了一套新的政治信条。他决不希望看到要放弃“个人自由以实现集体的人的想法，而认为社会不应当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抽象概念”。

马克思首先关心的是资本主义，这一词语在下面将要反复用到，因而应当加以解释。他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抱着相信发展即相信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远景的信念，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带有它自身衰败的种子，社会主义最好是理解为脱胎于资本主义。在他看来，现代的资本主义始于16世纪，也就是拉丁美洲被征服的那个时候。他认为，国际劳动分工从那时以来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导致的后果。他用自己的理论去联系美洲各国时，在1848年说过：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sup>①</sup>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有三大弊病：第一，它的首要目的是利润，而不是人的发展；第二，资本是社会劳动的集体成果，但企业却由决定社会劳动过程的私人资本家所支配，因而产品的分配不是由社会来进行，而是根据资本家的意愿；第三，资本主义缺乏通盘的秩序，因为每个资本家能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于是在不知道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同其它资本家争夺市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和工人被固定在一种共生关系中，这种关系为前者增殖财富而为后者加重贫困。他设想有一个辩证的过程，能使财富与贫困经过它最终产生出一个没有苦难与剥削的无阶级的社会。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所特有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这种统治是由一场民主革命带来的。他意识到，除非到了由一场工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资本主义的时机业已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将一直供养着资产阶级。

马克思建立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靠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戴维·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思想，他们两人都企图使经济因素脱离政治和社会影响。和他们不同，马克思表明了，经济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支撑经济结构所必需的社会结构的范围内起作用的。他并不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各个方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7—458页。——译者注

面，但断言生产方式即基础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及其变化的最基本的方面。在他看来，经济决定论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当他的阐释者们完全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来分析他的学说时，他曾经宣称：“那么，以我所知，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正如马克思声称自己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一样，他也不接受那种认为他首先提出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概念的意见，而认为第一次提出这些概念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然而，他却接受了这样一份功劳，那就是，他表明了阶级的存在同生产方法的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期间不可缺少的因素<sup>①</sup>。

马克思从集体的意义上使用“阶级”这个词，是指以其单个成员所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和活动的群体。他用阶级来分类，并不意味着他剥夺了个人所独有的特性。但他认为，阶级关系制约个性。他的最终目标是形成阶级意识，其中包括独特的思想体系、世界观以及旨在维护或变革现存制度的行动纲领。

他认为，只有通过阶级分析，才能找出和了解权力关系。例如，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他进一步论证说，国家建立起“秩序”，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从而使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看，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说：头领专制<sup>②</sup>在历史上一直是地主贵族通过

---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译者注

国家来永久维持其阶级统治而采取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不是解决人的福利，而是保护财富。

马克思在1846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构成统治阶级，它支配经济，建立各种组织机构和制度，甚至制定某种思想方式，以证明其创立的制度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对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见解，不应当采取过分简单化的看法，例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总是唯资本家阶级之命是从。”在他看来，阶级统治比起这种把政治进程仅仅归结为某个阶级的意志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的肤浅概念，是具有远为丰富也更加复杂的含义的。

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和阶级分析，以发展他对革命的想法，认为革命体现了西方人道主义中那些永恒的准则。他打算把自己的著作作为解放无产阶级所必需的行动指南，而不是作为革命的纲领本身。他从来也没有刻板地指明无产阶级要如何实现自己的革命作用。他在谈到革命必不可免的同时，强调必须由想要革命的人来发动。

马克思厌恶无谓的杀戮，因而并不主张暴力是革命最重要的因素，倒是认为旧制度主要是由于包含着矛盾才毁灭的。他主要关心社会革命，看到这是生产方式中的矛盾演化的结果，即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对抗，表现为阶级冲突，最后推翻国家。他认为，一个阶级从另一个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需

---

② “头领专制”在过去国内有关拉丁美洲的论著中一般音译为“考迪罗主义”，即头领（“考迪罗”）操纵政党或政治机构从而对政治进行控制。——译者注

要使用暴力，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例证足以说明，统治阶级不是在暴力下放弃其统治的。但一旦取得了政权，就要建设新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而这些组织机构和制度是可以建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的。他不把社会革命看得完美无缺，而把它看作乌托邦和历史的现实之间的互相让步。

门外汉通常把马克思和革命思想联系起来，还经常把一些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错误地归因于他。尽管我们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研究帝国主义，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专攻的问题。他和恩格斯都表现过对帝国主义的关注，而且指出它对人类的有害影响，特别是象它在印度和爱尔兰所起的作用那样。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形成过对帝国主义的系统看法。所有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学说的阐释者们搞出来的，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出发点是列宁的学说。

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简单地看一看马克思对拉丁美洲有些什么了解和想法。黑格尔在他的关于历史哲学的讲演中，曾经把美洲叫做未来的土地。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知道黑格尔的看法，但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关注却从来都是间接的或肤浅的。恩格斯对于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文明具有粗略的知识，对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组织具有模糊的概念。这是通过阅读赫伯特·H·班克罗夫特的那些很有名气的作品得来的<sup>①</sup>。马克思看过威廉·H·普列斯科特的关于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书，对秘鲁印加人的劳动分工有了一些见识。他看到印加社

---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61页；第35卷第120页。——译者注

会的生产是建立在公有制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私有的个人之间货币交换准则的基础之上<sup>①</sup>。他从欧洲人要经过非洲环航世界这个方面来论述过美洲的发现，还从对世界的关系来论述过美洲的殖民地化问题。他懂得征服美洲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他了解寻找“黄金国”一事，这是英、法两国对这一地区的野心；也知道在这里找到的贵金属对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所起的作用，即加速了欧洲的工业化<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关于美洲的发现和征服的简短论文中，分析了此事对欧洲社会而不是对美洲的影响。马克思认为拉丁美洲贸易的扩大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基本因素。

马克思为报纸写过一些文章，论述拉丁美洲的独立和西班牙对失去其美洲殖民地的反应，以及它在19世纪中叶要恢复一部分美洲帝国的愿望<sup>③</sup>。他发表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的一些文章，论述了保证秘鲁获得独立的阿亚库乔战役和西蒙·玻利瓦尔<sup>④</sup>，但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他并没有自称

---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3页；第13卷第50页；第24卷第133和168页。——译者注

② “黄金国”是旧时西班牙征服者想象中的南美洲。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65页；第4卷第467页；第9卷第175页；第12卷第72—73页；第23卷第819、821—822和827—828页；第24卷第528页；第25卷第1022—1023页。——译者注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94和505页。——译者注

④ 阿亚库乔战役是1824年12月9日拉丁美洲人民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一次著名战役。马克思关于阿亚库乔战役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72—173页；关于玻利瓦尔的论述见同书第225—241页。——译者注

很熟悉拉丁美洲或玻利瓦尔，而是写这些文章来赚点钱，以免于挨饿。他的关于玻利瓦尔的叙述性而不是分析性的文章，把这位拉美人描绘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独裁领袖，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运动可能是殖民地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步骤。他得出结论说，玻利瓦尔倒不是以其辉煌业绩来自肥，而是把自己的差不多全部财产耗费在“人民的事业”上。他还说，尽管玻利瓦尔爱好“享乐、名望和权力，但热爱祖国和自由却是其主要情感”<sup>①</sup>。马克思也许了解玻利瓦尔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几乎没有注意到其在南美洲的克里奥耳人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而这些克里奥耳人是想要取得对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并使自己在这里的利益得以永远保持下去的。从我们的目的来说，论述玻利瓦尔的这篇不可靠的文章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显示了马克思反对进步的独裁，认为这只能使人民作好准备去反对它，而不是让人民有所准备去实行民主。

阿根廷历史学家豪尔赫·阿韦拉多·拉莫斯曾经提出假说，马克思在论述拉丁美洲独立的问题时，正在形成他对民族问题的想法；他是从拉丁美洲的一位立法机构成员迪奥尼西奥·因卡·尤潘基那里获得了这样一个概念的，即“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sup>②</sup>

---

① 以上本书著者引述马克思对玻利瓦尔的熟悉情况，以及他对此人的评论，按原书所注出处分别引自德国迪茨出版社的《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80页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第3卷第10页所载马克思文章，而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均未能查到。——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0页。——译者注

马克思的著作对于墨西哥遭受到外国干涉，特别是对于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在19世纪40年代所进行的“游击战”，也表现了关注<sup>①</sup>。恩格斯曾经论述过，美国想要获得加利福尼亚的矿山和西进太平洋沿岸的通道。他看到美国在同墨西哥交战中取得了领土，用以创造新的资本和保护其可望作为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の特旺特佩克地峡<sup>②</sup>。他还认为，美国预计要敷设一条横贯大陆而以加利福尼亚为终端的铁路，作为扩大商业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美国并吞加利福尼亚，是要开辟对智利和秘鲁、再进一步对亚洲的贸易，从而使巴拿马地峡具有了战略上的重要性。经过对大西洋至太平洋所有可能的运河路线方案的一番考察，他们断定巴拿马运河方案最为理想<sup>③</sup>。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表现了对古巴和波多黎各境内西班牙驻军的关注<sup>④</sup>。当时，他的著作表明，他知道美国害怕俄罗斯的扩张，也许还认为门罗主义便带有阻止扩张行动的意图。他同样知道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他声称，詹姆斯·布坎南是靠了发布1853年的《奥斯坦德宣言》，才弄到美国总

---

① 墨西哥和美国的“游击战”指前者对后者1846至1848年侵略战争的武装抵抗。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50、381—393、496—497、499—504、524—526和553—555页；第28卷第410—411和415页；第30卷第224—225、237、300—301和365页。——译者注

② 墨西哥东南部地峡，介于墨西哥湾和太平洋之间。——译者注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2—263和507—510页。——译者注

④ 我们看到的论述文章只有恩格斯的作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35—536页。——译者注



统一职的<sup>①</sup>；而这个宣言宣布，美国要用付款的办法或用武力来取得古巴，并且声明获得古巴是国家的一大目标。

马克思谴责了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在 19 世纪 60 年代对墨西哥的占领<sup>②</sup>，认为这是极其丑恶的行为，同时把这次干涉称为针对美国的更大行动的前奏，并预言这一行动会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而必然发生。1861 年，马克思特别提到了美国土地投机商对墨西哥的奇瓦瓦州、科阿韦拉州和索诺拉州的兴趣。他指出，白宫指挥了在中美洲煽动叛乱的美人，并且推论说，美国的许多人都把拉丁美洲看成是一个具有扩大奴隶制的巨大潜力的地区<sup>③</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中写道：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sup>④</sup>

马克思知道，在拉丁美洲贩卖非洲奴隶，一开始就为欧洲的制

---

① 布坎南(1791—1868)于 1854 年任美国驻英国公使期间奉命会同美国驻法国和驻西班牙公使在比利时西部城市奥斯坦德讨论古巴问题，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一份文件(即《奥斯坦德宣言》)竭力主张美国夺取古巴。布坎南对此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得到美国南方奴隶主的拥护而当选总统(1857—1861)。——译者注

② 指 1862 至 1867 年法国企图把墨西哥变为附属国的武装侵略以及英国和西班牙最初出兵参加占领墨西哥领土。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381—393、496—497、499—504、524—526 和 553—555 页。——译者注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351 页。——译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19 页。——译者注

造业主和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本。他把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剥削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他认为这两种奴隶制比无产阶级受压迫还要坏。他提到过古巴、巴西、牙买加、墨西哥、苏里南和美国都存在着奴隶制，也谈到过1854年秘鲁废除奴隶制以后中国苦力工人在那里所处的奴隶状态<sup>①</sup>。他把奴隶制看作殖民地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步，也是建设资本主义所必需的。

到了19世纪末，恩格斯对于法国资本的巴拿马世界海洋运河公司打算建造一条横越巴拿马以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路的计划，表现了很大的关注<sup>②</sup>。19世纪80年代该公司破产时，很多人大赔其钱，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丑闻<sup>③</sup>。恩格斯把这一夭折的冒险事业，以及2·2万名拉丁美洲、中国和印度工人在试图修建这条运河期间毫无必要地遭受欺骗一事，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缺点和残酷性。他认为，围绕着运河失败的宣传足以形成支持社会主义的情绪，而巴拿马由于具有比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多得多的欧洲色彩，将会是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基地。恩格斯知道，巴黎公社的灭亡已经使得它

---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78和544—545页；第16卷第397页；第23卷第191、821—822和827—828页；第27卷第483—484页；第28卷第269—270页；第29卷第340页；第31卷第162页。——译者注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20—522、526—532、536、539—540、543—545、547—548、552—554、556—557和561—562页。——译者注

③ 即“巴拿马丑闻”，是19世纪90年代围绕开凿巴拿马运河而发生的法国大贿赂事件。——译者注

的许多社会主义支持者流落到了拉丁美洲，第一国际已经于1872年在阿根廷建立了第一个支部，<sup>①</sup>因而他对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创立共产主义运动抱有强烈的兴趣。

## 马克思学说的主要阐释者

在考察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时，如果不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一些说明，这种考察就会不全面；而如果不看看拉丁美洲思想家们据以作出推论的马克思学说的主要阐释者们的一些信念，这种考察也会是马虎的。首先是弗·伊·列宁，这位20世纪的俄国革命家指出了怎样去贯彻马克思的思想。列宁毕生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其组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分配和交换以及使每个劳动者都参加国家管理的人民民主。

列宁从来不承认他修正过马克思的思想，可是他卓有成果地使它适应于俄国的条件而确实改变了马克思的思想，从而为拉丁美洲这样一些落后社会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创造了一种理论模式。在他那50多卷的全集中，列宁只有18次提到了拉丁美洲，但他关于革命主观条件以及社会主义者准备同时用武装起义和议会手段夺取政权的意见，在这个地区一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列宁致力于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为现

---

<sup>①</sup> 据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中文版第523页引用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工人政党》一书的材料称，巴黎公社的流亡者爱弥尔·多马士在阿根廷成立了第一国际的分会。——译者注

实。在他的祖国的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位俄国的理论家和行动主义者把知识分子归到无产者一类，这些人一般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领取薪金的。他认为，必须消除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每个劳动者都必须有接触一切种类的文化和充分发展其才能的机会。这些意见后来都被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者采纳了。

对于他的拉丁美洲拥护者来说，共产国际意味着：(1)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其他国家可以仿效的；(2)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共产党；(3)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4)消灭殖民主义；(5)以革命毁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宁强调政党在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和成为革命先锋队方面的作用。他相信，在必要时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或合作是有效效的，但并不认为要服从这些党。他强调，对群众的政治教育比起议会中的些小胜利更重要，后者在一场社会革命开始时还不如一次成功的起义。

列宁不象马克思那样把社会革命看作根本的行动，面认为社会革命就是政治革命。他决不容忍改良，也就是渐进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农民虽然落后，但他们在尚未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却显示出其革命的潜力。他指出革命的决定因素是政治组织的性质，而不是社会或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阶段，这就使马克思的思想更切中拉丁美洲的情况。他强调无产阶级可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面不是在其后夺取政权，从而改善了马克思的学说。他信奉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强调战争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政治采取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认为，军队一旦被

灌注了革命热情，就能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和革命的担当者；这一思想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是古巴革命<sup>①</sup>的发动者们所赞同的。他曾经告诫说，在革命胜利以后，国家有被上层官僚控制的危险。

大概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见解，使他同拉丁美洲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以约翰·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2）和鲁道夫·希法亭的《财政资本》（1910）为依据<sup>②</sup>，表明了资本主义到1900年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程度。他说，垄断资本家向国外投资以寻求利润，产生了帝国主义，使他们能够通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控制，从国外地区榨取利润而暂时维持下去。他预言这种状况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在他看来，德国和美国集中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分布不平衡。他指引民族主义去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赋予它本身所没有的革命威望，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特别切合于受欧美投资影响的、就象拉丁美洲那样的非工业化的不发达地区。

列宁读过阿尔伯特·B·哈特的《门罗主义》（1916）一书，提高了他对“保护国”的发展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的认识<sup>③</sup>。他提到过拉丁美洲的共和国是一些“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其实在财政和外交方面却处处依赖他国”<sup>④</sup>。他的观点成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拉丁美洲的一

① 指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1958年取得胜利。——译者注

② 参阅《列宁全集》第22卷第190和234页。——译者注

③ 《列宁论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1970年版第608—609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255页。——译者注

些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接受的依附性问题的立论根据。

对拉丁美洲的思想一直发生影响的第二个马克思学说的阐释者是列夫·托洛茨基，他的想法从30年代以来就在这个地区有影响。该地区的许多组织虽然代表着对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的不同观点，却都自称为托派。美国一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阐述者唐纳德·霍奇斯认为，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分裂为战略和政见各不相同的许多派别。但他们一般都不接受斯大林关于革命首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然后经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论点，而接受托洛茨基关于这两个阶段套叠在一起、视革命为一个单一过程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和托洛茨基一样，希望发生世界革命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由生产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便成为统治阶级。他们还强调这个俄国革命家关于必须反对官僚主义的意见，因为官僚主义倾向于自上而下的领导，从而篡夺人民的权力。

阿根廷思想家利沃里奥·胡斯托(又以笔名“崩断斧”<sup>①</sup>著称)认为，近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有两种明显的倾向。按照胡斯托的看法，一派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强调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地位以及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把民族资产阶级描绘为工人的主要敌人；赞成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斗争；认为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承认中国革命对该地区的现实意义。另一派则强调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地位；把帝国主义看作该地区的首要敌人；提出反帝的土地革

---

<sup>①</sup> 一种木质坚硬的豆科树的俗名。——译者注

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对拉丁美洲有重大意义。

尽管斯大林从未放弃国际革命，但他认为革命能在一国胜利，即使这个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阶段。他的同胞托洛茨基则认为革命必须超越国界才得以保存下去；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对于革命是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必须领导革命。他还主张把农民结合到社会主义制度中去，而不是容许他们继续成为可能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

就在1940年他在墨西哥被暗杀之前，托洛茨基写了许多论述拉丁美洲的文章，其中指出该地区的法西斯主义是依附的表现，并且断言必须开展反帝斗争以消灭法西斯主义。他认为睦邻政策<sup>①</sup>的实质就是门罗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其目的是要在华盛顿的霸权下统一西半球。他悲叹美国支持古巴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和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这样一些独裁主义的领导人。他为该地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下把工人（有时还有农民）组织起来的日益增长的趋势而感到忧虑。他认为反对独裁主义最好的斗争方法是土地革命，同时他主张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甚至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合国，以坚持为反对睦邻计划所必需的不断革命。今天的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者效法他，不断地提醒其他社会主义者注意奉行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政策的危险。

近几十年间，拉丁美洲的思想家除了应用马克思、列宁和

---

<sup>①</sup> 1933年美国总统一罗斯福(1882—1945)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着重改善同拉丁美洲关系的方针。——译者注

托洛茨基的思想,还应用毛泽东的思想来寻求革命的模式。毛的巨大吸引力(特别是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于他的人道主义,以及他强调人比黑格尔主义国家更重要;他能把马克思学说批判性地适应于非工业的中国社会,并且强调创新的而不是模仿的革命思想。毛接受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历史条件和必须采取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行的意见。他强调世界革命并非要在无产阶级的集中地发动,而可以在殖民地或农村地区开始,从而使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地区转到农村地区。他发展了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党,坚持农民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联盟,强调以农民游击战为基础的军事斗争。在毛看来,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sup>①</sup>。他认为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因为它们是世界农村,而控制了这些地区,就封锁了原料和市场,使世界帝国主义遭受挫败。

毛从他的故乡湖南省的一位17世纪的反满哲学家王夫之那里得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政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就象人性和社会风俗可以改变一样。他从同一位思想家那里接受了这样一个信念,即行动比思想更可能促进变革。他把这些概念增添到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里去。尽管他也用对立力量并列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但他坚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虽然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限制,从而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见解提出了异议。

毛从列宁那里接过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无产阶级觉悟不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译者注



是由无产阶级自发地产生出来的，而必须由优秀分子即先锋队加以促进。与列宁不同，他认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可以同时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矛盾。拉丁美洲的思想家由于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传统，所以能够赞同他旨在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大胆的政治和社会纲领及其关于工人阶级只有民族解放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即这个阶级动摇于革命与反动之间，它拥护资本主义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他坚决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非买办的资产阶级，因为它还没有勾结帝国主义而背叛国家。

毛把帝国主义称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的主要煽动者，并且给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增添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依附性社会中的敌对阶级由于反对外国剥削的共同要求而联合起来了。他强调一个有政治觉悟、武装起来和有献身精神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他还认为是人而不是武器赢得战争，有决心取胜的人民能够打败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

最后，毛不接受列宁关于党的领导人带着革命纲领到人民中去的思想。他认为必须由人民来制定纲领，他们是教育人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教育的对象。拉丁美洲的毛主义者也修改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他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容许社会主义蔓延开来，所以强调只有继续革命才能使社会主义在世界力量对比中获胜。

意大利新闻记者、共产党领导人、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的思想，从它在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中

间流行的情况来说，最近已经比毛的思想更受欢迎。葛兰西从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那里认识到，历史研究用过去联系现在又将现在联系到未来，这就优于其他一切智力活动。葛兰西把历史学家的岗位看成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他精于写作，写得有创造性、客观和不懈可击。他的见解很有启发性，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就连他那些看来近似别人的思想的想法，也是经过独立的批判性分析才得出来的。

葛兰西认为人的意志能够超越历史和个人经验的局限性，并且断言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发扬民众的创造精神、文化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论证说，一个阶级之所以能够统治别的阶级，不仅仅由于它具有经济上和物质上的力量，还由于它能够说服被统治者接受它的一套信念，也就是共同遵奉它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准则。为了引导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主张造就一种以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组成的“历史性集团”为中心的新文化的一致。他预料这一“历史性集团”由于有能力解决国家的各种问题而终将行使思想和政治上的统治权。他极力主张自己的党把党员安插到舆论界和出版社去，把知识分子和教员争取过来，以着手影响文化。

葛兰西怀疑这样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改变经济基础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认为阶级斗争既是走向根本变革又是走向改变经济基础的首要步骤。葛兰西强调必须研究文明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的历史发展，认为文明社会可以达到意见一致而政治社会则趋向于阶级专政。在他看来，意见一致的秘诀在于解答文化和统治权(阶级统治)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他提出下列问题：文明社会如何获得其结构？什么思

想潮流影响这个过程,以及它通过什么渠道(就哪些历史已决定的社会力量而论)来运转?它如何能得到彻底改造以达到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自由主义没有处理的问题,并且强调社会主义必须促进人类的文化统一以做到这一点。为了改善社会状况(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理论探讨必须对一切新的稿件开放,而且必须不断地根据历史情况和群众经验来加以检验。

葛兰西坚决主张党必须提供直接的实际利益和对未来的希望,必须组织工人群众,然后对他们和中间阶级施加压倒的影响,以便建立一个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国家。他不接受那种等待必不可免的革命到来的想法,而极力主张党去发展群众中的革命意识,要他们准备进行广泛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革命。他认为,这些革命时而处于主动状态,时而处于被动状态,从而使不断革命有张有弛。他坚持认为革命运动能够持续不断,尽管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预言那样还没有被消灭。因此,他给意大利和拉丁美洲这样一些地区实现社会主义重新提供了希望。

葛兰西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出发,为开明的知识分子架设了一座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要他们成功地利用上各种开明的国内组织机构与制度并使之转而解决资产阶级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那么这座桥梁就是极其重要的。葛兰西指出了造就一种新的文化一致的办法,这就是知识分子通过培养历史意识并向其他人加以阐释而领路前进。他对知识分子在意大利社会中的作用的关注引起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对他的兴趣,就象我们在下面各章

中将会看到的那样。

葛兰西强烈的思想感情，他那精练有力的文风，还有他思维的严密性，都吸引了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和他一样把实证主义看作只是力图使社会的特权阶层得到发展的主要哲学体系。他们赞成他决不言从其他地方使用的策略和战略，以及他坚持意大利共产党采取符合意大利历史条件的政策，认为就历史条件来说意大利比马克思的英国或德国和列宁的俄国更近似于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他们同意葛兰西的下述看法，即拉丁美洲如此盛行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暴力的非法方面……是企图用机关枪和手枪来解决生产与交换的问题”。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家赖以维持其经济制度的唯一办法，这一意见促使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增强了力求消灭资本主义的紧迫感。

葛兰西论证说，俄国革命开始时，尽管列宁提出了城市无产阶级是运动的先锋队的理论，却是农民推动了革命并且给革命以大量的支援。他对意大利需要有广泛支援基础的见解，同样适用于更具有农村而不是城市特点的拉丁美洲。在意大利就象在拉丁美洲一样，农民总是指望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或教会充当政治领导。葛兰西主张把农村组织起来以打破农民所受的这些传统的控制，并且强调必须反击有组织的教会所进行的很有效力的宣传。他致力于创建一支民兵队伍，让农民能借以进入政治生活，并且认为工农联盟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不可缺的因素。

葛兰西的六卷集《狱中笔记》(1948—1951)是了解在保守的独裁社会中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问题的极具有用的工

具。他研究发展意大利社会的方法，特别是他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为统治权而战斗的思想，给有志于在拉丁美洲实现变革的人们提供了可行的模式。

## 历史背景

卡尔·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发源于西方世界的思想史，主要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传统和18世纪的理性主义。学者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祖先追溯到诸如第一个提出关于社会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等先驱者，追溯到为“人人平等”而斗争的斯巴达克，还追溯到16世纪初主张自由而反对国王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卡斯提起义者<sup>①</sup>。人们可以从19世纪以前的历史中找到很多例子来说明阶级冲突、工人团结、民族解放、社会革命和帝国主义，以及证明采取暴力来消灭专制统治是正当的。不过，这种追溯考证的工作并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因为本书考察的是马克思及其阐释者们的思想如何被成熟的思想家们接受、拒绝、修改和适用于拉丁美洲的实际。

拉丁美洲曾经因为寻找资本的、有阶级意识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奉命扩大其伊比利亚祖国的帝国版图而被开拓为

---

① 1520年7月卡斯提的十一城市议会组成“神圣联盟”为维护城市自治权而发动各阶层人民反对查理五世（1519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前，称查理一世）专制的斗争，由丁夫贵和中等贵族相继脱离运动而于1522年被镇压。——译者注

殖民地，所以提供了很适合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历史情况。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哥伦布到达后的 250 多年间还没有传入美洲，但在殖民地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些伊比里亚传统却间接地有助于某些方面的人士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潮。例如，尽管殖民国家不提倡思想家去怀疑现行制度的理论依据，却鼓励占统治地位的白人上层当中的教育事业，因而出生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领导人以及克里奥耳人的领导人在独立以前就爱上了欧洲的新思想。

独立以后，拉丁美洲在国际关系方面产生了一些新思想，但在政治思想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这些新国家的思想家在试图创立其本国的哲学体系时，期待美国的思想启发和支持，但也试验过欧洲出现的每一种新式的政治思想。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一种向国外寻求可用以解决其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思想观念的传统。

把社会弊病归咎于现行制度面向外国寻求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有时候比在本国寻找解决办法要容易些。马克思主义不是作为一种成熟而可行的本地学说出现在拉丁美洲，而是作为年轻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慢慢吸收的一种意识形态逐渐进入该地区的。

19 世纪 40 年代引人注目的新的欧洲社会学说之一，是法国人亨利·圣西门(1760—1825)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是阶级分析的早期实践者，社会发展劳动与资产的作用的研究者，把社会改革看作政府主要职能的鼓吹者，以及无产阶级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统一体的信仰者。除了圣西门的思想外，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移民还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尔·傅

立叶(1772—1837)的思想带到了拉丁美洲。傅立叶著名的无处不有“吸引力”的学说断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力量把人们联合起来采取行动,而这种吸引过程中的障碍所引起的反社会行为,在障碍得以消除时就会减少而利于普遍的和諧。傅立叶的理论影响了一些知识分子,如阿根廷的何塞·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和智利的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1823—1865)等人<sup>①</sup>,后者曾经参加了1848年的巴黎街垒战。但在这个时期,就大多数来说,拉丁美洲的思想家(一些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中产阶级人士)感到实证主义更合乎心意,而对社会主义并无反应。

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仍然支配着拉丁美洲的思潮,尽管他在财产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问题上早就同圣西门的门徒们闹翻了。孔德的哲学在性质上属于决定论,强调科学和理性,给人以带来拉丁美洲人所向往的“秩序与进步”的指望。

在19世纪60年代,有少数阿根廷知识分子熟悉了马克思为之起草原则声明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劳工国际)的想法,把马克思的思想传播到智利、古巴和墨西哥。1870年,智利历史学家本哈明·比库尼亚·麦肯纳写道:

“国际的成立本身就是一次革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大进展,是一场革命的预兆——这场革命将

---

<sup>①</sup> 埃切维里亚是阿根廷诗人、作家、政治家,曾组织秘密团体“五月协会”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因受迫害转到国外活动,长期侨居乌拉圭。比尔瓦奥是智利思想家,曾组织“平等协会”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译者注

使剥削者面临要向整个剥削制度给予致命一击的有组织的工人。”

欧洲移民(有些人是在巴黎公社、意大利复兴运动和西班牙为废除君主政体的斗争<sup>①</sup>中暴露了的)给拉丁美洲带来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偏爱和对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一些巴黎公社社员于187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第一国际的支部,出版了阿根廷的第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劳动者报》。他们的影响超过了拉普拉塔河而扩大到乌拉圭,并于1874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国际的支部<sup>②</sup>,当时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手工业阶段,工人们尚未组织起来。

欧洲的殖民地扩张是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达到高峰的。反对资本主义尚非时尚,连英国和法国也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资本论》于189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这是该书第一次在拉丁美洲用西班牙文印行,其时第二国际已在巴黎成立了6年。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正义的思想在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想家和社会思想家当中还不流行,因为其中大多数人属于统治本国的权贵,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经济发展。

这期间有千百万美元的美国和欧洲资金流入了这一地

---

① 意大利复兴运动指19世纪意大利人民争取解放和统一的运动。西班牙为废除君主政体的斗争指西班牙人民反对斐迪南七世(1784—1833)及其后的封建专制统治。——译者注

② 据维克托·阿尔巴,《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劳工运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46页,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成立第一国际支部是1872年。——译者注



区，促进了新的工业和造就了一些新城市并且扩大了旧的城市中心。该地区的知识分子希望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中心得到启发，以有助于解决自己国家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为该地区新工业提供劳动力基础而引入的欧洲移民，则带来了激进的思想。他们当中占优势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既指望工联主义能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又主张罢工以导致消灭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非常相信总罢工是工人得以控制工业的手段。为了追求比他们在欧洲更好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这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人组织起来，提名候选人竞选公职，为制订福利计划和社会保险立法而进行鼓动，为 20 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打下了基础。

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在 19 世纪表现得非常相信自动的进步和渐进的改良，但该地区的种种问题得不到解决，使其中许多人在 20 世纪转向激进的资产阶级改革或者有组织的社会主义革命。随着 20 世纪向前推移，该地区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事务中去，便没有多少思想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了，而对各种不同类型可供采用的社会主义方法增长了兴趣。

20 世纪初，英国资本扩张所促进的轻工业、小行业和商业在拉丁美洲发展起来了。1900—1910 年间，欧洲人灌输的社会主义在该地区获得了拥护者，在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和乌拉圭的工人中尤其有力量。各国社会党都强调要实行八小时工作日，降低生活费用，改善劳动条件，有罢工的权利，征收遗产税和实行免费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短暂地中断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工

团主义和列宁主义等思想的涌入拉丁美洲，而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始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且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然而，该地区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大战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经常敦促自己的同胞对欧洲这场冲突采取和平主义的路线。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重新唤起了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工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兴趣。尤其是在那些有社会党的国家里，思想家和工人们成功的俄国革命表现了同情。思想家如阿根廷的何塞·因赫涅罗斯和巴西的利马·巴雷托等人赞扬了通称“最高纲领派”的布尔什维克。到了1919年，列宁的作品已经在拉丁美洲国家翻译和发行了。知识分子和工人们读了他论述社会主义与战争、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左翼共产主义的著作，特别对他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发生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开始按照本地区出现的问题来阐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而特别着眼于那些因正在扩大的生产力和以大庄园为基础的落后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以及英美对基本经济部门的控制而造成的问题。

阿根廷1918年旨在使学生对大学管理有更大发言权的大学改革运动蔓延到整个拉丁美洲。它的许多大声疾呼的拥护者表示信仰激进政治和社会主义，并在后来的岁月里都成了该地区的民主派政治领袖。

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世界革命事业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到了1922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墨西哥和乌拉圭都有了共产党。拉丁美洲

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如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通称共产主义而与倾向俄国的共产党有联系；另一部分是与该地区各国社会党相联系而有较多空想社会主义成分的哲学体系。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特别是对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不断实行军事干涉和炮舰外交，一个又一个新的思潮也冲击了拉丁美洲。思想家们开始把帝国主义和不断恶化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批评外国资本家贪得无厌以及由此发生的对人的剥削。一些作家在20世纪初期唤起了拉丁美洲思想家们的觉悟，其中有乌拉圭的何塞·恩里克·罗多和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sup>①</sup>；前者的著名文章《爱丽儿》(1900)着重指出决意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塑造世界的美国的倒退影响，从而推动了一个憎恶美国佬的巨大浪潮；后者谴责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后来的年代里，他们的意见给社会革命家们的反帝要求增添了依据。

到了20年代，象秘鲁的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那样曾受到马克思学说影响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思想家，都同意罗多和达里奥的反帝观点，而且给它增加了关于印第安人主义<sup>②</sup>、世界被压迫人民团结以及土地和工业国有

---

① 罗多(1871—1917)也是思想家和教育家，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在散文方面最著名的作家。达里奥(1867—1916)还是文学批评家，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在诗歌方面最重要的代表。——译者注

② 又叫“土著主义”，指主张印第安土著居民加入文明世界同时保存其风俗文化和维护其利益的学说或社会政治运动。——译者注

化的新思想。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则遵循共产国际关于使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共产国际断绝了同拉丁美洲社会党人的所有联盟，痛斥其为小资产阶级，并且否定他们提出的拉丁美洲仍为半殖民地的论点。此事的发生适逢人们对大萧条不抱幻想，从而使左翼激进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当中获得了许多拥护者。到了大萧条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外，在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也有了共产党。它们的发展多半是由于组织得好，而且提出了强调经济独立和更多的政治民主的党纲。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该地区的力量下降了，原因是理论上存在弱点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党都没有在拉丁美洲人数不多的工业无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

随着希特勒在德国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兴起，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是拉丁美洲最先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并且警告欧洲即将爆发战争的团体。到了1935年，左翼宗派主义失败了，因为共产党和各式各样的社会党表示愿意一起工作，甚至同开明的资本家结成联盟以打败法西斯主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民阵线”<sup>①</sup>即联盟的战略包括左翼和开明组织之间的协商、建立竞选联盟和共同努力打败法西斯主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的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党派联合结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约束自己不去谈论美帝国主义，而且赞同泛美团结的计划。

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维护民主的想法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唾手可得的利益。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构想的利他主义再加上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在拉丁美洲引起了反独裁的态度。有组织的左派由于战争期间苏(联)美(国)联盟而得到了加强，他们奋力争取建立立宪民主，强调该地区之所以极度贫困，与它的独裁者们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有关。因此，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伴随着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斗争开展起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于将近半个世纪的欧洲移民，以及由于战时无法获得欧美商品而促进了工业化的扩大，拉丁美洲已经有了更为纯一的城市无产阶级。从传统看，该地区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工会会员。然而，前者没有后者支持便从来得不到政治上的影响。如今思想家们开始把该地区的问题同阶级意识联系起来，并通过马克思主义分析来寻求解决办法，因而第一次能够求助于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而且有些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开始背离这样一个正统的革命理论，即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继而进行长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着手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谈论的是不经过马克思论述的那些阶段和达到全面工业化以前，就在不发达社会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的学者开始分析现代化，而且他们的研究更加着重于增长、变革和发展，就象 100 年前马

克思所做的那样。这一新的趋向连同苏联生气勃勃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革命巨变，在马克思关于充分现代化社会中的人们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管理的先见如今比以往更有吸引力的拉丁美洲，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新的兴趣。思想家们施展其聪明才智来解决国家建设、工农商业发展、公共教育、人口控制以及美帝国主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帝国主义是其他问题的根本，因此必须加以消除。只要知识分子和工人能够设法统一起来，如今就有足够人数成为有效的反帝力量了。

冷战既破坏又帮助了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发展。统治该地区的权贵和美国政府认识到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潜在革命力量，因而花了很大力气来腰斩社会改革和革命运动。华盛顿当局企图收买思想盟友，并用军事与经济援助为美国投资铺平道路，它既然支持古巴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海地的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和委内瑞拉的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之流的专制统治者，它的“民主化”政策就显得十分伪善了。而当拉丁美洲得到巨额的美商私人投资之时，正是这些暴君贪污受贿、胡作非为、不关心社会之日，这就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可信性。该地区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使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向左转。年轻的大学师生甚至连牧师都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而民众对社会改革和革命的要求则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兴趣。

中国革命成功，随后苏联发射了第一颗宇宙卫星，增加了

拉丁美洲人对这两个国家如何解决不发达问题的兴趣。美国日益支持拉丁美洲的独裁者，而后的镇压策略则有助于为外国投资提供必需的政治稳定和安全，这就使民族主义情绪转向反对美帝国主义，并促使人们注意国际资本主义如何活动以损害生活在格兰德河以南各国的群众。

首先是毛泽东然后是非德尔·卡斯特罗表明：对革命采取战斗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能够在非工业社会中取得成功。第三世界革命成了现实，因为在30年代和40年代变得激进的思想家们的指导下，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成熟起来了。这时候中苏分裂使马克思主义者两极分化，但也使他们当中更多的人独立地探究社会主义，既不受某个思想领袖的束缚，又采取更适合其各自国家现有情况的形式。

到了60年代，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变种。他们把卡斯特罗、格瓦拉、列宁、托洛茨基、毛和葛兰西的理论同民族主义、印第安主义、存在主义，甚至基督教神学的一些方面结合起来，以逐渐实现奥尔特加—加塞特<sup>①</sup>所谓的“群众造反”，也就是使普通人掌握政治和社会权力。

---

<sup>①</sup> 西班牙哲学家、政论文作家、教授(1883—1955)。——译者注

### 第三章 阿根廷

既然有一种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它助长不平等；又有一种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它至少以某种平等为其目标；那我就要选择后者。

胡利奥·科塔萨尔

国际知名的阿根廷小说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上述意见，代表了拉丁美洲历史最悠久而人数又最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链条中最近的一个环节。直到60年代，阿根廷比拉丁美洲任何其他国家产生了更多具有不同派别倾向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熟悉阿根廷左派的人不可避免地要找出自己喜欢的一位思想家或者一个思想学派，但本书因篇幅所限而略去了。

论述阿根廷的社会主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何塞·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开始。他在1825到1830年在法国学习期间崇拜上了圣西门和彼埃尔·勒鲁<sup>①</sup>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在反对1829到1852年控制阿根廷的独裁者胡安·曼奴埃尔·德·罗萨斯的斗争中，成为阿根廷1837年一代人<sup>②</sup>和五月协会的思想领袖。埃切维里亚

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作家(1797—1871)，强调人作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译者注

② 即1837年成立的“五月协会”所团结的一批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知识分子。——译者注



认为，社会主要的共同任务是提供最大的个人自由。他实质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最高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的理性，因而不接受阶级平等的思想。在他看来，只有集体的理性（但不是集体的意志）才是高于一切的。他喜欢理性的统治而不喜欢群众的统治，担心后者会没有理性。

埃切维里亚的《社会主义原理》一书写于1839年而初版于1846年，它成了五月协会的革命信条。这部开明的文献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和进步的思想。埃切维里亚的信念充其量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性质，但与其欧洲原型不同。他信仰一种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出发点是用经济平等来消灭贫困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不寻求革命的对象，也不企图根本改造社会。

埃切维里亚欣赏欧洲1848年社会主义运动为改变生活并达到更为人道的社会所作的尝试。他使本国的知识分子知道更多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历史，从而为社会主义者在阿根廷争取类似的目标奠定了基础。在阿根廷，他第一个宣布信仰圣西门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以及“民为本并创造全部权力”的原则。圣西门关于“各阶级和解”的意见对埃切维里亚那些受到阶级束缚的同时代人则过于先进了，所以他们给他的支持是不够的。

直到埃切维里亚死后，他的重要性才为人们所感知。为了逃避1871年巴黎公社招来的反攻倒算和俾斯麦的镇压而来到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曾求教于他的思想。1872年法国人埃米尔·迪马斯<sup>①</sup>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办了社会主义杂志《劳动者》之后，有关埃切维里亚的谈论开始更经常地见诸出

刊物。到了1880年赫尔曼·拉尔曼主办的一份报纸《工人报》开始在阿根廷积极宣传马克思的思想时，埃切维里亚的《社会主义原理》一书在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已经相当出名了。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来到该国，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人恩思科·马拉特斯塔<sup>②</sup>。他在1885年抵达阿根廷，一直逗留到1889年。他劝告其阿根廷同伴少搞些个人行动而多采取集体行动。到了1892年，由于马拉特斯塔及其同胞彼埃特罗·索里的努力，办成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期刊《声明》。就象在大多数主要的南美洲国家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终于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9世纪90年代，许多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的思想同康德、孔德或斯宾塞的哲学联系起来，致使阿根廷的第一批工人阶级组织具有折衷主义的而不是独特的、革命的性质。甚至1895年成立的社会党也是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居阿根廷的千千万万的人在那里找不到“黄金国”。他们加入了不断增多的大批雇佣劳动者的行列，共同认识到自己遭受着大家为之辛苦工作的资本家的剥削。工人们把自己争取改善状况的集体行动的矛头，指向那些开始鼓动人们在合法建立的制度范围内进行变革而躲开暴力对抗的政党。然而，在国内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会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份里仍然是从属于这些政党的。

---

① 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纲》中译本译作爱弥尔·多马士。——译者注

② 意大利革命者(1853—1832)，于1879年被意大利政府流放到法国。——译者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阿根廷就有代表在第二国际了。这期间，通过积极行动的知识分子、政党和工会的努力，城市工人获得了比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更好的劳动条件。除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还普遍地一致同意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俄国的1917年巨变在阿根廷的城市工人中唤起了新的革命热情。到了1918年，社会党内持不同政见的人在该国帮助建立起国际社会党，该党在1920年加入了第三国际而成为共产党。

欧洲的事变<sup>①</sup>连同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在1918年发源于阿根廷的大学改革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大学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相得益彰，互相支援，两者都唤起了民族意识并且以更大的动力推动了更加自由的思考。20年代，思想交流在阿根廷加强了。该国的作家、教员和政治家都表现了对来自欧洲和美洲其他地方的新思想有相当大的接受力。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尤其花了大量时间，同来自智利、巴西和乌拉圭的同志们讨论政治理论和各自国家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社会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报刊杂志上展开争论，各自阐明其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相对地说有哪些优点，因而一度在该国的大学师生和城市工人中受到了很大的敬重。他们建立了后辈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赖以发展的基础。

比森特·谢拉在其《阿根廷政治思想史》(1950)中指出，该国具有一种开明的、接受进步思想的历史编纂学传统。如

<sup>①</sup> 指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译者注

果相信他的话，其必然结果就是至少在那些以历史为指导的人当中，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转变就容易了。从五月协会那个时候以来，主张进步的思想就一直在阿根廷的思潮中起着显著的作用，甚至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示同这个 19 世纪的人道主义者团体有联系。

路易斯·帕恩写的一些书成了集阿根廷社会主义思潮和历史知识之大成的杰出宝库。他指出了埃切维里亚与其后的社会主义作家诸如胡安·包·胡斯托、吉奥尔迪兄弟和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的思想联系，并且表明了阿根廷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历史学家阿尔韦托·普拉则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对左派如此长时间的支配，使得象胡斯托这样一些作家的社会主义形象黯然无光并受到损害。他强调共产党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态度帮助腐蚀了 30 年代以前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威望。普拉表明了（帕恩大概会同意），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阿根廷政府一直倾向于追随美国那种对任何只有一点点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赋予否定涵义的冷战政策；这样一来，到了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在阿根廷就再也搞不起来了。

不管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帕恩和普拉的理论如何感党，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赞成卡洛斯·隆巴尔迪在《阿根廷的社会思想》（1965）一书中发表的意见。该书把阿根廷的所有思潮作为一个辩证过程来分析。隆巴尔迪认为，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想法而无行动的空论。他细致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使社会科学可能在以

下六个领域中作为严密的分析工具发挥作用；(1)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法则；(2)法律学——研究法典以察看国家的演变和发展；(3)伦理学——面向道德问题和人的行为之形成及其道德价值；(4)历史学——研究人民、人类和创造生活的道路；(5)语言学——研究语言在人类发展这种现象中的作用；以及(6)美学——分析艺术和现实的社会形式。记住这些广阔的领域，我们现在就来考察阿根廷的个别社会主义思想家，以确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传统。

#### 胡安·包蒂斯塔·胡斯托(1865—1928)

象许多渴望消除人类灾难的拉美人一样，胡安·胡斯托的第一个职业是行医。他在欧洲学习期间就知道了社会主义，并且开始探究人类求生存的生物学斗争和为政治上休戚与共而战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胡安很快就发现，斗争的政治成分比生物成分更使他感兴趣。他吸收了马克思、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特别是赫伯特·斯宾塞的想法，着手把他们的思想结合为一种切合于自己的祖国阿根廷的哲学。

胡斯托学成之后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教授医学，并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他与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尼古拉斯·雷佩托和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一道，试图分析19世纪90年代困扰阿根廷的那些问题并寻找解决办法。他们一块儿形成了阿根廷第一个致力于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社会进步的主要组织青年公民联盟的激进派。

1894年，胡斯托创办了社会主义刊物《先锋》杂志，第二年又帮助创建了以贯彻渐进的议会政治思想为职志的社会党，这是一个追求政治权力以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组织。多年以后（1912年），他就作为社会党的代表被选进了阿根廷议会。他在从事政治活动当中，于1895年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了西班牙文；1909年发行了他论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的著作的第一版；后来又把自己的文章汇编成《社会主义》（1920）一书，该书对阿根廷的历史和政治作了卓越的科学分析。

胡斯托的作品表明，他读过马克思的书，懂得的革命理论不亚于同时代的任何人，但他同样地为斯宾塞的进化思想所感动，并且因此一直是个改革者而不是革命家。他用简朴而优雅的散文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以无与伦比的明晰性来传达社会主义的真髓。

在胡斯托看来，劳动是历史的基本素材，所以研究和分析劳动的各种模式与关系是主要的，我们从他的《历史的理论与实践》（1915）一书就能确定这一点，因为该书论述了劳动不同的社会方面，并且详细说明了人类活动的一般原理。胡斯托强调，某一个阶级对技术的私有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使它支配了劳动的物理和生物工具以及其他材料，从而阻碍了劳动者争取生存的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决不能达到有创造性的个人发展所必需的自由。他断言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是垄断生产资料的结果，并认为这是阻碍人类发展和违反人性的现象。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妨碍了工人改善自身条件的能力，所以健康受到损害，而弱者则遭到失败。他坚决主张所有的人而不仅仅高贵者需要有一切机会从技术中得

到好处,改变自己的环境。

胡斯托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意黑格尔哲学关于无处不在的辩证法是走向进步之路的观念。他指望从过去找到主宰社会进化的法则。他懂得阶级斗争并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他是一个虽不接受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但喜爱马克思博大的历史眼光并加以灵活解释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沉迷于抽象的概念而忽视了纠正现存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切实办法。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设想,而认为人类必须进行实验以发现如何科学地改变社会。他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而坚决主张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另一些杰出人物必须作好准备进行管理。在他看来,教育比革命更可取,因为通过前者就可以逐渐获得社会合作所必需的行为举止和正当使用技术的方法,而一旦未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掌了权,也许便得不到这些成果。胡斯托重提19世纪的阿根廷作家和总统多明戈·萨缪托<sup>①</sup>关于教育能使国家革除妨碍其进步的野蛮行为的论题,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教育会使群众抛掉萨缪托认为是“有教养者”的高贵人物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从而把萨缪托的论题放到了阶级斗争的远景之中。

胡斯托生活在帝国主义成长时期,与曼努埃尔·乌加特同属于社会党<sup>②</sup>;后者认为拉丁美洲有被美国控制或吞并的危险。对后者提出的如此有说服力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警告,胡斯托也是熟知的,但他仍然说外国资本对阿根廷的发展是不

---

<sup>①</sup> 阿根廷政治家、教育家、作家(1811—1888),积极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于1868至1874年任阿根廷总统。——译者注

可缺少的，因为国内无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单独胜任的。他强调外国投资会加速为最终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打下基础的进化过程。他却一点也不明白生产资料社会化究竟将如何实现。

胡斯托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作用的重视。他在使社会主义适应拉丁美洲和阿根廷的情况时，强调有80%的人口是受地主摆布的佃农的农村地区需要改组。他主张把土地累进税作为一件实事来办，以削弱地主贵族的权势。

胡斯托对农村问题的想法以更带理论性的高度出现是在1909年，当时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恩里科·费里<sup>②</sup>在阿根廷的一个公开讨论会上批评了胡斯托的同志们是中产阶级激进分子，而且说他们没有权利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是欧洲而不是本土的创造，还说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工业上的，而阿根廷基本上是农村性质。胡斯托回答说，尽管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但村镇中却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他指出，在阿根廷，所有雇佣劳动者，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下层阶级的还是中间阶级的，都必须加以发动。胡斯托说费里不懂得，阿根廷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一向不是靠工业化而是靠不让劳动者获得土地并迫使他们流入城市来造成城市无产阶级。他说，马克思关于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供应使工业

② 阿根廷外交家、诗人、小说家(1878—1951)。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乌加特因其“国际主义立场”在1913年被开除出社会党。乌加特的著述主要涉及一个方面(反帝)，而且没有足够的理论深度，故未并列于本章提到的著作的作品中。

③ 意大利犯罪学家、政治家(1856—1929)。原为激进党人，后参加社会党。  
——译者注



资本主义得以发生的意见，可以适合于拉丁美洲挨饥受饿的农村人口。

胡斯托是在其本国肯定民族主义胜过一切的时候寻求阿根廷最尖锐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而与此同时他又向自己的同胞指出了妨碍本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因素。在阿根廷力求使其政治组织和制度民主化的关键时刻，胡斯托代表了社会主义的选择而且体现了灵活性。他谴责了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学说刻板僵化的看法，而谈论存在着可以改变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说，“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理论、一种经济假设和一种政治学说，它是一种思维方法。”他批评了装腔作势的、其宏伟计划常常在行动面前变得差劲或者只不过是卖弄学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提出的使理论和行动更加现实地融为一体的呼吁，对阿根廷及其邻国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就反映了他的思想。

#### **阿尔弗雷多·L·帕拉西奥斯(1880—1966)**

如果我们认为胡安·胡斯托是20世纪前几个年代一起工作的那批精神饱满而又富有才能的阿根廷社会党的行动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政界元老”，那么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就可能被认为是包括阿道弗·迪克曼（一本详细论述民族主义的分裂性的著作的著者）、恩里克·迪克曼（曾在人口问题、思想和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著述的犹太教经典式学者）、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其著作我们随后就要加以研究）和哈辛托·奥多内（阿根廷的社会党和工会运动中比较缺乏

批判能力的编年史家)在内的一个社会主义学派的老前辈。

帕拉西奥斯是大演说家、法学教授,向穷人免费的“人民律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阿根廷议会中第一个社会党的代表(1904)、参议员,曾为自己党的荣誉决斗而因此被开除的人物,30多部大作(涉及文学批评、法律、军事司法、大学、社会主义、主权、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妇女权利、经济状况和国际冲突等题目)的著者。象胡斯托一样,帕拉西奥斯非常偏向于让·饶勒斯的观点,所以他批评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唯一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他和胡斯托都认为工人的命运正在改善。

帕拉西奥斯力图使社会主义思想同自由主义传统中有创造性和生气勃勃的方面协调起来。在某些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精神力量。他还说过,“我不认为社会运动是不以自觉的意志和不以意向为转移的法则所支配的自然进程。”他是一个还认为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也重要的唯物主义者。这些意见有时使他离开了自己的社会党同事们。

帕拉西奥斯的主要追求是社会正义,认为社会主义能在生活各方面扶植社会正义。他认为人们必须懂得正义这个概念的历史以便了解非正义,所以他试图在《社会正义》(1954)一书(一篇立足于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立场的、关于正义哲学的论文)中说明这两者。象饶勒斯一样,帕拉西奥斯既承认理想主义者的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又承认经济价值的重要性。他指出,正义可以从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观念中提升出来,而并非只能产生于对生产资料的调整。这些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唯物主义的看法,却没有使它黯

然失色。

帕拉西奥斯把人际关系中正义的概念从古代和古典世界追溯到现今，描述了马克思用以发展其从生产方式上解放工人这一思想的那些社会制度。他找出了现在的极权主义、奴役、剥削和人的反社会行为即种种非正义现象的先例，然后表明非正义的这些方面在阿根廷如何发展，并从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胡斯托信奉的那一种）如何能消除非正义。

他在《拉丁美洲的群众和杰出人物》（1960）一书中搜集了阿根廷一连串非正义的历史，引用土著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作为争取正义斗争的例证。除了土著对正义的渴望，他还把欧洲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同主权属于人的集体这一思想联系起来，就象托马斯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sup>①</sup>和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曾经做过的那样，而后二者的思想在殖民地时期的学术界中是很流行的。帕拉西奥斯论证了“人民主权”的早期形式从历史上看如何在阿根廷与人权概念一起发展起来。在他看来，争取人权和“人民主权”的斗争连同埃切维里亚的《社会主义原理》一书的影响一道，终于导致了1853年的宪法<sup>②</sup>，该宪法从理论上提供了社会正义。他认为这部宪法是工人鼓动的结果，而工人的鼓动同时得到杰出人物的理解；就锻造出了一套新的治理原则；他还断定说，群众和杰出人物必须一起努力来引起革命。帕拉西奥斯大概用他

---

① 西班牙政治家、作家（1827—1900）。——译者注

② 这部宪法的基本内容是建立保证地方寡头势力支配省政、授权总统干涉各省事务以确保共和政府、实行两院制议会的联邦共和国。——译者注

自己作为例子，象当时如此众多的阿根廷自由主义者那样，设想面向群众的杰出人物会努力增进工人的命运。

帕拉西奥斯研究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如何影响阿根廷的进步。例如，他表明 1824 年独立后的永佃权计划如何使大片国有土地转入少数人手里，因为根据这个计划，国家虽然对其土地保留支配权，却把它租给个人和法人。而当这条法律在 1869 年被废除时，这些权贵人物已经成为该国的政治和经济独裁者了。他认为这次增加国库岁入的尝试是产生大庄园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劳动者遭受剥削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化才能把国家变为尊重人的尊严的处所。

帕拉西奥斯系统地表达了符合阿根廷社会发展的意见，但又强调社会主义不能离开国际条件。他一方面批评升国旗和奏国歌之类国家主义的象征，一方面力求在阿根廷树立一种社会主义的国际精神。他喜爱写作和辩论国际问题，在这方面看来多半是受到何塞·马蒂和曼努埃尔·乌加特的思想影响而不是列宁的影响。1925 年他帮助成立了拉丁美洲联盟，这是一个致力于大陆团结和反对美国在美洲扩张的组织。他的《我们的美洲与帝国主义》(1961)一书是一部非常有文采但并不特别深刻的著作，它表现出有马蒂和乌加特的影响，也有何塞·因赫涅罗斯、何塞·马利亚特吉和墨西哥外交史学家伊西德罗·法韦拉的影响。在这本著作中，他说“国旗随贸易而来”，并断言美国佬鼓吹泛美主义是要在拉丁美洲推进

美国资本主义。他主张利用泛美联盟<sup>①</sup>作为争取社会正义的工具，而不是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他反对美国控制巴拿马<sup>②</sup>和根据“普拉特修正案”来控制古巴<sup>③</sup>，为奥古斯托·桑地诺试图消除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势力<sup>④</sup>而辩护，并且支持波多黎各的独立运动。帕拉西奥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结构，却重新布置了世界力量对比，使之有点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不同意苏联共产主义，但也认为美国对它的反应过分了。1960年他到古巴旅行，发现古巴革命缺乏思想体系，只是受到马蒂的人道主义和热爱自由的鼓舞。他称赞卡斯特罗成功地反抗了美国，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为古巴革命特别是它的土改政策辩护。他高兴地注视古巴以“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他某些毕生的目标。

### 阿尼瓦尔·庞塞(1898—1938)

何塞·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和列宁的思想之间、阿根廷的有时倾向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党思想家和该国更为激进的

① 于1890年第一次美洲国家会议上成立，原称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1918年4月后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译者注

② 美国为夺取巴拿马运河区于1903年怂恿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巴拿马省分立，建国后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译者注

③ 1910年美国国会通过参议员普拉特有关霸占古巴领土并干涉其外交与内政的提案，并强迫古巴载入宪法和写进1903年的《美古条约》。——译者注

④ 1927年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地诺(1893—1934年)领导了反对美国占领军、占领高山领土。1934年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在美国唆使下刺杀了桑地诺并建立了长期的家族独裁统治。——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的最强有力的联系是阿尼瓦尔·庞塞，此人被鲁道夫·吉奥尔迪称为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智力奇才，其著作在阿根廷文化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庞塞大概是他那个时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于研究工作的最好的政论家，他在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和哲学诸方面都很杰出。他早年为列宁、帕拉西奥斯和马蒂的著作所激励，后来又受到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古巴思想家胡安·马里内略和自己的亲密朋友——墨西哥历史学家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的影响，后者曾经向他鼓吹了墨西哥革命<sup>①</sup>的希望。

当他在阿根廷国立中等教育学院任心理学教授时，与何塞·因赫涅罗斯共同编辑了《哲学杂志》。他在1930年创办并主持了免费进修大学，1936年掌管了致力于严谨的社会分析的《辩证法》杂志。

庞塞最初强烈爱好科学论证和生物学，这使他走向了实证主义；后来与他的一些社会党同志们不同，他转向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终于断定人们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其生存条件，从历史上看，人们一直在创造和改变经济关系与社会状况。他认为，人们一旦接受了这些意见，其眼界就会向足以解释世界并且改造世界的哲学开放。作为一个提倡充分发展智力的人，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英国的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哲学。但他强调，马克思是唯一以“毫不

---

<sup>①</sup> 指墨西哥1910至1917年革命。1911年5月推翻了波非里奥·迪亚斯(1830—1915)独裁统治，1917年2月颁布了民主宪法。——译者注

留情的分析”和严密精确的方法，并“以其批判的无懈可击和以历史的革命意义”来面对当代各种问题的人。

庞塞认为，仔细阅读经典著作会使人明白许多有关无产阶级命运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他把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诸如《理查三世》、《裘力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看作能够借以看到阶级制度的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他谈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即通过经典著作看到的实在的事变史，因为它们表明了各种社会如何发生作用和互相影响，同时揭露了生活的现实性不在于其种种理想而在于其各种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如何起作用 and 做些什么事。

庞塞试图在他认为是机器时代而不是解放无产阶级引起了人性丧失和剥削的阿根廷扶植起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1935)一书后来在古巴再版，对卡斯特罗的社会规划者们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这部著作中说明，以回到古典著作研究为特点的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的前奏，由此出现了对人的看法过于抽象的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他说，伊拉斯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告了人的自由，但人只是摆脱了一个主人而为另一个主人即生产资料占有者所役使。他对比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把人看作生物而非抽象物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从而断定人类只有消灭了阶级差别才能兴旺。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办法是对人文科学、文学、艺术和音乐产生热爱，以及创造一种人人都能平等参与的无阶级文化。他看出向群众传播经典著作和使人摆脱贫困之间，以及为所有人打开大学校门和使每个人懂得剥削如何进行从而加以消灭之间的相互关系。

阿尼瓦尔·庞塞作为大学改革运动的产儿，从来没有放弃改进教育的愿望。他认为，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关注教育是要促进本阶级的利益，而他则主张一种必将享有自由而无受阶级束缚之思想的“新型大学”。庞塞在《教育与阶级斗争》（1936）一书中，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何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教育。他从原始的教育中，看到一种反映集体共有观念的社会责任。但他坚持认为，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起，教育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及其国家用以维持奴隶制和封建制度的助手。他认为，教会诲人以非理性、不抵抗、宿命论和信仰超自然物，而到11世纪第一批大学创立时，资产阶级视教育为获得先前贵族和僧侣专享利益的途径，于是开始支配智力活动。

《教育与阶级斗争》一书在卡斯特罗的古巴重版，为该国新的革命教育制度作出重大贡献。庞塞在书中论证了统治阶级如何一向通过教育来支配国家的社会体制，因为教育所传授的是经过选择的知识，而不教导人们去思考，以免他们可能因此怀疑教育本该支持的那个制度。他感到痛惜的是，一般人常常不了解自己的孩子正在被训练来充当部属。他还否定“中立”学者这一概念，并指出那些认为自己客观或者其看法不受任何准则影响的人是危险的。

这位有灵活性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教学有方，由于鼓励人们对那些他认为已导致阿根廷缺乏历史远见并对社会改组的必要性缺乏充分认识的“真理”加以怀疑，竟然被迫流亡异乡了。



## 吉奥尔迪兄弟——鲁道夫(1897—)和阿梅里科(1899—)

鲁道夫·吉奥尔迪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16岁时在当地帮助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几年以后他参加了那场幸而使阿根廷免于卷入争端的反帝和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运动。1910到1921年间，他领导了阿根廷全国教师联合会，同时针对阿根廷社会党的修正主义并与其既加以赞扬又当作改良主义者加以批判的胡安·胡斯托相忤，而与维多利奥·柯都维亚一道帮助创建了国际社会党即共产党的前身。1921年他访问了苏联，回国后成为列宁主义的终身皈依者和共产党主张的阿根廷阐释者。共产国际曾派他到巴西去组织民族解放同盟，这一活动使他接触了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并成了后者的思想指导人，也使他在1935年被关进了巴西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认为阿根廷落入了德国妄图夺取世界而美国妄想攫取拉丁美洲的交叉火力中，但他同俄国的关系使他支持美国而反对德国。战后，庇隆政权迫使他流亡异乡。他后来回到阿根廷并成为共产党出席该国立宪会议的代表。鲁道夫·吉奥尔迪作为托洛茨基和毛的毫无保留的批评者和斯大林的辩护人，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努力为其人民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

跟庇隆一样，鲁道夫·吉奥尔迪也受到力图使阿根廷开放而接受新思想的大学改革运动的影响。但他认为，该国以向右转姿态而最终反对大学改革运动，并终于成为独裁主义的组合国。他还认为，实证主义思潮的复活、教会的保守主义和

军方想要充当政治裁决者，已勾销了1918年大学改革运动的大部分成果。他说，适者生存即“实证主义教派”的具有高人一等优越感的想法，无异于把长枪党<sup>①</sup>或希特勒引进阿根廷。在他看来，实证主义思想家们（例如亚历杭德罗·科恩这位康德和唯心主义的信徒）错误地认为，道德规范必以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存在为前提。尽管科恩在其生命的末期加入社会党时（1931年）公开认错而转向科学地说明社会，但吉奥尔迪仍然断言其早期具有高人一等优越感的想法对阿根廷有深刻的不利影响。

鲁道夫·吉奥尔迪坚持认为，除了科恩和康德的思想不科学而外，通过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著作而流传于阿根廷的存在主义思想也是不科学的，而且与拉丁美洲所需要的反帝和土地革命相对立。他批评奥尔特加把群众描写为引起混乱和暴力的《群众造反》（1932）一书是不同于马克思学说而认为总要有杰出人物来领导群众的尼采学说的延伸。

鲁道夫·吉奥尔迪从更实际的方面抨击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论点，即认为19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保住阿根廷进出口税岁入利益之争，也就是阿根廷的“港口人”和“内陆人”之间的斗争<sup>②</sup>，阻碍了该国的进步。他说，严重损害阿根廷社会的

---

① 1936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佛朗哥时代的法西斯组织。——译者注

② 指19世纪下半叶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保持其一向作为阿根廷对外通商港口的垄断地位而发动的反对中央政府并辟其上游的罗萨里奥为主要出口的战争。——译者注

矛盾不是“港口人”和“内陆人”的斗争，而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反对工人阶级的寡头统治集团的联盟。他断言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和内陆人是反对这些共同敌人的天然同盟者。

在他看来，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就是门罗主义和命定扩张论<sup>①</sup>。他读过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sup>②</sup>的作品，此人认为加勒比海是通往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战略要冲，而古巴则是通往加勒比海的要冲，还认为自己的作品表达了与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摇旗”·比米斯<sup>③</sup>几十年后所写的著作中表述的同样观点。他也从华盛顿当局的拉美政策中注意到了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直到最近即60年代，他又把争取进步联盟<sup>④</sup>所依据的劳尔·普雷维什<sup>⑤</sup>的实质上是扩散主义的发展理论看作资本家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具。

多年来鲁道夫·吉奥尔迪的口气变得温和了，但他的根本想法依然如故。他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样一个信念，即不经过反帝和民主革命的预备阶段就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他1967年的著作《不能搞革命的革命》一书把菲德尔主义者

---

① 19世纪为美国向外扩张辩护的资产阶级史观。——译者注。

② 美国海军军官、海军史学家(1840—1914)，以其论述国家实力的基础在于海上霸权的历史著作知名。——译者注

③ 原名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1911—)专攻美国外交史。这里以“摇旗”代替弗拉格是用英语“旗”和弗拉格的谐音构成绰号。——译者注

④ 美洲国家组织的主要机构，美洲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根据美国总统肯尼迪(1917—1963)的倡议以“加速拉丁美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宗旨于1961年建立。——译者注

⑤ 阿根廷经济学家(1901—1986)，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创始人之一，“发展主义”经济理念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看作极端的冒险家，而把雷吉斯·德布雷<sup>①</sup>叫作前马克思主义的非阶级社会主义的鼓吹者。

归根到底，鲁道夫·吉奥尔迪的思想几十年来已经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思想发展为权威的共产党阐释者的，而且有时是“迂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他作为一个批评家，在指摘与历史无关的非科学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只强调群体观念而不强调群体冲突并在虚伪的客观性假面具下完成其旨在维持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控制使命方面，一直在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

与鲁道夫·吉奥尔迪恰好相反，他的弟弟阿梅里科是一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家和注重实际的社会党政治家。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受到让·饶勒斯和同他亲密共事的胡安·胡斯托的影响，在哲学上虽然同意社会主义思想家亨利·勒费弗尔<sup>②</sup>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一个时代的表现，却不完全赞成卡尔·马克思的思想。

路易斯·帕恩把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和胡斯托一并称为阿根廷最有魄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阐释者，这一头衔是由吉奥尔迪的理论性论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观点、共产主义与今日之阿根廷现实》(1950)和他的《胡安·包·胡斯托及其历史、社会和哲学思想》(1933)一书挣来的。后一部著作阐明了胡斯托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吉奥尔迪对胡斯托关于

① 法国记者、作家，积极鼓吹古巴革命领导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主张的“游击中心论”，并著有《革命的革命？》一书系统阐述该理论以提倡对革命来一个“革命”。——译者注

② 法国哲学家(1701年生)，据说现代法国活动面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社会主义固有民主的信念、关于左派何以形成的观点及其对阿根廷历史所作的经济分析是持相同看法的。

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写过一些著作，论述社会主义、萨缪托、教育学理论，以及1943和1966年军人在阿根廷执政。这些书籍和许多长篇小册子展示了对阿根廷历史编纂学的深刻认识和对其中固有矛盾的了解。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综合了阿根廷大多数主要思想家（不论其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来说明本国历史上每个时代的社会关系。

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在他那部令人难忘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观点、共产主义与今日之阿根廷现实》中，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史的关系，并且批判了阿根廷的“极左派”对马克思学说的简单化分析。他似乎把自己的哥哥鲁道夫列为“简单化”但不属于“极左派”一类。人们奇怪的是阿梅里科所说的“极左派”如何不同于鲁道夫谴责的“极左派”。两兄弟都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两个派别的差异，但他们又力图分辨清楚，这势必引起许多饭桌上的热烈讨论。

在《民族进化中的社会主义》(1946)一书中，阿梅里科·吉奥尔迪描述了使社会主义的一些倾向得以在阿根廷立足的因素。他指出了阶级斗争如何把工人阶级不同的民族成分统一起来，帮助他们同化并且推动他们获得减轻贫困状况所必需的政治教育。他坚决主张阿根廷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共同信仰民主而鄙弃极权主义。他相信阿根廷的大多数有识之士都重视社会主义的民主目标并且认识到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代表了惯于赞扬某种方法、某种行为、某种事业

亦即某个正在发生的进程好得很的传统。他断言，受到索列尔<sup>①</sup>思想鼓舞的工团主义开始寄希望于阿根廷工人中的自由传统，而这正是后来庇隆主义运动的“无产者”所追求的。他断定，胡安·庇隆宣传工人自由观念主要是想赢得无产阶级的支持，但庇隆欺骗了工人而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并使社会主义在阿根廷更加成为民主的同义语。他特别提到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庇隆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对庇隆主义的威胁，而把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正义的说法掺合到自己的纲领中去。换言之，庇隆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企图用国家社会主义代替社会主义那样，力图用把社会主义罗致过来的手法而以庇隆主义替代之。

阿梅里科·吉奥尔迪解释说，阿根廷到了庇隆时代已经进入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新阶段，并且经历了某些初步的经济发展。阿根廷人在庇隆向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希望时，便已经在心理上为情况继续改善有了相信的准备。因此，社会主义争不过庇隆主义并不现实的许诺，因为社会主义虽然承认乌托邦的想法是理想的目标或鼓舞人心的事物，但它还得面对现实而斗争。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在描述人们对庇隆的崇拜和庇隆的权力如何起作用时，对这个阿根廷铁腕人物把马克思、列宁、胡斯托和克劳塞维茨的一鳞半爪掺合到自己妙想天开的宣传和随心所欲制定的有关战争、权力和政治的政策中；

---

① 法国人(1847—1922)，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其最有影响的著作《暴力论》(1908)鼓吹以暴力而不是以渐进方式改革社会。——译者注

表现出既夸赞他独出心裁又鄙视其不重言诺的心态。

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并未象阿根廷工人阶级那样对埃娃·庇隆及其庇隆党妇女部着迷。他深刻关注妇女的社会解放，使他开展了反对埃娃的运动，认为她助长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他认为，庇隆夫妇是在用不实际的希望骗取阿根廷人民支持其旨在建立一个以组合主义、法西斯主义、教权主义和黥武主义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这样一个伪善的独裁纲领，而埃娃那些精心建立起来的慈善机关就是这个纲领的组成部分。

阿梅里科·吉奥尔迪在他的长久生涯中，一直是以能言善辩、有说服力和深明事理著称的阿根廷受压迫的少数派和大多数人的代言人。作为一个剖析其所在社会的有洞察力、有创造性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他与胡安·胡斯托、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和阿尼瓦尔·庞塞并列为使社会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大萧条时期和在庇隆时代得以继续存在的那一大批社会党思想家中最著成效的人物之一。他和他那些可敬的社会党同事们在为自己的同胞提供可行的政治选择时，通过他们的著作以及投书报刊和作为各政府部门的参加者，不屈不挠地向阿根廷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头面人物挑战。尽管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来没有实现，但他们在阿根廷实行的大部分进步改革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直到60年代军人在该国执政<sup>①</sup>为止；他们的顽强反对对全

---

<sup>①</sup> 指1966年6月军方德羅（人民）激进公民联盟的伊利亚政府后执政。

——译者注

面抵制使阿根廷统治者有害的过分为有所收敛。

### 维多利奥·柯都维亚(1894—1970)

生于意大利的维多利奥·柯都维亚在1912年来到阿根廷,并且马上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后来又成为一名社会党员。1918年他声称其社会党同志特别是胡斯托和迪克曼兄弟<sup>①</sup>是“修正主义者”,而与鲁道夫·吉奥尔迪一道创建了国际社会党即共产党的前身。跟吉奥尔迪一样,柯都维亚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同义语,是该党主要的政论家、辩论家和社会批评家之一,也是党史学家。他在20年代开始写作,从大萧条时期到冷战时代直至进入60年代始终忠诚地捍卫斯大林主义路线。

尽管柯都维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阿根廷度过,但他却按照在该国发展欧洲式社会主义的路子来思考。例如,他不象巴西的普列斯特斯那样接受这样一种想法,即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他认为普列斯特斯和探索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道路的人是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以致排斥国际主义而成了背离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的叛道者<sup>②</sup>。

柯都维亚在《阿根廷反抗美帝国主义吗?》(1948)一书中,强调共产主义不是反美或反英,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他指出了

---

① 指恩里克·迪克曼和阿道弗·迪克曼。——译者注

② 引自1976年7月同政治科学家约瑟夫·R·斯塔罗宾的一连串私人会见谈话。后者在1946至1947年间任美国《工人日报》外事编辑时已向柯都维亚交谈过。



伪装反对干涉主义而实为一种新的、更隐蔽的干涉办法的睦邻政策的欺骗性。他断定，睦邻政策使工人们认清了那些搞扩张和剥削的美国企业的特性。尽管睦邻政策令人反感，但柯都维亚仍然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主义促进了拉丁美洲的自由化，因而使共产党人得以在智利和古巴担任部长职务<sup>①</sup>。

柯都维亚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鲁门总统为在美洲内部扩大其旨在保护美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渗透力的体系的同时，重新实行了“金元外交”。为了共同一致搞冷战，美国迫使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建立起与其财政能力不相称的军队。柯都维亚表明了睦邻政策和杜鲁门主义是矛盾的：睦邻政策声言其目的是在美洲增加贸易和减少依附，杜鲁门主义则反其道而行并且阻止工人和民众主义群众扩大政治基础。柯都维亚反对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念，认为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个组织里将隶属于美国的霸权主义。他也不接受另立一个由阿根廷或巴西操纵的拉丁美洲集团的想法。他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着两个世界市场：一个是毫无规律而不可预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建立支配和从属关系，而社会主

---

<sup>①</sup> 智利共产党从1936年开始同激进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1941年更名为民主联盟)先后三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智共曾在激进党人魏地拉任总统期间占有三个政府部长职务。古巴共产党(当时称共产主义革命联盟)领导人在巴蒂斯塔统治期间曾先后于1940和1943年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和担任政府部长。——译者注

义体系则致力于无阶级的平等<sup>①</sup>。柯都维亚认为，人们在拉丁美洲所能享有的要么是屈从于某个资本主义大国的殖民主义，要么是在力求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帝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平等。

尽管国际事务占去了柯都维亚的很大一部分思考，他仍很关心本国的政治。他以怀疑态度看待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阿根廷主要的平民政治组织——激进党<sup>②</sup>的兴起，认为它进步而代表了政治发展中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但把工人置于政治进程之外并且不寻求农村中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改革。他断言激进党包括了许多反动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者，他们害怕群众运动的发展，因而更希望象在德国那样导致铁腕人物统治以保护现行制度。实际上柯都维亚预告了庇隆主义的兴起。

柯都维亚是公开倡导女权的主要人物，而女权思想在阿根廷的男性社会中是难以普及的。他赞成男女同工同酬，并力图使妇女界团结起来。1947 年他曾极力主张共产党按性别划分小组以吸引妇女，她们在自己备受支持的组织中共同活动，就能克服在男女混合会议上所体验到对男子的从属感。柯都维亚的想法和那些虽然为妇女权益而工作却多半承认男子优越地位的庇隆主义妇女组织的想法是大不相同的。

柯都维亚对庇隆时代提供了有趣的分析。他说，在两次

---

<sup>①</sup> 参阅《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63—564 页。——译者注

<sup>②</sup> 正式名称为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1891 年在原青年公民联盟和公民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译者注

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时期，工业资本开始超过了大庄园主和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从而使阿根廷受到外国对其自然财富有史以来最大的利用。于是形成了大量的城市平民，而在大萧条以后工人要么成为在与新兴资本家较量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要么成为资本家的附属物，只有在其控制下才允许他们为自己和资本家的利益组织起来。当胡安·庇隆在1943年的军政府中出任劳工部长一职时，他开始利用其控制下的工会来建立一部政治机器。他于1946年当选为总统，1951年再次当选并一直干到1955年。柯都维亚承认，城市工人在庇隆时代日子过得稍好些，但是政府却从来没有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而这是他们的领袖要他们这样相信的。

在柯都维亚看来，庇隆的反美词藻掩饰了外国的进一步渗透。尽管宣传的是庇隆主义的管制，但阿根廷社会却操纵在外国和本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手里。庇隆主义还得到管制国家机关的军警、不关心政治的工人、地主寡头政治集团、教会、大学生，以及某些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手工业者的支持。由于支持他的基础如此广泛（大多数是出于不实际的希望），庇隆几乎做到消灭阿根廷的左派尤其是共产党。柯都维亚断言，共产党提高工人的觉悟而庇隆加以利用，却看不到庇隆主义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帝国主义和外国垄断集团这个事实。

庇隆主义自称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动，但按照柯都维亚的看法，它不是一种新的合成物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间劳动的最大部分利益养肥了统治阶级。他认为，“社会正义”已被口头上连声允诺，但在一个为阶级对抗所分裂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培育出来的。不过庇隆还是办了一件

大事，这就是广为宣传并使人们相信他搞了一场社会革命。庇隆有吸引力的宣传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他那充满矛盾的假科学的正义主义哲学，其中有每个人各自所需的东西——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基督教气氛下的集体主义。

柯都维亚觉察到，庇隆是一个以民族主义妨碍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社会煽动家。庇隆扶植的是一种排斥现有外来的（或移民的）影响而否定多元文化的萨缪托式的民族主义。相反，柯都维亚则坚持认为，把象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好的外国经验结合到本国的民族精神中去是有益的。他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虚假的繁荣，而不是庇隆；后者只给阿根廷带来了一种不实际的幸福感，一种以为群众命运正在改善的虚假的希望。但生产关系在庇隆时代并没有改变，同时工人们还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 西尔维奥·弗朗迪西（1907—1974）

很难在左派中找到象维多利亚·柯都维亚和西尔维奥·弗朗迪西之间那样大的差异，尽管他们都是意大利血统，同属一代人，而且最初都受过社会党思想家的影响。然而，生于阿根廷的弗朗迪西的思想就象我们将看到那样，更类似 20 世纪后半期这到智力全盛时期的那些人的思想，而不同于柯都维亚那样代表 20 世纪前半期想法的那些人的思想。

弗朗迪西虽然受的是律师教育，但在古典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面而有扎实的基础，曾经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而闻名全国。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包括写有许多关于现代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以及民主制度的危

机、阿根廷的现实和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理论著作。

西尔维奥·弗朗迪西的弟弟阿图罗·弗朗迪西是激进党中最开明一派的领袖，并于1958至1962年出任阿根廷总统。他创立的革命左派运动是旨在为拉丁美洲研制出革命方法的组织，也是针对社会党和共产党而建立的，因为他认为社会党虽然拥护革命理论，但实际上搞的是改良主义，而共产党则由于其苏联式官僚主义及其人民阵线主义缺乏活力面对革命不甚追求。与共产党和社会党不同，弗朗迪西的左派革命运动主张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弗朗迪西永远不能完成革命左派运动的事业了。1974年军方在卡塔马卡省的屠杀和酷刑行为<sup>①</sup>遭到他谴责之后，他被暗杀。要是他再活10年，这位独立思考而很有创造性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已被国际上公认为阿根廷的赖特·米尔斯了。

弗朗迪西在《辩证唯物主义》(1966)一书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德国起源。他受过哈罗德·拉斯基<sup>②</sup>的经济思想和葛兰西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想的影响，并同意后者关于知识分子在完成社会上层建筑方面起根本作用的论点。他在这部著作中把自由主义国家描绘为与个人无关和不关心人，并对它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成分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他探究了欧美知识分子为现行经济制度辩护的倾向及其不能调和个人自由与不受经济约束的行动自由的原因。他认为民主制度要继

<sup>①</sup> 将1971年8月阿根廷军队在游击队攻打卡塔马卡省的兵营后以“游剿”为名滥杀和刑讯群众。——译者注

<sup>②</sup>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1893—1950)。——译者注

续存在下去,就必须保护个人的道德价值,即使牺牲经济自由也在所不惜。换言之,只有国家控制经济也许能够保护个人的道德价值。他论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提供了为安抚人民的大多数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目的在于使他们不拥护重大的变革。他说,在现代的自由主义国家中缺乏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使得其他各种自由都归于无效;不同阶级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和民主。

弗朗迪西除了评论政治和经济自由,还讨论了精神自由。为了了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中精神自由的地位,他追溯了康德和卢梭的思想。康德认为我们只认识我们所感知的东西,这种情况支配着我们的行动,我们对其他可能更有益或更有效于我们社会的价值结构并不了解。康德还断言,合乎道德的好事与强加于人的事情相一致(弗朗迪西认为强制可能是有害的)。自然神论者卢梭则同意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认为道德规范是表达良心的而不是智慧的感觉作用的语言。通过康德和卢梭背道而驰的见解,弗朗迪西指出了自由主义国家如何培育限制精神自由的意识。

弗朗迪西还表明了教会所信仰的各种理论自由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形在有法定宗教(罗马天主教)的阿根廷特别明显。他认为国家的动机和宗教的动机是根本不一致的。在他看来,拉美人由于其天主教传统,已经变得习惯于接受“天启真理”,从而阻碍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进程。弗朗迪西断言,认为最大的自由寓于接近上帝(也就是真理)的可能性的想法是中世纪的观念。

他说,极权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地位的提高,以致在那

里有一种取消个人的价值而把政治提升到生活的最高范畴的倾向。他把国家地位的提高和教会地位的提高联系起来,并且分析了这两个妨碍自由的实体的关系。他指出,只有消灭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连同其在阿根廷的法定教会,才能解放个人。他还考察了教会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基于“不信神和不虔诚的共产主义”的旧观念的斗争。他看到正在出现新的一批年轻的、已了解到接受社会基督教的可能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而倾向于人民的僧俗,从而预见到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徒引起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即把教会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转变为互相合作的可能性。和他给予苛评的旧左派中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相比,弗朗迪西更加看到人道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基督教之间比较接近的一致。

在《当代政治理论》(1965)一书中,弗朗迪西讨论了诸如美国在新政时期存在过的那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它是介乎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而不同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因为它懂得国家干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到了60年代,他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正在被存在主义、新天主教和新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起来的存在主义尤其引起弗朗迪西的兴趣,因为它在本质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任何一种制度。他指出了以绝望为基础的存在主义的消极性质,还拿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作了对比。象让-保罗·萨特一样,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能够找到某种一致,因为两者对道德、社会生活和自由都采取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弗朗迪西试图从更为实际的方面来说明拉丁美洲建立波

拿巴主义政体的倾向，并且效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政体说成是依靠压力从外部硬要各阶级实行和解。他认为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没有直接统治的能耐，所以当寡头集团还不够强大或过于不团结而不能按资产阶级的利益接管国家和社会时，象庇隆统治那样的波拿巴主义半独裁政权就实行控制。

在《阿根廷现实》(1956)这部不朽的两卷本著作中，弗朗迪西试图说明阿根廷社会。他坚持认为，阿根廷政治是使资产阶级民主在20世纪初在阿根廷得到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表现。但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潜力，因为它由于工业化而在经济上已同外国资本联系起来并依附于后者了。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阿根廷群众的利益，而是其控制工业化的外国伙伴的利益<sup>①</sup>。

象拉丁美洲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西尔维奥·弗朗迪西毕生向往的在美洲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终于在古巴革命中实现了。在《古巴革命及其历史意义》(1961)一书中，他断言古巴革命比20世纪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事件更加唤醒人们去注意依附性的危险和采取成功的行动来改变支配与依附关系的可行性。他认为古巴革命是在拉丁美洲消灭帝国主义的开始，这将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从而导致进步。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同，弗朗迪西没有陷入宗派主义。他认为古巴是革命的“一个”而不是“唯一”的模式。他认识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奉行的某些理论和战略不会在拉丁美洲的一切地方都行得通，这个较小的非工业的加勒比海岛国的条

---

<sup>①</sup> 他在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谈论“不发达的发展”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论述依附论以前十年就表明了这些意见。



件与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的条件大不相同。他认为谴责古巴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反效应的和反革命的行为，所有关心人类幸福的人都能体会到古巴革命的意义并为它所鼓舞。

### 利沃里奥·胡斯托(“崩断斧”)(1902—)

拉丁美洲最吸引人而又最有干劲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利沃里奥·胡斯托，他在文学界用得最多的名称是“崩断斧”，也用“洛博东·加拉”的笔名。利沃里奥是1932至1938年阿根廷总统阿古斯丁·P·胡斯托将军的儿子，他以短篇小说和小说作家而博得名声，同时以政治上讨厌的人、小册子作家，以及论述托洛茨基主义、玻利维亚革命、智利革命<sup>①</sup>、阿根廷历史和帝国主义等著作的著者而著称。

胡斯托深受大学改革运动的影响，认为它既是一场反对其著名父亲的那个阶级所代表的那个静止不变的社会斗争，也是对在拉丁美洲的美国道德价值的否定。在读了反帝的瓦尔多·弗兰克<sup>②</sup>的作品之后，他断定这个北方强邻有一套粗俗市侩的道德价值，拉丁美洲必须从资本主义以及从文化、经济和政治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

① “玻利维亚革命”在本书其他地方又作“玻利维亚民族革命”或“玻利维亚民族(主义)运动”，指1952年玻利维亚人民推翻巴利维安·罗哈斯军事独裁统治的武装起义。以帕斯·埃斯登索罗(1907—)为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获得了政权。“智利革命”指1970年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后他所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采取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措施实行社会改革。——译者注

② 美国作家、社会批评家(1889—1967)。——译者注

胡斯托强烈反对美国的扩张，这在阿根廷是众所周知的。他总是突然出现在政治集会上谴责那个北方巨人。例如，1936年12月1日当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阿古斯丁·胡斯托总统主持的泛美联盟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起立致词时，从会议室后边响起了“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一声大喊，接着是一阵厮打，随之又是几下重击声，然后在罗斯福开始讲话时，才重新安静下来。会议结束后，要人们离开了主席台，胡斯托总统向一名警察窃窃耳语，问：“那是我的儿子利沃里奥吗？”警察回答说：“是的，总统先生。”

利沃里奥·胡斯托一生致力于寻求“我的时代的真理”，盼望着出现“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那一天。他原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纯正癖者，后来却否定了托洛茨基，认为此人在墨西哥的最后岁月里同美国势力结盟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第四国际决裂后，胡斯托成了没有什么影响的革命工人同盟的主要指导者，同时鼓吹把他认为象征着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这一名称，改为他认为足以标榜他所期望能在第五国际领导下共同行动的各国实现团结和解放的“安第西亚”<sup>①</sup>，但不怎么成功。

胡斯托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在《列夫·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在全世界的失败》(1975)一书中，他极好地记载了第四国际及其内部问题的史实，而正是这些史实导致了他力求建立足以战胜美国超级帝国主义、联合无产者和农村劳动者、统一所有民族并建成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五国

① 从“安第斯”(山脉)一词演化而来。——译者注

际。胡斯托认为托洛茨基及其第四国际对拉丁美洲的政治一无所知。他把托洛茨基对该地区的看法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过分倾向于把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sup>①</sup>和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这样一些自由主义改革家看成革命家。他认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期间，曾被卡德纳斯利用来促成一个实质上不革命的政府。胡斯托认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宿怨取代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之所以同意美帝国主义就是因为美国积极支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胡斯托说，阿亚·德拉托雷是个假革命者，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欣赏为西半球防务而与美国合作的想法，于是默许了睦邻政策的神话和金元外交，而且还谴责过苏联，但接受其共处的意见；而胡斯托则把这种意见称为放弃社会主义，因为它无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固有矛盾。

胡斯托除了是托洛茨基的严厉批评者，还是阿根廷社会的敏锐分析家。他的《大草原和长矛枪，论民族的历史、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及阿根廷的民族意识》（1962）一书表明了对话瀚的阿根廷历史文献非常熟悉。他分析了各种各样历史学家的著作，并且创立了他自己的经过校正的本国史。

胡斯托研究了大草原的奥秘，表现出对边远地区传统的很大关注。他否定了把高乔人<sup>②</sup>作为19世纪民族团结和自由

---

① 1934至1940年墨西哥总统（1895—1970），以积极实施1917年宪法中的改革条款著称。——译者注

② 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一带草原上的人，一般为混血种，大多放从事畜牧业或过着流浪生活。——译者注

的象征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话题，而强调居统治地位的寡头集团对印第安人和高乔人的镇压。而且在他看来，高乔人成了白人比印第安人优越的象征。所以他揭露萨缪托的资产阶级态度中包含的种族主义，因为后者想看到更多的“野蛮”阶级采纳“开化了的”白人阶级的行为举止。胡斯托叙述了阿根廷印第安人象美国本土人一样被推向西部越来越远的地方或者被灭绝的悲惨故事。他认为19世纪的头领（铁腕人物）胡安·曼奴埃尔·德罗萨斯是“港口人”中这样一些大牧场主的领袖，他们在夺取土地和牲畜的斗争中力求抚慰印第安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既已为大庄园主获得，一个新的阿根廷民族便形成了，而由本国寡头集团和外国势力操纵的经济秩序则使高乔人沦为雇农，从而放弃其自由，成了被剥削的工资劳动者。利沃里奥·胡斯托保留其乐观主义，而且象胡安·胡斯托那样谈到了阿根廷“蒙托内罗斯”<sup>①</sup>这支规模不大的队伍之所以有坚不可摧的精神，是由于他们认为自由向来至为重要，并象从前反对殖民制度那样反抗商业资产阶级的权力。

胡斯托研究了拉丁美洲的历史，从而认识到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是他所探求的社会主义成功先例即良好开端的一部分。因此，他对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很感兴趣，并在《玻利维亚：被破坏了的革命》（1971）一书中对此作了论述。他

---

① 意为“（骑马的）起义者”或“游击队员”。——译者注

对“塔胡安丁苏约”<sup>①</sup>印加人村社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玻利维亚阶级和经济的清楚分析，反映了何塞·马利亚特吉和玻利维亚学者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的思想。胡斯托断言“塔胡安丁苏约”有过一种类似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即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以强征贡品或劳力甚至二者兼施来剥削村社这样一种阶级分层制度。他也许把印加社会看作地方自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胡斯托论证说，独立以后玻利维亚的基本制度依然如故，由地主贵族（包括矿场主）、军方和商业资产阶级控制。到了太平洋战争（1879—1883）<sup>②</sup>期间，国际公司开始对玻利维亚发生很大兴趣；而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公司就既操纵了它的政治，也控制了它的自然财富。

在大萧条、查科战争（1932—1935）<sup>③</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开始冷战敌对行动以后，反帝活动在玻利维亚逐渐增长起来。胡斯托认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企图联合无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玻利维亚比较强大的托派和共产党也赞成联合，以便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走向社

① 意为“四省联合”，是印第安人的印加族在公元12至16世纪以秘鲁南部的库斯科地区为首都建立起来的印加帝国中安蒂苏约、昆蒂苏约、泰瓦苏约和科维苏约四个省的统称。——译者注

② 实际发生于1879至1884年，是智利侵夺玻利维亚和秘鲁太平洋沿岸产硝地区的战争。智利在英国支持下获胜。玻利维亚丧失沿海领土。——译者注

③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分别在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支持下争夺北部查利资源的战争。玻利维亚失败，激起了该国广泛的改革要求。——译者注

会主义。他指出，这一异乎寻常的错误促使玻利维亚更加靠拢乃是其祸根的资本主义列强。他强调，这次革命尽管发动了反帝的冲击，但玻利维亚仍然向美国的矿业政策投降，屈从于美国通过联合国的操纵，并且接受了美国根据反共的1951和1952年“共同安全法”提供的军事援助，其严重后果将在本书论述玻利维亚的一章中加以讨论。

胡斯托同意玻利维亚的1952年土地法旨在形成小地产和粉碎农村头领控制，还同意这次革命改变了一些政治和社会状况。他把玻利维亚的经验称为拉丁美洲第一次不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说这次革命未能获胜，是因为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控制革命和政府的中产阶级手中夺得权力。胡斯托仍然忠于列宁的意见和托洛茨基的早期教导，他断言不能顺从控制或者满足于两个阶级共同控制，政治革命的技巧就是使权力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他还断言玻利维亚革命表明了托派不懂得如何利用其在强大的锡矿工人联合会中的影响。他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地区工人党把自己局限在玻利维亚，也就是不去巩固为支持革命所必需的大陆和国际的联系。在他看来，拉丁美洲是一个需要团结起来促进革命的被分裂的民族。胡斯托还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结（他把这种团结看作革命成功所必需）在玻利维亚的局面中并不存在。他承认，古巴的经验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有取得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但他仍象一个真正独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强调结构和制度的变革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城乡劳动者于一场国际性的安第斯革命中会师的

条件下,才能在玻利维亚及其邻国实现。

### 豪尔赫·阿韦拉多·拉莫斯(1921—)

接替利沃里奥·胡斯托为阿根廷独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袖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和阿根廷人民左派阵线的首领豪尔赫·阿韦拉多·拉莫斯。拉莫斯是阿根廷左派的一个多产作家和批判性分析家,并以文学批评家闻名。他强烈反对斯大林单独在一国进行革命的想法,而把乌加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象马克思一样,强调从理论上说工人没有祖国,他们的问题及其解决是世界性的。

作为人民左派阵线的思想指导人,他研制了以下的纲领:(1)政治主权,(2)经济独立,(3)社会正义,(4)人民的工人政府,(5)致力于消灭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把印第安人纳入工人阶级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合国。

拉莫斯以在阿根廷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印度兵左派”<sup>①</sup>批判的倡议者而变得知名。他(在1939年以后)主张一种依据本民族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来表态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他属于有责任推广“民族左派”理论的那一代人,而这项活动的结果是在40年代初建立了规模不大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于1955年底庇隆下台后与民族革命社会党合并。

拉莫斯断言,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20世纪中期已从大

---

① 印度兵是指过去被雇用于欧洲特别是英国军队中当兵的印度人。——译者注

的发达中心转向了象拉丁美洲这样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他认为，拉丁美洲必须从受欧洲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欧洲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展不能在该地区重演。他驳斥了那种认为 20 世纪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扩展具有进步性的意见，而这在 19 世纪的情况下倒是说得过去的。

拉莫斯坚持认为，始终只有空谈而无行动的极左派一直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停滞不前。他批评了他称之为新索列尔主义的抽象暴力鼓吹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索列尔的颂扬。他新言，拉美人必须按照拉丁美洲的特征来研究和现实地重新明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附和托洛茨基，后者认为拉丁美洲的反帝斗争有两方面的进步性：首先，它为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其次，它为打击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本国同盟者奠定了基础。

拉莫斯认为 20 个拉丁美洲国家是人为的，其疆界阻碍了发展，并使外国企业家得以提供拉丁美洲在统一情况下能够自己生产的商品和设施。他说，帝国主义唯一容许拉美人发展的是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因为其所提供的只是言词而没有多少行动。

拉莫斯认为，自从 1945 年以来，附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正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样。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反教会的思想意识下增长起来了。拉丁美洲人民开始认识到，拉丁美洲的命运操在自己手里，而不是操在寡头集团、军方或上帝手里。美国对拉丁美洲生活的频繁介入增强了反美团结。他认为，这一团结有助于克服民



族主义和地区主义，并且引起人们对玻利瓦尔关于拉丁美洲联邦的想法以及停止拉丁美洲的巴尔干化<sup>①</sup>重新感到兴趣，而拉丁美洲的巴尔干化是在它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而实现独立以后便开始的。

拉莫斯在他的《拉丁美洲是一个国家》(1949)一书中指出，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实现民主革命。该地区不能发展重工业及其需要的国内市场，也不能实行土地改革。他论证说，为了实现这些变革，20个拉丁美洲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他在40年代赞成同庇隆主义分子合作，因为后者有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劳工改革为基础的拉丁美洲团结计划。拉莫斯认为，庇隆成功地动员了阿根廷的城市工人反对美国，这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好榜样。

庇隆下台后不久就发生了拉莫斯认为给整个西半球的反抗提供了动力的古巴革命。在他看来，卡斯特罗证明了人民的力量能够战胜军队，起义中心即游击中心<sup>②</sup>能够创造革命的条件，在不发达的拉丁美洲斗争的主要地区是农村。拉莫斯虽然没有强调古巴的一切经验都可以在阿根廷或委内瑞拉这样一些国家重复，但他认为这些经验证明了共产党要等待

---

① 意指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推行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把某一地区分裂成为若干个互相对立的较小的政治单位而使它们互相牵制以便从中取利，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列强对巴尔干半岛各国采取的那种做法。——译者注

② 古巴革命胜利后其领导人之一格瓦拉宣扬的一种军事思想叫“游击中心论”亦称“格瓦拉主义”。格瓦拉在60年代曾先后到非洲的扎伊尔和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搞“游击中心”。——译者注

有利条件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介乎古巴经验和共产党采取的方针之间。拉莫斯认为，古巴革命奉行了玻利瓦尔和马克思的想法，即国家的界线是可以打破的。他鼓吹“马克思玻利瓦尔主义”，这是两种斗争形式的结合，即把议会的政治活动与发起行动、组织工会、游击战和宣传互相配合起来，作为建立美洲社会主义联合国这一运动的各个方面。

拉莫斯尽管鼓吹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但他仍然研究了阿根廷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西半球情况的缩影。他的五卷本著作《阿根廷的革命与反革命》(1974—1977)跨越了1810到1973年的时期，对该国谋求生存的不屈不挠斗争提供了全面评价。人们连同他写的阿根廷共产党史来读这部著作，就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革命的工人政党在世界中心(莫斯科)的指挥下决不能兴旺发达，阿根廷工人是属于一个拉丁美洲集团的，这个集团很可能发动并改造高乔人成为现代的无产者。

拉莫斯认为，为了解放象阿根廷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重新评价其过去和辨明外国势力使其生活不正常的程度；与此同时，还必须懂得其传统，例如寡头控制便是从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统治时期一直到底隆统治时期都存在于阿根廷的。他指出，由单一的阶级(无产阶级)从事解放事业这种欧洲思想在阿根廷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在20世纪初期胡安·胡斯托的“国际化”思想开始在阿根廷知识界和城市工人中得到支持者，以及社会党人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拥有够

多的选民足以使他当选众议员时也是如此。拉莫斯认为，无产阶级在社会党全盛时期人数太少，并且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因而不能夺取对国家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联合不满现状和备受剥削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象阿根廷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拉莫斯相信大学改革运动具有提高政治觉悟和帮助社会主义兴起的性质。他也承认这一运动的主要贡献是给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出了力。他认为在1930年军方接管政府时<sup>①</sup>，自由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便一起消亡了。

直到1943年，随着庇隆和穷汉们崭露头角，阿根廷的无产阶级才得以再生并显示出政治行动的某些潜力。拉莫斯说明，到了1943年，阿根廷的政权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和陆军手里，而原来的寡头集团则已失去其控制<sup>②</sup>。这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根廷到欧洲的通道被切断，阿根廷开始从英国的半殖民地变成美国的附属国。战后，阿根廷初次以本地人占优势的无产阶级有了发展的机会，但不幸的是工人政党在庇隆主义影响下都受到其小资产阶级基础的妨碍。与此同时，知识界与群众之间以及无产阶级与年轻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之间出现分裂，使外国帝国主义者能够重新建立其霸权。

在拉莫斯看来，庇隆主义显示了半殖民地国家中各阶级

---

① 指1930年9月6日乌里武鲁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以伊里戈延为总统的阿根廷激进党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译者注

② 指1943年6月4日以“联合军官集团”为核心的军人发动政变掌握政权，实权在庇隆手里。——译者注

的典型汇合。由陆军、工业资产阶级、城乡劳动者和教会各部分组成的庇隆的全国反帝阵线，把社会主义所开的先河据为己用。这些派系把庇隆抬高到无限权力的地位，却未见其运用权力做出对大多数阿根廷人有利的事。庇隆主义的统治终于给阿根廷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使得阿根廷再也没有从动荡中恢复过来。

我们以豪尔赫·阿韦拉多·拉莫斯来结束论述阿根廷的这一章是适宜的，因为他的学术著作涉猎了本书提到的所有阿根廷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他的长处是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多地作回顾历史的认识，因而能够批判地分析阿根廷各种各样社会主义运动的消长，并且指出这些运动多年来如何在该国自由主义者实行进步的社会和政治措施方面作出了贡献。

拉莫斯的见解使我们更加懂得，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终于成了军方保守政策的牺牲品。由于军方从1930年以来一直支配着阿根廷的政治；以致到本书写作时完全根除了拉丁美洲传统最深和发展潜力最大的本国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军方无视正义主义阵线（庇隆党）曾被允许通过1973年选举重新执政而且尚在致力于国内团结，竟于1976年接管了政权<sup>①</sup>，此后便一直通过检查制度来消灭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动用“敢死队”来扑灭激进的政治活动。

---

① 指1976年3月24日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以庇隆夫人玛丽亚·伊萨贝尔为总统的阿根廷正义党政府。——译者注

## 第四章 智 利

从硝酸盐的荒凉土地上，从水下的煤矿里，从埋藏着铜而我们的人民靠着双手用非人的劳动进行采掘的难以攀登的高地上，一个宏大的自由运动突然出现了。这个运动把一位名叫阿连德的人物推举为智利总统，去实行不能延缓的各种改革和伸张正义的措施，并从外国人的魔爪下营救我们民族的财富……

在智利这块土地上，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正在建立起来，它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民族尊严……在我们一边的，在智利革命一边的，是宪法和法律，民主和希望。

——巴勃罗·聂鲁达

何塞·维多利亚诺(1817—1888)是19世纪智利杰出的知识分子，要建立美洲独树一帜的学问的提倡者，也是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批判者。1841年，维多利亚诺在圣地亚哥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这个团体的活动，激发了它的成员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1823—1865)去追求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的新的综合。他的探索导致了《智利的社交倾向》(1844)一书的

出版。这部著作谈到了历史决定论，也讨论了天主教教义与封建主义的“旧综合”，以及中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那些信念与曾经导致他称之为“同等自由”的一些信念的“新综合”。他的见解使他被课以亵渎神明的罚款并被流放到欧洲。他在那里结交了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徒费利斯泰·德·勒敏内瓦、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和诗人埃德加·基内等<sup>①</sup>，从他们那里知道了1848年的革命思想。

比尔瓦奥在欧洲期间，圣地亚哥成立了一个抱有社会目标但缺乏阶级觉悟的手工业工人协会。1850年比尔瓦奥一回到智利，就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鼓舞下，以理性主宰一切的原则是全部政治生活的唯一基础、博爱和友爱是唯一的道德标准作为依据，和圣地亚哥·阿科斯一起建立了平等协会。这个协会举行秘密集会，讨论公民权利、劳动，以及工业法和金融法。1851年它遭到了镇压，被控参与反政府的武装叛乱，但到1859年它的主张又在《平等》杂志上重新出现了。

智利民主党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公开宣布信仰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887年，并在1894年选出了一名党员参加众议院。该党日益向右转，所以到了1912年，其中富于战斗性的一派与之断绝了关系，而成立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社会主义劳工党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鼓动反对教士对政治的影响，并力图建立工会运动。到了1919年它又改变自己的纲领使之符合共产国际的纲领，而于1921年成为共产党。在

---

<sup>①</sup> 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其渗透着小市民精神的政治和社会道德观点在19世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中有很大影响。基内(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作家、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30年代社会党(部份地受到了秘鲁的何塞·马利亚特吉的鼓舞)诞生以前,它一直支配着智利的左派政治。

智利在20年代既经历了立宪民主制度,也经历了军人独裁统治<sup>①</sup>。铁腕人物卡洛斯·伊瓦涅斯于1931年下台,接替他的是一个保守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左翼分子担心贵族重新掌权,因为后者曾经长时间地阻碍了国家的进步。接着于1932年6月4日,马马杜克·格罗韦上校发动了政变,其军政府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sup>②</sup>,主张实行累进税制,由政府垄断煤、铜和硝酸盐等命脉工业,国家控制食品,分散大地产,政府管理信贷事业等。可是,这一改良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长远的计划,因为它的领袖认为,马克思虽然过分地颂扬了体力劳动,却从来没有提到工人统治。它设法在格罗韦执政的12天内,建立起一家国家银行。卡洛斯·达维拉在其后的100天内控制了运动,并且给成千上万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人带来了一些经济援助。达维拉政府后来成了军事政变的牺牲品。

智利的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激进分子、激进社会主义者

① 1920年自由党人阿历山德里当选智利总统,他的政府通过的1925年宪法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1924年9月被军事政变推翻。参加政变并在其后实际控制了国家生活的陆军参谋长伊瓦涅斯(1877—1960)又在1927年5月夺得政权并实行专制统治,1931年7月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译者注

② 通过政变掌握了政权的达维拉(1887—1955,智利外交家)——格罗韦集团曾宣布智利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实际上没有进行社会改革。达维拉后来与格罗韦决裂,并在军人支持下于同月16日发动新的政变,逮捕了格罗韦并自任临时总统,但同年9月13日又被另一个军人布兰勿撵下台。——译者注

和民主主义者在30年代末成立了“人民阵线”，并且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一联合终于因为在理论上发生分歧而破裂了。在其后的30年间，智利的各不相同的社会主义派别都倾向于否定列宁关于战争不可避免和暴力革命的理论，而宁愿采取选举的策略。这个国家曾受过俄国革命鼓舞的老左派，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遇到了受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开辟的可能性所鼓舞的新一代社会主义者的严重挑战。一向控制着智利参议院而阻碍进步立法的贵族寡头，则在60年代中期失去了一些权力，这就为开展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了缺口，而这些改革又成了1970年把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推举为总统的人民民主运动的预兆。

在分析对阿连德终于当选起了作用的智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前，需要简略地谈一谈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各个学派。既然智利的各个社会主义派别的存在早于俄国革命，所以它们一直赋予了智利的社会主义以一种本土的特色。一般地说，它们的力量与其说在于其形成理论的能力，无宁说在于其动员的能力。尤其是社会党具有独特的性格，历史学家保罗·德雷克把这种特性归因于它的创建者们，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刻板的思想信仰，无宁说是一种表示异议的象征。”社会党人声称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也宣布自己独立于特定的世界革命运动之外。政治学家厄恩斯特·霍尔珀林特别提到，智利的社会党人容易受到“思想风气”的影响，所以对人民阵线主义以至庇隆主义、铁托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等新思想，甚至对毛主义的一些方面，都敞开了大门。多年来，社会党人一直是非常民族主义的，他们反对



议会主义，而且倾向于无产阶级，尽管他们的领导人一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随着古巴革命向前发展，智利的社会党人变得更加激进了。

智利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主要分歧，向来表现在对外政策和对待中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上。社会党人一向拒绝同中产阶级政党结盟，甚至不同其中的激进党派联盟，而且直到60年代始终宁愿采取较为中立的“铁托式”的对外政策。尽管智利的共产党人并非象他们的阿根廷同志那样的典型斯大林主义者，可是他们却基本上追随苏联的对外政策。共产党人认为有两个革命阶段：第一个即“民主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垄断，主张国家支配经济以提高生活水平。在“第二个阶段”中，工人阶级将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但是，共产党人毫无革命的经历；而从对共产党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党，则自1932年的起义<sup>①</sup>以来具有更加激进的传统。一般地说，社会党人向来是由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员，尤其是由法律界和医学界的人士领导的，而共产党人的领导者则是劳工领袖。

在为智利的知识分子开辟向左转的道路方面，西班牙内战比起俄国革命后的其他任何一个事件来，都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例如，世界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目睹了西班牙的斗争实况后，于1939年加入了共产党。聂鲁达曾经说

---

① 从1931年7月伊瓦涅斯被迫下台到1932年10月亚历山德里第二次当选总统，智利发生过多次军事政变，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只有一次起义即1931年9月在科金博港演习的军队士兵的起义，原书所说的“1932年的起义”未知是否即指这次起义。——译者注

过，“完完全全的独创性乃是现代人的捏造”，是他并不相信的偶像，从而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智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特征；而当他断言，除了厌恶资本主义和信仰社会主义而外，他对人类的持久矛盾了解得越来越少时，他就充当了很大一部分智利左派的代言人。

### 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1876—1924)

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擅长于把理论变为实践，对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的影响就象何塞·马利亚特吉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的影响一样大。他的职业是印刷工人，但他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必要而有效的工具，因而以一名富有战斗性的记者、小册子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对此作出了贡献。

唐·雷卡(雷卡先生)是他的同事对他的尊称。最初给了他影响的，是他的同胞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的思想，还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和埃蒂耶纳·卡贝，无政府主义者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和米哈依尔·巴枯宁。1906—1908年间，他漫游了阿根廷、法国和比利时，见到了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胡安·胡斯托，以及西班牙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sup>①</sup>和法国人让·饶勒斯，他们都有助于他的激进化。

已经有过不少的著作，记述了这位自称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他成了智利工人的良心，因为他支持了他们的事业。雷

<sup>①</sup> 西班牙社会工党创始人胡安·伊格莱西亚(1850—1925)。——译者注

卡瓦伦以“爷爷”这一充满深情的称呼而知名于智利的穷苦人。他组织他们参加工会，从政治上教育他们，激励他们进行非暴力的革命。他不断劝说智利的无产者效法法国和俄国的工人，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利益。

1903年雷卡瓦伦开始编辑《工人报》，后来又为其他的工人出版物如《无产者》、《先锋》和《人民之声》等承担了类似的责任。1906年他被选入国会，代表安托法加斯塔矿区。当他拒绝进行就职宣誓（其中包括发誓要忠于上帝）时，其他代表都把他看作危险的革命者，不让他就任议员。

后来他在智利北部的硝酸盐矿区，发起了拉丁美洲第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1912年他又成立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以此团结各劳动者阶级。该党主张把私有财产转为公有财产，促进结社和出版自由，扩大选民登记范围，取消常备军，没收教会财产，实行义务免费教育。雷卡瓦伦领导的这个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当继之以革命，由无产阶级把崩溃中的资产阶级文明世界接过来。它还认为，社会党人应当实行裁军，建立世界和平。

雷卡瓦伦认为，自从独立以来，智利的阶级差别增大了。为了消除阶级差别，他在1920年竞选总统，但失败了。1921年他被选入国会，先是代表社会主义劳动党，后来代表他帮助成立起来的共产党。次年，他代表智利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人代表大会。他对俄国人如何消灭了资本主义印象很深，因而断定俄国人民具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品质；但他又推断说，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要比智利有利。当他在俄国的时候，他还进一步熟悉了托洛茨基和列

宁的著作。这些著作使他认为，智利的无产阶级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纪律性和政治组织。他为俄国解放妇女的努力所强烈吸引，认为她们已经平等地参加了革命斗争，并且正在获得平等。俄国的成就引起他去研究智利劳动妇女的问题，同时他把苏联的经验称为智利人可以从中学学习社会经验的实验室。

他在众议院中奋斗了几乎4年，揭露智利矿工所面临的悲惨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同时竭力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力图通过鼓动和组织罢工，把无产阶级变为强大的有纪律的队伍，而他认为，罢工乃是工人们能够用以解放自己的最有效的武器。由于他自己的共产党在反对军人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软弱无能，雷卡瓦伦心烦意乱，于1924年自杀身亡。

雷卡瓦伦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工人掌权的意见，在其后的岁月里，一直活跃于智利的劳工运动中。他象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支持建立一个工会系统，使工人对智利各级的管理都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根据他所理想的组织结构，有三个基本的政府部门：第一，行业会议，由每个地区的工人组成，代表所有的工农业和服务部门。第二，市政府，由每个行业会议任命的代表实行管理，并由各种委员会进行指导，负责其辖区范围内的居民福利。第三，全国会议，其代表由每个有万人以上居民的市区产生，由各种委员会实行管理，为整个共和国立法。在这种制度下，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在某个方面参加政府。

雷卡瓦伦认为，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基本上是由工人承担的。他信奉劳动价值论，声称一份薪金不足以报答工人

的贡献。在他看来，一份薪金不等于分享了生产出来的财富。他认为，工人有资格分享生产出来的财富，从而分享生活的舒适。

在《社会主义》(1912)这本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它的信奉者应如何活动的入门书中，他痛斥了个人主义及其所怂恿的利己主义的发展，认为这已经证明对智利社会是有害的。他向城市工人指出，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和道德的状况。他论证说，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变贫穷为富裕，还包括改变思想。认识到财富的再分配不是在基本经济问题即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实现的。他坚持认为，财富的再分配以及废除私有财产，将导致进步而最终达到个人和道德的完善与正义。

在雷卡瓦伦看来，阶级斗争是首要的，所以他把阶级合作列为改良主义。他非难宗教，认为资本家阶级利用它作为政治力量来维护其特权和制度。他极力主张，宗教的思想应当用科学的思想来替代。在他看来，宗教许诺在来世提供更美好的生活，是要人们服服贴贴地在尘世间受苦受难，这是对人间剥削的粗俗的、不适当的安抚，并且是对为反对腐败和暴政而殉难的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歪曲。他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预示了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那些观点，对此本书以后还要谈到。

他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秘鲁的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的思想的基础。雷卡瓦伦批驳了关于最高造物主的观念，说物质即宇宙始终存在于无限的空间和无穷的时间之内。在他看来，物质是看得见的，是唯一真实的。他完全相信，人们最终能够解开自己中间的奥秘。

他指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基督教形而上学的区别，并且提出疑义说，最高造物主的存在怎能说明世界各地的文化、种族、道德和宗教的千差万别。在他看来，唯一正当的解释就是从进化和环境方面来加以说明。

胡利奥·塞萨尔·霍韦特(他的著作以后还会谈到)认为，唐·雷卡“这位工人报刊的创办者”使得智利的工人斗争成了政治行动的同义语。雷卡瓦伦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纲领。智利后来几代的社会主义者，不论其派别倾向如何，都接受了他的理论，即“生活对所有人均等”和机会均等(不是指生物学上的相等)应当贯串于生活的全过程，而且超越于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他那些有时很有创造性的关于社会、政治和艺术相互作用的道德观点，来自他对生活总体的分析，散布得很广，甚至扩展到了阿根廷和乌拉圭。他的计划很有条理，很有科学性，也很明白易懂，就是要建立一个无论男女都能充分发挥潜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说过，“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sup>①</sup>；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认为，共产党必须是一个有知识的集体；雷卡瓦伦与列宁和葛兰西相应，他强调说，智利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就是对劳动群众进行教育。

### 胡利奥·塞萨尔·霍韦特(1912—1980)

胡利奥·塞萨尔·霍韦特属于智利30年代一代人，这一代人几乎是由大学生组成，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正在出现的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3页。——译者注

危机(大萧条),并力图了解20年代智利的经济问题如何导致了伊瓦涅斯的独裁统治(1925—1931)。他们感到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因而想象自己是新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先锋。

30年代初,当霍韦特在智利大学就学时,他加入了新成立的社会党;而在其后的几年间,他已经成了该党的思想指导者之一和杰出的经济史专家。他认为,智利的历史都是由有学问的上等阶级高贵人物写出来的,他们过分强调了按政治纪年而忽视了社会的相互作用。在30年代,霍韦特的思想类似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当时他所代表的是社会党的右翼;他们经常用不强调经济决定论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向左转了,变得更加教条,而且把30年代的社会党政策都指责为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

霍韦特是雷卡瓦伦的信徒和传记作者,他把雷卡瓦伦称为“民众的首领”,认为雷卡瓦伦是智利工人阶级觉悟的主要培养者,也是斗争的灵魂。

霍韦特认为智利屈从于美国的垄断集团,后者则靠狡猾的外交手腕而不用粗暴的炮舰行动来获得其地位。他注意到本国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铜和硝石的出口,并且责备地主贵族让这些基础工业落到了外国势力的手里。他说,这种不实行国有化的做法,给人们带来了感情的变化,贪污腐化和机会主义滋长起来了,而道德则堕落沦丧。他断言说,由于智利经济的依附性,智利工人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点,要多于同智利其他阶级的共同点。

霍韦特在《关于智利社会经济发展的批判性论文》(1955)

一书中，考察了智利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关系。这本书对于象路易斯·加尔达梅斯<sup>①</sup>（他的著作在智利国内外大学师生中极为流行）这样一些学者所写的毫无批判的历史，是一股强有力的解毒剂。霍韦特尽管有时也进行论战，但还是很清楚地描述了智利的劳工如何由于这个国家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而产生了觉悟。与他那个时代的智利历史学家的主要倾向不同，他把这个国家归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有极大依附性的国家。他不同意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学究们所描绘的、把智利装点成为立宪民主制堡垒的“惬意”画图，认为他们是自欺欺人，自以为其学问是客观的，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何况他对自己的著作也并不这样看。霍韦特要求对智利的历史进行社会主义的解释，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或抽象的概念，而是切实可行的和实实在在的。

圣地亚哥·阿科斯·阿尔特吉<sup>②</sup>那封著名的《致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的信》，发表于1852年，是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写成的，它成了霍韦特力图在智利建立起牢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传统的基础。他的努力在50年代开始结出果实，有了一系列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问世，它们摆脱了编年体和叙事体，而转向了对智利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以及其他着眼于阶级的历史研究。而这种做法，是后来才在美洲其他国家流行起来的。霍韦特及其追随者们写作的史学论著，彻底考察了社会，对智利不加美化，而讲述了

---

① 智利教育家、作家(1881—1941)。——译者注。

② 按照原书附录中的“索引”，这里的圣地亚哥·阿科斯·阿尔特吉和本章开头(第101页)提到的圣地亚哥·阿科斯是同一个人。——译者注。



这个国家的人民难以置信的痛苦、灾难和贫困。

除了历史，霍韦特还写过一些理论著作。例如，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书，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霍韦特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生产成果留给私人消费，而共产主义还要配给生产成果。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成果按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成果是按需分配的。他指出，“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把国家奉为神圣，容许有特权的官僚阶级进行支配，剥夺了公民的人权和削弱了民主，从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霍韦特把拉丁美洲看作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认为它通过大陆团结是能够用自己牌号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他认为，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应当谋求独立的经济的发展，但同时要着眼于最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这些国家结为一体。他论证说，这是消除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主要资源的控制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而这种控制之所以长久存在，乃是提倡民族主义的克里奥耳人寡头集团造成的。

随着古巴革命的发生，霍韦特和奥斯卡·韦斯一道，在60年代作为社会主义者当中鼓吹通过非选举手段来实现政治统治的主要人物出现了。他说，“革命暴力不可避免，而且合法。只靠和平即合法的斗争手段，得不到政权。”他还论证说，只有避开既定的政治进程而从事“武装斗争”，才能取得政权。可是，当时占上风的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人民团结政府的成员们的意见，他们不赞成霍韦特的这些想法；不过，按照这个政府当时面临的境况，人们现在还被极力劝说不要采

取他的立场。与此同时，象雷卡瓦伦和人民团结政府一样，霍韦特强调教育是培养人道主义价值观念的基本手段，它能使智利人认识到革命时期是人类发展中的创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还强调说，只有在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没有党派纷争，也没有宗派主义（他把这些比作阶级斗争），才能使自己的国家获得安定和自由。

### 奥斯卡·韦斯

圣地亚哥的律师奥斯卡·韦斯在1961年被驱逐出智利社会党以前担任该党国际关系书记，也是其主要理论家之一。其后他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民社会党，作为思想传播者为该党辛苦工作。他的辱骂人的作风曾使一位学者称之为“智利左派的塞西提斯”<sup>①</sup>。

在30年代末“人民阵线”的岁月里，韦斯以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崭露头角。尽管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作为激进党人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他于1938—1942年间出任总统）的后盾通力合作，但智利的社会党人却憎恶同资本家的这种关系，哪怕他们从中也得到利益。韦斯认为，不可能靠法令来走向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条件下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反复指出了包括激进党在内的智利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与工人之间的不同目

---

<sup>①</sup> 塞西提斯是古希腊传说中希腊与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之间的十年战争时期一个战士的名字，他以发表苛刻的批评和进行侮辱的辱骂著称。——译者注

标。他断言“人民阵线”旨在实现所有参加者希望达到的目的，尤其是要反对促成美帝支配智利的铜市场和债权关系的美国“命定扩张”的帝国主义理论。他对局外人把这一联盟说成是思想一致深感遗憾。

韦斯对马利亚特吉的印象很深，认为他正确地不把拉丁美洲的独立看作一场社会运动而看作克里奥耳人和半岛人<sup>①</sup>之间的阶级斗争，即前者要从后者手里夺权。他认为雷卡瓦伦是又一位杰出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作家，并对其工人纲领非常敬重。在韦斯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朋友中有乌拉圭的罗德内·阿里斯门迪和阿根廷的西尔维奥·弗朗迪西。

他讲过需要创立一种革命制度，一种按集体原则把拉丁美洲的群众组织起来以战胜一向由假领袖或机会主义者掌权的制度。他谈论过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并不天真地认为就此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承认和平道路是更民主的办法，但正如阿连德的悲剧终于证实的那样，他仍怀疑政权能够不经流血而从压迫者手里转到被压迫者手中。他还坚持认为，“民主制”就象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用国家来调节社会各阶级间关系的一种政治形式，以便于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能够操纵自如。在他看来，真正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它不是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的同义语，而是恰恰相反。

韦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有创造性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主

---

<sup>①</sup> 半岛人指在拉丁美洲居住的西班牙人，因西班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而得名。——译者注

义者，对第三世界的政治特别是与东、西欧的关系有可靠的了解，所以一贯寻求在智利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行办法。历史上的证据使他认为，实现这个目的的主要障碍是宗派主义。在《当代社会主义的问题》(1961)一书中，他把社会主义思潮分为四大类。他认为，苏联的正统社会主义就是强有力的、严厉的官僚主义控制，以及利用和平共处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取得政权。中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持久的革命、抵制官僚主义控制的分权制和以农村劳动者为重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对其青年没有吸引力的革命、强调分权制的自治制度、积极而中立的共处和人民有权选择其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受固定思想方式的支配。最后，他颇为含糊地讲到了非难共处和避开官僚主义恐怖统治阶段的“革命社会主义”。

他的《当代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书不仅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例如，其中有论述自由和创新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杰出的一章。象列宁一样，他主张每个艺术家都有权充分自由地进行创作。按照他的意见，不应限定艺术家只反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政府不可向艺术家发号施令以致剥夺其创造力。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艺术家诸如伟大的俄国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up>①</sup>，是其社会的组成部分，其作品自然反映这个社会及其阶级斗争。

---

<sup>①</sup> 苏联早期电影导演(1898—1948)，其1925年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被公认为当时世界电影的杰出作品。——译者注

除了分析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韦斯还想阐明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认为它的运转基于三种普遍的理论：第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一些政党诸如秘鲁的阿普拉党、巴拉圭的二月党和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sup>①</sup>只争取个人自由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接受阶级斗争，也不强调生产资料的结构性变革。包括在这一类的大概有诸如墨西哥(1910)、玻利维亚(1952)和危地马拉(1944)<sup>②</sup>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们设置了得人心的政府并努力实现各种民主权利，但在设法消灭封建生产关系时促进了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第二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即严格运用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阶级斗争。这一理论包括这样的意见，即在拉丁美洲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一码事，以及即使同帝国主义斗争也完全不能依靠资产阶级。他之所以把这一路线称作教条主义，是因为它把拉丁美洲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情况概括为一个断定只有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劳动者能够援助革命的人为公式。它排除了中间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帮助，而且含有这样的意思，即革命一旦发生，可以转变的人们都必须在同样的条件下经历同样的历程(阶段)。第三种是他主张的“灵活

---

① 巴拉圭的二月党全称为二月革命党。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由贝坦科尔特(1908—1981)于1941年创建，其最早的前身为流亡在哥伦比亚巴兰基利亚市的他的朋友按他的意旨于1931年成立的左派革命小组。——译者注

② “危地马拉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本书其他地方又作“危地马拉革命”，指1944年危地马拉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乌维科独裁政权及随后阿雷瓦洛(1904—)和阿本斯(1915—1971)先后任总统的两届政府实行改革和独立的外交政策。——译者注

而中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通过变革财产与劳动的根本关系来使革命稳步前进，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又能估计和预料到各种偶然事件。革命的目标不仅是工人的解放，而且要使国家和大陆摆脱帝国主义而独立。象列宁一样，韦斯也认为革命不是非得要在每个国家一模一样地重演，其发展必须适应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差异。最重要的是，他想用清晰的思想来代替简单而僵化的公式。

### 路易斯·比塔莱(1927—)

生于阿根廷的路易斯·比塔莱后来成了智利公民，并在该国以历史学和地理学教授以及当代社会问题分析家而博得名声。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其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人物批评、犹太复国主义、古巴方面的著作和一部智利历史的七卷本专著。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帝国主义和智利的劳工运动、土地改革与工业发展。

他的老师、阿根廷的何塞·路易斯·罗梅罗<sup>①</sup>培养了他对政治思想史的兴趣。比塔莱后来运用他受过训练的头脑来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并且采纳了马克思对发展阶段的意见。他把墨西哥的西尔维奥·萨瓦拉<sup>②</sup>关于殖民地时代的见解和秘鲁的何塞·马利亚特吉的政治分析吸收到他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中去。

比塔莱论证说，西班牙人到达拉丁美洲时，前哥伦布时期

① 阿根廷历史学家、教育家(1907—)。——译者注

② 墨西哥历史学家、法律学家(1907—)。——译者注

文明的生产方式处于金属时代(铜和青铜)的高级阶段。他认为西班牙的征服是伊斯兰教徒入侵西班牙、君主制力求巩固、寻求国外市场和新生商业资产阶级兴起的结果。他驳斥了民主主义的左派认为西班牙是封建国家的意见,并认为“自由主义者”把经济落后和封建主义混为一谈。他认为,西班牙在征服时期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同时还发展着一种贪婪的教权主义和残酷的军国主义。殖民地经济是靠大量资本组织起来的,而工人则靠工资过活,尽管所得微薄。西班牙人以取代前哥伦布时期农业社会的方式,来继续推进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西班牙的领地制<sup>①</sup>把印第安人(而实际上是把他们的土地)授予其士兵,这在性质上不是封建的,而是一种掺杂的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比塔莱指出,英国作家传播的“黑色神话”<sup>②</sup>未能清楚地揭示出拉丁美洲的情况,而那里却是十分类似于欧洲国家前去搜求利润的所有海外地区的。另一方面,他对企图为领地制辩护和捍卫教会的“粉红色神话”深感遗憾。

克里奥耳人中的资产阶级对发展国内市场的愿望导致了一场向西班牙和半岛的垄断者夺取政治与经济权力的运动,并且引起了1810年的叛乱<sup>③</sup>。独立虽然扩大了政治自主权,

---

① 拉丁美洲在殖民地时期将土著居民村落划归殖民者管辖的制度。——译者注

② 用以表明西班牙和西班牙人形象不好,谴责他们残酷和偏狭的一种说法。原先流行于许多非西班牙语特别是新教徒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译者注

③ 指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为争取独立而举行的群众起义。——译者注

却未能阻止帝国主义，也没有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或者促进土地改革和工业化。比塔莱坚持认为，拉丁美洲历史的进程是屡受挫折而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因此，智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经历过欧洲的历程而直接发源于殖民地时代的。它不是工业资产阶级，而是商业资产阶级，其国内市场很小。

独立以后，权力转到了把原料向国外出口的资产阶级手里。因此比塔莱认为，智利的悲剧不在于它是封建主义的产物，而在于它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个资产阶级在一块因为依赖外国金融资本而不能断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半殖民地大陆上阻碍了发展的主要可能性。没有任何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发展，而帝国主义则成了智利现行制度的组成部分。

到了 19 世纪末，智利的资产阶级便与地主和外国投资者勾结起来，因而以为有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智利没有重复 19 世纪的欧洲所经历的那种由中等阶级推翻封建主义而开始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是直接从本土人的原始公社进入早期的资本主义。比塔莱还坚持认为，美国从 1889 年第一次泛美会议就开始对拉丁美洲以直接的军事与经济干涉和间接的外交干涉双管齐下，巩固了美国和拉丁美洲这两个地区的寡头集团之间的联系。

比塔莱强调，在雷卡瓦伦时代阶级斗争的活动还没有成为智利日常生活中持久的部分，但唐·雷卡加强了该国的无产阶级传统，而他的自杀则标志着其国内工人运动的政治独立性。

比塔莱指出，1920—1932 年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合



作已经形成一个传统，从而导致了1938年的“人民阵线”，亦即60年代和70年代阿连德的人民行动阵线的先驱。他看出阿历山德里执政期间(1920—1925)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部分发展，但没有发生驱逐帝国主义的事，而这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在不断革命的这一阶段中应有之举。他还指出，伊瓦涅斯政权(1925—1931)看到工人开始组织起来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尊重，便用资产阶级来取代了上层阶级的寡头集团。但伊瓦涅斯却把工人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以挫败之，而不是象马克思所理想的那样采取相反的做法。在伊瓦涅斯指导下作为波拿巴主义革命而开展的活动，结果倒更象墨索里尼搞的联合国了。尽管工人和资产阶级都反对寡头集团，但它们的短暂联盟却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支配权。

比塔莱把“1932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描绘为智利经济混乱所引起的众多矛盾(政治和社会的动荡，议会、军方和各政党皆面临危机)的明显表现。“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马马杜克·格罗韦上校没有取得政权不应归咎于工人，而是一些军事单位搞政变的结果。他的运动具有反帝、反寡头集团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特点。它没有持续下来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害怕武装工人，没有制定反帝纲领和解除敌人武装。

按照比塔莱的估计，1928—1938年间智利的左派开始联合起来，但宗派主义妨碍了他们取得政权。在他看来，人民阵线时代的阶级合作使智利不可能在经济上特别是对原料拥有主权。人们根据他的论断可以看到，从“人民阵线”时代直到阿连德执政期间，阶级合作使外国企业家得以对智利经济保

持巨大的控制权。

比塔莱分析了社会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并把它称为假革命。它在社会利益的幌子下修改了智利的法律，以改善外国和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的命运。在他看来，阿奎那和奥古斯丁的思想体系连同基督教民主主义，都支持已在智利证明是无效和倒退的、搞政治妥协和社会和解的想法。

比塔莱描述了革命进程如何随着智利经历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而在国内政治斗争和工人阶级中开展。他猛烈抨击了对待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的教条主义解决办法，并且强调社会主义团结的必要性。在《克洛塔里奥·布莱斯特的演讲和智利革命》(1961)一书中，比塔莱汇编了布莱斯特的著作，同时收入了自己的论文，认为古巴是对智利阿连德的运动最重要的心理推动。古巴革命证实了比塔莱的信念，即每场革命都解放新的力量，加速普通成员与官僚主义领导的矛盾，引起分化过程、向心与离心倾向、严重分裂和新组织的产生。

比塔莱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必须是国际性的，因为只有在全球性市场的范围内人类才能重新占有世界产品，而且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阻碍其全面发展的本地和本国的局限性下解放出来。

有些思想家(例如 C·赖特·米尔斯)认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先后次序不一定会发生，因为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都不是从资本主义而毕竟是从封建主义产生出来的。比塔莱驳斥了米尔斯的上述意见而坚持认为，即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没有先进的工业，但在矿业、牧业、农业和轻工业里却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制

度，存在着不是受制于封建主义的法则而是受制于剩余价值、利润率以及一般的资本主义法则的社会阶级，即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举了卡斯特罗取得政权时的古巴为例，说明它当时就不是处于封建阶段而是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不否认历史性跃进的可能性，但强调过渡性社会的存在。

比塔莱反复强调，世界上的工人国家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不是从封建国家而是从那些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而带有停滞和联合特征的国家中产生出来的。他一再重申托洛茨基的观点，即农民在这样一些落后国家的革命中可能是宝贵的推动力量，但要注意他们是革命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他看来，农民的个人主义使他们难以适应集体主义的社会，这是人们回顾一下前哥伦布时期一些社会中的公有现象就能驳倒的论点。

比塔莱怀疑，革命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是否因为无地的农民为革命进程提供了动力，或者因为农村是能够打败现代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军队的唯一地方，或者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就要以农村为基地开始战斗。在他看来，革命的第一阶段究竟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历史情况。

路易斯·比塔莱对过渡中的工人国家作深入的理论研究表现了很大的关注。他认为，特殊的条件使历史迂回前进，并使落后国家成了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场所。在他看来，世界朝着社会主义稳步前进；人类有 1/3 以上已进入社会主义的某一阶段，从而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将代替资本主

义的预言。他论证说，这就使资本主义国家置人类于核屠杀的边缘以延缓其灭亡。尽管如此，他对进步的想法特别是对智利的发展仍然没有失去信心。虽然他在60年代就警告说，智利的工人总的来讲比阿连德的人民行动阵线所代表的政党更有战斗性，但他仍然为人民团结运动在1970年竞选获胜而感到高兴。在阿连德当选之后，比塔莱要求左派在理论上重新武装起来以捍卫社会主义政府，并且主张工人组织起来随时准备用暴力保卫自己的政府。他的远见未得到重视，因为智利的工人随同阿连德政权垮台而消沉下来了。

#### **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1916—)**

共产党理论家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大概是智利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中杰出的文学人物。泰特尔鲍姆受律师的教育而以作家为职业，在智利大学就学时成了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毕业后以其诗作、小说和文学批评而知名。他的人道主义品性部分地来自阅读马利亚特吉、鲁文·达里奥、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智利同胞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的著作，还写过一部关于雷卡瓦伦生平的歌剧。

泰特尔鲍姆把文学工作视为其社会职责的组成部分。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杂志社的社长，还创办了《世纪报》。他为人庄重，很有修养，更喜欢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其在1943年出版的分析西班牙在南美洲建立统治的《资本主义的到来与美洲的征服》一书而出了名。两年后他被选入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冷战使他不得不于1947—1951年间隐藏起来，其间他写了最著名的小说《硝石之子》。该书以七种外

文出版，反映了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集中体现了泰特尔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因为它描绘了智利硝酸盐矿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劳工领袖埃利亚斯·拉斐特为改善矿工命运所作的努力。

在随后的岁月里，泰特尔鲍姆当过瓦尔帕来索市的众议员（1961）和首都圣地亚哥市的参议员（1965），并以思想明智、行事从容和致力于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声誉日增。例如，对于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论是武装的还是非暴力的他都能接受。

泰特尔鲍姆是巴勃罗·聂鲁达的“战斗性尊严”的赞美者，他感兴趣的是智利作家应当做什么，特别是在描绘本国的人的异化方面。他对造就马克思主义的新人和克服使许多知识分子苦恼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乃是象马克思所说的“其工作对自己来说具有深刻人性的和精神的意义的创造者”。他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即知识分子的劳动通常不是解决自身的物质需要，他们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不喜欢的活动上。

泰特尔鲍姆同意恩格斯在 1888 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加的一条附注中对无产阶级提出的定义，即“无产阶级是指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sup>①</sup>泰特尔鲍姆起码把知识分子看作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们有特殊的斗争形式、武器和作用，其声音在拉丁美洲更频繁地为人们所听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65 页。——译者注

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觉悟在不断提高，其中许多人起初经历了消极对抗法律和习惯的阶段，然后进入反叛的阶段。

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以为这是解决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的矛盾的办法。他还论述了如何在向人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同时维护自由的问题。在他看来，人道主义的实质是社会关系如何起作用。他宣扬中庸之道，而且象马克思和列宁一样告诫不要采取煽动农民夺地之类的极左行动，他认为这样做最终肯定会自取灭亡。

1970—1973年的社会主义政府<sup>①</sup>在很大程度上遵从了泰特尔鲍姆的克制要求。关于该政权，他写道：“智利从未象今天这样在以萨尔瓦多·阿连德为首的人民团结政府下有如此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和对人权更多的尊重。”他从来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天真的信念，即智利军方（他们后来推翻了阿连德政权）对忠于其支持按宪法选举的政府的使命是决不会动摇的。当他的这一梦想被粉碎、阿连德以身殉职而他自己也被监禁时，泰特尔鲍姆还把几分责任推到本应集中力量把人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却拒绝与人民团结联盟合作而使其道到削弱的极左派头上。更有战斗性的一些组织的成员不接受泰特尔鲍姆的论点，他们提出相反的论据是：如果象共产党这样较温和的力量都拿起武器，那末智利本来是不会成为极右

---

<sup>①</sup> 指阿连德于1970年11月出任总统而组成的人民团结政府，由于实行铜、煤、钢铁等工业企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触犯了反动阶级的利益，于1973年9月被右派军人推翻。——译者注

派的牺牲品的。

### 路易斯·科尔巴兰(1916—)

同他的更有创造性的共产党同志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相比，热情奔放的政治家路易斯·(战斗)·科尔巴兰则擅长于贯彻别人的思想和简明扼要地说明复杂问题的实质。他也受过雷卡瓦伦的很大影响，而且象泰特尔鲍姆一样，认为共产主义在智利是人道主义的最高表现。他是共产党的理论家、报纸编辑、小册子作家和参议员，还是党的总书记。他同共产党与社会党的竞选联盟——人民行动阵线密切合作，并吸收了其他政党而使该阵线扩大，终于成立在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下上台执政的人民团结政府。1973年军方在智利掌权后，科尔巴兰被监禁，直到1976年同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可夫斯基交换而去了苏联。

科尔巴兰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根本问题，如土地所有制和天主教会；这些问题在智利引起了极端保守主义，并使之长期存在而阻碍了社会发展；每个国家的革命者都必须懂得本国的问题，并据以决定其运动的方向。

古巴革命使科尔巴兰看到，在智利有一种革命的构造正从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形成起来，它倾向于轻视无产阶级，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爱用恐怖手段。科尔巴兰坚持认为，在智利不同于古巴，暴力行动不能在农村而只能在城市爆发。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断言从古巴扩散来的革命思想应当同诸如共产党这样一些较确定的革命组织的思想协调起来。虽然他注意到列宁关于防止冒险主义危险的告诫，并且一度把菲德

尔·卡斯特罗的早期行动列为冒险主义，但他同时主张左翼结成联盟，从而使智利的社会主义者赢得短暂地获取政权的局面。他相信自己的国家不用武装斗争也能促进革命。他还赞成多党制政体，但从来没有说明这样的政权一旦上台如何能维持下来。

在编入《我们的革命道路》(1964)一书的一系列文章中，科尔巴兰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这是智利共产党长期鼓吹的一种思想，认为它能够通过选举程序上台执政。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目标是通过民主手段取得政治胜利，但即使失败，整个运动也还是得到加强，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他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不赞成为暴力而暴力”，这是任何神志正常的人都不能反驳的意见。他表明，“如果统治阶级诉诸暴力，则人民的运动可能被迫走另一条道路，即武装斗争。”在他看来，暴力似乎只是在执政者天天使用暴力时才存在。科尔巴兰的左翼反对者们说，只要智利存在着表面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就认为情况是正常和没有暴力的。他只从杀戮方面给暴力下注解，而不考虑夭折、营养不良、健康不佳、缺乏卫生设施、失业和对人的剥削。

科尔巴兰知道，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和民族解放革命不可能和平地实现，他也了解，列宁曾经否定这种可能性，但他仍然坚称，历史情况不同，何况列宁也认为不是所有社会主义道路都得一模一样。其实，科尔巴兰还知道列宁有过这么一个预言，即顽固势力决不会自动投降，他们如果在选举中被打败就很可能进行一场反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智



利的经历却证实了这位俄国革命家的预言。

科尔巴兰表明，他的党同意每个国家都应当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发号施令，而只是给予指导。但智利的社会党人把“指导”解释为驯服。例如，他们指责华沙条约把世界卷入军事斗争，甚至被社会党领导人劳尔·安普埃罗·迪亚斯(下面就要讨论)说成是把全球分为两个阵营便造成了使工人斗争从属于国家安全的局面。

科尔巴兰还拒绝中国人关于每一个党都应当同时做好和平过渡和武装斗争的两手准备的意见<sup>①</sup>。他也无视古巴的经验面继续强调宁肯让智利走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致使他的左翼政敌深为恼怒，指责他的态度是对阶级斗争的污蔑。不管人们认为科尔巴兰的看法是属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也好，教条主义地追随苏联的路线也好，甚至个人的唯心主义或者空想的天真行为也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阿连德政府那些混乱的日子里，也从未对总罢工能够挫败右翼武装叛乱的论点产生过动摇。

#### • 劳尔·安普埃罗·迪亚斯(1917—)

人们可能把劳尔·安普埃罗·迪亚斯称作社会党内相当于共产党的路易斯·科尔巴兰的人物。他是律师、精明的政治家、理论家、杰出的参议员和党的组织者，象科尔巴兰一样擅长于解释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50年代控制了社会

---

<sup>①</sup> 参阅《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6—99和335—384页。——译者注

党，并把它塑造成为有纪律的和独立自主的组织。他努力消除政治中的个人至上论，并使党从民众主义转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在冷战期间奉行独立的路线，即使必要时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也决不放弃社会党的目标。

尽管迪亚斯不是一个特别有创见的理论家，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扎实可靠的知识。他尤其了解毛泽东的思想，而且象后者一样不囿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事实上他特别提到，要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遵循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就会仍然在古巴掌权。象科尔巴兰一样，他断言每个国家都必须改订策略和战略以适应自己的情况。他在社会党内被公认为经济和社会问题专家，是比萨尔瓦多·阿连德更善于运用马克思学说于智利现实的人物。

安普埃罗·迪亚斯拒不接受共产党人自诩有权在智利垄断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及其“和平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他看来，共产党人和鼓吹在现存制度下通过议会程序进行工作以实现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是不现实的。他认为，世界不是分为两个政治(党派)阵营，而是分为资产阶级势力和无产阶级势力。在他看来，智利的党派争论和宗派主义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者能够加以实现的理想，但在他们达到步调一致以前仍然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他努力消除社会主义各派的隔阂，而终于使社会党同以反对帝国主义、寡头政治和封建主义；尊重工人权利；主张民主的集体主义和消灭土地剥削为纲领的人民行动阵线结成联盟。但尽管如此，他总是强调在智利社会主义团结的道

路更难走，因为智利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和用黑格尔的意见来说是牢记心头并化为生命的。私人倾轧与思想不一致，使他在1967年末退出社会党，他指责该党搞民众主义，并且反而同共产党人结成过分紧密的联盟。后来他创立了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该联盟在1970年没有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

迪亚斯认为，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其他革命运动的催化剂，但它又使拉丁美洲处于美国指挥的、旨在复活门罗主义以防止意识形态移植的戒严状态之下。他认为美国在古巴革命后已迅速采取行动使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制度化，而且指明争取进步联盟和对拉丁美洲右翼军人的大规模援助就是这一政策的例证。

智利不得不同过分自信的美国作斗争，同时还得解决国内许多与外国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安普埃罗·迪亚斯认为，有一个重大障碍使智利不能解决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他指出，外国投资和垄断就很难对付，同时靠低下的生产率特别是靠缺乏政治觉悟的工人运动也难以维持高水平的赢利。他认为，老的地主寡头控制了金融和政治并同外国资本勾结是不利于发展本国资本的，而农业部门由于土地受到前资本主义方式的利用与开发而停滞不前。他认为上述所有问题在工人控制成为现实之前不可能解决。他以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制度为楷模，说它防止了斯大林主义的弊病，表明了多党制并非民主政治所必需，而只消工人能直接派代表到经济和政府部门就行了。

另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共处比核战争要好，不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势必继续下去；资本主义

国家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世界战争是能够避免的。

迪亚斯在《当今世界面临的社会主义》(1964)这本小册子里指出，中国人比俄国人对第三世界了解得更清楚，但国际斗争必须协调得更好。他为中苏分裂之类的对峙局面感到痛惜。他主张兄弟般的合作和多元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迪亚斯讨论了智利是否必须经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断定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所说帝国主义在发达地区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在智利这样的不发达地区却是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是正确的。他劝告自己的同胞要有批判性、求实精神和灵活性，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不同方面来加以试验，才能使智利得到他所赞许的南斯拉夫社会那样的社会主义独立性。

### 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梅迪纳(1923—)

我们要论述的阿连德时期最年轻而且在某些方面最有发言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梅迪纳，一位先前的律师和智利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他在50年代支持过他所希望能为智利提供其所缺乏的权威的卡洛斯·伊瓦涅斯，并且先后担任过这位将军的劳工部长和矿业部长。

阿尔梅达·梅迪纳被公认有敏锐的头脑，后来就成了人民团结运动的固定支柱。他在阿连德政府中当过外交部长和智利总理<sup>①</sup>。1973年军人掌权后成了流亡中的人民团结运动的执行书记，一直卓有成效地运用此职务来协调对皮诺切

<sup>①</sup> 实为智利内政部长即总统属下的第一部长。——译者注

特独裁统治的全球性谴责和抵制。

梅迪纳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48)这篇为取得智利大学法律学位而提出的论文,使自己成了真正的思想家。他在这篇论文里认为大学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场所,正如他对国家和政治的历史前驱作出中肯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实质上也就是传播。

梅迪纳基本上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只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也掺和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即认为国家不存在政治权威,而行政与技术官员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公众和满足社会需要。他反对智利通行的那种议会程序,认为它只是为阶级利益效劳,没有足够的权威来解决大庄园之类的社会问题。他还同意阿罗德·拉斯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有局限性的意见。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与政治、法律、经济、管理、权力、民族和阶级专政的关系时,他把国家和民族区别开来。他强调人类(族)群体组成民族,而国家则含有一种理论上的政治成分,即群体受其统治。他断言国家应当制定一种使其不同选民满意的综合意识形态,并保证所有人自由。在他看来,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国家则是统治阶级力图稳定现存结构的工具。因此,国家是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机关,也就是说实际上存在着少数者阶级的专政。

他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应和“工人民主”相一致,从而导致共产主义的国家即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自由的无阶级社会。尽管他认为苏联有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但他注意到它已蜕化为官僚和军方统治的社会而剥夺了人们的一些权利和自由。

他还是试图阐明组合主义有别于国家干预的第一批拉丁

美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而这两者都是 60 年代在该地区更加流行起来的。在他看来,组合主义在拉丁美洲正日益取代自由主义国家。它是科学的,处于高水平上;而干预则只讲实效,常常是即兴的行为,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也没有预先估计其结果。组合主义体现为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它的一切政治权力属于构成这一自治体的专业集团和社会实体。从理论上说,在组合主义形势下,各项决定由代表人民的各个集团作出,而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则由旧统治阶级的权贵人物作出各项决定。他认为组合主义是管理资本主义国家更好的办法,因为在理论上它比自由企业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制更有代表性。

除了对国家的分析,他阐述人的概念的文章也许最能显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广度。他举出了对人的三个基本概念:(1)传统概念认为人受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和生物规律所支配,其中农业和经济活动构成权力与威望的基础,信仰上帝则起重大作用而有助于维护一种社会(亦即封建的)秩序,包括指望来生就必须安于现状。(2)现代(17—19 世纪)概念以文艺复兴思想居支配地位,其中有一种把人看作处于人类生存中心的见解,并相信理性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力量。(3)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则效法亨利·勒费弗尔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虽未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却开创了一个人们能够认识从而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时代。

阿尔梅达·梅迪纳建立了一套以其对拉丁美洲现状的认识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他认为影响智利的主要问题是帝国主义导致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发展和统治与依附关系。他在《政

治见解》(1958)一书中坚持认为,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上的渗透有损于智利的主权、文化和建立更公平社会的能力。他指出,智利在独立后几十年间曾经有过较大程度的主权,但后来居统治地位的贵族开始输入了大量的欧洲文化,从而导致外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竟然喧宾夺主的局面。

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也可能过度地受到外国思想意识的影响。他正告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他们的榜样,并坚持认为他们是对普通人不够关心的、有知识分子优越感的人。他认为,智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过多地信赖欧洲的理想和19世纪的社会准则,包括议会民主、政党制度、自由和抽象的民主,而所有这些都认定是不适合智利实际的。他猛烈抨击接受外国社会准则的做法,并且指出民主的自由主义在欧洲容许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运动的发展,而在拉美各国这样的依附性国家中却引起政治混乱,并使反动的少数人借口群众得不到公共的自由而加强其统治。

梅迪纳认为拉丁美洲有依附性的人民必须打破其从属关系,这使他接受了中国人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象中国人一样,他认为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才能消除战争的危险,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反帝斗争是互有联系的。他认识到,中国人不否认有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当然也不主张这种冲突。梅迪亚长期以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认为建立一个灵活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可能是着手联合左派进行革命斗争的最好途径。在他看来,人民团结运动这一包括八个政治组织的联盟乃是全国范围内朝此方向跨出的重大一步。

阿尔梅达·梅迪纳在人民团结政府中担任智利外交部长

期间,违反了他上述的一些想法,就象他在50年代在伊瓦涅斯政府中任职时那样起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作用。在阿连德的领导下,他支持了一个三方面的纲领:他既赞成拉丁美洲和美洲国家组织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又努力创造为建立面向本国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外部条件,同时还致力于加强国际上为变世界资本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个组织。

### 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

萨尔瓦多·阿连德与其说是个政治理论家或社会理论家,倒不如说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有办法把别人的思想用群众懂得并且常常理解为改良主义想法而不是革命想法的简单语言表达出来。他出现在本书中主要是因为他在1970年当选为智利总统乃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思想家中许多人努力的结果。简单地看一看他如何解释智利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有助于阐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方针的政权如何第一次在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通过选举政治活动而上台。

阿连德是一个律师的儿子,曾在圣地亚哥的医科学学校读书,其间积极参加了政治活动。他在1933年帮助建立了社会党,1937年被选入众议院,1939年在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的人民阵线政府中任卫生部长,1943年任社会党总书记。他于1945—1970年任参议员,其间曾任参议长五年。他还在1952、1958和1964年竞选过智利总统,但都没有成功。

阿连德从30年代到50年代站在社会党思想家的主流派一边,后来由于他们支持卡洛斯·伊瓦涅斯将军任总统而与



之短暂破裂。但他在 40 年代曾认为，社会党人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支持只不过推迟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使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催化剂。在他看来，这场冲突存在着一个重大矛盾，即其间代表法西斯主义的不单是轴心国，还有智利资产阶级的势力，后者一向表现出右翼的倾向。因此，大战既使法西斯主义者同与其有类似倾向的人互斗，同时也有人为了民主而打仗。他推理说，大战预示了社会与经济关系的改变，而且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瓦解。

阿连德既指望由于同盟国胜利而带来的民主潮流，便在战后时期强调集体的社会变革而不是工业化，希望削弱外国和本国权贵的特权地位并且改善群众的命运。他在 50 年代追随了囿于不同贵族、中产阶级、保守分子、改良主义中间派政党打交道的“工人阵线论”。他谋求只同工人阶级的政党结盟，以为历史从未表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必然只有一个党。

收集有他的文章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思想》(1974)一书，揭示了阿连德是一个谋求社会主义团结而不是个人权力的行动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解释历史的方法。他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相当有说服力，但他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却无任何重大贡献。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有可靠的理解，同时信奉阿尔梅达的观点，即智利国家一向是供统治阶级使用的压迫工具。阿连德表现为一个要使本国经济发展、社会幸福和民族独立的民主主义者。

他不愿充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力图了解思想家们的著作和作用。他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包含着很关键的意见，但不应把它们用作“问答手册”。他经常提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一书，对其主题产生共鸣。恩格斯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番话基本上概括了智利社会党的哲学，阿连德则认为它综合地体现了一个不发达的美洲国家的实际、一种依附性经济、一个民族的抱负和拉丁美洲团结的观念。他也有与恩格斯同样的理想，即“可以设想，在人民的代表们已把全部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的国家中，在不违背宪法便可以为所欲为的国家中，从大多数人民支持新社会的时候起，旧社会就和平地演变为新社会。”

智利社会党建立初期奉行激进的反自由主义纲领。它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却推行一条本地的方针，倾全力于群众工作而反对中产阶级，认为它已丧失革新的能力并接受上层阶级的社会准则。社会党人背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论。按照阿连德的看法，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其特点是实行具有政治的和社会的两大职能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主要起政治作用，而无产阶级却谋求社会变革。他说，在智利专政的思想已由一种不同的（选举的即宪法的）手段所取代，只是其社会的即无产阶级的外表还依然存在。

阿连德以“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自豪，强调它就是对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不受国际关系的牵制，但支持中国、古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有选择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

利。

阿连德的其他见解还可以从《总统同志语录》(1973)一书中看到,这是毛的“小红书”的阿连德变种,它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举凡饮食、农业以至酒精中毒、争取女权运动等广泛的社会事物中去。该书表明他致力于用技术和行政手段来改善人的状况。

阿连德认识到,世界日益互相依赖,智利有争取平等即减少依附性的必要。在他看来,世界上两个部分即两个集团的存在危及全球和平。但这一有潜在危险的局面是能够消除的,其办法就是平衡依赖性使之均等,特别是要平衡发达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依存关系。他还认为亚非拉国家必须协调它们各自的革命努力。在国际方面,他主张拉丁美洲通过联合国,努力同处于依附地位的亚非人民实现团结,实现拉丁美洲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和文化交流,以及普通限制军备。

由于在民主制范围内力求实现“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得到一些资本主义政党理论上的默许,阿连德得以在1970年当选为智利总统。在此之前,许多左派人士曾经认为他是站在社会党右翼一边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认为,他能运用一个最具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机制,来实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他打赌说,他能在保存民主、法制和智利悠久的宪政传统的情况下,努力改变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在他的政府尚未掌握支配国家的权力并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遭到国内外激烈反对的当时,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阿连德由于没有武装智利的工人和农民以及没有形成充

分的阶级团结来统一工农以反对美国所支持的本国武装力量而一直受到批评。他忽视了列宁的告诫：统治者是政府各部和私人企业中的中层技术专家、官僚和军事家，他们是不能用选举而只能用革命来取代的人物。归根到底，是阿连德的理想主义，是他不愿让智利人反对智利人，使他的生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梦想同归于尽，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率领下的国家军队于1973年9月11日打垮了人民团结政府，建立起一个消灭国内一切民主痕迹的残暴独裁政权。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阿连德和智利的经验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他试图在没有革命形势即没有能够对付反革命力量的先锋队的情况下，开始自上而下地建立社会主义。人民团结运动除了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运用国家机器来改变该国的基础结构以减弱其受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控制就能使权力从资产阶级手里逐渐转到工人手中，此外毫无思想上的一致性。

在某种程度上阿连德的运动所遵循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一种共有制社会主义，其思想基础是认为土地和产品属工人所有。这一想法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在资本主义中占有者阶级和为其效劳以获取工资的无财产群众之间的冲突，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伸张正义造成了障碍。在共有制社会主义下，资方和劳方已团结起来反对个人的或阶级的剥削。它与国家社会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国家的作用只是工人自我管理的补充。国家只做工人还不能做的事情。共有制社会主义发生作用的前提是所有职能最后将由人民的组织来接管，从而防止国家成为权力过大而不关心人的机构。

## 第五章 巴 西

资本主义不是神圣上帝创立的永恒制度，而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段落。

——莱昂西奥·巴斯包姆

从1822年佩德罗一世皇帝同葡萄牙断绝关系，直到1889年巴西的君主政体被推翻<sup>①</sup>，民族主义加强了君权的神秘性，并在拉丁美洲这个最大国家的政治中起着支配作用。民族主义者执掌了该国政务，他们是一些既代表当局又有改革思想的权贵人物，在19世纪末以前追随哲学家本雅明·康斯坦特<sup>②</sup>，后者向他们灌输了许诺“秩序与进步”的孔德实证主义。巴西的知识分子也相信这一套，因而未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也就不能发动群众。从独立到现在，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巴西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障碍。

然而，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设法进入了巴西。该国主

---

① 1822年9月葡萄牙王之子、巴西摄政佩德罗(1798—1839)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并建立帝国，称佩德罗一世。1831年因人民起义被迫传位其子即佩德罗二世(1825—1891)。1889年11月由于共和派发动废除帝制的军事政变，帝制被推翻，成立共和国。——译者注

② 法国政治家、作家(1767—1830)，鼓吹君主立宪制度，宣扬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译者注

要的思想性刊物《进步》杂志由安东尼奥·佩德罗·菲格雷多(1814—1859)编辑,是该国支持某些前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种出版物。为时短暂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于1845年在里约热内卢开始出版,社会主义思潮便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注意。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名著《腹地》(1902)的作者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9)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的民族精神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的巴西作家。1901年库尼亚创立了劳动者国际俱乐部,用以展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他不知怎么竟把马克思主义误称为“理性主义”。

19世纪最后25年间,欧洲移民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带到了巴西。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了巴西的内科医生西尔韦里奥·丰德斯(1858—1928),他出版了致力于传播马克思的社会思想的《社会问题》杂志。这个时期巴西另一位受人敬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是托比亚斯·巴雷托<sup>①</sup>,他是累西腓法学院教授,一个思想上缺乏无产阶级意识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但毕竟促进了科学分析的思想。他那些范围广泛的作品从阶级斗争方面描述了巴西的实际,并在君主政治的欧洲和佩德罗二世统治(1841<sup>②</sup>—1889)下的本国之间作了比较。19世纪70年代,他和累西腓法学院的一些同事试图分析巴西的组织机构及其各种制度受到的非欧洲影响,在80年代又试图推

---

① 巴西唯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1839—1889),其影响所及形成了“累西腓学派”。——译者注

② 佩德罗二世亲政于1840年。——译者注

广马克思的思想。托比亚斯·巴雷托既敬慕马克思也敬慕康德，他尽力使巴西的哲学、文学和法学摆脱严重的法国影响，而把它们重新引向德国的思想。他出版的德文报纸信守两条根本原则，即相信人们受经济进程的制约和人类的历史性和可变性。

巴西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92年在里约召开，出席者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后者遵奉克鲁泡特金的信念，即人类的根本美德将会在一个没有权威和财产的社会也就是容许充分发展个人意志自由的社会中展现出来。尽管1895年成立了巴西社会党，但无政府主义由于宁联邦制不要集中制以及在党的约束问题上抱有意志自由论的思想，因而仍然是支配巴西工会会员的哲学。

巴西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积极开展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运动，但由于其政治信仰而几乎不为公众所接受。他们之间紧张的敌对关系一直持续到20年代，严重地妨碍了该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发展。

俄国革命在巴西重新引起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因而受过法国思想家让·饶勒斯影响的内斯托尔·佩肖托·奥利维拉在1917年5月复兴了巴西社会党。这时无政府主义者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强调布尔什维克用主席代替沙皇是一桩非革命的、改良主义议会政治派的行为。无政府主义者攻击巴西的社会主义者沿着类似布尔什维克的思路进行思考。尽管大多数的巴西社会主义者不能接受列宁对1917年革命的看法，但许多人到了1922年已经改变主意。其中一些人与社会党分裂而帮助成立了巴西的共产党。无政府主义

者这时已熟悉列宁的思想和阿根廷的何塞·因赫涅罗斯对“最高纲领主义”(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因而也加入了按阿根廷共产党模式建立起来的共产党。

奥塔维奥·布兰多是巴西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他在1924年就把《共产党宣言》译成葡萄牙文,在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后,于1926年写出了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巴西的重要著作《平均地权与工业化:论圣保罗的起义和巴西的阶级斗争》,其中把巴西的共产党人称作蒂拉登特斯<sup>①</sup>、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和其他曾试图使本国摆脱政治和文化支配的已故革命者的继承人。著者强烈主张革命要有理论指导。他认为,巴西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完全受封建土地制度的牵制,以致保持着一种以不重要产品即咖啡为基础的不稳定经济,而使国家不断地需要外国贷款。他还分析了美国和英国为在巴西争夺经济霸权的斗争。

直到30年代大萧条的灾害之后,许多巴西作家才开始认真研究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到了这时候,他们已经更加充分地体会到俄国革命的成就和墨西哥革命的目的。随着大萧条而来的是艺术创造力和思考积极性的高涨。巴西的戏剧、电影、建筑以及民间的和严肃的音乐经历了一个复兴过程。进步的思潮在国内文化生活中占了主要地位,而许多艺术家和作家则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在热图利奥·瓦加斯独裁统治时期(1930—1945)形成起来的民众主义,使许多知识分子看到

① 意为“拔牙者”,是弗尔瓦·沙维尔(1748—1792)的译名,曾组织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密谋活动,被捕并遭杀害。——译者注



工人阶级参加政权是进步所必需，他们因而创作了许多旨在唤醒巴西工人阶级认识本国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巴西加入了美苏同盟，推动了该国实行进口替代<sup>①</sup>和工业化，并把工人阶级意识提到了新的高度。巴西的经济已不再适应欧洲的需要而向美国。战后美国把巴西列入其保持美洲资本主义霸权的计划，力图以此保住它对这个南美洲国家的支配权。为了努力加强它在巴西的立足点，华盛顿当局讨好巴西军方，认为他们较之一大批软弱无力的政党是更稳固的力量。美国提供训练和装备，并灌输了大量反共思想。

美国国务院授意的反共运动掌握了巴西的军队、企业和政界的权贵人物。例如，50年代瓜纳巴拉州的卡洛斯·拉瑟达州长就领导了一场成功的运动，把马克思主义者驱逐出巴西作家协会。协会垮了，许多巴西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

身为共产党员而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最有名的小说家若热·亚马多在他的一些描绘巴西不发达的东北部地区的阶级斗争的故事中，把巴西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描写成按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贡献来说相当浅薄和无能，以此评论他们新近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的共产党理论家雅科布·戈连德尔坚持认为，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大

---

<sup>①</sup> 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步骤，即举办工业而以本国产品替代原来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译者注

发展加剧了现有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引起了新的矛盾,这就有助于通过日益加深的矛盾(诸如美帝国主义和巴西人民的幸福的矛盾)来进行革命思考。

1964年军方夺取了对该国的控制<sup>①</sup>,几年以后,巴西的左翼政党就被压垮了。但尽管如此,巴西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写出理论上有针对性的书籍,只是在这个军方领导人、大多数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和较有文化的俗人仍然相信实证主义的国家里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读者。1979年当我在里约的一家书店找到社会主义者写的大量著作而感到惊奇时,书店老板解释说政府并未受到这些几乎无人理解的著作的威胁,它主要是害怕马克思主义观点为群众所接受。因此,审查员注意的主要是广播、电视、公众集会和通俗刊物。

在着手考察巴西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前,请读者注意:知识分子在该国有组织的左派队伍中一直是经常不受信任的。有人说,原因是盛行着对革命无产阶级的神秘感,即相信体力劳动者有一种天生的革命倾向使其比脑力劳动者优越。这一点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比在巴西最有名的共产党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态度中表理得更明显的了。

### 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1898—)

没有哪一个巴西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吸引了更多的国际注意。他的母亲教授法语,曾经

---

<sup>①</sup> 指1964年巴西军方发动政变迫使当时任总统的工党领袖古拉特(1918--1976)辞职而开始军人统治。——译者注

受到埃米尔·左拉的小说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接受了实证主义。1919年普列斯特斯以全班第一毕业于列亚连哥军事学院，并被任命为工兵部队中尉，于是这个和葛可亲而又不屈不挠的年青军官就开始了他的上级预言的光辉的军事生涯。

1922年，一批出身于中产阶级下层的理想主义的年轻尉官反叛了巴西的阿图尔·达席尔瓦·贝纳德斯政府，攻击它不关心社会和没有正义。这场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尉官派运动并没有消逝，而在1924年普列斯特斯就募集到一支队伍，其中包括大约1500名反叛者，进行了一次旨在引起人们关注他们争取国内社会进步的要求的进军。从这时起，普列斯特斯的一生成为了巴西社会史的一章。

普列斯特斯纵队的两年长征，行程超过25000公里，从巴西南部的大草原出发，穿过内地到达巴拉那河谷，多次反复穿越巴西东北部和中部，越过马托格罗索州，最后到了玻利维亚边境。当长征被得力于自然条件的联邦部队击败而结束时，普列斯特斯流亡国外寻求避难所。

普列斯特斯把长征看作对这个代表统治阶级和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而不代表人民的现行制度的批判。他在长征中实现了从小资产阶级改革者到革命者的转变，并开始看出巴西的冲突是20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也懂得了巴西没有先进的工业基础而只有依赖帝国主义的单一经济是不能进步的。他曾经打算使长征“唤醒内地的居民，把他们从已经陷入的麻木状态中摇撼出来，终止其对我国命运的漠不关心……我的任务首先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

他本来不曾想象他的纵队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者阶级的良心，而象他在1978年的一次会见中表明那样是破坏政府和建立公众同情心与团结性的一种手段。他承认长征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转向政治和社会的抉择，并且导致他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而从中获得“新的世界观”。

长征之后，这位“希望的骑士”（时人对普列斯特斯的通称）于1927年留居玻利维亚期间，在巴西共产党的鼓励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末他到了阿根廷，在那里遇到了吉奥尔迪兄弟（鲁道夫和阿梅里科），他们成了他的思想指导人。

1930年5月，普列斯特斯发表了一个得到广为宣传的宣言，号召进行土地和反帝革命，以建立由城市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会议管理的政府。按照他的计划，政府将没收土地分给农民，拒付外债，实行银行、矿山、公用事业和通讯系统的国有化。宣言并未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斯特斯认为，革命由共产党独霸将会受到妨碍，应当使更多的巴西人卷入革命进程。他的观点引起了共产党的很多批评。普列斯特斯指望苏联的指导能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而对巴西则帮助实现摆脱英、美资本的独立。他认为热图利奥·瓦加斯政权的民众主义倾向的许诺是空话，并且反对它与资本主义勾结及其法西斯倾向。他认为，共产党同其他民众力量结成联盟，就能够动员巴西群众拯救国家而免受法西斯主义之害。

到了1931年，普列斯特斯已经指责普列斯特斯主义的某些方面，把他过去的一些尉官派同伴称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并

且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时他既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又是中间阶级的英雄，其人道主义超越了阶级界线，使一些共产党员把他看作“小资产阶级”而不接受他入党。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加入共产党是他能够帮助反对瓦加斯的最好办法，而瓦加斯的纲领虽然花言巧语却不是革命的，其所代表的是在巴西掌权的阶级。

普列斯特斯在苏联住了较长时间后，巴西的共产党于1934年正式接受他入党。第二年他在民族解放同盟（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寡头集团的“人民阵线”组织）中起了显著作用：鼓动消灭大庄园，建议取消外债，主张外国企业国有化。尽管瓦加斯镇压民族解放同盟，普列斯特斯仍继续竭力争取实现其纲领，为公共工程国有化、发放社会保险津贴、实行八小时工作日、限定最低工资、保障个人自由和废除有害的国际条约而努力。政府于1935年逮捕了普列斯特斯，并在次年判处他监禁46年。

普列斯特斯在监狱期间完全置身于苏联和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他一被释出狱，就会见了著名的智利马克思主义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后者特别提到：“这样长时间的监禁，在‘自由世界’决非罕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是它最有影响的拉丁美洲成员，并且指望他解释该地区情况。按照他的估计，美帝国主义已经取代法西斯主义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反动力量。他努力使巴西经济脱离美国而转向苏联。他坚持认为，巴西有更大机会在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集团中扩展其市场，能够

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而不受苏联垄断，巴西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加强其主权。与此同时，他劝告其追随者不要试图马上发动革命，而要通过议会程序进行工作，直到具备适当条件（一如纯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计划所示）。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成功地使用了游击战术时，普列斯特斯仍然谴责巴西激进的革命和恐怖活动，并且说明由于条件与古巴的不同而劝告该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小心从事。

普列斯特斯认为，1964年巴西的军人夺权是抛弃了独立的经济政策而便于依附美国。为了努力推翻军人政权，一些巴西左派分子（其中包括不满意的前共产党员）转而采取城市恐怖活动的策略。普列斯特斯批评了“极左分子铤而走险”，强调他们缺少工人阶级的支持。他责怪社会主义营垒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招致了许多失败。在他看来，诸如实行城市游击战的卡洛斯·马里格拉这样一些“机会主义者”犯了重大政治错误，思想水平低，患了急性病。他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告诫过不要急躁，并劝告必须在革命低潮时实行退却。他表示，只要象马里格拉这样的人懂得历史，他们就会知道还不是武装斗争的时候，如今搞武装斗争只会造成毫无意义的生命浪费。普列斯特斯指出60年代马里格拉的“左倾”和1907—1910年俄国的“左”倾有类似之处，而列宁曾经成功地使后者在与右翼社会党人的均势中抵销掉。普列斯特斯指明，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反对过恐怖行为激发革命群众勇气的观点，而认为这种行为妨碍革命所最需要的提高觉悟。

到了70年代，普列斯特斯发觉自己在巴西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因而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继续严厉批评革命左派的“错

误”，同时从事有关巴西的著述，希望保持该国的反抗活动。到了80年代他又赞成武装革命，巴西的共产党就是因为他持这一态度而把他开除了。

普列斯特斯一向是人们谈论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时首先提到的名字之一。考察他的生涯以及发表其大多数意见的小册子和讲演，就能确认他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者和辩论家，而不是作为深刻的思想家的地位。普列斯特斯的传记作者之一阿布瓜尔·巴斯托斯说，对于30年代的普列斯特斯主义，最合适的看法就是把它看作一种英雄崇拜同一个为无产阶级（对他们来说，普列斯特斯象征着希望）设计的宏伟规划的结合。普列斯特斯主义是一个不科学的、非理智的运动，它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当时俄国革命成了发现自己日益处于西方实证主义支配下而努力实行工业化的巴西的样板。研究巴西共产党的权威罗纳·德·奇尔科特说，“在巴西的共产主义文献中，除了党的正式文件和普列斯特斯的著作之外，理论性作品极少。”奇尔科特注意不提普列斯特斯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断言他对自己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傲气十足、过于自信；其控制巴西革命的野心导致了广泛地鼓吹民族主义。

1951年以前担任美国《工人日报》外事编辑的约瑟夫·斯塔罗宾，在1946—1948年间花了很多时间与普列斯特斯在一起，从而断定他违背了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他寻求巴西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因为担心巴西爆发全面的阶级战争，或者向革命左转得太远而引起右翼军人的政变，以致严重妨碍左派的发展能力。1964年巴西军方的夺权进一步证实

了普列斯特斯的担心，当时若昂·古拉特的亲劳工的改良主义政府就被指责为向左转得太远。斯塔罗宾还说，普列斯特斯在30年代被监禁后失去了一些革命热情，他为寻求和平解决巴西问题的办法费尽心机，而又为不能找到办法感到痛心。斯塔罗宾认为，普列斯特斯由于早期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努力的失败，再加上他不能靠自己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获得地位，才使他转向莫斯科企求支持，以便能够有效地对抗冷战。

普列斯特斯的生涯已经长达70多年，其间他就象政治和社会状况一样经历了无数变化，这加大了评价其著作的困难。此外，他不信任知识分子，何况事实也证明他从来不是方法论正确的理论家，使得企图对他的思想进行分类成为有困难甚至也许是不明智的事。他在某些方面在自己的思想体系范围内追求灵活性。他早期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已如上述，而近到60年代他还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无条件地否定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接着他又说，“暴力行动除非有助于提高觉悟水平和组织群众，否则与革命进程毫无关系。”因此他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巴西除了反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是否可能用其他办法组织群众。普列斯特斯在要求对真正的问题进行明确的分析时陷入这种无批判力的花言巧语的倾向，加上他经常为斯大林和苏联的教条主义辩护，从而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他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其在巴西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位民间英雄。也许当若热·亚马多在其小说中把共产党领导人描绘为既是认真的行动主义者却又是浅薄无能的理论家时，他想到的正是自己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



## 莱昂西奥·巴斯包姆(1907—1969)

与注重实用的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大不相同的是更有学问的莱昂西奥·巴斯包姆(有时以笔名奥古斯托·马查多见称)。他受的是医学训练,却成了政治活动家,加入又脱离了他曾担任过负责职务的共产党,也当过经济史教授,还写了关于唯物主义社会学、巴西发展道路和工农革命道路等问题的13本著作。他在青年时代最欣赏19世纪巴西小说家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和查理·卓别麟的电影,特别喜欢堂吉诃德。成年时,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者维多利亚·柯都维亚和吉奥尔迪兄弟对他发生了重大影响,但他最钦佩的还是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象葛兰西一样,他是一个体谅人的弱点、不搞教条主义,而且其马克思主义考虑到民族、地理、经济和人口等等许多因素的社会批评家。他效法葛兰西,强调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只存在文化上而不是生物上的差别。

巴斯包姆提出了一种象让-保罗·萨特的学说那样具有存在主义特点的人道主义历史理论,从而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对历史的科学态度,特别是他自认为无与伦比的研究巴西的四卷本专著。他认为历史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其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使人成为自己产品的奴隶,而又转过来使之寻求根本的自由即社会主义。他认识到,为了达到社会主义,必须克服异化。他不象马克思那样把异化看作现实和理想的矛盾,而象赫伯特·马尔库塞<sup>①</sup>那样把异化看作对人的奴役状态、机器或劳动、财产、宗教、资本主

义市场和国家的反应。他坚持认为，人必须避免成为产生异化的生产的奴隶，而应着手形成一种适合于控制生产以提高其结果（即产品）的社会价值的新的意识。他认为，异化可以用不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而是针对全人类的人道主义来克服，而劳动和教育的异化一旦为人道主义所取代，就会给人以尊严。

巴斯包姆的回忆录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何随着其对自己一生中最后40年（从普列斯特新主义兴起时起）巴西政治史的观察而发展。他曾经写道：作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他，研究过马克思、列宁和托尔斯泰的著作，十几岁时便对普列斯特新纵队的英勇行为很感兴趣。他的好奇心推动他去分析普列斯特斯主义，分析普列斯特斯同巴西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巴西左派内部的政治斗争。他断定无政府主义思想对普列斯特斯纵队的拥护者来说是显著的。他把该纵队说成是在提高觉悟方面巴西史上最具有意义的军事政治举动。

20年代末的世界危机在工人蒙受严重损害的巴西产生了巨大反响。他认为大萧条是倒退的生产关系制度的破裂，即陈旧的半封建制度的爆炸。他把普列斯特斯主义和大萧条同造成热图利奥·瓦加新上台执政的所谓1930年民众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认为这次革命使某些权力从地主贵族手中转到了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手里，于是资本贵族（工业家）和外国势力便取代了地主贵族。他指出，随着在巴西有巨额投资的美国公司及其新的同盟者即民族资产阶级取代了地主贵

① 美国哲学家（1898—），其对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哲学和心理学分析在激进学生中有影响。——译者注

族及其英国支持者，英镑对美元的比价如何变得失势了。在他看来，瓦加斯作为这次“革命”的首领是个政治首脑，也就是说他不代表金融资本，而只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即其所代表的是那想要代表民众的很小一部分人而已。

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巴斯包姆担心起法西斯主义来了。他发现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和更加血腥的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不能取得必需的市场的最终结果。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后，他预见到会出现结束殖民主义而逐步扩大自决范围的国际要求。与此同时，他发现学术界和政治界中他称之为维持现状的“永久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与变革思想即“社会的辩证改造”观念之间的斗争更剧烈了。他认为，大战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冲突不可避免，从而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巴斯包姆把1964年巴西的军方夺权归咎于美国。他说，美国大使林肯·戈尔登和中央情报局认为，同共产党有关系的古拉特政府的政治不安定，以及外国势力想要保护自己在巴西的巨大投资和担心民众支持另一个卡斯特罗式的运动，导致了让军方取得控制的反改革、反革命的阴谋。他认为，独裁统治是该国产生了由经理、董事和公众关系人员组成的新阶级的必然结果，这些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及其金融同盟者的财产。

巴斯包姆在其著作中尽力把巴西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置于历史的相互关系中。在依附性理论盛行之前就写成的《巴西的发展道路》(1960)一书中，巴斯包姆指出了当代巴西是一个形式上独立自主但非常有依赖性的国家，这里

封建关系存在于资本主义结构中，既有城市的工业资本又有农村的封建残余。他认为，这个既有富裕兴旺阶层又有贫穷衰落阶层的两重性社会的矛盾，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与政治混乱和经济通货膨胀的重大问题。就象经济学家安德烈·贡德尔·弗兰克几年后认为的那样，他也把巴西看作经济发展不充分的主要例子。

他在信奉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因而指出工业化使巴西变成殖民地并使农村群众贫困化的同时，探索了当前改善社会状况的两条道路：第一，他主张分散大庄园和解放农民以消灭封建关系；第二，他提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从而取消外国在巴西的存在并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间阶段。在军方于1964年夺取了政权并且加强了政府控制而一些企业的国有化又使巴西对外国投资更安全的情况下，后一种意见就不可信了。

也许巴斯包姆的最大才能在于更富哲理性方面。例如他的著作《唯物主义社会学》(1964)是一篇内容广泛的历史论文，从希腊和罗马的源流来研究唯物主义，并把它同唯心主义对比，同时说明庸俗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别，从而使他跻身于最有学问的巴西思想家之列。

他的深刻著作探究了众多的哲学领域。他最好的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相互作用”概念的阐述并用之于研究作为阶级斗争组成部分的政党。另一篇卓越作品是他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心理因素一章，其中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何发展、个人心理如何不同于民族心理，以及克服民族意识以建立国际心理如何困难。

他的有独创性的《历史发展进程》(1963)一书是研究历史社会学与方法论的最好的葡萄牙文著作，它把历史分解为八大法则：(一)物质诸因素推动历史；(二)物质诸因素互相依存；(三)它们互相作用；(四)历史不可逆转而呈螺旋式发展；(五)所有因素辩证地转化；(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在相互作用；(七)辩证过程的转变中的“突然飞跃”并不平静；(八)新的变化总要影响历史进程。他主张灵活解释这些法则，并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者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认为，马克思如果在世也一定要对左派进行持久的批评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断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要素恰恰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他批评了巴西的共产党僵化，而且曾经特地指出小卡约·普拉多对共产党路线的“教条主义屈从”。

这个有创造性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从传道的意义上说是不激动人心的，却给予人们永恒的乐观主义，即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他主张一种不同于旧巴西历史的新的历史，前者是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由其成员如奥利维拉·维亚纳、佩德罗·卡尔蒙和希尔韦托·弗雷雷<sup>①</sup>写成的，他们提供了虚假的现实并为特权与非正义行为辩护。他否定了以单纯叙述或说明事实的方式记载“我们光荣的过去”的历史，也不相信仅仅依据民族或政治发展来解释巴西历史的人。他强调历史应研究社会的一切细节，历史学家应寻找决定历史进程

---

<sup>①</sup> 卡尔蒙(1902—)，巴西历史学家、法律学家。弗雷雷(1900年生)，巴西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其《主人与奴隶》(1933)一书和一部关于巴西东北部移民制度的著作(1936)被认为社会学杰作。——译者注

的根本特点和各种事实的起因、关系与后果。

尽管巴斯包姆很乐观，但他的历史意识却使他不得不讲求实际。例如，他在分析社会主义的成就时就指明了苏联是过分官僚主义化的例子，并赞成南斯拉夫政治理论家米洛凡·吉拉斯的意见，即俄国的官僚已经成了“新阶级”，它进行政治统治并且在托洛茨基看来构成了对革命的背叛。另一方面，他乐于背离经典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指明古巴能够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社会主义，而且象卡斯特罗这样的个人也能阐明群众的渴望和帮助他们改变其历史道路而充当群众的带路人。

#### 小卡约·普拉多(1907—)

在整个美洲最著名的巴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小卡约·普拉多，他的一些著作已译成西班牙文和英文。他的研究为探讨诸如民族、城乡冲突、巴西的外部压力、该国的社会史，尤其是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发展等领域中过去未曾阐明的方面提供了基础。他的博学的著作以其经济分析和敏锐地发掘依附性主题著称，并且是用明晰的文体而不是用数学术语或社会学行话写成的，具有这位认为社会主义只要有机会就能在男男女女心目中占优势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的明确方法论的特点。普拉多还有其(在巴西以外)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另外一面，这就是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巴西利亚出版社负责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杂志《巴西利亚评论》的编辑、“迂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度是苏联的支持者(他在60年代不同意吉拉斯和巴斯包姆的“新阶级”论)的生

涯。

尽管普拉多是巴西的共产党的老党员，但他从来没有不折不扣地遵循党的路线。例如在巴西的封建主义问题上，他总是不同意共产党的观点。他强调从来没有封建主义，该国生产始终面向市场，种植园制度的社会经济结构也不同于封建主义。他使用马克思的观点，坚持认为1888年奴隶制废除时巴西就从前资本主义制度转到一个剥削性更强的制度，即他所谓的“农民经济”。

普拉多一直使自己的分析依据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要懂得现在就必须理解过去。在他看来，过去殖民地的东西仍然改头换面地存在于巴西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他指出，殖民地时期的巴西生活是以商业界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而当代的经济、民族和政治问题则根源于以殖民地商业为基础的殖民模式。他表明，由少数企业家和行政官员经营、面由群众提供向国际贸易供应重要自然资源所必需的劳动力基础的殖民地经济，是如何形成为制度并在后来与实证主义关于物质进步通过秩序和纪律而来的信念同流合污的。普拉多把第二帝国(1841—1889)称作殖民地巴西和当代巴西的过渡阶段，当时有一些奴隶劳工被转为自由劳工。巴西的下层基础扩大了，咖啡变得重要了，但该国仍然是初级原料生产者，而另一方面中、上层阶级在与下层阶级扩大差距的同时，生活有了改善。

在《巴西革命》(1966)一书中，普拉多试图有系统地表述以巴西历史为基础的革命理论。他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各阶级和各社会部门的成熟程度与等级制度，总是反映了作为其基础的经济构成”，并且对此加以

证明。他把60年代军方统治下的巴西列为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管理的国家。他声称,为了促成社会主义革命,城市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村劳动者结成联盟。然而在巴西,甚至在瓦加斯时代的“民众主义”影响下也完全没有这种结盟的传统,而农民多半是被忽视的。普拉多指出,巴西没有革命力量,即使在共产党那里也是如此。他强调巴西从来没有直接存在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在《巴西革命》一书的西班牙文版序言中,鲁道夫·普伊格罗斯指出,左派在巴西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其原因是搞宗派主义和缺乏用革命行动夺取时机的机会。他说,“普拉多体会到巴西的工人和青年已经懂得对革命者要求有英勇气概,但宗派主义者并不采取行动而宁愿颂读革命的辞句,并在各自的组织中增加阅历和提高所谓的威望。但尽管如此,普拉多在亲自观察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对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的历史问题和矛盾的出路至今没有失去信心。他一直指出,拿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与结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行比较是枉费心机的。后者为私有财产所有者及其阶级的利益而存在,而前者则为占大多数的工人的利益、为正在努力实现人类和谐的社会集体成分而发挥作用。

他主张社会主义要用集体利益的观念来代替个人刺激的想法,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所有人提供必需品,比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更重要。社会主义使社会生产关系安排得合理均衡,从而使社会公平、均等并防止竞争性冲突和歧视。

他始终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的一党内定候选人的办法辩护,说是这样选出来的官员便构成一个为全体的利益



服务的行政机关,并且指出在多党制的资产阶级国家里,选出来的官员则为私有财产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而立法。他一直告诫巴西人不要用资本主义眼光观察社会主义政府,在互不相相当的事物之间进行比较。他断定,基于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敌视社会主义,是既不正确也不是建设性的。实际上,资本家的竞争心理使他们不能客观地分析社会主义。这里他已经间接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头脑充满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人扩大其心胸,从整个人类而不仅仅从自己这一部分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让他们自己有真正的思想自由。

#### 卡洛斯·马里格拉(1911—1969)

被朋友们称为佩德罗的卡洛斯·马里格拉在40年代曾接受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指导。后来他成了巴西的共产党在圣保罗的领导人 and 该党党刊《问题》杂志的编辑。1964年军方夺取巴西政权后,他对普列斯特斯的保守主义、共产党的官僚化及其不促进革命的缺点开始有所认识。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毛主义“造反有理”的信条,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以及雷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1967)一书中提出的必须不受那些暮气沉沉的正统老共产党支配的主张,都给了马里格拉以启示,从而使他在1967年与巴西的共产党决裂。当时巴西没有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美国则将其对拉丁美洲的外援总额的2/3拨给了控制该国的将军来加强它在那里的存在。马里格拉认为,共产党寻求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方式所花的时间太长了,同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他断定“正统观念属

于宗教，属于旧宗教”，而新宗教则是注重实效地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革命仅限于共产党就会把它限制在无休止的讨论中而很少有进展。

马里格拉宣告游击队是革命的先锋队，并在1968年初和他的同事马约·阿尔维斯一起建立了亲卡斯特罗的巴西革命共产党，号召开展武装斗争。到了1969年，他们又同武装革命先锋这一组织联合起来并发动了政治和军事战役。

马里格拉声称，依靠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在巴西已经失败，搜罗新成员也得不到什么结果。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行动方面开始了使用暴力的新方针，即同普列斯特斯的观点相对立的方针。当普列斯特斯后来批评马里格拉的“极左”是“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其基础是不相信工人阶级和联合行动的革命潜力时，马里格拉反驳说他一向也是批评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行为的。他也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与人民斗争中只能考虑前进的观点大相径庭的”，但他声称普列斯特斯的共产党吃亏在缺乏思想基础上，而不能怀疑他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

马里格拉强调，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并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分割完毕时，巴西已经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巴西从未赶上发达国家，而且不能走那些通过工业革命达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走过的道路。他断言，巴西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力量或资金通过私人企业来建立基本工业，因此必须由国家来建立工业，而国家资本主义也就发生了。

马里格拉声称：“资产阶级设法给予这个国家的，最多是

一定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尽管依赖帝国主义，却意味着前进了一步，也是真正的进步。但资本主义积累的法则也就立即起了作用，从而引起了牺牲、贫困和剥削，特别是农村群众。”

事实上，马里格拉描绘的是一幅新殖民主义的典型情况，巴西的病根不再是资本不足，而在于资本主义。要纠正这种局面，就必须革命，但他认为，只要共产党继续同资产阶级讲团结而使巴西的两大阶级保持一种既联盟又对抗的状态，革命就决不会发生。他认为，巴西需要使甚展也就是使无产者和农民阶层，而不仅仅是主导阶层有新的内聚力，有实力和涉足于政治。

马里格拉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战略家，他具有创新的能力，善于调和新老左派的思想，把不同理论家的意见兼容并蓄于一炉。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战略和理论都概括在《争取巴西解放》(1971)一书里，该书包括有他的《小指南》即《城市游击战手册》，其中许多意见是从乌拉圭理论家阿夫拉姆·纪廉(其著作将在本书乌拉圭一章中加以分析)借用过来的。

马里格拉强调，革命者在试图推翻军方之前必需了解它。纳尔逊·雅尔内克·索德雷的《巴西军事史》(1965)一书有助于使他相信，巴西军方向来为保卫现存制度而存在，它对阶级冲突作出反应，以保证政权不转到民众手里。它为此采取的一贯行动，表面上是在保卫宪法，却在扼杀人的进步愿望。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为支持共和政体而推翻君主制度的巴西军方一直有民主倾向，马里格拉对这一看法感到遗憾，并指出军

方向来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就连那次推翻君主制也仅仅改变的是巴西政权的形式，而不是其统治者。

马里格拉主张成立一个武装组织来对抗军方，而把巴西的政治危机转变成一个迫使军方承认有斗争存在的对峙局面。他认为，最初的对抗应发生在城市地区，在这里游击队能够发动袭击然后迅速消失，而不象在农村地区必须回到更为持久却较易遭受攻击的基地。他不接受游击中心论（见第十章古巴的格瓦拉一节），理由是在某个地方建立武装组织然后等待中心在别的地方形成，这未免带有过多的自发性而将归于失败。他认为需要有更加精确的策略方案，即包括了使用农村游击战的方案。

马里格拉论证说，一旦发生了持久的政治危机，不满情绪就会遍布全国，而军方就会为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失误受到责备。只要群众认识到革命行动针对其敌人，就会承认城市游击队为同盟者而给予援助。与此同时，同美国的联盟就会受到怀疑，而当军方倒台时，美国佬就会被赶出国门。

马里格拉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种针对军方的立场，并且引证了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书，断言有两支决定性的队伍，即有组织的国家队伍（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基本力量中未组织起来的队伍。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把军队看作国家的工具，而且必须懂得国家决不会容许可能反对或妨碍军队从而颠覆其所保护的阶级霸权的对抗队伍组织起来。他指出，军队在整个巴西历史上一贯起着镇压和保守的阶级作用，它不了解巴西社会的矛盾，它的阶级立场和政治领导地位使它不能对社会需要作出反应而改变其政治路线。他

断言：“基本的一点在于巴西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并非历史的必然……无产阶级能够一开始就行使自己的革命领导权，而且能够为之坚决斗争……这一可能性并不改变所要进行的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民主性质。”

一旦革命坚持下来，马里格拉的争取民族解放行动组织就打算要求废除特权和审查制度，实行艺术表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清除政治警察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在巴西指挥政治迫害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警察代表团，赶走美国企业人员并没收其银行、土地、矿业资源、原子材料和不义之财，实行国家对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公用事业、矿产和通讯系统的控制，打破土地垄断，保证农民的财产权，根除政治腐败，实行不以美国为方向的教育改革，以及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就业。

马里格拉的组织把理论用于实践，在1969年9月3日绑架了美国大使查尔斯·伯克·埃尔布里克，企图使15名被俘同志获得释放。尽管俘虏被释放并空运到墨西哥获得自由，但它引起的强烈反作用导致了在巴西重新实行75年前废除了的死刑和一次警察镇压行动，而马里格拉就是在这次行动中于1969年11月4日被杀害的。

这位拉丁美洲城市游击战的主要缔造者死后，巴西富有战斗性的左派实际上就被消灭了。反动派的军队就象几年后在邻国乌拉圭那样，以残酷镇压各种革命的和社会改革的行动来还击城市游击队。本书写作时，即马里格拉逝世14年后，巴西仍然受军方控制，其行事的依据还是那一套哲学，而支持它的也还是那一些同盟者。

### 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1911--)

纳尔逊·维尔内克·索德雷是巴西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思想家中最多产的，又是其中最一贯表现深刻的一个。他毕业于本国军事学院，跻身于将军之列，并与其袍泽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一样转向革命的左派。与普列斯特斯不同的是，历史学家索德雷写有理论性深刻的、没有花言巧语的著作。他已炉火纯青地完成了30多本书，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启发手段而注意到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在巴西历史上的作用。他的《对巴西政治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1933)一书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应用于巴西，多年来一直是巴西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典范。

索德雷写过各种各样的题目，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原理、普列斯特斯纵队、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现代化和军事史。他的《巴西的历史形成》(1962)一书把巴西社会的发展追溯到其葡萄牙本源，并且指出其发展如何与资本在国内的形成相平行。在他那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巴西资产阶级史》(1967)中，他说明了巴西从“封建秩序”直到商业革命的变化，并且指明由于葡萄牙发生资产阶级革命<sup>①</sup>，封建关系在巴西也被摧毁了。他描述了巴西资产阶级如何于1808年葡萄牙君主制度转移到该国<sup>②</sup>后在极大程度上发展起来，但它仍

---

① 时为1820年。——译者注

② 1808年葡萄牙摄政王约安亲王为避免拿破仑军队侵入葡萄牙后成为阶下囚，在英国海军帮助下率领皇族、大贵族和大官吏并携带全部国库财产逃到巴西，从此巴西实际上变成葡萄牙帝国的中心。——译者注

然受到当时盛行的奴隶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领主制的阻碍。19世纪中叶以后,该国经济重点从东北部和食糖转到了南部和咖啡,而随着该国商人阶级的壮大,更多的权力从地主贵族手中转移到了他们手里。与此同时,英国在巴西的投资增加了。而在奴隶制结束时,随着更多工资劳动者的出现,阶级结构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索德雷坚持认为,外国金融资本在巴西的增长导致了更多的本国金融资本,该国资产阶级的规模和力量都增长了;国内殖民主义随着出口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他有充分理由认为,资产阶级到1889年君主政体结束时已经建立并保持着权力,而到1930年大庄园主更多的权力被破除后,他们的权力已经很牢固了。索德雷断言,农民及其天然同盟者无产阶级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潜在力量,但由于缺乏互相信任而一直妨碍粉碎资产阶级权力的共同努力。

索德雷写了《巴西资产阶级史》(1967)若干年后,又写了《普列斯特斯纵队》(1978)来弥补前者的某些缺陷,其中说明了普列斯特斯的长征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许多人想要消除因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巴西极端依附性而造成的人间苦难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大庄园制的反抗。在索德雷看来,长征意味着土地革命导致土地贵族政治权力削弱的第一步。他认为尉官派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改良主义的,是一些军人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旨在反对他们认为既不尊重宪法又不信守自己诺言的现政府。索德雷强调,这场运动最终有助于把共产党改造成成为群众的党和把巴西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他还说,普列斯特斯主义并未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导致了瓦加

斯时代，巴西在这一时代经历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特点而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变革。例如瓦加斯的“新国家”便把工人阶级不拥护的社会立法强加到他们头上。

索德雷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常提供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应当做什么的最好榜样。他的著作表明，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会使作家去分析因果关系，去研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从而阐明阶级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而构成一幅社会结构的清晰历史图象。他的《作家的职能：文学的辩证法》（1965）一书阐明了这一过程如何运转，其中探究了艺术与社会相互关系。象葛兰西一样，索德雷认为作家探求社会真实、真理和美，并且通过理解而加以再创造。作家展示社会的持久冲突和对话，而这些往往就是阶级斗争。索德雷赋予他讨论的艺术以尊严，其办法使人联想到俄国人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象高尔基那样，他把传达事实或“知识”的技术专家同激发起重新塑造社会的打算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在他看来，由技术支配的艺术便成为遵命艺术，从而失去纯洁性、自主性和作为艺术的价值。

他指出了工资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劳动者发现自己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支配，而脑力劳动者也通常如此，不过前者很可能属于下层阶级，而后者则一般属于中间阶级，或者被上层阶级吸收过去帮助维护其传统。他指出，杰出人物不但提供而且通常拥有对表达方式的垄断。他的《巴西文学史》（1976）一书还重申经济在艺术著作中的重要作用。

索德雷认为，艺术家应打破那些给人以虚假希望的幻想，



而表现那些预示着未来的现实情况。在他看来，希望是能达到的，但要通过革命而不是仅凭空想。艺术家能够成为几乎任何事物的传达者，但首先必须描绘真实情况。战斗者也必须通过创造力来传达人类的希望。索德雷揭示了传达所固有的自由、其宣传价值及其盲从权威的可能性，但他坚决认为艺术形式依然是探求真理的最重要方法之一。他特别提到社会主义艺术家在为群众观赏或阅读而创作时保有个性和创造力；社会意识能够在创作个别作品的过程中加以保留。他强调，艺术应建立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要致力于反映社会状况并促进和引起变革、鼓励独立性而不是加深依附性。他尤其把书而艺术看作悟性的一种形式，因此写作能够有助于思想自由并进而有助于行动。

索德雷对保持艺术风格、形式和内容，对艺术家所起的社会主义者的作用及其在市场的地位，对在一种社会主义视野内保持文学艺术的高标准，都表现了深刻的关注。他理解艺术家既要独力工作又是为大众消费即为社会而产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他解决矛盾的办法是请问艺术家究竟把个人的价值还是把集体的价值灌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他认识到文化一般总是由资产阶级政权所控制，但认为可以不是这样，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就证实了这点。

索德雷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的由来与作用的深见卓识，他对本国历史进行许多有创造性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全部质量，都标志着他是无与伦比的巴西社会主义思想家。尽管他的著作一般地说比他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同行的范围广泛，但他也评价并且吸取了他们各自的劳动

成果。索德雷从普列斯特斯主义和普列斯特斯本人的业绩中得到了启示和明证,即献身精神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思想。就象巴斯包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了多方面的运用一样,索德雷也运用普拉多对殖民地巴西的细致的科学分析作为他研究其他历史时代的样板。

索德雷在很大程度上和本章叙述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巴西历史抱有共同的看法。他们基本上都接受两重社会的观念,对阶级结构如何演变、权力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时间与方法,以及普列斯特斯主义和瓦加斯的“新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后果,也是意见一致的。尽管他们至今还不时地提倡不同的革命战略,但这些巴西思想家对社会主义是更为人道地走向“进步”的道路一直抱有共同的信念,而且一直否定主张强调阶级斗争的竞争性并常常在巴西粗暴地加强“秩序”的实证主义。

## 第六章 秘 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使自己完全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实际事件中的方法。它并非如某些人错误地想象的那样是一套僵硬的预言，可以按照同一种方式应用于一切历史趋势和社会范围。马克思正是从历史的内部得到他的方法的。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

经院哲学在秘鲁的影响很深，产生过一些拉丁美洲杰出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家。19世纪，实证主义也根深蒂固地移植到这里来了。但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在促进这个国家的智力发展和自由方面，已经作出了不亚于任何人群的重大贡献。

早在1884年，面向欧洲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在秘鲁成立了手工业工人工会。不过，他们的观点连同后来俄国革命的思想一道，在一些秘鲁思想家的见解面前很快就黯然失色了，因为后者强调研究本国的问题。到了20世纪20年代，土著主义作为使印第安人进入文明同时又保存其文化的运动，成了秘鲁知识界大部分人主要关切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意见很快就传遍拉丁美洲。秘鲁的思想家过去和现在始终站在这个地区的反帝、反美运动的最前线，而以20年代到60年代声

势最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秘鲁的知识分子是属于在拉丁美洲首先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同关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理论结合起来的人之列的。

到了60年代，秘鲁有一个主张社会进步的思想学派，其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历史循环论，以及一点点存在主义和少许推测。这种理论家和思想家们的大杂烩提供了一些这个地区最具深刻依存性的示例，在学术界不断引起思考和论战。

对秘鲁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分析，如果不提到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sup>①</sup>，那就决不会是全面的。他尽管主要是个实证主义者，但有若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有些人称之为秘鲁的激进主义之父。

冈萨雷斯·普拉达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他认识到秘鲁社会和阶级的基础。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分子，他把秘鲁的问题主要归咎于其社会经济结构不让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而让贵族以牺牲本国劳动者来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他认为，革命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且是可以由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联盟在城市地区开始的。他预料，随着印第安人的觉悟终于提到革命的高度，革命就会扩展到农村地区去。

秘鲁在太平洋战争(1879—1883)中丧失宝贵领土给智利之后，冈萨雷斯·普拉达对于自己国家的各种组织及其制度就不再抱有幻想了。在他看来，秘鲁代表的是移植于美国式

---

<sup>①</sup> 秘鲁诗人、散文作家。——译者注

立宪政体的头领控制，是一种加剧社会和种族不平等的制度。他猛烈抨击西班牙人的价值观念、天主教会以及军队中的权贵人物，希望通过教育群众来加以消灭。他激励工人起来造反，怂恿他们接受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蒲鲁东的思想。他还攻击秘鲁的自由经济和假民主制度。

冈萨雷斯·普拉达起了提高觉悟的作用，他影响了秘鲁所有后来几代的政治和社会科学家。对于他们来说，他的全集《无政府状态》(1936)是标准的精神食粮。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强调要承认印第安文化的社会价值和独立的秘鲁的思想与文学的传统。从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秘鲁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线索；循此前进的有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和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sup>①</sup>，其扩展的范围甚至超出秘鲁而及于墨西哥革命(1910)和玻利维亚革命(1952)。例如，他曾经指出殖民主义和土著主义的对立，就象后来马利亚特吉指出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对立一样。尽管冈萨雷斯·普拉达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他的见解给了马利亚特吉和整个的1919年一代人<sup>②</sup>以重大的影响，而后者是信奉要进行政治革命的。

###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894—1930)

没有哪一个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象何塞·卡洛斯·

---

<sup>①</sup> 秘鲁作家、文学批评家、教授、阿普拉党领导人(1900—)，1985年当选为秘鲁第一副总统。——译者注

<sup>②</sup> 指1919年秘鲁全国性罢工高潮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译者注

马利亚特吉这样，得到了同一类思想家如此深厚的、表示自己在思想上深受其惠的谢意。他出身贫寒，体弱多病，主要是靠自学，十几岁当排字工人时对出版界着了迷。从思想上说，他由一个西班牙神秘主义者们的信徒，发展成了一个能够把那些有所变通的欧洲社会主义的原则应用于拉丁美洲情况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马利亚特吉最初是从他的朋友和同行作家阿夫拉姆·巴尔德洛马尔那里知道社会主义的；后者在欧洲呆过，特别受到乔治·索列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激励。1919—1923年间，马利亚特吉被奥古斯托·莱吉亚<sup>①</sup>的独裁政权流放到国外而漫游了欧洲，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有深刻的印象，还受到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亨利·巴比塞的鼓励，启发他要有政治方向感。在欧洲期间，他澄清了对拉丁美洲的看法，开始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看到了希望。他实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转变，从感情用事的“感性阶段”进入了具有更深刻的信念与信心并对社会进行更深刻分析的阶段。

1923年他一回到秘鲁就接替阿亚·德拉托雷担任了期刊《直言》杂志的编辑，后来又把阿亚看成是没有国际革命思想的自由主义改革家。理论上和私人之间的分歧使他在1928年和阿亚公开决裂，而他接着就帮助成立了秘鲁社会党<sup>②</sup>和秘

---

① 秘鲁商人(1868—1932)，1908—1912年任总统。1919年在美国扶植下发动军事政变第二次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1930年因政变下台。——译者注

② 1930年改名秘鲁共产党。——译者注

鲁工人联合总会。

马利亚特吉创办了《博学者》这份社会主义杂志，他的作品有整整八卷，而且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主题，其中包括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经济学、土地使用权、地区主义、教会、印第安人问题和文学批评。他还用胡安·克朗尼凯乌尔的名字写作剧本。历史学家奥古斯托·萨拉萨尔·邦迪认为，马利亚特吉最大的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应用于理解秘鲁的历史和社会。他把马利亚特吉看成是“有取舍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而所谓“有取舍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应当是可以修改的、非教条主义的和可以适用于新情况的。马利亚特吉知道，拉丁美洲面临着与欧洲不同的各种问题，而马克思的见解只适合欧洲的情况。

马利亚特吉主要是以深刻而鲜明的风格进行写作的政论文作家，而不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理论家，而他的作品经常表现得没有系统性。他过去和现在一贯是秘鲁人主义<sup>①</sup>的主要推动力。他以卓有成效的文学形式阐释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他的著名的《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论文》（1928）则成了他的国家的基本的革命纲领。

马利亚特吉知道，本土主义和欧洲主义是冲突的，所以他主张秘鲁人的秘鲁，而这个前提至今在秘鲁还常常挂在人们的嘴上。按照马利亚特吉的传记作者赫苏斯·查瓦里亚的意见，马利亚特吉认为神话、希望和信仰是人类的基本要素，都会促进革命的觉悟。神话就是意味着社会革命体现一个永恒

---

<sup>①</sup> 意为秘鲁人的爱国心。——译者注

的真理，而马利亚特吉认为可以使它成为现实，从而导致最后的斗争。马利亚特吉表现为一个唯意志论者（强调个人在作出决定时的选择），而不是决定论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决定论因素会抑制创造力，因而革命的神话不可以抛弃，否则与之一道失去的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品质。

马利亚特吉最优先考虑的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为社会公平而努力。他知道，知识分子经常很欣赏传统，因而往往是保守的而不喜欢变革；而且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们全都从某种先入之见出发来开展活动。他宣称，“我决不是不偏不倚而完全客观的批评家。滋养我的判断的是我的理想、观点和感情。我有一个坚定不移而且公开宣布的目的，这就是要为创造出秘鲁的社会主义而作出贡献。”

他认为，1918年的大学改革运动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加唤起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觉悟。尽管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个运动而转向信仰社会主义，但其中一些人却因此而无产阶级化了。出身于贵族的学生表现出有了阶级意识，而且其中一些人在弄清楚了阶级的差别之后，就觉得自己精神上是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马利亚特吉认为，“新”、“老”社会主义者会联合起来，组成杰出的知识分子集体去领导革命。

本书无法公正地评价马利亚特吉在拉丁美洲思想界中的地位<sup>①</sup>。要叙述影响过他的人，可以写出许多章节。不过，就

---

<sup>①</sup> 查瓦里亚提供了有关马利亚特吉的生平和著作最完全而又最敏锐的记录。



我们的目的来说，有几段也就够了。他的成果反映了他的同代人伊尔德布兰多·卡斯特罗·波索关于印第安人和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思想。而他也影响过波索的思想。他从冈萨雷斯·普拉达那里获得了在印第安人主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行国家一体化的想法。冈萨雷斯·普拉达对欧洲文化帝国主义不屑一顾，对教会干预世俗事务抱有反感，这些思想感情也为马里亚特吉所共有。他从自己的这个同胞那里懂得了培养战斗精神、教育工人和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为革命而联合起来的重要性。

阿根廷文人和政治家多明戈·F·萨缅托的著作使马里亚特吉认识到，欧洲和西方的科学与思潮只要灵活地加以应用，使之适合拉丁美洲的文化与传统，就可以成为拯救这个地区的基础。然而，他没有接受萨缅托关于从土著人种中培育出原始风尚的种族主义想法。马里亚特吉谈到了曼努埃尔·乌加特的反帝主义，并把何塞·因赫涅罗斯称为其见解有助于改造文化的、发人深省的导师。

马里亚特吉读过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一加塞特的一些著作，而且象加塞特一样不接受那种认为普通人没有个人创造力的资本主义见解。他从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sup>①</sup>那里获得了这样一个信念，即西欧和美国在走下坡路；这使他得出结论说，拉丁美洲可以出现一种新的、以本国人的观念为基础的文明。马克思的著作则使他确信，人类在道义上应该共同享受社会的物质利益，而不是靠剥削自己的同类来求得

---

<sup>①</sup>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1880—1936)。——译者注

生存。他称赞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韧性，而憎恶他没有人性。

马里亚特吉后来关于人种和阶级的想法，得自尼古拉·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的方法》（1921）一书。该书强调说，一个民族的地位源于其与生产关系的联系。马克斯·伊斯门<sup>①</sup>的《马克思和列宁：革命的科学》（1927）一书，则使马里亚特吉认识到，无论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基本上都揭露了自私自利，而这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特征。

马里亚特吉的《捍卫马克思主义》（1934）一书，维护了亨利·德·马恩<sup>②</sup>以旨在提高无产阶级地位的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主义；不过，该书也包含着列宁主义的调子。这位秘鲁思想家遵奉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见解，并认为这位俄国人是理想的革命领袖。法国人乔治·索列尔的观点则加强了马里亚特吉对马克思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关于自发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是有独创性的能动的革命思想”。

尽管马里亚特吉有上面提到的这些理想联系，但他所受到的最大教益却来自意大利，并在这里形成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共鸣感。他之得以了解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便是通过意大利作家埃埃罗·戈贝蒂<sup>③</sup>而达到的，后者曾经强调道德的复兴和人类控制自己意识的力量，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的纪律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

戈贝蒂曾与葛兰西合作出版《新秩序》杂志，他们都受过

---

① 美国编辑、作家（1883—），对美国左翼舆论有过很大影响。——译者注

② 比利时社会学家、政治家（1836—1953）。——译者注

③ 意大利文艺批评家、政论家（1900—1926）。——译者注

新黑格尔学派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影响，后者的著作使他们两人都确信索列尔是正确的。他们也都相信知识分子支配革命的作用。马利亚特吉同葛兰西一样意识到，对他来说，政治既包括有哲学，也包括了宗教。他们还一致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用于本国的情况，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人们处理地区或国家的问题，通常要借助于大众文化才能达到国际主义。葛兰西和马利亚特吉都提倡灵活的、非决定论的、能动的马克思主义。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的思想家才开始认识到，马利亚特吉确实深受到葛兰西的教益。于是，这位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著作就在这个地区流行起来了。很有意思的是，尽管马利亚特吉在1921年曾一度同葛兰西作过短暂的会晤，但他最亲密的知识分子朋友之一的乌戈·佩塞却说，马利亚特吉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葛兰西或其思想。1979年，我在罗马的葛兰西著作研究院期间，无论是通过已经出版的著作，还是通过来往信件，都没有发现这两个思想家有任何的私人联系。但尽管如此，任何人只要阅读马利亚特吉的著作，都不会看不出意大利都灵的《新秩序》集团对他的巨大影响。而在这个集团中，就有戈贝蒂和著名的共产党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特别是葛兰西。

马利亚特吉在意大利的经历，有助于他使社会主义适合于拉丁美洲和秘鲁的社会精神。他一方面否定了在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实证主义思想，而主张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历史阶段的辩证进程，同时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即各个国家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时，如果仔细分析

所发生的事情，就能加深对自己的认识。他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了秘鲁，从而得出结论说，秘鲁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独立以后一直没有改变，尽管他意识到独立运动主要是由经济促动的。他注意到，连英国的银行也希望独立运动取得胜利，以保护其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并且帮助它们向国外投放更多的资本。他论证说，在秘鲁独立以后，欧洲的那一套经济体制也从来没有达到过平衡。甚至在硝酸盐和海鸟粪的景气期间，当新的富有阶级已经形成起来并在政治上同地主贵族的残余力量结成联盟的时候，也仍然存在着垄断和特权。

马利亚特吉一再深情地谈到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因为这场革命给了他建立拉丁美洲新社会以重演各种俄国实验的希望。他还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太唯物主义了，因而不适宜于秘鲁这样一个主要是印第安人的国家。他说：“社会主义当然不是印第安美洲人的学说。可是，既没有任何一种学说，也没有任何一种当代的制度是印第安美洲人的。况且，社会主义尽管是在欧洲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却并不是专门属于欧洲的。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

马利亚特吉认识到，马克思并没有创造社会主义，他只是阐述了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马利亚特吉力图对拉丁美洲作出类似的贡献。他支持列宁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认为首先要在本国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而秘鲁在同世界各被压迫民族联合之前，必须形成本民族的团结与一致。他坚持说，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土著主义者，而仅仅是社会主义者。他称自己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的”，毫不迟疑地宣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又拒绝屈从于共产国际。

马利亚特吉否定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所以他创建了秘鲁社会党，并设想由无产阶级、农民和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来组成这个党。最初，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印第安民族主义的融合，但又承认国际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后将会取代民族主义。他主张在秘鲁实现左翼的团结，而不是他在欧洲看到过的那种宗派主义。马利亚特吉象葛兰西一样，认为有可能发生自发的革命，不过他也指出，秘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出现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所以革命就得由其他方面来发动。

在某些方面他比毛泽东更有先见，因为他看重本土古老的集体主义，认为这是对革命的启发；而这种集体主义是在中产阶级建立起资本主义以前，就由农村群众培植起来的。他把 20 世纪的秘鲁的某些部分，看成是仍然处于殖民地或封建的阶段，因而同葛兰西的看法一致，即认为社会主义者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可以创立起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他否定了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其信徒们想通过现行的议会制度来建立社会主义，实在是过于空想了，因而是注定要失败的。

马利亚特吉象葛兰西一样，认为不应把问题只归结于经济原因。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首要的，而经济则是超越国界的阶级对抗的武器或表现。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创立受到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联系的阻碍。在他看来，秘鲁的地主或资产阶级满足于充当控制了该国商业、交通运输和矿场的外国资本的中间人。他把这种助长经济和政治依附性的局面归咎于思想上的依赖，即拉丁美洲的思潮只是作为西欧

思想意识的近似物而存在，因而认为必须用本土的思想意识来取代后者以减少依附性。

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他断言美国在生产开始超过消费时就寻求国外市场，以此说明秘鲁的依附性。他借用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把流入美国的过剩黄金描述为有害的东西，因为美国的工业部门再也不能吸收自己的利润了。黄金储备增加了，它就必须向海外扩张以投放过量的资本，从而加深了外国的依附性。他说，帝国主义变得疯狂起来了，它大规模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他指明了资本主义垄断的扩展以牺牲自由竞争为代价，这就是以帝国主义面貌出现的垄断。马利亚特吉从经典的列宁主义意义上看到了美国随着帝国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他把这看作毁灭的道路）而正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衰退的重要分水岭，而国际联盟的建立则是企图使这一制度恢复秩序。国联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缩影，因为它旨在有利于资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而且已被证明不利于无产阶级，无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需要。马利亚特吉的见解也许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证实，这次大战爆发是由于德国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经济受挫折、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夺市场和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动。

马利亚特吉试图用唯物主义观点弄清秘鲁本土的过去，并分析其革命潜力。他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把对秘鲁社会物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同他对其上层建筑的唯意志论想法结合了起来。他断定，在秘鲁的条件下最好不经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本土的社

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

马利亚特吉不相信美斯蒂索人<sup>①</sup>的美洲，也不相信由何塞·巴斯孔塞洛斯<sup>②</sup>的“宇宙民族”（一个拉丁美洲各民族融合的国家）来领导革命。他不认为秘鲁的根本问题是种族性的，而认为其基本性质是社会和经济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而不是人种问题，印第安人受害最深是因为其土地落到了与秘鲁资产阶级合作的公司手里。他认为印第安人能够实现秘鲁的变革，因为他们有吸收进步事物的习惯和战胜逆境的精神与纪律性。他没有期待秘鲁农村的印第安人自发地觉醒起来并领导革命，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认为，了解本土精神并富有战斗性的城市知识分子必须努力在农民中重新形成集体主义态度。

马利亚特吉把社会主义和印第安人主义结合起来，因而希望恢复古代印加人的村社土地模式，这会缓和土地使用权问题并把权力置于人民手中，而此举将扩展到秘鲁以外去。他主张建立一种群众性农民组织，以打破农村头领控制，即半封建庄园主对政府决策机构的支配。在他看来，农村头领控制构成秘鲁发展的最大障碍。他断言，农村劳工随着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繁荣兴盛而受苦受难。他把资本主义列为基本上是一种产生国内殖民主义的城市现象。

马利亚特吉赞美前哥伦布时期的生活和价值观念的长处在于对革命的心理推动，但没有全盘否定西方。他认为，印第

---

① 白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种人，过去一般译作“印欧混血人”，——译者注

② 墨西哥作家、哲学家（1882—1959）。——译者注

安人必须利用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来树立社会主义革命。他一方面热心推广印第安文化艺术，同时又公然主张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解决拉丁美洲的问题。他从印加人的过去看到了一种同他的未来社会主义规划相吻合的特征，即在物质上和道义上为其公民承担起全部责任的国家，使那里的任何人都缺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他不想用印加人的制度本身作为样板，因为它实行神权政治和专制主义并且非常刻板，他仅仅要借用其集体观念。

马利亚特吉钻研了无数课题，而比较值得注意的课题之一是宗教。他的母亲是极其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但他超越了青年时代接受的基本信仰而认识了宗教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断定，宗教感情不能象 19 世纪理性主义者曾经企图那样用哲学来解决，“现今的革命神话和社会神话就象古代宗教神话一样，能够用相同的丰富性来填充人们的深层意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比基督教更纯真的宗教。象晚近的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他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斗争会引起宗教变革，因而不需要发动对宗教的反神圣战争。他认为耶苏教同历史进程的加速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同等重要，但从来不谴责天主教本身，而只谴责罗马教会。他认为，必须在经济和政治影响方面把作为秘鲁最大地主的教会降低到其适当的位置。

马利亚特吉懂得冈萨雷斯·普拉达为什么把秘鲁妇女称为“教会的奴隶”，并且希望她们能够象欧洲妇女那样获得更大的独立性。在马利亚特吉的指导下，《博学者》杂志刊载了无数文章阐明妇女的政治作用。该杂志推广了艺术家胡利



娅·科德西奥<sup>①</sup>、雕刻家卡门·萨科和作家玛丽亚·威斯的作品，从而向其他妇女提供了在政治和艺术两方面表达自己的工具。

马利亚特吉象冈萨雷斯·普拉达一样，认为所有艺术形式都有社会作用，并有助于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他指出，美术工作者象作家一样，在树立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思想方面起极重要的作用。他主张革命艺术家应强调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不应搞诸如未来主义和埃尔利尔主义<sup>②</sup>这些转移注意力的形式。

马利亚特吉大大增加了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性。他的思想既有助于发动激进的改革，又有助于开展革命运动。他比拉丁美洲任何别的政治思想家（也许除了他的同胞阿亚·德拉托雷）都更加发扬了印第安人主义，使它成了秘鲁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以及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革命的必要部分。他既向墨西哥革命学习，又对它作出了贡献，认为它是致力于推翻封建主义和以土地改革与归还印第安人财产为方向的一场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运动。马利亚特吉影响了他死后在秘鲁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思想家和组织。此外，改良主义的阿普拉主义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也来自马利亚特吉，而1968—1980年间控制秘鲁的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资本

---

① 科德西奥应为科德西多(1893—)，秘鲁女画家、版画家，在美洲很有名望。——译者注

② 此词暂按音译。原文Arielism，来源于ariel一词，意为“小仙”、“小精灵”等。——译者注

主义军人们<sup>①</sup>的想法同样是从马里亚特吉那里得到的。

他表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当中绝无仅有的愿望：要引起人的内在革命，也就是要给拉丁美洲的左派运动增添个人激进主义的因素。他的想法得到了很大的支持，但在30年代的秘鲁也引起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这个流派的为首者就是给《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创作了天主教复制品的维克托·安德列斯·贝朗德<sup>②</sup>。但是教会支持的这一运动（后来还有一些鼓吹法西斯主义社会学说的人参加）从来没有做到削弱马里亚特吉思想的精神，而马里亚特吉乃是当代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的教父，也是后来提出第三世界革命这一概念的弗朗兹·法农<sup>③</sup>的先驱。

## 伊尔德布兰多·卡斯特罗·波索(1890—1945)和

### 里卡多·马丁内斯·德拉托雷

在20世纪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秘鲁思想家当中，对于土著人的作用及其与土地的关系是同对政治和国家一样分析得最仔细的课题之一。系统地研究印第安人主义和土地使用权问题的一个早期思想家是社会党领导人、律师和政治理论家伊尔德布兰多·卡斯特罗·波索，他的经历和他的同志马里

---

① 1968年10月以贝拉斯科为首的秘鲁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以人民行动党创建人和主席贝朗德(1912—)为总统的政府，建立军政府。1975年8月莫拉雷斯中将又发动政变罢黜了贝拉斯科而自任总统。官方称他们的执政分别为“革命进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1980年军政府结束。贝朗德在大选中获胜再次出任总统。——译者注

② 秘鲁外交家、法学家、历史学家(1883—1966)。——译者注

③ 著名心理分析学家、社会哲学家(1925—1961)。——译者注

亚特吉的经历有一部分是相同的。

卡斯特罗·波索是《我们的土著社会》(1924)和《从“阿友”<sup>①</sup>到社会主义合作主义》(1936)两书的作者，他断言庄园制尽管带来了灾难性影响，但印第安人还是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他认为，资本主义及其殖民地成分已经破坏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制度，如果农民要获得社会正义，就必须用土地集体主义取代 20 世纪存在的那一套。

卡斯特罗·波索描绘了前哥伦布时期秘鲁村社制的不断解体和用外国资本武装起来的城市资产阶级对生活的支配。他主张在秘鲁现实的条件下，把马克思学说的精神增添到前哥伦布时期的村社制传统中去。他认为，复兴“阿友”即合作的农业社会是走向更带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的一步，这将同时有助于解决秘鲁的粮食短缺问题和打破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秘鲁，以为可以重新获得一种更道德的文明的某些方面，这种文明几乎不带种族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偏见，并且非常灿烂，足以激发 20 世纪的革命。

卡斯特罗·波索单就其自身来说，算不上是何塞·马里亚特吉很好的继承人，但他和其同时代人里卡多·马丁内斯·德拉托雷一道，却有助于填补他们那位更著名的同事因过早逝世而在秘鲁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留下的空白。1931 年马丁内斯·德拉托雷创办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为依据的《前线》杂志，便继续了马里亚特吉的工作。

---

① 居住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土著印第安人的一族——凯楚阿人对原始氏族社会的村社的称呼。——译者注

马丁内斯·德拉托雷是论述秘鲁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四卷本文集《对秘鲁社会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札记》(1935—1949)的作者,他分析了自己那个时代的秘鲁,强调工人在该国日常生活和政治中的作用。他从马利亚特吉的观点出发,描述了大学改革运动的社会正义目标,认为这次运动标志了教育方面的贵族学术传统的终止和殖民地时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富豪统治制度的结束。他认定社会主义是大学改革运动的必然延伸。

马丁内斯·德拉托雷曾经触及反对教权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还在更小的程度上触及秘鲁的阶级斗争。他在写作时看到秘鲁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贵族富豪统治之间的对抗。他认为大萧条是秘鲁和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分水岭,是一个使阶级斗争加剧和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时期,对那些在这一经济崩溃时期受害最深的、经济上单一的国家尤其如此。根据一篇明确的评论看来,他认识到大萧条提高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种种缺陷的认识,特别是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依附性的秘鲁更是如此。

卡斯特罗·波索和马丁内斯·德拉托雷的著作无论从广度还是从风格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比不上马利亚特吉的著作,但他们在秘鲁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链条中,却是马利亚特吉这位大师和60年代才开始知名的新一代社会主义思想家之间承前启后的人物。

**乌戈·布兰科·加尔多斯(1933—)**

1930年马利亚特吉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在秘鲁由于维克

多·劳尔·阿亚·德拉托雷的改良主义的阿普拉主义运动而多少有点失色，这次运动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拉丁美洲团结、土地与工业国有化、巴拿马运河国际化和同世界被压迫人民与阶级团结。秘鲁整整一代杰出的思想家为阿普拉主义所吸引，因为它鼓吹一个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众主义联盟在私营企业支持下管理的民主国家。阿亚·德拉托雷追求的社会变革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而以民族的、多阶级的革命为指导。他企图在没有不可避免的重大冲突情况下实行马克思提出的许多社会和经济变革。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作为一系列的冲突而不是作为普遍的冲突来接受的，因而他驳斥了决定论。

阿亚·德拉托雷象马利亚特吉一样，撇开欧洲而在印第安人美洲的基础上研究拉丁美洲和秘鲁的历史现实。与马利亚特吉不同，他认为经济帝国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促进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并为发展提供了资本。阿亚·德拉托雷相信有不经激烈暴力行动而实现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可能，这很受秘鲁的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例如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等人的欢迎，致使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赞成阿普拉主义。

阿普拉主义者和阿亚·德拉托雷支配了秘鲁中间偏左的政治活动，直到60年代才有迹象表明秘鲁军方决不会让阿亚·德拉托雷当选为总统。经历了40年的奋斗和政治优势之后，阿普拉主义在秘鲁失势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到，象阿亚·德拉托雷这样的改良主义者尽管此时亟欲同保守分子结成联盟以获取政治上的职位但败局已定，便转而寻

求更激进地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革命道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积极行动者中，最成功而又最突出的是乌戈·布兰科·加尔多斯。

加尔多斯出身于中产阶级，青年时代被库斯科及其周围凯楚阿人占优势的地区中浓厚的印第安人主义气氛所吸引。他早年就熟悉马利亚特吉和阿亚·德拉托雷的观点，而且相当重视阿亚·德拉托雷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对印第安人主义采取的看法。

他在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大学受业于乌戈·布雷萨洛期间，成了托洛茨基思想的信徒。他从布雷萨洛那里获得了这样的想法，即通过地区性和全国性联合会使农民行动起来，以及通过把工人组织起来和夺取不让农民分享利益的地主的土地来消灭地主的权力。

布兰科·加尔多斯回到了秘鲁，加入了1944年以来就在该国存在的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运动。1958—1963年间，他在冈边西昂和拉列斯两地组织了农会，又使农会建立了学校和诊所并教育农民和提高其觉悟。他的工作是要使其农会有朝一日控制乡村教育、公共工程计划和司法工作。他对农民的态度近似于毛泽东，只是这位秘鲁人认为农民在获得土地并成了资产阶级后，其革命热情就会降低。他坚持认为，保持革命的真正希望是在无产阶级身上。

他遵循第四国际的观点，一再指责共产党人为改良主义者，并且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不通过斗争剥削者就决不可能放弃权力，也就是不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强调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必要部分，也就是群众借以

提高其觉悟、组织起来并且接受革命先锋队指导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

他的著作《土地或死亡》(1972)说明了革命纲领能够通过逐步的过渡而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对拉丁美洲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它是游击中心论的对立物，因为它表明了武装斗争能够从群众运动中脱颖而出。布兰科·加尔多斯批评雷吉斯·德布雷和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缺乏党的观念和没有遵循科学马克思主义。他警告不要把单纯的游击战同革命混为一谈，古巴革命低估了群众运动的重要意义而倾向于颂扬孤立的英雄行为。他说明不应人为地运用游击战，不过当它在一定情况下(例如秘鲁农民的政治发展)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那就好得很。在他以及托洛茨基学说的其他老练的权威解释者看来，游击战是特定国家中在特殊条件下可能采取的策略，而不是必须运用的战略。

象马利亚特吉一样，他把农村头领控制描述为秘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他力图破除农民的依附性和开阔其眼界，而不是加深其与世隔绝状态。在他看来，印第安人的秘鲁有两方面的含义：既包括马利亚特吉和卡斯特罗·波索的村社理想，也包括被教会和农村头领灌输的错误意识所左右的流氓无产阶级。

加尔多斯想象秘鲁有相互对抗的两种力量，即代表可耻的过去的剥削者和昭示未来的被剥削者。他设想后者应是一支能领导武装斗争、最后剥夺寡头集团的权力并创立一个权力归群众的制度的工会民兵。

他在1962年写给冈边西昂谷地的同志们的信中，概括了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察。他在信中断言，苏联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它在革命取得世界性胜利以前也不会达到社会主义，从而重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声称，秘鲁的革命进程标志了斯大林主义“革命阶段”论的完结，这一理论错误地断言“我们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他们称为进步资产阶级的本地资本家将参加我们反对地主所有制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加尔多斯一度成功地提倡过不合作，即农民拒绝在种植园劳动。与此同时，他鼓励农民耕作拨给他们自用的地块。他在1963年被判处25年徒刑后，便中止了为农民而进行的活动。

他也许会说，有两个原因使他没有在秘鲁建立持久而可行的运动。首先，城市左派组织没有参加斗争，而象他曾经规划的那样，让无产阶级为农民越俎代庖。其次，秘鲁从来没有全国性的列宁主义战斗政党。

尽管屡受挫折，他仍然设法持续其革命尝试。然而，他的运动的很大一部分热情遇到1968年接管秘鲁的有改革思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军政府便消失了。民族主义的军方使用左派词藻，实行了马利亚特吉和布兰科的某些打算，例如提倡秘鲁人主义（即秘鲁人的秘鲁）、土地改革、外国企业国有化和开展强有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

政府当局有鉴于他已失去60年代初有过的政治影响，乃在1970年把他释放出狱，他得以短暂地恢复其革命活动，然后流亡到墨西哥。1975年他回到秘鲁，遇到的只是再一次流亡。1978年他被选入秘鲁立宪大会，参与恢复文人执政的准



备工作。他履行其作为学生工人联合会成员<sup>①</sup>的职责而与政府对抗，使后者深怕他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联盟会在1980年的选举中获选总统。因此，他在1979年被监禁，因为军方已作好准备，随即选举非马克思主义文人费尔南多·贝朗德—特尔里为总统。

### 阿尼瓦尔·基哈诺

60年代和70年代，秘鲁的高等学府出现了无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本书没有足够的篇幅论述其大多数。举出一位杰出而有创造性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与政治》杂志社社长、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基哈诺继续了马里亚特吉、卡斯特罗·波索和冈萨雷斯·普拉达的传统，对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兴趣并掌握了这方面的专门知识，认为它是秘鲁人主义和土著主义的必然延伸。他的著作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特别是列宁与毛的学说，同政治社会学的最新原理结合起来。他使理论很好地联系实践，详尽地阐述了适合拉丁美洲现实的方案。

基哈诺对布兰科·加尔多斯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赞同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新国家机器的思想。他怀疑这部机器究竟代表人民还是充当革命权力结构的一种适当模式。基哈诺谴责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建立以工人直接权力为

---

<sup>①</sup> 布兰科是作为工(人)农(民)学(生)人(民)阵线候选人参加秘鲁立宪大会选举的，当时他领导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加入了该阵线。——译者注

基础的制度。

他在《帝国主义危机与拉丁美洲工人阶级》(1974)一书中,对社会主义为什么还没有掌握拉丁美洲提供了极好的理论说明。他指出,拉丁美洲仍在寻求合适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这里的左派却分裂为遵奉布尔什维克模式、毛主义、游击中心论(即古巴革命理论)、辛迪加(或工会)领导,以及城市或农村游击战革命道路等各种人。他感到难以把这些派别组织起来,并以70年代初智利的情况<sup>①</sup>为例,说明不可能制定一个在无产阶级各个发展水平上起同样作用的纲领。他认为,除此以外还难以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建立起政治联系,更不用提建立国内左翼联盟的问题了。

基哈诺认为,阿普拉主义运动阻碍了秘鲁激进左派的壮大,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可行的、不至于用暴力的反寡头集团和反帝国主义的办。除了阿普拉党多少拉走了一批人外,他坚持认为还有三个基本问题妨碍了社会主义在秘鲁和拉丁美洲的兴起:(1)完全没有可供拉丁美洲据以发起革命运动的有效理论,(2)该地区人数占优势的阶级还没有组织和发动起来,(3)群众尚无发展暴力革命的能力。换句话说,基哈诺看到了有组织的运动都缺乏始终如一的革命理论,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很薄弱,因而有组织的群众革命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而显得很差。他指出,没有使工人革命化乃是缺乏社会主义成就或进展的主要原因。他还注意到,机械化和自动

<sup>①</sup> 指1970至1973年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期间及其前后,该阵线内部六个党即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等,以及该阵线同其他左派政党如革命共产党等的相互关系。——译者注

化已经取代了工人，因而减少了其革命潜力。

基哈诺批驳了这样的意见，即认为秘鲁脱胎于西班牙人建立的封建结构，国内并存着的两种社会各有其历史特点和构造法则，而由一个共同的政治机器结合起来，其中资本主义部分直接依附于外国资本，而封建部分只是一个依附于资本主义部分的外层而已。他指出了中产阶级在历史上如何随着资本密集工业化的扩大、经济的继续增长和失业与贫困的增加而在该国得到发展。

基哈诺描绘了秘鲁的依附性资本主义从追随西班牙到投靠英国再委身于美国，最近（1968年以后）又从美国转而依附于与本国城市资本家有联系的国际资金的历史变迁。他指明了在旧的依附性安排下，外国资本主要在农业、畜牧业和矿业等部门占支配地位，而在新的制度下还渗透到城市制造业和商业中。他阐明了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集团之间，以及依附性资产阶级和它的外国控制者之间的关系。

基哈诺断言，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模式是半殖民地性质，而生产关系的基本方式则是前资本主义性质。大部分资金来自国外，而扩大国内市场的可能性则由于国外因素和本国资产阶级不能获得全部政权而被堵死了。他还表明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冲突，因为前者对后者行使了很不相称的权力。

基哈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但这只是对先进的工业国家而言；对于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落后国家，帝国主义则是最初阶段。在这一点上他同阿亚·德拉托雷的观点一致。他指出国际生产分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

何有了改变,各个层次的阶级斗争如何随之而有了新的活力。他想象社会主义很快就要到来,因为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了它的最后危机。他认为,战后20年间美国已显然没有能力领导资本主义国家重新确立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正统地位和威望。依附性资产阶级和它们控制的依附性民族国家如秘鲁,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有更大的运筹自由,并开始奋力争取新的利益和经济与政治关系。

他指出,上述这些因素连同国际垄断资本的进展和民族资产阶级推行可行性经济的失败,使秘鲁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他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企图缩小和控制国内发展水平不适应由于国际积累与垄断资本新形式的扩展而促成的生产力所造成的矛盾。在他看来,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在整个处理过程中作为主要谈判者可资利用的一种手段,足以使依附性虽不能全部消除却也能有所减弱。他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为拉丁美洲的现象,因为它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已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足以控制劳资冲突了,它在政治上是由将它引向民族主义和反寡头统治的资本主义组合国的官僚和技术阶级支配的。

基哈诺把多国公司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活动区别开来。他从国际观点来看拉丁美洲,而把跨国公司看作现今主要的支配手段。他指出了生产在达到国际水平时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变化,并且表明当代社会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在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必然要集中的理论。他还表明,大萧条以来由于秘鲁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该国农民的命运越来越恶化了。

基哈诺把农民的社会斗争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在第一个即前政治时期，农民斗争是按“封建宗教模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世人和上帝构成社会现实的观点和实质上不能改变的天然秩序之上的。这个时期的农民运动分成四类：（1）旨在改变人和上帝关系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运动，（2）反对滥用特权和非正义行为的社会盗匪活动，（3）反对其他人种血缘集团支配的种族运动，和（4）要求社会改革但对社会根本问题缺乏了解的土地运动。基哈诺把这种封建宗教模式称作“一种错误意识的、社会心理异化的表现”。他指出，许多世纪以来，各个统治阶级加强了对社会现实的这种解释。但后来这种解释开始不灵了，因为农民力图认定一种反对某一对立阶级的利害共通性，因而抑制种族的、地区的和文化的差异，以便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基哈诺看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农民开始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

他认为，秘鲁在30年代开始了这第二个时期，即“民族主义反寡头统治革命”，这部分地是由受马利亚特吉的思想指导的革命左派和有改革思想的阿普拉主义者造成的。他坚持认为，民族主义反寡头统治革命的结果并未达到使社会主义制度化，而是以1968年改良主义的军方接管该国而告终。

基哈诺断言，30年代以来秘鲁的农民一直比较政治化，其间发生了三种基本类型的政治化：第一、“改良主义的平均地权论”，例如阿普拉党所奉者，仅致力于变革社会秩序和改变土地使用权制度而不过问权力结构，第二、“革命的平均地权论”，致力于变革社会秩序和土地使用权制度，以及改变权

力结构，并经常采用例如乌戈·布兰科使用过的那些非法策略，第三、“政治盗匪活动”，属于游击队一类，用以摧毁政治镇压或依附的旧枷锁。

基哈诺论述了农民集团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以城市为基础的各组织向依附于它的农民进行宣传鼓动。换言之，他是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第一阶段经常通过一些政党传给农村的农民。在第二阶段，农民比较独立于城市而获得了更多的农村自主权和领导权，但仍然需要城市支持。在第三阶段，农民组织、游击队和民兵一起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思想政治上的作用。马克思曾因为农民恋乡土、其社会和文化处于孤立状态而且缺乏集团内部交流等妨碍他们成为阶级的因素，而怀疑过达到第三阶段的实际可能性。基哈诺举出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的例子，作为农民达到第三阶段和成为阶级的证明。他断言，拉丁美洲最大的土地改革已在农民鼓动一向进行得最深入的国度里发生，阶级冲突随着农民发展为阶级而会加剧，农民能够象在古巴那样成为整个革命极重要的同盟军。

由于农民运动通过成立联合组织和非法占据土地（特别是在布兰科指导下的库斯科地区）而在秘鲁取得了重要地位，因而基哈诺注意到秘鲁的乔洛人（印第安人或混血种人）发现自己在日益好战的印第安人（农民）和该国白人贵族这两个极端对立的立场之间正起着缓冲作用。在《秘鲁的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新帝国主义的研究》（1971）一书中，他断言秘鲁军方由于在1968年接手执掌政权并在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甚至可能是人道主义和共有制主义但不是社会主义）的支持

下实行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和解，而最终会致力于排除冲突并使该国保持稳定。

秘鲁执政的将军们借口基哈诺写了一篇煽动性文章，论证军方缺乏调和其经济改革的阶级性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矛盾的能力，而于1973年将基哈诺驱逐出国。基哈诺强调说，秘鲁掌权的人错误地认为，政治变革可以不通过阶级斗争而由政府决议来实现，但他坚持认为政府决议必然导致压制性的政策。

## 第七章 玻利瓦尔国家

独立革命使我们脱离了西班牙，却没有除掉本地寡头政治。所以玻利瓦尔的事业并未完成，因为我们摆脱了对西班牙的依附却陷入了对美国的依附，同时统治阶级从这种依附关系中得到更大好处，从而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更加保护这种关系。

——卡米洛·托雷斯

### 哥伦比亚

欧洲 1848 年革命后不到一年，哥伦比亚由于其地处贸易中心而有了一个很小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同欧洲意识形态的接触是通过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海沿岸和马格达雷那河上的港口城市进行的。有些哥伦比亚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接受很快，但该国缺乏象 19 世纪末阿根廷和巴西那样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有政治觉悟的移民无产阶级，因而直到俄国革命后哥伦比亚才开始出现能够成活的社会主义运动。

20 年代初，1917 年革命<sup>①</sup>的有力支持者西尔韦斯特雷·

---

<sup>①</sup> 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译者注



萨维茨基和在《旁观者》杂志发表作品的社会主义者路易斯·特哈达创办了哥伦比亚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22年哥伦比亚自由党的常年大会产生了一个对付社会问题的纲领，宣传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思想，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详细说明了的课题。到了1925年，试图替拉丁美洲详细拟订出新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秘鲁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思想，已为卷入大学改革运动的哥伦比亚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接受。马利亚特吉的印第安人主义立场使哥伦比亚人转而研究自己的前哥伦布社会，作为了解当代印第安人和土地使用权问题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哥伦比亚的知识分子中更加流行起来，而反对天主教信条和反帝国主义的活动同提高无产阶级物质水平和保卫国家版图的要求一起，在学术界有所增长。同时还存在着把石油收归国有和加以保存的特殊感情。民族主义就象1903年巴拿马依靠美国援助脱离哥伦比亚时开始出现的反美态度那样，在国内有所抬头。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一场争取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自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而终于引发了40年代那场暴力政治冲突<sup>①</sup>。

---

① 哥伦比亚独立后的两大传统政党即保守党和自由党曾因争权而多次发生流血事件。1948年自由党左翼领袖盖坦被暗杀，引起了首都波哥大暴乱和全国各地的抗议运动，两党进行了数年流血斗争。1950年保守党人戈麦斯执政后，因迫害自由党和镇压农民运动而引起了游击战争。1953年陆军总司令皮尼利亚政变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到1957年在群众运动高涨下被迫下台。两党于是就恢复文人政府问题达成了建立“全国阵线”的协议；从1958年起的16年内，两党轮流担任总统并平分政府部长职务和各级议会席位。——译者注

如果不讲到哥伦比亚倡导社会变革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那末对该国 40 年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斗争作为该国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环节来研究将是不完全的。盖坦出身贫苦，靠学术奖学金上学，在意大利攻读法律，终于回到哥伦比亚国立大学任法律教授。他在欧洲期间受到列宁的启示，认为列宁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革命。盖坦在某些方面仿效列宁，把列宁当作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导师和国际公认的智者来尊重。

1924 年盖坦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哥伦比亚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这无论对当时和对一个 26 岁的人来说，都是思想内容深奥的著作。这篇论文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史、对马克思，以及对这位德国思想家的意见如何能够适合非工业化哥伦比亚，都具有真知灼见。

盖坦在他的论文中，把生活看作不断的历史过程，它通过辩证过程而最终导致平等的胜利。他看出哥伦比亚生活的所有根本方面（宗教、艺术和哲学）都产生于经济根源，它们都是共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里他指的是能够说明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即它们都从共同的问题演化而来又都是这些问题的组成部分。他探讨了哥伦比亚条件下资本的作用，看到了该国处于产生资本的阶段，但不是由个人劳动直接产生，而是由被剥削的劳动产生的。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便终止于这个节骨眼上。他把马克思的一些意见用作启发手段，来分析和理解哥伦比亚的问题，并把阶级歧视看作进步的严重障碍。他竭力主张城市无产阶级彻底改造社会，但从来没有提

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改组社会的蓝图。

盖坦基本上采取的是以列宁、马里亚特吉、秘鲁阿普拉主义早期学说，以及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著作《群众造反》(1930)为依据的反帝、反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路线，但他不同意奥尔特加的等级制哲学。这位有超凡能力的盖坦宁愿通过哥伦比亚自由党的左翼来为社会变革工作，他在1948年4月9日被暗杀时正代表该党竞选总统。

盖坦要是当选总统，会如何为社会变革工作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引起种种推测。作出最令人满意答案的是已故的政治科学家、研究美洲共产主义的权威、评价政治人物的行家约瑟夫·斯塔罗宾，他认识盖坦并视其为尊重世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激进派改革家，认为此人一旦执政势必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家。斯塔罗宾特别提到盖坦曾担心美帝国主义企图对一个天主教国家扩张耶苏教霸权。显然，盖坦对美国的得寸进尺是瞧不起的，但是其发展却表明了耶苏教的行为道德占了优势。

盖坦在哥伦比亚群众眼里成了烈士，成了为政治和社会改革而斗争的象征。他的逝世使哥伦比亚陷入了暴力行动，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而至今还有持摆脱的国内政治冲突，同时还使自由主义者和大批不关心政治的穷人趋于激进，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国家连盖坦这样的社会改革家也被操纵社会和政治的人视为极端危险分子，便很少有实现变革的希望了。

## 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1910—)

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是社会学教授，一度担任过波哥大自由大学校长。他认为豪尔赫·盖坦是一个浪漫派人物，其政策没有一贯性也不科学，但致力于消灭特权和为民众阶级获得政权。象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蒙塔尼亚·奎利亚尔用“庸人”一词来称呼象盖坦那样为已被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达到的理想而斗争的自由主义者。

他的著作《哥伦比亚：形式上的国家和实际上的国家》(1963)把本国的历史改写成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在书中强调了列宁关于发展的思想，分析了哥伦比亚主要由于对咖啡单一经营的依赖而导致农业不平衡，由于未能适当发展本国石油工业而引起能源短缺，以及由于重要投资的大量损失而招致外国对实业的渗透。他对比了马克思观察英国统治印度时所得的情景同哥伦比亚近代史之间的相似之处，指出后者存在的重大经济问题已引起激烈的暴力行为，而这正是他所认为的国内阶级斗争和外御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这部著作就象他以前的《政党与国家的现实》(1950)一书那样，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概念很好地联系起来。

在《美洲社会学》(1950)一书中，蒙塔尼亚·奎利亚尔研究了英属、西属和葡属美洲由前哥伦布社会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发展，以便对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当代问题产生更彻底的了解。它尽管不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著作，但还是值得提到，因为它在1950年出版时是哥伦比亚和美国刚刚有的那一类社会史的早期例子。著者把拉丁美洲当作一个大实验室，并认

为他研究的各个社会已构成一个集体。例如，他认为劳动是集体行动，因为它影响整个社会并表明了社会生产关系。他展现的是一幅平面的社会图景，而不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喜欢的由上而下的垂直模式。他强调这是社会学研究，即考察推动社会的各种因素，而不是相反地单纯研究时间和空间，后者在他看来乃是历史学的任务。人们也许把这些想法解释为他对哥伦比亚历史学家的批评方式，他们在30年前大都写下了没有分析的政治和军事著述。

蒙塔尼亚·奎利亚尔还把哥伦比亚的政治和社会弊端，同种族和地理决定论联系起来，这是由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拉丁美洲奠定的传统。洪堡在19世纪最后几年旅行了该地区，并写下了有关作品，而且从事因果论和进化论的研究。蒙塔尼亚·奎利亚尔把洪堡置于与阿根廷思想家、著名的《社会主义原理》(1846)的著者何塞·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本书已在前面提到)同等的现代社会学先驱的地位。

多年来蒙塔尼亚·奎利亚尔曾经是哥伦比亚共产党党员，但他的著作没有反映出“党的路线”。与他的拉丁美洲同志中一些“迂阔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的观点一般地说是“批判的”和“坦率的”，受列宁的影响多于受斯大林的影响。古巴革命使他从自省为政治上自满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从而有助于形成他最近的思想。在卡斯特罗掌了权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取得了初期成功之后，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对共产党的和平共存政策变得不耐烦了，认为这种政策过多强调议会政治，而对在古巴显然有效的游击战重视不够。1967年他在这个问题上同共产党决裂了。

他认为古巴革命对哥伦比亚有两大影响，其一是说明了在这个南美洲国家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其二是强调了在该国消灭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势力的好处。他认识到，哥伦比亚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着手赶走美国佬，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断送自己权力的社会革命。因此他开始怀疑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功效。

蒙塔尼亚·奎利亚尔向自己的人民剖析了哥伦比亚社会，他对千千万万感到盖坦及其伙伴们的自由主义显然毫无意义的人来说，乃是他们智力和思想上的指导人。

### 何塞·孔苏埃格拉·希金斯

与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甚至与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不同，象何塞·孔苏埃格拉·希金斯这样一些年轻一代的哥伦比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易获得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文献，觉得研究马克思学说在学术、社会和思想方面都更为可取，而且还有更多的志趣相投的思想家可供互相切磋和交换对各种理论的相对优缺点的看法。孔苏埃格拉的著作更象他的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同时代人所作，而不那么象他的哥伦比亚前辈们的著述，从而充分证明了他熟悉早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如乌拉圭的罗德内·阿里斯门迪、古巴的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智利的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和秘鲁的何塞·马利亚特吉的思想的。

何塞·孔苏埃格拉最广为人知的是批驳了资本主义发育论中可以找到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论调，认为它转移了对诸如经济帝国主义及其导致的结构性依附等问题的注意

力。他否定了争取进步联盟所持见解中的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拉丁美洲的人口爆炸是发展的首要障碍；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使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想来源于斯宾塞、达尔文和孔德，它与适者生存说有联系，而往往依据的是推测性的、不科学的资料，并且投合经济上有权势者的利益。他指出，马尔萨斯的观点本来阻碍着印第安人美洲国家的发展，但当地的统治者却荒谬地利用它来散布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已无希望的神话，而事实上现存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人口过剩，而是财富不够分配。象马克思一样，孔苏埃格拉认为马尔萨斯主义思想是反革命的，是为工人阶级的苦难作遁词。在他看来，新马尔萨斯主义思想，更确切地说是节育运动，所治的是标而不是本（经济制度）。他把节育看作一种维护现行制度，使之永远保持以饥馑为灾而不是以人口过剩为患的不发达状态的手段。

孔苏埃格拉觉得，把拉丁美洲的问题和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是开脱了真正的祸首帝国主义。他在自己的著作《列宁与拉丁美洲》（1972）中，把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观点同当前的拉丁美洲问题联系起来，断定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然后指出当前的拉丁美洲依附性如何符合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孔苏埃格拉表露了这样一种感情，即大多数拉丁美洲经济学家不论认识到与否，都受过列宁的恩惠，运用他的观点来解释本国的事件，阐明发展的根本法则与特点。

他认为，列宁和1917年俄国革命在心理方面和能力方面都为后来的运动提供了样板，使得象卡斯特罗在古巴领导的

运动有了成功的可能。在他看来，何塞·马蒂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综合为列宁的化身。这些人物全都施加了同样的影响，都了解帝国主义，而且设法用实际行动推翻它。对他们来说，革命安排和规定了战略与实践，人民则通过它们以自己的天赋能力来改造社会政治状况。在这位“坦率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塞·孔苏埃格拉看来，菲德尔·卡斯特罗之于拉丁美洲犹如列宁之于全世界。首要的是卡斯特罗和列宁分别领导的革命都是创造性地修改马克思学说的成功例子，因而孔苏埃格拉相信马克思的想法是可以修改以帮助促进哥伦比亚的社会主义的。

#### 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1928—1966)

卡米洛·托雷斯的父亲是波哥大一位有自由思想的儿科医生，母亲则是贵族家庭出身的、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他本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神甫和革命者，在拉丁美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事迹。他年轻时生气勃勃，富有反抗精神，怀抱着有益于社会的志愿进了波哥大的罗马天主教神学院，后来又上了比利时设在卢万的天主教大学，在那里熟悉了法国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雅克·马利丹的鼓励基督教民主主义既要超越资本主义又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净化”论。马利丹还主张天主教徒参加世俗政治活动，唤醒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向他们解释新的人道主义思想。除了马利丹的观点之外，卡米洛·托雷斯还欣赏新马克思主义，但是哥伦比亚各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别后来使他试图把新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调和起来。



1959年卡米洛神甫回到波哥大国立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试图在以其保守的大学课程称著的校园里组建一个进步的社会学系。

他在遵循领导过墨西哥为脱离西班牙而战斗的曼努埃尔·伊达戈尔和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这两位神甫<sup>①</sup>建立的拉丁美洲传统的同时，采取了认为神学最能体现于行动的态度。他作为社会学家，主张社会多元论，作为神甫，则赞成宗教普遍性。

1957年，哥伦比亚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达成了建立全国阵线以保证两党轮流担任国家总统的协议，从而正式结束了暴力行动，但压制依然如故，因为国内寡头集团仍然剥削穷人而以保持其统治为目的。到了60年代初，卡米洛与农民一道工作，从而驱使他主张分散大庄园，鼓吹政权应归哥伦比亚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大多数，并且明确要求妇女平等，包括享有节育权和离婚权。他开始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在哥伦比亚实现社会正义。他论证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无须是无神论者，社会主义可以根据哥伦比亚人的历史和需要同基督教的宗旨协调一致，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合作以促进结构变革。

卡米洛·托雷斯认为，哥伦比亚本国的寡头集团仰恃的帝国主义是他的同胞取得进步的主要障碍。他怀疑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与结构，并断言彻底改弦更张才是正理。他在公

---

<sup>①</sup> 伊达戈尔(1753—1811)为墨西哥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被誉为“墨西哥独立之父”。莫雷洛斯(1765—1815)也是墨西哥独立战争的领袖，在伊达戈尔战败被俘遭杀害后继任起义军领导人。——译者注

开讲话和在写作中没有直接援引过马克思的名字，以免疏远可能的同盟者。但在他的言语中却穿插着“人民的使命”之类的词组和“资产阶级”这个词，而他的布道、写作和行动则使人感到，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气质在把从事反对外国和本国剥削者斗争中的哥伦比亚人引向团结的道路。

在哥伦比亚这个拉丁美洲最保守(就宗教性而言)的国家中，卡米洛神甫的罗马天主教胸襟已为世俗革命者打开了紧闭的大门。他从来没有否定过他称之为“恩主”的上帝。即使正式离开教会去专门从事游击活动之后，他在崇敬其非常正直的品质的虔诚信徒当中仍然享有巨大的威望。他显然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里面不可能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之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宗教解释为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状况的表现，而这是与罗马天主教神学水火不相容的观念。但尽管如此，他在离开教会之前仍声称：“作为哥伦比亚人、作为社会学家、作为基督教徒和作为神甫，我是一个革命者。”当他的使命感和看破红尘之无济于事驱使他放弃当神甫而上山打游击时，他于1965年10月声明：“我脱下教士袍，为的是做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教士。作为天主教徒而不革命，就是过着罪大恶极的生活。”

他在参加民族解放军的战斗时，于1966年2月同哥伦比亚陆军巡逻队的一次作战中被杀害。这位认为“一旦任圣职，永远是教士”的人物给天主教僧俗人士提供了一个榜样：认为救世主的目标是要解放所有生灵，而不是拯救个别的人。在整个拉丁美洲，他的逝世使基督教徒激进化，团结了左派和鼓舞了其他人为社会正义继续奋斗。

卡米洛·托雷斯体现了工人教士运动<sup>①</sup>的精神，而最深刻地说明这种精神的，大概是法国哲学家埃马纽埃尔·穆尼埃了。穆尼埃接受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主张通过完全献身人类特别是饥寒交迫和无家可归的穷苦大众而努力达到上帝的王国。穆尼埃的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拉丁美洲的“人民教士”所接受，他们同被剥夺者和被抛弃者生活在一起，共同追求社会正义，并猛烈抨击人间的压迫者，特别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而强调救世主的博爱。卡米洛遵循了这一理论路线，并把它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那个承认马克思主义优点和强调和平与发展相互关系的《人世和平》通谕结合起来。

卡米洛神甫及其教士同伴们寻求生活的意义，认为生活在于追求基本必需品，寻求敬重、尊严和集体的完善。他们把拉丁美洲存在的饥馑、剥削、种族主义、贫困和异化看作贪婪追求财富与权力的表现，并认为是教世主和马克思都不允许的。托雷斯和他的同胞迭戈·蒙塔尼亚·奎利亚尔的看法相同，后者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所有把拉丁美洲用作社会学试验室的学者都看不到马克思曾经看到过的那些资本主义弊病。在卡米洛看来，每个基督教徒就象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样，都有责任使人摆脱压迫。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都强调个人牺牲的必要性，而且都宽恕使用暴力来获得自由。

托雷斯认为，使用科学的方法论从事研究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总相信自己的分析是客观的，却没有意识到其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天主教会中流行的运动。提倡深入工厂、工地和工人同劳动、共甘苦，促使了一些教士关心和参加政治斗争。——译者注

想法带有文化帝国主义色彩的程度。另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具有摆脱民族优越感和力求客观的科学能力的明证。他指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没有价值标准，而是他们避免了自己阶级出身的矛盾。

托雷斯对哥伦比亚社会从未进行过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例如，他曾经希望暴力行动会迫使统治阶级搞一个发展纲领，但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因为暴力行动对哥伦比亚的统治者来说是正中他们下怀的，他们在巩固其政权的同时需要有反对派来证明其压制行为的正当。他还认为暴力行动激起了农民的阶级意识，给了他们以集体休戚与共的感觉，但他仍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认为暴力行动使农民有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他1962年对暴力行动的研究表明，他是熟悉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的，并且认为暴力能够在哥伦比亚推动变革，而游击队推翻政府的尝试正在摧毁哥伦比亚的旧秩序。此时要看出他的估计是否正确还为时太早，赞成和驳斥其论点的证据都有。

托雷斯是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达到政治上成熟的，他把古巴革命看作拉丁美洲第一个使变革制度化的运动。他认为哥伦比亚的自由主义者如豪尔赫·盖坦与古巴的革命者相反，其所实行的是昙花一现而且经常迷惑人的改良，其利他主义和愤世感根本比不过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使用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方法。他坚持认为，哥伦比亚旷日持久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争有助于统治阶级，因为基本的两党制自上而下地分裂了哥伦比亚社会，而在选举斗争中把民众阶级分成对立的两派，从而阻碍了阶级团结的形成。他主张建立一个民众

阶级的政党，并提议在它有足够的力量取得政权之前，群众不要参加传统政党候选人的选举。

到了1965年，他的解放伦理观让位于革命价值观。他公开谴责哥伦比亚统治阶级即“本地寡头集团”有损于群众利益，而从置国家于对美国思想和经济的依附中得到好处。

他发表了“人民团结运动纲领”，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城市改革，包括集体使用空地；取消自由企业；实行工人所有制和工人参加管理；工业国有化；官办公共卫生网；多元化的社会主义。他责成人民团结阵线统一哥伦比亚一些不结盟的进步组织，但没有成功。由于他越来越激进，一些自由主义者害怕马克思主义，加上内部的宗派主义，该阵线终于解散了。尽管他认为苏联的制度同基督教水火不相容，但他仍然认为教会不应反共，而且接受了哥伦比亚共产党对他在团结阵线解体后协助领导的民族解放军的支持。

卡米洛愿意充当激进基督教和各类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纽带，并且主张暴力社会革命，这就助长了拉丁美洲教会的分裂。1965年8月5日，他以教会接受对话和社会主义期待对话为话题接着写道：

“如果不经革命就不能取得爱世人的效果，则爱世人必视革命为其目标之一；如果这些目标在革命的行动和实践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方法和目标相吻合，那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变为基督教徒或基督教徒在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他们对解决大多数哥伦比亚人的问题在办法上趋于一致，而且这一办法不但天主教徒必须容许，而且教士必须加以执行。”

卡米洛·托雷斯经常被称为“穿上教士袍的切”<sup>①</sup>，他所宣传的游击队有社会良心而与盗匪截然不同的观点已为加入“拉丁美洲卡米洛·托雷斯协会”的教士们所接受。该协会在他逝世后，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增加了力量。他还坚决主张，每个基督教徒的义务是做一个革命者。这意见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特别是与哥伦比亚政经两界权势人物有勾结的该国基督教会领导人的攻击，他们竟然竭尽全力妄图把托雷斯神话化而诋毁其真实性。列宁在解释这种历史现象时曾经写道：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sup>②</sup>

卡米洛·托雷斯的思想没有在哥伦比亚的深山中与其人俱逝，而是同依然致力于推翻日益加强其镇压手段的哥伦比亚政府的游击队员共存，并继续活在组成1968年麦德林拉丁美洲主教会议的骨干分子心里；会议号召改革与革命，谴责了制度性的暴力行为，并声讨了国际资本与帝国主义。卡米洛的思想和行动为其他教士和神学家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了先导。一批解放神学家在拉丁美洲

---

① “切”是埃内斯托·格瓦拉的称谓，此处用作比喻。——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3页。——译者注

各地出现了<sup>①</sup>。他们强调，企图使福音保持在教堂内而脱离政治，这本身就是使现有政治局而合法化的政治手段，亦即屈从现状。这一观点同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想法直接相连，后者认为最好的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并让有组织的大多数人有效参与处理历史进程的制度。

## 委内瑞拉

革命理想主义最初在委内瑞拉公开出现于1928年，当时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并为社会变革进行鼓动。这些激烈反对1908年以来统治该国的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人通称1928年一代人，他们谋求使诸如捍卫民主委员会<sup>②</sup>、工人阵线和全国劳动阵线等左派组织参与政治。在1910年墨西哥革命和1917年俄国经验的鼓舞下，理想主义的1928年一代人希望撵走戈麦斯，并在委内瑞拉建立民主政权。

1928年一代人探索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新路子，是20世纪首先使委内瑞拉接受可供选择的各种哲理的人，其中有的成了马克思主义毕生信徒，另一些对它有过短暂的信仰，还有一些则被不那么激进的政治纲领如秘鲁的阿普拉主义所吸引。例如，大约30年后当上该国一名反共总统的学生领袖罗慕

---

<sup>①</sup> 1962年第二届梵蒂冈会议确定教会要更接近人民的原则。1968年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又确定教会工作要“优先选择穷人”。其后秘鲁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神甫把上述思想称作“解放神学”，1979年以来在拉丁美洲迅速传播，提倡社会改革。——译者注

<sup>②</sup> 意为“全国民主联盟”之误。——译者注

洛·贝坦科尔特在被戈麦斯监禁后，便讲到委内瑞拉需要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且加入了第三国际<sup>①</sup>。他和大约 11 个同伴在流亡哥伦比亚期间制定了“巴兰基利亚计划”，试图为分析和解决例如加勒比地区各国如何从他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之类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1928 年一代人中的一些人于 1931 年帮助建立了委内瑞拉共产党<sup>②</sup>。但到了 1935 年暴君戈麦斯逝世时，他们之中已经有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例如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就帮助成立了民主行动党<sup>③</sup>，这是一个中间偏左而倾向改良的政党。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已在委内瑞拉受到尊重，而另外一些 1928 年一代人已将这方面的研究提高到了学术水平上了，有的甚至试图在该国建立社会主义运动。随着政府的反左派运动在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沉寂下来，新的马克思主义潮流便占了支配地位，在大学中尤其如此。

从 1928 年的学生积极分子当中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其著作在 30 年代末开始在委内瑞拉问世。例如，卡洛斯·伊拉萨瓦尔的《走向民主》一书于 1937 年出版，其中接受了恩格斯的教导而强调人民斗争。两年后，曼努埃

---

① 贝坦科尔特因领导反戈麦斯独裁统治的斗争被驱逐出国后曾侨居哥斯达黎加，并参加创建了 1931 年 6 月成立的哥斯达黎加共产党。1935 年因反对该党加入共产国际而脱离。——译者注

② 1931 年开始筹建，1937 年 8 月正式成立。——译者注

③ 贝坦科尔特在戈麦斯病故后于 1936 年初回国并建立委内瑞拉组织运动。同年 10 月该运动与全国民主联盟、工人阵线和全国劳动阵线等成立国家民主党。而正式宣告成立民主行动党是在 1941 年 9 月 13 日。  
——译者注



尔·马托斯·罗梅罗在《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一书中分析了帝国主义在石油工业中的作用，并说明该工业如何加深了依附性，而依附性概念直到那时主要是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思想相联系的。

到了 50 年代，随着贫富悬殊在这个石油富国中更加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那里得到了更广泛的讨论；而到 60 年代，当卡斯特罗在古巴成功地进行了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成了委内瑞拉学术生活中公认的组成部分。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委内瑞拉人都知道马克思对他们的民族英雄西蒙·玻利瓦尔感兴趣，他们还把秘鲁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尊为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父。

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合法的研究课题，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了在研究院中进行活动的某种自由，但委内瑞拉政府在卡斯特罗接管古巴后，却奉行了一种成功的、有时还是蛮横的反马克思主义政策，使得一些学者经常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限于过去的时代而不涉及 20 世纪。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时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有阶级倾向的评论。

不管政府如何干预甚至经常施加相当明显的压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过去 20 多年还是给委内瑞拉学术界增添了方法论、方向、新形式、不同的观点、条理性 and 更透彻的分析。但它也助长了一场徒劳无功的反政府的游击战，这场战争在 60 年代得到美国军方的大力支援，却未能促使国内不同的社会主义团体达成策略上的一致而仅仅是一场流血冲突。

## 多明戈·阿尔韦托·兰赫尔(1923—)

多明戈·阿尔韦托·兰赫尔由于改良主义的民主行动党辜负了他对委内瑞拉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期望，便退出了该党并放弃了自由主义而成为左派革命运动的主要鼓励者；这个运动在50年代后期形成为一个信奉卡斯特罗式社会革命的政党。兰赫尔在号召亚、非、拉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领导“真”革命的黑人革命倡导者弗朗兹·法农的影响下，终于认为只有革命暴力才能使本国人摆脱自卑感、绝望心理和无所作为状态而重新自尊自重起来。

兰赫尔是1928年一代人的追随者、国会议员、受人尊敬的大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他成了左派革命运动的思想指导人和委内瑞拉最多产而又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他的《执政的安第斯山人》(1964)一书是一部1899到1945年的委内瑞拉政治史，其中指出中产阶级在19世纪末国内出现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以前是委内瑞拉最进步的部分。在他看来，1899年以前存在的是两重性社会，其中商业资本主义在塔奇拉州发挥作用，而委内瑞拉其他地方则或多或少处于封建阶段。当塔奇拉州第一个有名望的头领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sup>①</sup>于1899年控制了该国时，安第斯地区就开始掌握了全国政权。兰赫尔认为，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虽然发动了反帝运动，却没有导致国内政治改革，也没有提高伸张

---

<sup>①</sup> 委内瑞拉独裁者(1858—1924)，统治期间曾因英、德、意三国逼债并封锁委内瑞拉通道而同帝国主义有矛盾。——译者注

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政治觉悟和社会意识。

兰赫尔认为，1928年一代人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思想觉醒和探索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开端，这种变革在独裁者戈麦斯死后委内瑞拉允许政党存在时开展起来。兰赫尔指出，委内瑞拉阶级斗争和工人主宰一切的可能性恰恰在达到最高峰的时刻，有可能随着在政治上控制了该国的中产阶级改革家的民众主义许诺而减弱下来。

在《幻想的革命》(1958)一书中，兰赫尔谈论了1811至1958年曾经是委内瑞拉一个方面的政治幻想，说那是一种认为委内瑞拉尽管接连由独裁主义者统治，但毕竟存在着民主趋势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还讲了这种幻想作为对委内瑞拉最后一个暴君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1958年被推翻)的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有什么特征。他断言，1948—1958年独裁统治和外国经济、军事与思想渗透期间，许多委内瑞拉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左派。

他明确指出，尽管委内瑞拉的政权已从独裁统治转到中产阶级手里，但该国群众仍继续遭受剥削，所以他强调灌输民主主义是同社会革命不相容的，抽象化的选举自由没有使各阶级机会均等。在他看来，委内瑞拉没有代议制民主，而有的是替中产阶级办事的政府，并且是由平庸的、没有创造性的政客而不是由杰出的知识分子来领导的。他说，委内瑞拉的政治就是由在石油繁荣中显赫起来的中产阶级控制着政党。

兰赫尔认为，1959年以来连夺三次五年一届总统职位的民主行动党是根据列宁指示的集中制原则工作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混血儿。他指出政府满足不了人民的要求便如何诉

诸压制手段，但也肯定现行制度有消弭社会对抗的能力并认可改革的存在。他指出，中央大学是委内瑞拉社会的缩影，在那里左派人士已归顺当局，而这样的结合乃是兼并和操纵的结果。他预言，委内瑞拉无法摆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诸因素的矛盾势必引起未来的崩溃，从而导致要么右翼专政，要么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兰赫尔看出政党政治在取代老的先锋队，但他仍认为一支新的先锋队正独立于政党制度之外而出现。因此他批评委内瑞拉共产党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由于参加了传统的选举政治而被操纵在官方手中。

在他的两卷本著作《资本与发展》（1971）中，兰赫尔研究了委内瑞拉的生产关系史，并且说明了石油工业如何使该国从一个粮食自给自足者变成了依靠进口的国家。他把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即其欠发达状态置于历史的展望中来加以考察，从而同意了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的看法，即认为不发达是起源于殖民制度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不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因而也是伴随着帝国主义而来的依附性的组成部分。

兰赫尔表明 20 年代巨大石油蕴藏的发现如何成了委内瑞拉历史的分水岭，以及外国势力的渗透如何随着石油取代咖啡成为该国主要出口物和创造资本的商品而出现。他指出，委内瑞拉确实符合托洛茨基关于资本主义使农村从属于城市的意见，这在该国则表现为农业被称为“黑金”的石油代替了，政权也从地主贵族手中转到城市权贵的手里。石油还有助于使工人产生委内瑞拉第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

觉悟，而这一觉悟由于贪婪的石油生产者对工人日益歧视而加剧了阶级对抗。石油使该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加强了资本主义。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需要全国步调一致和中央集权的机构与制度，而兰赫尔看到，为了达到和保持上述前提，委内瑞拉发展了一支更职业化的军队，它成了该国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和中产阶级克里奥耳人的主要支柱，后者到了1944年就力图自己控制石油经济而不让外国资本插手。

他认为民主行动党这个代表新的中产阶级统治者的两大政党之一（另一个是基督教民主党<sup>①</sup>即独立竞选政治组织委员会）已经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象它的花言巧语使人相信的那样走向社会主义。他批评了民主行动党的渐进主义政策，特别是由于它没有实行有力的土地改革纲领和没有对抗美帝国主义。

兰赫尔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已取代欧洲和亚洲而成为美国主要的原料供应者。他断言，美国为了生存就需要拉丁美洲，而这种需要则导致美国对该地区实行军事上和思想上的控制，其策略是用危地马拉前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定义为“反共”的手段，即在人们对共产主义有反感的借口下把认为要不得的任何活动都贴上“共产党授意”的标签来加以制止。尽管美国加强了对委内瑞拉的思想统治，但后者仍然采取了行动控制自己的自然资源，终于在1976年实行

---

<sup>①</sup> 应为基督教社会党，其前身是1946年1月13日成立的独立竞选政治组织委员会，1948年3月改现名。——译者注

了石油国有化，不过后来却变得更依赖国际金融资本和技术了。兰赫尔在分析依附性时，从马克思对印度的想法中获得启示。他流露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石油给了委内瑞拉以摆脱依附地位的可能性，但在外国的或本国克里奥耳人的资本主义控制下这种可能性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兰赫尔是委内瑞拉传统上凭理智行事的、主张采取有力政治行动的作家在当代的一个例子。他在政治经济学上对委内瑞拉的见解，代表了大多数现今受过良好教育的“批判性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看法。当然，有些人会不同意他的策略，特别是他对待社会革命的非议会手段。他对委内瑞拉依附性的根本看法，不论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依附性理论家都是赞同的。兰赫尔保持着各种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对他的尊敬，并且发挥着以其关于改善委内瑞拉政治、社会与经济生活素质的分析与建议来促使该国当权的上层人物有时实行某些改革的社会批评家的作用，从而为他自己的事业在尽最大的努力。

### 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1930—)

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比他的同事多明戈·阿尔韦托·兰赫尔更紧密地和委内瑞拉大学师生的主流结为一体。他这样做而没有被同化或受到操纵。

他在墨西哥学习时认识到墨西哥革命缺乏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严密性，并开始学习如何制定一整套研究方法并把它应用于历史问题。卡雷拉·达马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委内瑞拉，并以使用富有革新精神的新方

法研究委内瑞拉历史的政论文作家和编辑的姿态，在大学生中赢得了极大的尊敬。他一直是在拉丁美洲历史研究中主张着重于各种思想的主要提倡者，而不赞成大多数委内瑞拉历史学家所偏爱的传统记事编年法。

他最著名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本国的殖民地的和 19 世纪的历史。他在为《独立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资料》第 1 卷所写的《初步研究》(1917)一文中，指明了委内瑞拉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情况和各种矛盾，即最初不同的选民从不同的动机出发要求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他主张对独立运动采用新的结构分析，以纠正论述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历史著作中他认为过分简单的缺陷。他多少有点象查尔斯·比尔德<sup>①</sup>对待美国史那样，评论了委内瑞拉资产阶级的发展与独立运动的关系。他指出，当时采取的斗争形式是同卷入独立运动的各社会阶级的思想发展水平、成熟性和觉悟程度相一致的。

他认为，独立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要让奴隶反抗克里奥耳人、克里奥耳人反抗半岛人、黑白混血种人反抗克里奥耳人，如果把克里奥耳人和半岛人看作同一阶级的组成部分，把他们的差别看成是等级制的，那么这个见解就必须加以讨论了。他说明不能严格地讲有一种解放的意识形态；参加独立的各种各样的人有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必须从多元的变革动力着眼来看这个时期。他在研究黑白混血种人时，把这个学者们一般忽视的集团称为委内瑞拉经济进程中的基本集团，并

---

<sup>①</sup> 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学教授(1874—1948)。——译者注

且描述了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黑白混血种人包括委内瑞拉占优势的出口商品生产者、该国手工业工人的大多数，以及该国商业和自由职业者的一小部分，后者中许多人的文化水平较之他们的克里奥耳人对手为高。

他断言，解放本身并不是目的，何况它并没有达到其各种各样参加者的所有目标。在他看来，重新出现的“1811年自由共和国”<sup>①</sup>表现了克里奥耳人那种专横、偏狭、歧视和蓄奴主义，以及助长不平等的特征。新的克里奥耳人统治者们几乎没有实行社会变革，而保持着旧的军事和政治制度。

卡雷拉·达马斯认为，废除黑奴制度是由奴隶反抗行为即要求自由的阶级斗争引起的，而不是克里奥耳人中产阶级发出善行的结果，因为后者自身还得进行争取同半岛人平等的战斗。他还指出克里奥耳人争取平等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与力图使地位上升之间的矛盾，他们比起他们想取代的半岛人来，无论在老练程度、教育水平、资产牢靠程度还是对地方的控制力方面都略胜一筹。

除了驱除某些关于独立斗争的神话外，卡雷拉·达马斯还试图消除一直充斥于委内瑞拉史的对玻利瓦尔的狂热崇拜。他在说明委内瑞拉摆脱西班牙束缚时，把玻利瓦尔主义贬低为仅仅一个因素。他怀疑玻利瓦尔有否定群众的看法，面始终认为这位“解放者”是一直被持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观的作家们捧为英雄的，他们搞的是一种已经成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偶像崇拜，其作用一直是掩盖失败和误人觉醒。在他看

<sup>①</sup> 指原委内瑞拉独立战争期间于1811年7月由国会通过独立宣言正式成立之共和国。——译者注



来,玻利瓦尔主义是个骗局,它在独立主要为商业资产阶级效劳的情况下,让人们误认为独立给群众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他坚持认为,玻利瓦尔主义是建立在怪诞念头和宿命论基础上的,它势必引起超越现实的奢望。

卡雷拉·达马斯著述了精确的批判性历史。他以“坦率的”马克思主义态度研究独立时代,可作为拉丁美洲其他历史学家的表率。尤其富有创新精神的是他对18世纪末到1830年这一时期的分段,以及他对当时委内瑞拉社会不同部分的分析。

不过他的研究和著述超出了18和19世纪的范围。《拉丁美洲和委内瑞拉现在的历史范围》(1972)一书表明他熟悉委内瑞拉经济的历史潮流。他在书中把委内瑞拉作为一个依附性社会来描述,认为其依附性具有强加的而不是固有的性质,并且受到外国传统的控制,这种外国传统来自初期对西班牙的殖民地从属地位,继而在独立后之先后依附于英国和美国。他把独立以后的依附关系细分为:(1)商业依附;1821至20世纪70年代;(2)绝对商业依附;1821至20世纪60年代;(3)帝国主义依附;1870至20世纪70年代;(4)现代化帝国主义依附;1870至1930年;(5)垄断帝国主义依附(即依附于矿产);1930至1970年;(6)当代热核革命,它引起依附关系的变化。

他谈到把宗主国(西班牙)的文化强加给本地人和非洲人,也谈到英美帝国主义。他认为,委内瑞拉的命运象今天这样束缚在资本主义和美国身上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必定同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超级大国拴在一起,并举出古巴对苏联的

依附作为后者的例证。但是卡雷拉·达马斯也指出了这两种不同的依附之间的差别在于，古巴不象资本主义附属国一直并且仍然受西方超级大国的剥削那样受到苏联的剥削。他和兰赫尔一样认为，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共同问题由于在国际秩序中缺乏独立性而被耽误了。

尽管他愿意相信拉丁美洲的地区性统一是可能的，但他还是注意到文化特性与国情差别使拉丁美洲这一概念成了人为的，不过这些差别在文学与创造性艺术方面（而不是技术领域里）能够战胜灌输文化的帝国主义。

在估价委内瑞拉的革命潜力时，卡雷拉·达马斯考虑到历史学家在其本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断定他们通常总让自己的同胞受到思想上的操纵。他把大多数当代委内瑞拉历史学家贬低为“中等思想境界”一类，以此委婉地责备他们不愿大胆采用具有优越感的学术当局认为不能接受的历史分析方法，并指责他们拒绝承认全部历史为价值观念所充斥而客观性只存在于各种思想动态之中。

### 特奥多罗·佩特科夫(1931—)

特奥多罗·佩特科夫代表了一种新的委内瑞拉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双亲出身于中产阶级，是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他本人则通过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崭露头角。他从在校期间反对1948—1958年统治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战士进而参加了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当选为众议员而成了致力于推翻委内瑞拉政府和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游击队领导人，最后则抛弃了视革命为意志的行

为的极端先锋主义。他认识到委内瑞拉的农民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于是接受了不可能白手闹革命这样一个前提,接着就在1970年建立了适应议会活动的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sup>①</sup>。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号召向社会主义作非暴力的过渡,即不实行人民阵线主义,但尊重社会主义的民主多元化而近似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宗旨。该党主张中立的对外政策,包括同美国友好相处,把后者看作委内瑞拉的石油市场和所需技术的供应者。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力图加强委内瑞拉的军队以保持该国中立。其理论家例如佩特科夫认为,左派由于把军队之类的组织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视为永久敌人,因而过去一直形象可怕和孤立,这是妨碍它取得进展的因素。到了1980年,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战略已经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以致使它获得委内瑞拉众议院11个席位和参议院两个席位<sup>②</sup>,而佩特科夫也得以成为受人尊重的众议员了。

佩特科夫一向认为,委内瑞拉在拉丁美洲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它潜在着巨大财富而需要不同的发展办法。在他看来,该国提供的丰富石油已使本国资本同外国尤其是美国企业拴在一起。他一直主张把经济多样化作为打破委内瑞拉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和随之产生的军事与思想依赖的一个步骤,同时也是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步骤。

---

①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是在1971年1月19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的。——译者注

②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1978年12月的委内瑞拉大选中获得了3个参议员席位和11个众议员席位。——译者注

佩特科夫一直强调，在当代委内瑞拉社会结构的条件下，小组织不可能对革命有很大作为，但群众必须而且能够转向社会主义。在他的《委内瑞拉搞社会主义吗？》（1970）一书中，他批评了分裂的委内瑞拉左派，并且探索一种办法把他们统一起來而又不致成为他心目中的苏联那样铁板一块的左派。

他赞同列宁的意见，即革命将分阶段到来：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在前，然后是社会主义阶段。他对委内瑞拉的分析使他得出类似赫伯特·马尔库塞对美国作出的结论，即大多数工人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所以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他们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

佩特科夫象葛兰西一样向往一个“实在的乌托邦”，在那里生活的质量最为重要，人们自由地参与社会事务，不搞官方文化而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他始终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人性善良和深信社会可以设计的基础上。为了实行变革，他坚持认为人们必须理解其所设计的社会的性质，并且写了《社会主义的理智与感情》（1973）一书以帮助提供这方面的基本认识。

他论述委内瑞拉时不是把它当作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当作处于依附地位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起有限作用而中产阶级则控制并阻碍着政治和社会改革。他以不久前暴力和非暴力的先锋主义在委内瑞拉都已失败便坚持认为社会改革不能靠教条主义的而只能靠有灵活性的社会主义者来实行，后者包括愿意卷入全国大辩论以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有理的学生、工厂工人和农民。

他指出，在委内瑞拉要反对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依靠外国势力的“大”资本主义，另一种是素有民族性而不必直接

同帝国主义勾结，但受其信贷和金融机构之类限制的“小”资本主义。然后他阐明了依附性资本主义同政权的关系，从根本上指出美国公司通常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如何同委内瑞拉的统治阶级建立业务联盟。他断言，这种关系由于有助于委内瑞拉资产阶级成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1945年以来通过民主行动党而得到了加强。象多明戈·阿尔韦托·兰赫尔一样，他也看到了在民主行动党那种亲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路线下，新殖民主义在战后年代里有了巨大的发展。

他说，在委内瑞拉能够迈向社会主义之前，生产资料必须置于“小”资本家手中。他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有能力破除委内瑞拉的依附性并促进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他赞成造就一支力量，在一旦依附性资本主义被消灭时就从本国资本家手里夺权；而之所以有这种可能性，是由于在委内瑞拉的小资产阶级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民主行动党的领导人（如罗慕洛·贝坦科尔特），而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如1968—1980年统治秘鲁的将军们）或社会主义者（如古巴的非德尔·卡斯特罗和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

佩特科夫的力量在于他既能批评资本主义又能批评社会主义。他不接受有着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的苏联模式，认为它不适宜于别的国家；他也知道古巴的游击中心主义在委内瑞拉行不通，在那里与社会主义者为敌的不是军人独裁统治，而是一种代议制民主形式。他说过，右翼指责左翼推行有外国（俄国、中国或古巴）特色的革命是对的。右派这样做就捍卫了民族主义，而把政治和社会动乱归罪于外国人。于是左

派装出似乎这些批评是正确的模样，以之作为替国际主义辩护和认定与外国社会主义兄弟姐妹有一致性的根据。左派就这样混淆了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团结。左派由于应用这些外国模式而表现出多少有点殖民地意识，因而不得不经常为此辩护。佩特科夫在力主非教条主义的左派观点而不主张维持现有模式的同时，谴责了左派使用的是诡辩的逻辑。例如，他举出一种常常提到的信念，即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以此推论说委内瑞拉既受到美国支配并执行其命令，则委内瑞拉国家只是为了执行美国命令而存在。如果这是普遍的情形，那么委内瑞拉国家给自己的人民办了某些好事时，左派就简直无法解释了；由于他们思想僵化而不对所发生的事情寻求真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解释，所以他们只会说：“这种好事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阴谋罢了。”

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和游击战士的佩特科夫：过去总是出色地显示出锋利的批判能力，并且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采取“坚定”而“迂阔的”服从态度。尽管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从来没有减低过，但他的思想已经连而他战略与策略一道发生了变化。今天，一个更老练的佩特科夫却支持议会程序并且采取一种“温和的”、较灵活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这也许最能从他对宗教的意见中看出来。

佩特科夫曾经是一个大喊大叫的宗教反对者，而现在已经象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一样承认罗马天主教基本价值在委内瑞拉的存在，并且相信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进步基督教对话的益处。他坚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在道德和伦理上的失败，其不人道和不合理性已促进了一种向“取消私有财产和

人间不平等”的基督教原有思想的回归。佩特科夫想要摆脱马克思主义视宗教为群众的鸦片的观点和基督教视马克思主义为魔鬼的化身的倾向。不管怎样，他已经获得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宗教给道德上和政治上都不可取的社会带来了秩序。

具有特奥多罗·佩特科夫、赫尔曼·卡雷拉·达马斯和  
多明戈·阿尔韦托·兰赫尔那种深邃和洞察力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家出现在委内瑞拉，比出现在南美洲南部锥体<sup>①</sup>为晚。但  
这些 1928 年一代人的后辈已经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  
问的传统。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行动家日益与佩特科  
夫、卡雷拉·达马斯和兰赫尔分道扬镳，而对有关委内瑞拉社  
会的知识库和该国的政治论战作出了贡献。

两位杰出而年轻的、“批判的”和“坦率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家埃克托尔·马拉韦·玛塔和何塞·席尔瓦·米切莱纳值  
得在这里谈一谈。马拉韦·玛塔的《委内瑞拉反发展的历史  
形成》(1974)一书是前殖民地时期到现在的经济史，它说明了  
偏重石油生产和相应地忽视社会其他部门如何加深了委内瑞  
拉的新殖民地依附性。

社会科学家何塞·席尔瓦·米切莱纳力图使经验主义附  
着于马克思主义。他还以柏拉图的方式创制了一个马克思主义  
的依附关系的模型，用以推断委内瑞拉的过去和现在，从而  
预见其未来。他对该国 30 年代以来迅猛的结构变化的研究，  
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 40 年的剧变导致的文化矛盾与冲

---

<sup>①</sup> 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译者注

突一直影响着所有可行的发展政策的制订和贯彻。他表明，民主在委内瑞拉只是一种假象；在那里，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之间有着直接联系，因而两者都操在美国支配的权贵手中。在经济方面，米切莱纳把既得利益的原理应用到委内瑞拉从而断定，虽然所有社会集团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委内瑞拉的发展却使更多的人受到损害而未从中得到好处，这就同经济学家安德烈·贡德尔·弗兰克关于“不发达的发展”的见解相吻合。他给自己对委内瑞拉的分析增添了社会心理学的内容，而用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和异化的基本思想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有组织的不满。他运用辩证法于委内瑞拉产生了新的看法，即该国是一个依附性的政治实体，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在这里不断增长。因此他预言，一旦遇到诸如国内石油资源枯竭（这是一种确切的可能性）之类强大刺激因素的激发，到80年代中期便可能出现革命的形势。

我们所有的委内瑞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是能够完全独立的。但他们还是强调，450多年来委内瑞拉一直处于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的地位，而且由于过分依赖根本就未关心过其民族利益的、占统治地位的外国和外国企业，委内瑞拉作出自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决定的能力便始终受到严重的限制。除此以外，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严厉批评委内瑞拉的自由主义者，即从1959年以来控制着政府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指责它们不但加强了对美国的依赖，而且没有实行适当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委内瑞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突出贡献是一向支持关于依附性和社会变革问题的全国论战的，却反



过来迫使执政的中产阶级权贵们实行了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

自相矛盾的是，在体力劳动者、学生和知识分子频繁谈论社会主义选择的委内瑞拉，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障碍却一直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所实行的温和改革，它们利用左的花言巧语，强调民主的民族主义，并且鼓吹要在它们的制度内部培养独立性，以减少委内瑞拉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性。

##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思想家吉列尔莫·弗朗科维奇<sup>①</sup>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国家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理论阶段和政治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的一种学说而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局限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在第二阶段中，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社会力量。著名的拉丁美洲文学专家恩里克·安德森——因贝特证实了弗朗科维奇的看法，因为他把玻利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成两类，即主张在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实行共产主义的人和精神上的共产主义者。这两个思想学派又都一分为二，即各有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很难确定玻利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时候开始把理论同积极行动主义结合起来的。我们知道，早在1906年就有

<sup>①</sup> 玻利维亚作家（1901年生）。——译者注

一个工人社会中心在拉巴斯按社会主义原则开展活动。到了1921年，国内开始形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兴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很快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何塞·因赫涅罗斯的《阿根廷社会学》（1918）一书在该国博得了一批读者，并且提供了一种注重历史的经济观点，来观察该地区从西班牙征服经过独立年代到混乱的共和国时期的情况，从而给了玻利维亚人另一种科学分析人的行为的眼光。

到了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献在玻利维亚的大学的已经很流行了，特别是以其反对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而广为人知。象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和阿图罗·乌尔基迪·莫拉莱斯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有系统地表达了对玻利维亚的科学批判，并寻找办法用社会主义代替国内许多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受秘鲁人阿亚·德拉托雷影响的人认为是足以拯救该国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秘鲁的何塞·马利亚特吉）的观点在玻利维亚的思想家中也流行起来了。马利亚特吉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于1928年在玻利维亚出版，而他关于经济发展、工业化、宗教和种族问题的论题则被改为适合于玻利维亚的情况。

尽管因赫涅罗斯和马利亚特吉的思想很流行，而且在拉巴斯和科恰班巴已经建立起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文学中心，在拉巴斯还建立了女工联合会，但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大不相同的是左翼激进主义在玻利维亚发展得并不早。直到20年代末，该国还没有任何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当时秘鲁的阿普拉主义在该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尤其是在著名的阿

普拉主义者曼努埃尔·A·塞瓦内<sup>①</sup>写了《左派对玻利维亚的看法》(1926)一书之后更是如此。该书集中描述了本土人的状况和矿业主阶级的特权,并主张在不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条件下能够实行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大萧条一开始,玻利维亚人就在寻求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而且读了更多翻译过来的欧洲著作,特别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的著述。由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支持的玻利维亚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支持的巴拉圭双方为争夺矿产丰富的北查科而发动血腥领土冲突的查科战争(1932—1935),引起了玻利维亚人更加认真地研究国内与国际的殖民主义,从而对玻利维亚矿场和大庄园的所有制提出了异议。

弗朗科维奇表明,查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为玻利维亚进入第二阶段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阶段设置了舞台。他指出,这场战争的起因与影响所引起的震惊使玻利维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出了脑力思索的阶段。他们开始同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以便建立一个可行的、反对剥削群众的运动。查科战争使人们更充分认识到玻利维亚从属于外国资本的程度,这主要是美国资本,但也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资本。

国际剥削的影响所及,导致大多数玻利维亚思想家在查科战争之后要么走坚定的改良主义道路,要么走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道路。连非社会主义者也领悟到了马克思

---

<sup>①</sup> 秘鲁政治家、记者(1901—1962),积极鼓吹阿普拉主义运动。——译者注

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价值。后来担任玻利维亚总统（1952—1956 和 1960—1964）的前经济学教授维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罗在 40 年代初曾说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国家现状的最好工具，并认定资本主义最终会消失，这就表达了玻利维亚知识分子普遍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玻利维亚的劳工运动中增长了，特别是在锡矿工人中托洛茨基的观点获得了坚固的立足点。与此同时，以追求进步为目标而视民族国家为求进步的的工具的民族主义则在矿工和城市工人中取得了巨大进展。

要把民族主义思潮同马克思主义思潮分开常常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两种运动都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并且都使用一些相似的托词。马克思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观点都影响过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这场革命始于 1952 年，并且暂时导致了大庄园解体，把土地分给农民，矿场国有化和削弱矿场主的权力，扩大了政府对工商业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工农在管理上有较大发言权，以及反帝情绪的增长。

不幸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由一个叫作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它在某种程度上投合了该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分子的心意）领导的这场革命（1952—1964）却实行了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而没有为资本发展作准备，从而使该国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思想上依附于帝国主义。这期间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所作所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是该国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前实行现代化和工业化所必需之举。与此同时，以胡

安·莱钦<sup>①</sup>为首的玻利维亚托派和代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左翼的矿工们则持有异议，而认为没有过渡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就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部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但这个同玻利维亚总工会结成联盟的组织中大多数人的改良主义观点在1952—1964年间却破坏了该国无产阶级中的革命热情。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还削弱了该国各社会主义组织之间团结性的加强，这一直是妨碍这些组织赢得政治影响的因素。这方面最好例证莫过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遭遇：他在60年代中期试图在玻利维亚重演古巴的经验，但终因玻利维亚左派组织的互相冲突而被民族主义挫败了。这就是后来使他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丧生的原因所在。

### 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1881—1968)

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是玻利维亚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为人直率，以诚实、热情和信念坚强闻名。他开始公共生活时是大学改革运动的学生领袖和1928年成立的玻利维亚大学联合会的创始人，该会主张大学自治、在印第安人问题上持革命立场、制止美国炮制的泛美门罗主义。

阿尔塞的专业是社会学家，他在1939年创立了玻利维亚左派阵线，该阵线在1940年并入了左派革命党，该党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主张自下而上逐步建立一个革命运动，但要

---

<sup>①</sup> 玻利维亚工会运动领导人(1915—)，玻利维亚民族主义运动创建人之一，于1964年另组左翼民族主义革命党。——译者注

由激进的知识界杰出人物来加以领导。左派革命党把发展工业放在首位，并以玻利维亚能够达到社会主义之前必先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为由拒不接受不断革命的想法。

尽管左派革命党同马克思主义作家特里斯坦·马罗夫（他要求自上而下建立社会主义，从而促成了该国左派的分裂）的追随者发生了冲突，但它不断揭露玻利维亚“假改良主义的”国内权贵对手们，而对该国工人工匠运动的激进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阿尔塞在拉巴斯和苏克雷两地的大学任教期间创立了玻利维亚社会学学会，充当了他那个党的主要发言人，并在1940与1951年两度竞选玻利维亚总统，而在这两度竞选之间担任了该国参议员。

阿尔塞对社会学持历史的研究态度以及他对前哥伦布社会有强烈的爱好，导致他用西班牙文翻译了乔治·卢马那把印加文明描绘为连续不断的专制制度的著作，以及路易斯·包丁著名的《印加人的社会主义帝国》（1928）一书，后者在他看来虽然说明了印加社会的村社面貌，却由于这个社会在经济上发育不全和容忍奴隶制，而没有证明它是社会主义的。

阿尔塞对玻利维亚历史所作的分析导致他把它分为三个阶段：（1）前哥伦布时期各族人民中存在的前共产主义；（2）殖民地时期的封建主义；（3）独立并出现资本主义。他认为，前哥伦布社会向其公民提供了更多东西，这是同他们在西班牙人到达后的生活状况相比而言的。这些事实连同他认为是在查科战争所导致的种种现象，有助于他形成对外国入侵玻利维亚的一切行为的敌视态度。他借用了马利亚特吉和马罗夫的观念，赞成玻利维亚人同拉丁美洲各地印第安人主义政党

结成联盟，以抵挡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帝国主义。他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中，为半殖民地人民找到了一条通过世界斗争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道路。

阿尔塞认为，只有唯物主义提供了关于宇宙的科学概念，以及消灭资本主义与阶级制度的实际方法，从而使人类获得解放。他认为，经济计划和技术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富裕。他通过其著述和作为一个积极行动者维护了妇女平等，并促进了可从初小进入大学的、由俗人管理的男女同校教育。他还强调，必须有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通用语言，以减少民族主义的敌对行动和冲突。

阿尔塞主张把印第安人纳入玻利维亚生活的主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力图象墨西哥革命早已着手的那样，通过解散大庄园来解放印第安人。他断言民主制同玻利维亚的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而要求私有财产社会化，尤其是矿场和石油工业国有化。

阿尔塞从更抽象的层次考虑了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实证科学研究宇宙以发现过去和现在的真实情况，哲学的存在是要找出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广义上用来指实用科学即应用科学的艺术，则旨在将现实改造为其应具有的面貌。<sup>10</sup>首先，他认为社会学是实证科学，因为它研究家庭关系、经济、政治、宗教、法律和道德。其次，他从哲学的立场出发，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发展的各种前提和目标。再次，他认为实用社会学则关心优生、立法和政治行动这类实际问题。阿尔塞以“坦率的”马克思主义方式使这种方法适用于玻利维亚社会。

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的思想和行动对左派革命党的另两名成员阿图罗·乌尔基迪·莫拉莱斯(1905— )和里卡多·安纳亚有重大影响。这两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曾任科恰班巴大学校长的乌尔基迪还研究了玻利维亚农民在社会学上的经历。在他的《本土社会：社会学上的经历，历史变迁》(1941)一书中，他断定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问题是能够通过土地国有化、进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印第安人的技术教育和恢复原来符合古代本土地区特点的经济行政基础来加以纠正的。换句话说，他建议在现代化也就是给现存村社关系带来技术的同时保存传统。乌尔基迪认为，玻利维亚具有半现代半封建的特点，因此他对该国土地问题采取决定论的观点，同意阿尔塞认为社会主义不经过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不可能实现的意见。他想象农民是革命的发动者和保卫者，并认为一个国家要经历资产阶级民主发展阶段，最初必须给农村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后给农民以土地并组织他们成立民兵与农会，而这些团体将成为革命政党的组成部分。他赞成消灭大庄园而将其土地分给印第安人，却主张不触动中等庄园。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后来采纳了乌尔基迪的许多意见，并把它们吸收到1953年《土改法》中去。此外，他关于学生应是改造社会的力量并应投入反对阶级特权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大学应是政治组织的意见，在文人政府统治期间也成了玻利维亚的准则。

另一个有影响的玻利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科恰班巴大学公法教授、杰出的议员和左派革命党党纲作者里卡多·安纳亚写过许多值得注意的著作，其中包括《矿山国有化》(1952)



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同意阿尔塞的意见，即玻利维亚的矿山必须国有化，以便使该国摆脱帝国主义。他提出了如何国有化以及管理和建立人民民主政体的意见。按照他的意见，现代化的关键是政府把国有化矿场的税收用于土地改革、电气化计划、工业化、教育和卫生改革。这一进程将使国家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而恢复主权和尊严。他认识到，加强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依赖性，因为在现代世界中玻利维亚总得与外界保持互相依存关系。安纳亚认识到有两种互相依存的选择对象：要么同美国集团，要么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既然玻利维亚已经认识到同前者亲密关系的后果，所以他虽然从来不成赞成同第三国际打交道，但仍然选择了同后者建立联系，认为这样将更加互利而较少受到剥削。

### 特里斯坦·马罗夫(1898—)

古斯塔沃·阿道弗·纳瓦罗以其俄国色彩的笔名特里斯坦·马罗夫而更为人知，一直成为玻利维亚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在该国的名望向来同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匹敌，而玻利维亚人一向是从后者描绘沙皇统治下生活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社会状况的类似点的。

马罗夫生于苏克雷的下等人家，早年就显示出爱动脑筋想问题和非常成熟。到了20来岁已因其文章、小说和政论而获有盛名。他在20年代担任玻利维亚驻巴黎领事时，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革命政治运动所吸引，并对此进行过广泛论述。他尤其钦佩法国“光明社”的社会行动主义者，特别是有影响的反战小说《火线》(1917)的作者亨利·巴比塞。

马罗夫在1925年一回到玻利维亚就组织了社会党。他的激进政治活动使他在1927年被捕入狱。他后来逃到了阿根廷。他在1934年流亡期间同一些玻利维亚同胞创立了革命工人党。两年后作为有国际地位的作家回到了玻利维亚。他的《印加人的正义》(1962)一书成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入门读物,而他提出的口号“矿场归国家,土地归印第安人”则成了玻利维亚左派的战斗口号。他们还采纳了他的下述意见,即外国资本只能有利于先进工业国,在玻利维亚既然矿产支配着经济,便应当用之于造福国家而不是有利于私人投资者。

他于1938年组织了玻利维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并认为这是第一个遵循马利亚特吉的土著主义思想的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政党。接着马罗夫就作为该党在玻利维亚众议院的代表,在那里主要起了马克思主义代言人的作用。

政治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剧作家和传记作家马罗夫的著作一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马罗夫作为批评家则有雷霆万钧之势,例如他对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sup>①</sup>的历史著作的分析就表明了这一点。他责备阿格达斯不了解唯物主义的作用,却崇拜代表腐朽阶级那种相信中间阶层优越性的美斯蒂索人的观点。马罗夫在考虑他的文学、戏剧和文学批评时,主要地不是把它们当作表现创造力的手段,而是利用它们来传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以鼓励怀疑主义,否定西班牙的一切和培养社会立法的信念。他最著名的也许是其剧作《头

---

<sup>①</sup> 玻利维亚外交家、作家(1879—1946)。——译者注

头》，这是一出嘲笑现行制度并为玻利维亚政治腐败深感遗憾的非常幽默的政治喜剧。

马罗夫读过鲁文·达里奥和何塞·恩里克·罗多的著作，基于这两人的思想，他的非小说类作品通常采取了反帝的态度。他承认在思想上受惠于秘鲁的何塞·马利亚特吉（他们直接认识）、墨西哥的安德列斯·莫利纳·恩里克斯<sup>①</sup>（他称其著作《国家重大问题》〔1909〕清楚地描述了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阿根廷的阿尼瓦尔·庞塞（他读过其著述并且赞成其社会主义解释）。马罗夫的作品还反映了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和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的观点，他尊重这两人的自由思想。他从西蒙·罗德里格斯身上虽看出有空想社会主义因素，但也从这位广为人知的西蒙·玻利瓦尔的导师那里获得了对美国的认识，特别是它对拉丁美洲构成的潜在危险。

按照他的同胞吉列尔莫·洛拉的意见，马罗夫的最大才能不是作为历史学家或理论家，也不是作为组织家或政治家，而是作为小说家（他写过《公民学》之类非常优秀的批判性政治著作）和社会主义推销员表现出来。洛拉指出，马罗夫对玻利维亚的分析多少有点欧洲式，缺乏玻利维亚的革命理论，也没有描写清楚什么类型的政体最能为工人斗争服务。

有些观察家一直把马罗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但认真研究其生涯和著作就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不代表任何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是一个独立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墨西哥 1917 年宪法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译者注

者，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寡头政治。他这样做是借鉴而不是照搬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马罗夫把革命定义为社会的运动，即各阶级互易其位。他指出，在玻利维亚一向被称为革命的事变只是一个政府被另一个同样的政府所取代。玻利维亚人一向称为“大变革”的事件并没有改变什么。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于缺乏有条不紊的计划和预先考虑。他不接受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群众虽从事大量颠覆活动却始终只是革命的工具，因为他们一向挨饿，毫无见识，象一盘散沙而设计不出成功的结构变革。他对群众一直缺乏阅读托马斯·莫尔、巴枯宁和马克思著作所需的教育而极端痛苦。在他看来，玻利维亚所经历的革命事变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招来的，因为他们只是事到临头才关心人民。

另一方面，马罗夫鼓吹以暴力革命引起社会变革。他把革命同恢复本土的政治与社会传统和土地归还印第安人联系起来。他的土著主义包含着一种神秘的特性，而与人附属于土地有关，即认为人若能成功地经营或耕作土地就能征服自然。同这种意见相联系，他极力主张矿场国有化和驱逐侵吞和霸占了土地的外国人。

他同意马利亚特吉的看法，即认为在可能着手摧毁玻利维亚的封建制度之前，印第安人必须有自己的土地来预示他们的自由。马罗夫1934年的著作《高原的悲剧》研究了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社会的贫困境况，并提到知识分子和政府不主动改善社会状况。他赞扬前哥伦布时期的文明，谴责西班牙人贬低这种文明，指出印加人了解并能够对付自己面临的问题。

题，并且声称玻利维亚人只要用社会主义方法分析当代情况，就能取得社会进步。马罗夫把印加人归类为村社社会，而不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或无阶级的国家。他承认他们的政府是专制的，但欣赏他们社会的团结，并且喜欢这样一种意见，即他们的自然财富是由国家支配的。

马罗夫认为，自印第安人失去对西班牙人的独立性以来，玻利维亚就没有自由。西班牙人被赶走以后，该国落到了英国、智利和后来美国的控制之下。他坚持认为，在外国支配下受苦最深的始终是应过更好生活的工人和农民。他在20世纪的无产者身上发现了类似前哥伦布时期各族人民的特点，即愿望的神秘气氛、博爱的情感和对富裕与自由的需求。

马罗夫认为，外国人给玻利维亚带来了种族主义，即阶级对抗的表现。贪图经济利益的白人制造了印第安人倒霉和美斯蒂索人靠不住的神话。他指出，查科战争是白人外国权贵力图操纵玻利维亚经济前途的例证，并用此来支持其对种族主义的意见。他还指出，这场战争中的广泛民族主义靠散布好景在望的想法削弱了封建制度。他认为，查科战争企图在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船获得港口以维护该公司的利益，所以他当时就看到这场冲突将唤醒玻利维亚的工人、士兵和学生联合起来，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寡头统治和进行社会革命中。

马罗夫是图帕克·阿马鲁<sup>①</sup>革命小组的成员，该组织竭

---

<sup>①</sup> 印加人最后国王(?—1571)，西班牙入侵后继续抵抗而被捕并遇害。

——译者注

力把查科战争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它有一种独特的看法，即这场战争会使军人认识到自己在为错误理由而战。因查科一地而引起的这场冲突，在使玻利维亚失去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和大约6万人的生命之后，成立了一个由原来的士兵组成的秘密团体“祖国的理性”，以推进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社会革命的目标。尽管该组织的纲领含糊不清而且太不实际，但它的出现却证实了马罗夫的论点，即战争教育了一些被迫服役打仗的人。

他曾经希望战争中的民族主义会促进矿场国有化运动，使国家从国有化中得到的资金能够用来改善社会。他在《玻利维亚的社会主义真理》(1938)一书中，说明了克里奥耳人反动分子如何搞掉玻利维亚的民族性，并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之再生。对于这一信念，他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包括玻利维亚民族革命时期在内，都是始终坚持不移的，并且把民族革命时期评价为没有使社会充分改组因而并未带来持久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改革时代。

### 吉列尔莫·洛拉(1922—)

吉列尔莫·洛拉以其富有活力的文体和锐利的批判性分析而为全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知，他一直是该地区把托洛茨基主义讲得最清楚的解说者之一。40多年前他创立了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工人党，随后担任了该党总书记。洛拉几十年来受到玻利维亚当局的干扰，却始终没有中断学术研究与著述。然而他要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普遍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积极努力已经减弱了。

洛拉的三卷本著作《玻利维亚工人运动史》(1967—1970)在拉丁美洲、英国和美国赢得了评论家的称赞，这是对他的高度学术水准和顽强精神的赞颂，特别是考虑到他是在玻利维亚缺乏书籍、图书馆和档案资料的情况下，即他认为造成该国历史学全面低质量而他称之为不利于工作的条件下写成的，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这部不朽的社会史比任何其他学术著作都更好地描述了玻利维亚工人阶级的发展，分析了该国的阶级结构，估价了该国在南美洲经济中的作用，并试图了解玻利维亚的知识分子在如何思考。洛拉研究了特里斯坦·马罗夫所研究的一些问题，但运用了比他这位同胞更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为马罗夫的一些概念提供了根据。

他说明了殖民地时代和共和国早期土著群众如何实际上受到奴役，以及由于太平洋战争(1879—1883)美国如何在玻利维亚经济中占了显著地位。他阐明了19世纪下半叶玻利维亚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开始取代保守的寡头集团或与之争夺政权。他指明了垄断资本在1870—1880年间大规模进入该国，以及在这个重要的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如何开始离开了该国。

按照洛拉的看法，赫拉尔多·F·拉米雷斯是对玻利维亚有重大影响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之一，此人崇拜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未来的社会》，其中列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国家的计划。洛拉指出，后来在20年代研究过马克思、托尔斯泰、因赫涅罗斯和帕拉西奥斯著作的阿根廷斗士、诗人、历史学家和外交家里卡多·海梅·弗雷耶尔(1868—1933)曾经在玻利维亚传播了自己的想

法。洛拉还认为，阿根廷社会主义者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和智利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雷卡瓦伦的著作，也影响过玻利维亚的工人运动。他说过，玻利维亚的第一批工会依据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作为1918年大学改革运动副产物的20年代的大学生联合会则十分信仰马克思。

洛拉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体力劳动者，却投身于玻利维亚工人运动而且一直很活跃。他认为谁控制了玻利维亚的矿藏就控制了该国。长期以来他一直鼓吹矿工作为革命先锋队有取代军队的特殊作用，而军方向来是掌握着政权的。

1946年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采纳了洛拉的普拉卡约论纲<sup>①</sup>，这表明拉丁美洲工会第一次正式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意见。该论纲的出发点是认为，无产阶级是玻利维亚的新兴阶级，而矿工则是其中最先进的革命部分，因而宣称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对争取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矿工应当领导这场斗争，全体工人也应武装起来，还应有一个武装的工人政府，并且它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论纲拒绝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联盟，而强调同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联系，认为他们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将发挥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洛拉的论纲依据的是托洛茨基的理论，即落后国家中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个连续的进程中相继发生。

奉行普拉卡约论纲标志着玻利维亚工人阶级史上一个重

---

<sup>①</sup> 普拉卡约是玻利维亚地名，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曾在此开会并发表了“普拉卡约宣言”。——译者注



大的关头，因为它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相抵触，后者提倡的是中产阶级优秀分子领导的、以多阶级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运动，而洛拉则认为这种主张是玻利维亚的资本主义特别落后的产物，它没有能力实现民主革命。

洛拉在他的著作《矿工罢工的总结》(1963)中批判了玻利维亚被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控制的时期，当时工会运动由政府官僚机构插手，而斯大林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则搞改良主义。他把这个时期的工会描绘为不合时宜，说它们全都是通过1952年矿场国有化后成立的、由国家资本主义政府而不是由工人控制的矿业公司即玻利维亚矿业公司，被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中。

洛拉在《玻利维亚革命》(1963)一书中把玻利维亚的工会运动描述为仿效麦卡锡<sup>①</sup>时期的美国模式。玻利维亚的工会仅管花言巧语反对帝国主义，却由资产阶级控制而不代表独立的工人阶级。他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的分析，同古巴人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和秘鲁的何塞·马利亚特吉对阿普拉主义的看法相似。他们都分别把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阿普拉党的斗争看作反革命，即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保护本国私有财产不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犯。

除了研究工人运动和玻利维亚民族革命的著作，这位不知疲倦的吉列尔莫·洛拉还写了一部游击战简史。该书大量

---

①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以50年代制造反共歇斯底里，迫害进步人士著称。  
——译者注

依靠了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武元甲将军和古巴的切·格瓦拉的著作。洛拉解释说，格瓦拉关于游击战在现政府既有民众支持又有宪法规定的合法外表情况下不能取胜的看法是错误的。洛拉坚持认为，如果军方从属于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而革命的其他条件都有利，例如有一个有组织的党领导起义，那么在有一个合法选出的政府的情况下游击运动仍然能够进行。

他强调，工农的民兵是对旧军队很好的抗体，并且指出，玻利维亚民族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它把军队改组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助手和政府解除了人民的武装。他认为，游击队需要由政党协调，而且必须象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军队那样经历不断的革命教育过程。他同意马克思和克劳塞维茨的看法，即“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并且说，自发的军事行动可能有用，但充当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能够提高游击斗争的水平和使游击队成为更正规的部队。他说，等待游击战的适当条件就是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正统共产党。他还坚持认为，拉丁美洲各国的形势与政治的发展（觉悟）是不平衡的，不可能让古巴简单地照搬玻利维亚而可望成功。洛拉认为，格瓦拉本来不应指望游击中心在玻利维亚建立革命政党，他1967年在玻利维亚失败是由于没有坚持必须有一个团结而发达的党来指导游击起义而背离列宁太远了。

从洛拉著作中反映出来的上述这些调查充分、推理正确、博学多识的治学态度，有助于巩固洛拉作为拉丁美洲第一流有创造性的、虽偏爱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却总是开明而灵活地工作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洛拉象他那些玻利维

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同行一样，期望自己的国家终止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下等地位，而在世界上发达的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成为生产性与非竞争性的一员。他和他的同志们不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在发展健康而多样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对“马上成功”都不抱任何虚妄幻想。他们认识到，玻利维亚的经济发展历来受到单纯搞矿业的限制，在一个尚未达到最低发展水平而处在本国地主和矿场主阶级及其外国伙伴所扶持的军方控制下大部历史一直凋敝不振的国家里，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乐观的。

从1964直到1982年，军方领导或控制的各届政府越来越迫使玻利维亚的激进分子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今天还偶尔能从倔强的农民和不抱幻想的大学生的喧哗声中，发现有特里斯坦·马罗夫、吉列尔莫·洛拉、何塞·安东尼奥·阿尔塞、阿图罗·乌尔基迪·莫拉莱斯和里卡多·安纳亚的思想影响。但在极大程度上，玻利维亚活跃的知识分子左派已由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而渐渐变得很有权势的实业界新贵所支持的旧贵族消灭掉了。

## 第八章 乌拉圭

社会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广大，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观点，也不仅是一种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的准则。它还是一种适应远离任何理论的需要运动，也就是一种渴望、期待和要求社会与人类正义的潮流。对于这些事情，马克思主义乃是河床，而且名副其实地充当向导，但无疑河床不等于整条河流。

——埃米利奥·弗鲁戈尼

对现代乌拉圭的任何分析，如果不谈到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1856—1929)就是不完全的，他的思想支配他的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思潮一直到60年代。作为很有声望的报纸《日报》的创办人、教会政策的批评者、政教分离的鼓吹者和该国总统(1903—1907和1911—1915)，他是坚定而开明的民主立宪主义者的缩影。巴特列主义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民族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较小程度上的克劳斯主义<sup>①</sup>招魂术思

---

① 人们对德国哲学家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斯(1781—1832)自称为“万有在神论”的哲学体系的称呼，这一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在西班牙吸引了很大一批人，并对西班牙教育发生过重大影响。——译者注

想中的唯心主义社会意识。

一向被人错误地叫作马克思主义者的巴特列懂得劳动价值论，而且他的观点反映了对工人悲惨命运的了解。但他的想法无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不接受辩证法，并认为不平等不是故意的，而仅仅是难以实现公平分配的结果。他认为，阶级斗争助长了不平等。为了促进平等，他主张国家干预和调节分配。他对人的控制冲突的能力抱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看法，但拒绝冲突有经济基础的意见。安东尼奥·格龙波内在其著作《巴特列的思想体系》(1967)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巴特列，并断定他纯粹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因为他最早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即大部分社会弊端将由有社会意识的中产阶级上台执政而加以消除。《乌拉圭的思想进程》(1941)一书的著者和该国读者最多的思想家阿尔韦托·苏姆·费尔德<sup>①</sup>也觉察到，巴特列的思想是中产阶级的。

为什么我们要从一位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家开始对乌拉圭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研究呢？我们知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乌拉圭有过一个相当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学派，而不论如何出人意外，其成员中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期间，这位有自由思想而虚怀若谷的巴特列则鼓励公开辩论国内外的新思想，并帮助乌拉圭成为拉丁美洲发展国际的与美洲的法学和外交的中心，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扎根并随之繁荣创造了学术气氛。他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应当介绍一切类型的思想意识，其对社会可能的益处都应加以考察，而且

---

<sup>①</sup> 乌拉圭政论家、批评家(1890—)。——译者注

都应加以了解。在他当第一任总统期间，乌拉圭社会党成立了（1910），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也产生了。在巴特列的支持下，乌拉圭通过了保护劳工立法，实行了进步的社会保险制度，举办了许多公共福利事业，从而建立了该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力图赖以创建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

#### 埃米利奥·弗鲁戈尼（1880—1969）

在蒙得维的亚鼓励思考的风气培育下，埃米利奥·弗鲁戈尼以外交家、律师、教授、新闻工作者、雄辩家、女权捍卫者、诗人、作家、社会批评家以及1904年成立的卡尔·马克思研究中心和乌拉圭社会党的创始人而闻名，是1911年该党第一个选入议会的议员和1938年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未当选。

弗鲁戈尼是遵循第二国际宗旨的亲劳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称受到古巴作家和自由战士何塞·马蒂的激励。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几乎是原始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其最初目的是要使乌拉圭人民理解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为此他竭力反对巴特列的思想，认为后者是一个破除了头领权力、带来了国家资本主义而开始使官僚政治进入乌拉圭新统治阶级的改革者。他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巴特列主义》一书表明了他反对巴特列的成功改革的艰维战斗，他认为这些改革使人民作出牺牲来扩大了资本主义。他声称，巴特列鼓动的民主政治会在乌拉圭盛行一时，但又告诫要提防右翼接管该国政权。

弗鲁戈尼领导了乌拉圭和社会党为反对他称之为“帝国

主义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1922年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时，他领导了退出该党的少数派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党，该党在后来的35年间一直相当保守。

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观点，在不断著述的同时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35年他出版了《砍刀的革命：乌拉圭政治概况》一书，这是对他的国家在巴特列逝世后转向独裁的谴责。他把自己的社会党看作30年代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并且警告乌拉圭的改革者终将成为艰难时世的牺牲品，该国经济将不稳定，法西斯主义者将代表资本主义权贵夺取政治控制权。他痛斥了对民主政治的虚妄幻想，即在工人几乎没有政治权力的国家里，选举进程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控制的。

到了50年代末，弗鲁戈尼对30年代的预言终于成了事实。乌拉圭的福利国家经济开始出现了巨额赤字。当乌拉圭看来有崩溃的危险时，社会党向左转而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到60年代经济进一步恶化时，社会党成了图帕马罗斯游击队<sup>①</sup>的发祥地，后者在军方夺取了对该国的控制权而终止其民主传统<sup>②</sup>时领导了反对军方的战斗，但没有成功。

我们从实践方面转到理论方面来考察，就看到弗鲁戈尼给乌拉圭带来了阿根廷社会主义者胡安·胡斯托的学说。他认

---

① 1962年乌拉圭律师劳尔·森迪奇·安东纳西奥创建了“民族解放运动”组织。1963年该组织采用“图帕马罗斯”（从“图帕克·阿马鲁”转化而成）的名称开展城市游击活动。——译者注

② 指1974年6月以后乌拉圭军方参与国家各机构活动，并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政府实权，同时解散议会和全国工人大会，禁止共产党、社会党等十几个政党与学生组织的活动。——译者注

为胡斯托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在拉丁美洲的背景下解释了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弗鲁戈尼指出，比较发达的阿根廷与乌拉圭的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后者的早期民主感情很突出，他把这一点归因于牧畜业环境、独立领导人何塞·阿蒂加斯<sup>①</sup>的观点，以及独立后欧洲移民带到该国的多种思潮。

弗鲁戈尼在他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论丛》(1936)中超出了胡斯托的教导，表现出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具有惊人的广博知识。在该书《食欲决定论》一章中，他才华横溢地论证了一切思想源于满足食欲的过程，即对食物的基本追求。弗鲁戈尼使用一些据我所知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从未表达过的观点，来构成他以人需要钱买食物为立论基础的对历史的解释。弗鲁戈尼从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乌纳穆诺和西班牙生物学家R·图罗<sup>②</sup>的观点出发，坚持认为人的第一个社会行为是要满足食欲，食欲激发了人的才智。他还把这些论据同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以及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意见联系起来。他认为，按先后次序有三种基本欲望要加以满足：(1)养活躯体的欲望，即需要生产食物；(2)满足精神的欲望，即需要生产交际和文明的成分；(3)对社会生活的欲望，即需要生产美好事物和知识成果。换言之，首先你得生产食物，其次是较奢侈的物品，然后是美好的事物。弗鲁戈尼断定食欲是暴力革命的发源地。

---

① 乌拉圭独立战争前期领导人(1764—1850)，1915年宣布乌拉圭独立并任护国主。——译者注

② 乌图罗(1864—1936)·西班牙学者、作家。图罗(1854—1926)，西班牙生物学家、哲学家。——译者注



弗鲁戈尼还关心精神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他的《马克思主义论丛》一书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唯物主义支配精神，社会唯物主义则指导人而不是其精神。他认为，拉丁美洲为了进步，必须了解自己的物质动力，而较少强调精神的东西。他还主张这样的意见，即阶级思想起支配作用，人视为“理想的”事物由来自于其阶级倾向。在他看来，社会制度按本源来说是物质的，而且本身就与阶级有关。他说明，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则，是人的思想而不是其精神决定其命运。他强调，拉美人民必须相信，理智能控制社会力量。

弗鲁戈尼的两卷本巨著《社会主义的起源、实质和基本原理》(1947)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的哲学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全面了解给人以深刻印象。除了他对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评论，他在这部著作中最令人信服的是关于墨西哥革命和秘鲁阿普拉主义的见解。他认为墨西哥革命是一场利用社会主义的言词却鼓吹国家资本主义的荒唐的民主运动。他勾画了墨西哥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类似点：后者宣扬人权，却以有阶级倾向的方式来实现它，所以经济和社会特权比比皆是。他指出，阿普拉主义本来以马克思学说为基础，但与其说它反对资本主义，不如说它反美和反帝。他说，就秘鲁而言，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也就是半封建地区的最初阶段，因为后者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重点在农业和矿业，因而按列宁主义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几乎没有潜力，而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来取得胜利。他看出阿普拉党尽管自诩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政党，但没有卷入阶级斗争而只是一个阶级的联盟，所以他认为该组织与其说符合马克思的思

想,不如说符合鲁文·达里奥的反帝观点。

弗鲁戈尼认为,不切实了解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所以他象其许多社会主义同道一样通晓世界历史过程,非常熟悉拉丁美洲内外各种左派运动的全部曲折经历。这位有创造性的、“坦率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把马克思学说解释得很狭窄是严重的错误。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经济决定论,而是一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广阔的社会学科学。他认为,非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这是只有在没有任何特权的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造成的无与伦比的局面。

弗鲁戈尼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巴特列主义处于成功的顶点时,从思想上对它提出了可以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以及他支撑社会主义思想的能力,使之在巴特列主义有负众望之后越来越为人们所信任了。

### **罗德内·阿里斯门迪(1913—)**

和埃米利奥·弗鲁戈尼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罗德内·阿里斯门迪是“迂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范例。多年来他刻苦致力于建立一个大陆的思想主体,以便围绕它把拉丁美洲共产党在理论和行动上统一起来。他从1955年以来一直担任乌拉圭共产党第一书记,同时又是该党非正式的历史学家,直到他在1974年被放逐去莫斯科为止。他是列宁的信徒,文章写得清晰,政治头脑很好,而且尽管意向在于宣传,但具有充分的创造力,足以被列为行动主义者理论家,而不是严格意义的词藻华丽而浮夸的作家。

象弗鲁戈尼一样，他反对苏姆·费尔德—巴特列思想学派。他不同意苏姆·费尔德的论点，即马克思主义只从经济立场解释历史。他认为，苏姆·费尔德误解了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系列孤立事件，从而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他同意苏姆·费尔德的下述看法，即巴特列是进步主义的，但又责备后者没有成功地处理大庄园制，并让英美垄断资本进入了乌拉圭。在阿里斯门迪看来，巴特列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尽管曾力图使乌拉圭民主化而最终未能着手。阿里斯门迪遵循列宁的思想，声称有时必须批评旧制度的各个方面，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而巴特列则不赞成这一意见。

在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中，罗德内·阿里斯门迪最著名的的是他1946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阿亚·德拉托雷先生》(1940)，这是一篇用社会主义观点研究秘鲁人阿亚·德拉托雷的政治思想的权威作品。阿里斯门迪断定，阿亚·德拉托雷的哲学意味着一种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即一种扭曲了的辩证法，其中俄国革命的论题和它的对立面法西斯主义被综合到资产阶级民主中。他驳斥了阿亚·德拉托雷关于秘鲁在20年代就有资本主义的论点，以及帝国主义就美洲的“时间和空间”而论是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这一论断。他指出，阿亚·德拉托雷否定美洲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只能有利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革命是由民众主义者带来的。在他看来，阿亚·德拉托雷同巴特列一样是个进步主义者，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变革的主要力量，而且同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实际改变其国家的经济制度。他指出，阿亚·德拉托雷同拉丁美洲其

他领导人例如委内瑞拉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总统（1959—1964）和哥斯达黎加的何塞·菲格雷斯<sup>①</sup>最高行政长官（1953—1958）一道，代表了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大资产阶级”，而不是危地马拉的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总统（1945—1950）的反帝“民族资产阶级”。在他看来，象阿亚·德拉托雷、贝坦科尔特和菲格雷斯这些人犯有同帝国主义妥协之罪，因为他们的言论经常诱使一些人误认为他们是力图从外国支配下解放自己国家的左派分子。

罗德内·阿里斯门迪依据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表述了拉丁美洲的问题。他的见解近似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想法，而且同意后者的这样一种看法，即独立后拉丁美洲的政治容易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只反映了该地区由于同世界市场的联系而使资本主义有所上升。阿里斯门迪和马利亚特吉都不是从传统意义上谈到资产阶级，因为他们认为拉丁美洲没有任何工业基础。

阿里斯门迪从第三世界方面说到拉丁美洲，并且勾画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类似点。例如，他把天主教会描述为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主义的主要工具。他的著作唤起了第三世界的阶级意识，使之认识自己的历史，以便造就一场导致社会主义的革命。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联战胜法西斯主义，为社会主义从1945到1975年在第三世界取得更大胜利开辟了道路，这是殖民帝国开始瓦解、反帝运动猛烈发展

---

① 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主要领导人（1906—），1948年发动军事政变后任革命委员会首脑。——译者注

和社会主义赢得重大胜利的时代。

阿里斯门迪主张武装斗争，他和列宁一样，有时宁可要群众行动而不要孤立的恐怖主义行为。他在其著作《列宁：革命与拉丁美洲》（1970）中表明了对这位俄国领袖的思想有切实的了解，然后把它运用到拉丁美洲。他看到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处在不断革命的某个阶段，并认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革命政党来领导以取得胜利，但可以有例外。他赞同列宁的看法，即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同于依附帝国主义的国家的革命。在后一种国家中，土地问题使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民族解放的民主阵线，正如它在中国表现的那样。他认为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单纯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对抗是经常的。他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民族解放运动可能的参加者，以后则可能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同盟者或者被消灭。在他看来，暂时的合作有时为推进革命所必需，但阶级联盟却不大合适。

他举了社会主义者和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成功合作的许多例子。从30年代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全盛时期的巴西，到50年代的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以至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和60年代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其间他特别提到一些受社会主义思想鼓舞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改革家起而领导了变革运动，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同本国已有的工人阶级结成了联盟。

他告诫要提防以争取进步联盟之类计划为表现形式的泛美主义，并认为该联盟是一个在美国经济和思想支配下统一拉丁美洲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企图。他指出，一方面华盛

顿当局在吹嘘拉丁美洲“民主阵线”，而另一方面争取进步联盟却在本地地区极大地削弱民主制度和加深其依附性。

阿里斯门迪关于帝国主义与革命的思想，以及他对阿亚·德拉托雷等其他思想家的分析，乃至他的政治与社会理论，全都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为基础的。这位乌拉圭思想家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样一个信念，即资产阶级必须完成其历史作用，包括消灭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工业，并在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前建立政治民主。

### 弗朗西斯科·R·平托斯(1880—1968)

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平托斯在声望上逊于他的共产党同志和同胞罗德内·阿里斯门迪，也不及后者有灵活性。在他的著作《1851至1938年的乌拉圭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1946)中，他成功地辩解并表明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历史问题能够得出可能的解决办法。他强调，在象乌拉圭这样基本上是畜牧业的国家中，土地改革是使大多数公民获得社会正义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表明，阶级对抗一直不断地造成乌拉圭权贵和群众的经济差别，再加上强大邻国阿根廷和巴西的压力，便妨碍该国在社会与政治上保持平衡。例如他指出，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在19世纪50年代使其政府实行中央集权时，许多乌拉圭人就由于两国资产阶级互相勾结造成的影响而深受其害。他还指出，乌拉圭如何受到资本主义逆流和外国思想意识的冲击，也许在程度上比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为甚。

平托斯认为何塞·巴特列在1903年当选是进步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胜利。象弗鲁戈尼和阿里斯门迪一样，他认为巴特列时代是民族改良而不是民族革命的时代。他在其著作《巴特列与历史进程》(1960)中，详细说明了1876至1933年期间，美国投资如何在该国开始取代英国投资，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如何在该国获得实力。乌拉圭象大多数保护国一样，在大萧条时期比支配国受害更深。平托斯表明，大萧条促使乌拉圭人反省，使各阶级认识到必须实行工业化以减少贸易赤字，同时也突出了土地改革对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该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平托斯的著作显示了对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强烈关心。他在《烧荒地的位置》(1965)一书中，把争取乌拉圭独立的斗争看作工人未来战斗的先驱。他在其《乌拉圭工人运动史》(1960)一书中，描述了早期解放运动同20世纪乌拉圭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的因果联系。

平托斯比任何其他乌拉圭作家更好地阐明了本国的工人阶级史。他对乌拉圭社会所作的“迂阔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正好颠倒过来提供了足以洞察该国政治经济的宝贵视野，同时也为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既有的和可资凭借的框架。他所提供的历史线索足以使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获得对乌拉圭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

### 阿夫拉姆·纪廉(1913—)

近年来乌拉圭最著名的“坦率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是阿夫拉姆·纪廉，一位符合葛兰西关于“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定义的才华横溢的西班牙流亡者。纪廉是西班牙内战

的老战士，有时用“阿拉佩斯”这个笔名，他最初博得名声是写了有关西班牙政治问题的作品。他从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逃到了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去了阿根廷，而最后在乌拉圭定居。

纪廉对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观察使他断定他们有时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信仰者，他把这种确信带到了拉丁美洲，并在这里作为经济分析家赢得了尊重。1957年他出版了其两卷本著作《帝国主义的痛苦挣扎》，以致阿根廷政府撤了他在经济事务部的职务，随后控告他同被怀疑是非德尔主义组织的“美洲豹”游击队合作。经过1961年的短期监禁，他在1962年要求到蒙得维的亚政治避难，当时乌拉圭还以流亡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和容纳新的思想方法而自豪。

纪廉一经在乌拉圭安顿下来，就替《行动报》工作并开始把几年间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指导城市游击运动的基本原理写成书。他思路清楚，能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应用到当代问题；书面表达有说服力；乐于为拉丁美洲争取工人控制下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出谋划策并积极参加斗争，这些都使许多乌拉圭左派分子把他看作思想指导人。他的著作遭到查禁这一事实，也许是对其洞察力及其文章影响力的最大赞颂。在美国，除了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几乎没有人接触过他已出版的20多部著作。

纪廉的《帝国主义的痛苦挣扎》和《金元帝国主义》(1962)这两部著作，使他被认为是号召拉丁美洲第二次独立战争的“危险的”知识分子。他预料美国和拉丁美洲终将发生冲突，



因为后者对前者的依附性增加。纪廉赞扬古巴是粉碎美国统治这一进程的开创者，并预言民族解放运动将在拉丁美洲所有国家中出现，而且会在反对美国及其拉丁美洲寡头盟友的西半球战争中联合起来。他预言，美国一旦失去其拉丁美洲附属国，其生活水平就会下降，贫困和失业就会增加，而工人阶级就会觉醒起来并开始推进社会革命。他断定，两半球的和平只有美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才会实现。他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建立，必须由拉丁美洲的革命来激发。

到了1965年《暴力论》一书出版时，纪廉在南美洲已以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游击战略家著称。他象毛一样不接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想法，并号召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反对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意见，认为后者为该地区提出的扩散主义计划归根到底主要有利于外国公司。

为了取代普雷维什对待拉丁美洲发展所持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看法，纪廉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计划，但告诫它只有在左派停止互相冲突而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能贯彻。他号召西半球团结起来，甚至建立一个能成功地控制该地区外国经济势力的拉丁美洲联邦共和国。这个建议，从该地区偏狭的民族猜忌心理和缺乏政治稳定性来看，是不现实的。在一篇更讲求实际的文章中，他提醒注意斗争面临的危险，并在没有具体谈到智利的情况下，指明了一旦出现阿连德式的局面，美国方面会作出什么反应。

纪廉主义把马克思的历史和经济方法同巴枯宁关于直接行动的信念 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布朗基关于

由职业革命家直接夺取政权的信仰，以及切·格瓦拉关于建立起义中心的战略结合了起来。纪廉不同意古巴关于民族解放斗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他认为，所有阶级都必须共同努力以促进社会革命，但在拉丁美洲他看到三个阶级即农民、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和中间阶级不屈不挠地反对美国支持的地主和中间阶级中的剥削阶层。因此他断定民族解放革命不一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另一方面，纪廉把西半球同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争夺和冲突看作不可调和的，而且对社会主义运动很有利。但他同时也指出，在与资本主义社会打交道方面，社会主义世界的分裂无异于削弱了自己。他特别提到了苏联帝国主义引起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发达的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官僚不让工人管理自己企业的倾向。

他号召社会主义者不断进行自我和世界两方面的分析。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寻求革命可能性和研究社会变革动因就能预测变革。纪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为行动作准备，而不仅限于发现思想规律。

他对乌拉圭的革命可能性的分析使他断定，城市游击战能在该国成功。根据既非技术优势亦非火力而是持续最久的能力赢得游击对抗这样一个前提，他论证了为资本服务的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是发动和拖长冲突的最好地方。当乌拉圭的非德尔主义者谈论要仿效古巴在崇山峻岭成立革命的游击中心时，始终注意到乌拉圭并无崇山峻岭的纪廉劝告他们把精力集中在城市而不是农村。不过他还强调，游击队必须在农

村有同盟者来阻止对城市的供应，从而增加城市的脆弱性。他同意切·格瓦拉的下述看法，即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城市还是农村的游击中心对武装斗争都很有用，先锋队政党能够从游击中心产生出来。

在纪廉看来，城市游击战乃是革命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恐怖主义。它旨在用不断打击其弱点以攻破其不可战胜的神话的手段来摧毁国家。他把城市游击战的胜利看作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成就，而不是军事上的战果。他主张把压迫者引诱到民众支持革命的地区，然后以持久的瓦解战将其打败。纪廉反复表明统治当局的残暴行为对赢得群众支持革命的重要性，并否定在温和政府统治下比在镇压性政府统治下更易发动革命的意见，而坚持认为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应从军人专政的而不是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开始。

纪廉的《城市游击战略》(1966)一书正如我们将会看到那样，成了乌拉圭的革命起义的模式，也成了他的巴西朋友卡洛斯·马里格拉写作《城市游击手册》的启迪。在《战略》第六章中，纪廉表明了政治的辩证法如何揭示以阶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及其根本的社会对抗。该章指出，强调经济就能使群众看清城市游击战的革命面貌，也就是说，游击队指出现行制度的腐败和操纵手腕，以及取而代之的可行办法，人民就能掂量出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可能性。纪廉告诫游击队，一旦获得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就必须防止高人一等的革命优越感，还劝告他们不要过分相信选举政治，并且特别提到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有过分强调社会改革而不重视社会革命的倾向。

乌拉圭人把纪廉当作理论家和战略家来怀念，他的一些想法被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运动）所采纳，使这支游击队在1968到1972年达到了显赫的顶点。由社会主义者劳尔·森迪奇·安东纳西奥领导的图帕马罗斯还得到无政府主义者、毛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支持。图帕马罗斯主张非宗派主义的武装斗争，并从古巴革命得到启发，于是竭力推广其运动，在揭露乌拉圭政府依靠一支雇用了屠杀队和酷刑队的军队的同时，经常使用“罗宾汉”<sup>①</sup>式的战术。

1968年智利的《终点》杂志刊登了《向图帕马罗斯提三十个问题》一文，解释了借用纪廉的许多想法的这个运动的目标与作用。该组织的城市游击中心主义既打上了纪廉的印记，也反映了切·格瓦拉的观点，后者相信，只要拿起武器、准备并从事反对资产阶级法律堡垒的行动，就会产生革命的意识、组织和条件。图帕马罗斯还遵循列宁的教导，坚持革命者应在革命中发挥作用，认定自发性行动就是回避现实的盲动，因而可能在生命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图帕马罗斯希望用武装的革命打败资本家后，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认为，工人和学生是进行革命的核心，而革命将通过银行和出口业的国有化，以及没收大的和闲置的庄园，使乌拉圭的经济问题得到纠正。

图帕马罗斯运动有过几年的发展，因为它成功地造就了一批乌拉圭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提高了正在稳步增长的贫困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觉悟。它把大多数左派分子团结在革命民

---

<sup>①</sup> 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中世纪绿林好汉。——译者注

族主义的周围,从而短暂地克服了社会主义者的宗派主义。图帕马罗斯遵循纪廉思想的同时,经常在没有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活动,并认为革命政党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政治机器。它并未正式采纳游击中心论,而只是把这一理论看作一种斗争方法,从而避免了内部分裂。它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游击中心是相容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但不是始终必不可缺的。

1970年7月,图帕马罗斯绑架了正在教授乌拉圭军警如何对付和迎战恐怖主义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央情报局官员达恩·密特里昂内,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位应对拉丁美洲许多社会改革家和革命者之死负有责任的美国官员后来被处决,导致反图帕马罗斯战役的不断升级,结果革命者完全敌不过乌拉圭武装部队,后者很快掌握了对该国的全部控制。许多乌拉圭社会主义者在密特里昂内死后的大屠杀中丧了命。

纪廉批评了图帕马罗斯处理密特里昂内问题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判处密特里昂内死刑然后把他的罪行告诉国际舆论界再加以释放,本来会赢得对运动本身的支持,而将他杀死则有损运动的声誉。纪廉在评论图帕马罗斯的错误时说,“在革命中,凡是必须向人民作解释的游击行动都是错误的,行动本身应理直气壮而令人信服。”他认为,图帕马罗斯没有充分教育群众,也许还须说服全世界,以便得到人们的认可。此外,纪廉还坚持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太近似于一个站在对立面的国家,但是除了实行政治处决和人民监狱制度外,没有为群众提供任何对着干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图帕马罗斯在未能建

立坚强的群众路线之前就被摧毁了。

纪廉的思想只是有助于促进一场激起右翼进行反扑的运动，其结果反而断送了乌拉圭悠久的民主与思想自由的传统，并且消灭了该国在近期内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某种希望。尽管他的著作连同与他志同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弗鲁戈尼、阿里斯门迪、平托斯的著作一道，已属于被搬出乌拉圭各图书馆并加以销毁的进步著作之列，但他们的思想仍然秘密地活在激进分子的心中，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从乌拉圭一度非常成功的自由主义国家的废墟上涌现出来。

## 第九章 墨西哥

这种新人道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包括了世间所有的人，黄种人和白种人，黑人和印第安人。不分东西南北都渴望按同样的理想和同样的希望来生活。

现在各国的人真正是兄弟，并用各具特色的语言同声高唱同一曲自由的赞歌。

——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

法国 1848 年革命引起了墨西哥 19 世纪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何塞·玛丽亚·路易斯·莫拉去勾画法国和墨西哥工人命运的类似点，从而间接地使其同胞知道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面貌。当时卡尔·马克思对墨西哥的情况就象墨西哥思想家对他的思想一样没有多少兴趣。但到 1861 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德国《新闻报》写文章时，已经表达了对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干涉墨西哥的义愤。马克思把干涉的罪责大部分归咎于英国，说它是个一心要把墨西哥包括在自己帝国之内的工业大国。在其后 10 年间，他的文章讲到墨西哥是国际政治中的殖民地抵偿品，于是墨西哥思想家便对他稍加注意。

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埃尔·蒲鲁东（1809—1865）的思想在墨西哥被译成西班牙文传播。某些墨西哥自由主义者随意借用蒲鲁东的一些原理，特别是他关

于上帝不好和私有财产助长盗窃的意见。生于希腊的普洛蒂诺·罗札卡纳特伊在1861年到达了墨西哥，并且很快就创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追随者办了一种傅立叶主义的杂志《法伦斯泰尔》。在罗札卡纳特伊的指导下，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坚持政权扼杀平等的观念，认为要发展民主的机制就必须消灭行政上的权力主义。罗札卡纳特伊的著作《社会主义手册》(1861)以傅立叶的学说为依据，论证了缩小政权会减少暴政。

1872年，罗札卡纳特伊的门徒建立了墨西哥工人大团体，这是一个采纳蒲鲁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1813—1882)<sup>①</sup>的想法的工人联合会。勃朗认定社会主义必须由工人而不是由特权阶级来实行，因而鼓吹用国营社会车间取代私人企业，并创造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提法而成为老一辈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承先启后的人物。大团体依靠这两位法国思想家奠定的基本原则，维持住了政治保证，鼓吹了自由选举，举办了手工业博览会，宣传了工联主义与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它密切注视欧洲社会主义的新动向，给墨西哥带来争论国际劳工共同问题的思想，使一些工人认识到自己同所有者和统治者阶级之间的永远对抗，认识到反对资本家政权的唯一武器就是总罢工。这些启示通过《社会主义者》和《劳动者》等社会主义报刊上的文章，传达给墨西哥各地12000名大团体成员。

1871年，巴黎公社的消息在墨西哥流传开来，朱塞佩·加

---

①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生年应为1811)。——译者注



里波第<sup>①</sup>和奥古斯特·布朗基等人的名字就象各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样，第一次在该国见诸书籍和报刊。同年，《社会主义者》杂志唤醒了一些工人，因为它致力于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三年后，《公社》杂志问世，为取消军方干政加强了鼓动。墨西哥第一次劳工代表大会于1876年举行。两年之内，工人运动和早期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智力库增添了一个唯灵论的当代变种。因此在墨西哥左翼思想家当中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论，即献身于社会正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是与社会改良携手并进的。一种把社会主义当作人道主义最高阶段的道德观成了《劳动者》杂志撰稿人圣地亚哥·谢拉的主要论题。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1876—1911)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无政府主义者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在同一杂志上发表文章，描述了工人的奴隶状态，谈论了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要素的自由、平等、博爱，并强调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应达到的极致，而墨西哥的劳动条件特别恶劣，工人必须从美国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尽管墨西哥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期刊，但在1883年以前该国没有出现过马克思著作的西班牙语译本。那时就象今天一样，能够在该国找到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或对马克思学说从无合理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在1910年革命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看法是

---

①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1807—1882)，1834年起义失败后逃往南美洲，曾参加巴西南部共和主义者起义(1835—1845)和乌拉圭独立战争(1836—1845)。巴黎公社成立时被缺席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

——译者注

墨西哥工人阶级主要的思想表现。

在墨西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以里卡多·弗洛雷斯·马戈恩最突出，他读过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却以米哈依尔·巴枯宁和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为指导，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种想法，即除掉一切政府官员和资本家以便建立一个自治体的社会。他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应组织起来反抗它必能加以摧毁的国家，然后不通过议会活动就没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并按适当方式和联邦制方针改组社会。弗洛雷斯·马戈恩承认，这样的目标由于美国资本和墨西哥政府紧密勾结而很难实现。他指责白宫实行并吞政策，并断言墨西哥社会不摆脱美帝国主义就不能得到改组。弗洛雷斯·马戈恩通过《新生》杂志宣传其想法，特别把他反政府和反资本主义的矛头指向本地社会，认为它是触发社会主义的潜在因素。在他看来，印第安人社会几百年来一直由于爱好自由而结合在一起，因而印第安人主义将是墨西哥革命可以指望的基础。

下面讨论有关 1910 年开始的墨西哥革命的许多理论问题。人们不应以这一运动时时有激进的言辞而误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常认为，没有革命的计划或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而资产阶级思想家则一直试图为墨西哥革命构想一个计划或理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一致看法，他们一直被极力劝说要使自己的意见适合既定的革命模式。政治观察家维克托·阿尔瓦说，墨西哥也许没有一个人在 1910 年读过列宁的著作，要是有人读过，他本来会认识到下述对每一革命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当时并不存在：统治阶级并非处于衰微状态，也不认为

现状在不断恶化；被压迫阶级并不总是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而有些意识到的人也不认为变革行得通；既没有任何足以确定革命方向的理论，也没有任何能够指引变革要求的组织。

大多数的墨西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不承认这场革命是一次完全彻底地改组社会的运动。学者们有时认为，这场革命是部分地社会主义和部分地资本主义的。而这种看法对那些认为两种制度根本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更喜欢把墨西哥的经验看作某种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这场革命的制定宪法的年代里，墨西哥政界中几乎找不到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一个例外是拉斐尔·涅托（1883—1926），他曾任卡兰萨<sup>①</sup>政府财政和政府贷款部副部长。涅托是一位很能干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国务活动家，还当过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州长和驻意大利与瑞士公使，曾经读过亨利·乔治<sup>②</sup>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是一个激进分子，被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称之为“先进思想家”、“不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地主”，虽然知道一些马克思的主要论题，却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

涅托试图使墨西哥的左派，特别是农村劳动者（他曾论述他们并力图维护其利益）作好准备，以便在1917年宪法实施后的岁月里参加思想辩论和政治生活。他还是一位孜孜不倦

---

① 墨西哥革命中的宪政主义者（1859—1920），墨西哥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译者注

② 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治家（1839—1897）。——译者注

的国际主义者，其著作《论美国帝国及其他》（1927）表明，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商人和工业家控制了墨西哥国内外的政治和经济。他认为，帝国主义掠取了墨西哥并不富裕的自然财富，并且使墨西哥人民的精神颓废下来。

涅托探求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对应理论，以便解释人的行为、道德原则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协调关系。尽管他致力于用唯物主义观点和经济解释来说明历史，但自相矛盾的是他坚持认为文明可以通过大力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来拯救。同时他还认为，政权应为人民而存在，并认为墨西哥政府历来是政治侵略的总代办和经济特权的工具。

涅托坚持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的创造，也不是简单的经济上划分等级或者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种基本事实的反映。他看到墨西哥的阶级斗争是由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大庄园制合成的。他认为，只要最上面的极少数人拥有一切而最底层的大多数人仍几乎一无所有，墨西哥革命便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完成。在他看来，1917年宪法规定的政治平等只是冒充的货色。

墨西哥制宪议会制订1917年宪法时，其成员中只有路易斯·蒙松是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他宪法制订者中，有少数人读过某些马克思著作，也知道马克思认为追求私有财产势必助长对工人经常施加的暴虐。因此他们在这个文件中替工人写进一些集体主义原则和保护性措施，但没有消除私有企业或财产。例如宪法第三条规定：“教育将是社会主义的……它将反对狂热和偏见，在青年中培养一种合理而准确的宇宙

观和社会观。”墨西哥最有名的诗人和政论家阿克塔维奥·帕斯认为宪法的这一“社会主义”面貌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文件在一个无产阶级对统治毫无发言权的国度里美化了私有财产，而且他怀疑村社土地所有制（公地制）怎能成为一个卷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世界帝国主义冲突的社会的组成部分。

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 N·M·罗伊<sup>①</sup>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他在 1920 年断言革命运动只有在欧洲不再有供榨取利润的殖民地之后才能在西方成功。列宁曾坚持认为，在欧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要在殖民地推翻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虽然罗伊认为革命能在欧洲和美洲同时进行，但他和列宁都同意择定 20 世纪头几十年作为在墨西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是不适当的。

尽管在俄国革命发生时墨西哥还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但该国知识界还是讨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 1917 至 1925 年间也没有引起政府的憎恶，尽管当时美国和某些西欧国家已在力图阻止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扩散。

直到 30 年代以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为首的大学教授提倡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社会主义分析以前，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式在墨西哥的教室里学习的。但到此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已触及墨西哥政府的最上层集团。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决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很重视列宁的

---

<sup>①</sup> 1947 年以前印度共产党领导人（1887—1954），1916 年去墨西哥，曾帮助建立墨西哥共产党。——译者注

见解，特别是有关帝国主义、人民对土地的关系和劳资矛盾的意见。卡德纳斯的一些追随者也抱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的教育部长贡萨洛·巴斯克斯·贝拉曾经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是墨西哥教育的哲学基础”。教育部还散发了载有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廉价小册子。有些书籍，例如共产党参议员和教育部成员路易斯·蒙松写的《墨西哥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方案》(1936)等著作，强调了资本主义导致阶级斗争，学校的责任就在于缔造社会主义国家以终止腐败现象。

在墨西哥谋求政治避难而后来被斯大林代理人暗杀的列夫·托洛茨基，在卡德纳斯统治期间特别是1938年宣告没收外国控制的石油工业以后，成了墨西哥革命的辩护人。托洛茨基把墨西哥列为正在发动独立战争的半殖民地国家。但他指出，墨西哥工人中占优势的不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参加民族资产阶级政府不应推论为社会主义。

到了40年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倾向于把墨西哥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少数“机智的”或者说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其著作我们将在后面研究）则宁可认为这场革命产生了新的综合物，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组成部分。

到了60年代末期，对历史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看来在墨西哥大学师生中日益得到承认，而拥护自由主义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则人数有所下降。尽管墨西哥有一批左翼小册子作者和辩论论文作家的悠久传统，但在过去20年间更大比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从该国基本上不满墨西哥革命进程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涌现出来。为了了解他们的思想，我们现在就研究他

们中某些较有影响的先辈和同辈的若干想法。

### 纳西索·巴索尔斯(1897—1959)

纳西索·巴索尔斯影响过墨西哥一些最重要的社会立法。这位法律学教授曾正式师事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奥·卡索<sup>①</sup>，并向自己的朋友、哲学家萨穆埃尔·拉莫斯和历史学家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学了很多东西。他出于为祖国服务的愿望而担任过许多政府职务，包括公共教育部长、内政部长、国库和政府贷款部长，以及驻英、法、俄的公使。

他是一位在法律哲学、政治体制、教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都有著述的才华横溢的分析家，为自己的著作和许多文章赢得了很大尊重，并且表明他在稳步地向左转。例如，1925年他曾拒绝历史唯物主义和卢梭关于人生来就好而只需要自由就足以证明的意见。但他不断分析墨西哥阶级制度的不平等，即75%的人被25%的上层所隔绝的现象，使他到了1932年终于倾向社会主义，不过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远。巴索尔斯在其讲话和写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但在担任教育部长的工作中却忽视了辩证方法。他卸任后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完全为之鞠躬尽瘁了。

到了1937年他为约翰·斯特雷奇<sup>②</sup>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西班牙文版作序时，已表现出他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情况称为“假民主”，并

---

① 墨西哥唯心主义哲学家(1883—1946)。——译者注

② 美国经济学家(1901—)。——译者注

认为自由对资本主义国家中 95% 的人是幻想。

巴索尔斯在其生涯的早期就断定，墨西哥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明智地分配土地给农民。在 1927 年他构想的土地法中，坚决捍卫了劳动者有根据墨西哥历史情况来裁决的权利。他赞成违反社会主义的村社（集体农场），把它看作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一个培养政治、经济和社会亲密感的核心，一块被迫离乡背井者可作归宿并克服其异化的地方。

巴索尔斯断言，缺少强大而有生产力的农村无产阶级，墨西哥就无法工业化，所以他主张生产资料从地主和外国企业家手里转到土地耕作者手中。这种见解后来对卡德纳斯统治时期进步的土地改革起了作用。

巴索尔斯认为，土著人是农业部门的骨干力量，是墨西哥社会的基本文化成分。他认为，保存印第安人的精神结构，同时引进科学的技术，墨西哥就能促进社会革命。他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得到种族上的平等待遇，就会加速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而有利于更公平的生产方式。因此他主张文化相互依存把它看作一种吸收新的进步思想的手段。

巴索尔斯认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特别是农村居民一向没有受到教育。他认为学校是制造集团或阶级差别与对抗的场所，以致妨碍土著居民参与墨西哥的生活。他建议从小学就开始用无私的社会主义思想来熏陶儿童，发展其对作为集体主义整体的国家的关心，培养出能使人们平等相处的墨西哥人主义。与此同时，他主张农村教育必须保持传统的民间传说、音乐、民间艺术、诗歌和舞蹈，并把本土的审美标准纳入墨西哥生活中。他不希望全盘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取代本国



文化。

巴索尔斯出任卡德纳斯手下的教育部长时，根据宪法第三条推行了一个社会主义化的教育纲领，使年轻的墨西哥人摆脱教会的影响，并在各级学校里传授“科学的真理”。他的教育纲领支持财富分配主义，剥夺了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对墨西哥的小学直到国立大学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巴索尔斯力图教育他的墨西哥同胞弄清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他把贝尼托·华雷斯<sup>①</sup>和米格尔·伊达尔戈描绘为不明确的革命运动的代表，说他们是在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指引下开始墨西哥社会斗争而没有认识到真正敌人的领导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内在弱点导致实证主义夺取了墨西哥，从而阻碍了真正的革命。

巴索尔斯起了一个对墨西哥革命的批评家的作用，他希望改变革命的方向来加强这场革命。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是这个运动的忠实支持者，总希望它能从改良的资本主义转变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他设想自己是一个献身于改组墨西哥的经济和主体政治的革命家。他断言，资本主义世界阻碍了墨西哥的发展，只有新的制度才能使其国家摆脱饥馑。

他强调墨西哥革命同俄国革命有关联，因为两者都是反对普遍剥削和阶级分裂的国际斗争的组成部分。他不赞成这样一种意见，即墨西哥革命自成一类而没有世界性联系。

巴索尔斯在 30 年代与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合作，

---

<sup>①</sup> 墨西哥民族英雄(1806—1872)，1858 年任总统后颁布“改革法”，墨西哥历史上称为“改革运动”。——译者注

办了社会主义刊物《未来》杂志，并创建了革命出版社。他还帮助西班牙内战中的难民进入墨西哥，其中许多人成了该国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

他认为，1938年的石油国有化是在土地所有权转入人民手中这一必然进程方面，以及在摧毁土地及其资源所有者的政治权力方面跨出的重大一步。他深感遗憾的是，到1940年墨西哥革命已经“之”字形地走下坡路了。为了帮助革命复苏，他致力于出版《战斗》杂志，用它来捍卫人民的切身利益免遭外国势力和后来靠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财致富者的侵犯。他还有鉴于守旧的修正主义倾向正在僭越革命，而依靠政治行动同盟的活动来加以抵制。他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发言反对法西斯主义，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组成部分，即既是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冲突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全都是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带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索尔斯坚持认为，美国除了把拉丁美洲看作其原料来源外，还打算把该地区的人力资源作为其力求控制世界的冷战的炮灰。他还指责美国榨取的脂膏三倍于它在墨西哥的投资，因而阻碍了墨西哥的发展。他认为美国控制了联合国，但他希望这个国际组织能发展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各新兴国家的密切联系，以便将来能共同努力反对美国的势力。后来他又主张墨西哥退出美国控制的联合国。

到了1949年巴索尔斯认为，革命党<sup>①</sup>领导的墨西哥革命

---

① 即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时称国民革命党，1938年改组后称革命党，1946年再次改组后称现名。——译者注

已停顿下来，因此两年后他帮助成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党，希望后者能重新激发他认为已被北部强邻扼杀的这场革命，并可能抵销由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而他认为是把拉丁美洲置于美国操纵的反共联盟之下的1947年里约互助条约<sup>①</sup>。

到1959年他逝世时，这位独立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已经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而且是社会主义宣传家了。他逝世时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始终尚未达到实现有效选举权这一基本目标的墨西哥革命已经消失了。

### 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1892—)

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早年读过弗洛雷斯·马戈恩兄弟的文章而获得对无政府主义的见识。后来他同阿根廷的阿尼瓦尔·庞塞亲近，说庞塞是实实在在为实现空想社会主义而工作的模范社会主义导师，并称其《教育与阶级斗争》(1936)一书是西班牙文同类作品中的重要著作。对马克思的研究曾使席尔瓦·埃尔索格短暂地加入过墨西哥共产党。同时，他既支持又批评了墨西哥革命，这是他作为外交家、智囊人物和活跃的经济学家与行政官员一直发挥的作用。

席尔瓦·埃尔索格尽管近30年来视力不断衰退，但他一直以极高的速度产出了学术成果。仔细考察其著作及其为亲手创办而受人重视的社会与政治评论杂志《美洲记录》所作的努力，就可以看出他一直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启发

---

<sup>①</sup> 即《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也叫《泛美联防公约》、《西半球联防公约》、《里约热内卢公约》。美国企图利用此条约从军事上进一步控制拉丁美洲。——译者注

手段来运用,因此与其说是他完全信奉的思想体系,不如说是他批判地分析问题的框架。

席尔瓦·埃尔索格的《社会主义思想》(1937)一书表明,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从伯罗奔尼撒战争<sup>①</sup>到墨西哥革命为止的演变有精湛的了解,并且探索了从原始部落时代历经封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各发展阶段的生产中的社会与经济关系(大庄园制和奴隶制)的作用。

除了撰写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外,席尔瓦·埃尔索格还钻研拉丁美洲和世界大事。他在这方面始终遵循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适应其历史沿革和地理条件的基本原理,但他总是把个别国家的问题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中来考虑。例如,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的工业化看作睦邻政策的直接后果,而认为睦邻政策只是用“白手套”取代“大棒”,形式变了而未变内容。他认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大多数国家进步的障碍,并预言这种局面将继续下去,直到资本主义变为“有能力废除商人血腥文明的新社会”。

他指出,美国力图控制拉丁美洲的事务和意识形态。他谴责美国及其美洲国家组织中的同伙借口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不民主而同古巴断绝关系,同时却对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右翼独裁者熟视无睹。他批评美国和肯尼迪政府的霸权主义在1961年入侵猪湾<sup>②</sup>期间企图推翻古巴,并对美洲国家组织竟

---

① 古希腊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的军事、政治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为争夺希腊地区霸权的战争。——译者注

② 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在古巴中南部猪湾的吉隆滩登陆实行武装入侵。——译者注

然一面谴责多米尼加共和国侵略委内瑞拉一面却纵容美国对古巴的行径感到惊讶。

席尔瓦·埃尔索格的生涯与墨西哥革命平行。他论述这场革命的文章指出革命未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也刻画出它的反资产阶级性质。在他看来，这场革命调整了而不是消灭了私有财产。他强调，1910年在反对迪亚斯声中追求权力的政治领导人没有较多地关心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未能接受阶级斗争思想，而人民则对改善生活条件较之完善统治制度与民主更感兴趣。按照席尔瓦·埃尔索格的想法，革命高潮很快就超过了原领导人的目标，于是穷人开始反对富人，即在宪法制定前的血腥岁月里农民转面反对地主。

席尔瓦·埃尔索格分析了墨西哥的社会阶级和工人运动，并断定1917年宪法的制定者是农民、工人、军人和不是受马克思而是受19世纪自由主义影响的专业人员。他们制定的是份人民的、支持农民的、民族主义的反资产阶级文件。他指出，这部宪法甚至连其中涉及劳工权利和地下资源的第123条和第27条，都接受了私有财产的观念，虽然地下产权属于国家，但大部分土地却归个人所有。

席尔瓦·埃尔索格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墨西哥思潮既不是独特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许多外国意识形态以及1857年宪法反映的社会解放<sup>①</sup>的产物。

象纳西索·巴索尔斯一样，席尔瓦·埃尔索格从墨西哥

---

① 墨西哥1857年宪法以当时的进步放任理论为基础，反映出限制政府职权，加强立法部门对行政的控制；强调个人首创精神，消除殖民时期相传下来的社团生活遗迹等特色。——译者注

革命中看到了为走向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他也认为卡德纳斯时代在独立方面带来了最大的进步。卡德纳斯实行石油国有化后，席尔瓦·埃尔索格作为墨西哥石油分配办公室主任，于1939年5月到1940年8月把他关于国家控制工业的主张付诸实施。在他看来，石油归公标志着解决人与人不平等问题的重要一步。他希望此举将导致墨西哥全国财富的合理再分配，而使该国人民至少能吃饱。

席尔瓦·埃尔索格断言，从1938年起墨西哥革命已由新的资产阶级篡夺，但尽管如此，墨西哥已从封建主义转到了前资本主义经济，而他认为这种经济是一种新的综合物。当墨西哥革命党在1946年改名为革命制度党时，他断言制度化的运动不是革命的，它的结构和上层建筑一直没有改变，只是一个社会阶级在政权上取代了另一个社会阶级。墨西哥所发生的，不可能既是革命又是制度化，因为前者意味着不断进行改造，而后者则至少是指改革现行结构。席尔瓦·埃尔索格认为墨西哥革命已经完结。

他认为革命热情衰退是由于缺乏维持热情的意识形态，所以到70年代他把这一运动评价为未遂的反资产阶级革命。他指出，墨西哥的左派分子往往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墨西哥革命的原则同社会主义思想混同起来。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给工人支付优厚的薪金，另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遵循救世主的根本教义，还有人则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社会化。席尔瓦·埃尔索格意识到，连最有教养的墨西哥人也不懂得整个马克思学说，也就是说，对社会主义以及墨西哥革命的理解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象他的朋友纳西索·

巴索尔斯一样，他深感遗憾的是，他对墨西哥革命所寄的希望始终不曾实现。

尽管差别悬殊的墨西哥左派没有把墨西哥革命转向社会主义，但席尔瓦·埃尔索格仍然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继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路子。他始终认定墨西哥的思想家有责任发挥社会建筑师的作用。他要把成分众多的墨西哥融合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去奔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以消除痛苦、灾难和非正义，而这种热情从来没有消退过。他一直指出，墨西哥要达到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准则还要走很长的路。同时他也指出，古罗马时代的人道主义和耶稣的教导是墨西哥的社会精神中所固有的，但其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也看到了柏拉图的影响在墨西哥形成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国家和社会的正义观，但他始终告诫不应把这曲解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因为墨西哥国家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席尔瓦·埃尔索格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从事体力劳动的手工业工人、武士和统治的哲学家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勾画了它同当代墨西哥存在的情况的类似点。他还指明了墨西哥国家和柏拉图的共和国都容忍私有财产，尽管希腊人是以平等为基础来规定私有财产的。

席尔瓦·埃尔索格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因而使他相信墨西哥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社会存在。他一直不断地断言，人类之所以进步实质上是由于有足以支配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思想并使这些力量为人类服务。他认为在墨西哥，鼓励牟取私利的资本主义已把人变为无须关心人类进步的市侩。但他坚信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

静止的，一切都在变，历史之所以存在就因为人们及其行为在不断变化。他预见到，资本主义既然有过发展并且代表着一个单独的历史阶段，那么它的矛盾也终将导致它让位给社会主义。他一直说明历史是站在人性一边的，而剥削的资本主义最后一定会灭亡。

席尔瓦·埃尔索格在形成其世界观的过程中，相继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对不平等的发现、从救世主身上、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以至从现状入手，探索了共产主义的要素。他考察了马克思以前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渊源，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已懂得经济的重要性，但仍强调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集一切之大成而发明了对历史作经济的解释。

席尔瓦·埃尔索格断言，马克思主义肯定了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支配地位，却并不否认政治与法律等其他影响。他一直批评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和反共论调，并始终要求明智地区分社会主义及其不同形式。他坚持认为一切社会主义理论都有两个要素，即它们都是未来的力量和以和平为目标。我们说明席尔瓦·埃尔索格如此频繁地提到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多样性，便可从中注意到他是一直不同意列宁表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名言的。在他看来，墨西哥始终可以作为一个主要实例来证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往往是最初阶段。席尔瓦·埃尔索格始终带有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而力图使其同胞相信墨西哥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获得更大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权，以便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古巴革命领导人和思想家切·格瓦拉在起草古巴国有



化法规时，曾经期望从埃尔索格那里得到启示，这是对他的远见卓识的赞扬。

### 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1894—1968)

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十几岁时受到古希腊民主和墨西哥1910年代人的思想激励，曾师事安东尼奥·卡索并从卡索那里获得了有关亨利·柏格森的人道主义的直觉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知识。他于1925年访问了美国，并在那里采购了他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回国后获得了一份与分配土地给农民有关的工作。这一岗位使他得以看到墨西哥革命的许多目标已被控制它的腐败政客和有产者忘却。这段经历培养了他对工人阶级的兴趣，并使他成了主张进化的社会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追随者。

隆巴尔多读过阿根廷社会主义者胡安·胡斯托的著作，认为胡斯托是南美洲马克思学说的主要阐释者，并从后者那里获得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国际主义与热爱祖国按社会主义的道理是一致的，因为工人就是国家。他从胡斯托那里懂得，每一个民族都有两个祖国，即被剥削者的祖国和剥削者的祖国；工人属于真正的祖国，即大多数贫苦人的而不是少数养尊处优者的祖国。

隆巴尔多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行家，写过许多书籍、文章和小册子，创办过期刊杂志，还领导过政治组织，这一切的主要注视中心就是阶级斗争。他那想象力丰富的头脑还癖爱哲学。例如，隆巴尔多在同安东尼奥·卡索就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进行大张旗鼓的辩论中，科学地表明了唯心主义者如何借助宗

教和形而上学。他的著作强调，依靠辩证唯物主义，人类就能利用自然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通过了解历史进程，人类就能开创使社会转入先进阶段的可能性。

隆巴尔多后来抛弃了他早期的信念，即人类不能跨越生物界和无生物界之间的鸿沟，而终于认为空间、时间和物质的统一是科学能够阐明的人类奥秘的组成部分。他断定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有相互关系，满足一种需要就会连带使另一种需要获得利益。

他强调，多亏米格罗·乌纳穆诺和何塞·奥尔特加一加塞特才在墨西哥一直大行其道的存在主义是害怕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方便的出路。他还认为实用主义只是假定理性不能处理一切问题而行动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方面，所以斥之为反理性主义的变种而加以否定。他决不相信这样一句格言，即“如果想不出来就设法做出来”。他认为资产阶级哲学在与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斗争中日益依靠唯心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并坚持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否认理性是获取知识和进步的手段，就是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忙。他特别指责阿图尔·叔本华大肆兜售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并把弗里德里希·尼采和梭伦·克尔恺郭尔<sup>①</sup>列为主要反动思想家，因为他们否认进化的发展而强调基督的救助。

隆巴尔多在政治上主张“人民民主”，即以不同集团的代表为基础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政体，它最后将导致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和大地产在农民中分配。他在《莫斯科还是北京？》(1963)一书中试图向墨西哥人民说明他的一些想法，其

<sup>①</sup> 丹麦唯心主义哲学家(1813—1855)。——译者注

中表达了一种涉及从自然规律到发展原则的整个生活领域的哲学。他通过描述各阶级在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中的矛盾分析了墨西哥的阶级阵线。他阐明了墨西哥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以揭示物质对于政治敏感的关系而表明自己的世界观。

隆巴尔多把墨西哥革命看作19世纪独立运动和改革运动的继续。在他看来，1910年的巨变打击了奴隶制、封建主义和外国人对国家财富的过度开发。他在20年代初把墨西哥革命解释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但又逐渐领会到它只是充斥看社会主义词藻的资本主义运动。他认为，墨西哥革命的民族主义是真心实意的，但被曲解了，因为该国控制在一些外国人和以利润为主要目标并把为群众的幸福而斗争的社会主义者污蔑为卖国贼的本国人手里。

他赞扬这场革命强调墨西哥的文化传统和印第安人主义，但也承认墨西哥从西班牙接受过来的遗产。他强调，民族自豪感抗御了美帝国主义，防止它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毁灭墨西哥。

他指出，墨西哥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有时民主行事而代表了大多数，有时却屈从外国压力。他承认，墨西哥革命拆散了一些庄园、分配了土地、兴修了灌溉工程，并把一些工业和公用事业收归了国有，但在外国人阻碍民族资本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名义下，依附性在加深而腐败的头领控制则比比皆是。他终于选择了既支持革命政府的积极而，又批评其消极而。

隆巴尔多把工人阶级看作墨西哥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并认为工会应是革命的焦点。他借鉴他所认为的中国经验，

在后来的岁月里号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没有支配生产资料的一切人在其人民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工人阶级是“墨西哥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它必须同民主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以实现民主。他不相信无产阶级凭自己就能产生觉悟来实行重大的变革。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尺度来衡量，他对工人阶级的构成抱的是资产阶级的看法。他声辩薪金比较优厚的医生、教师和律师应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并以断言他们的思想由其忠诚而不是由其收入决定来作为辩解的理由。

隆巴尔多总是遵循列宁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见解，把集体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看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帝国主义，它引起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导致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磨擦，引起殖民地反抗支配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信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引起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原理，但在战后年代里，他却坚持认为时代与情况变了，包括资本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大多数想要和平，因而他们努力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冷战期间隆巴尔多接受了俄国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的观点。他根据这样一种想法，即各国经受不住会使它们互相毁灭的战争，因而赞成共处的主张。

在《门罗主义与工人运动》(1927)一书中，他第一次在印刷物上讨论了帝国主义。他指出，门罗主义已从19世纪的保护性手段变为在20世纪支持干涉的手段。他把西班牙同美

国的战争确定为美国资本支配拉丁美洲的开端，并且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拉丁美洲实行更大的支配。

他接受了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标准解释，即由外国资本实行经济支配而不是领土控制。按照这一定义，他把美国称为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其政策的目的在于防止拉丁美洲自主。这一观点使他提出了一个近似安德烈·贡德尔·弗兰克很久以后才明确表述的“不发达中的发展”概念的依附性理论。

在隆巴尔多看来，印第安人和土地使用权问题是与外国经济侵入并列为墨西哥最重要的问题，而且他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在《印第安人问题》(1973)一书中指出，原先的村社土地和地下资源属于人民，而当前需要把印第安人纳入村社，需要新技术使印第安人的私人生产更有效益而较少滥用天然资源。他还指出，需要在印第安人村社进行灌溉和重新造林、实行农业多种经营、建立生产和销售合作社和禁止强迫劳动。

他的印第安人规划以墨西哥存在的阶级斗争源于殖民地依附性而非种族问题为由，抵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坚持认为，让西班牙语在墨西哥全境占支配地位势必破坏土著文化，要使印第安人明白自己如何受剥削而无须破坏其生活方式，他们在自己的方言之外还应授以基础西班牙语以免受人欺骗，他们需要消灭无知而不是消灭文化就能使之懂得自己如何受资本主义影响。象秘鲁人马里亚特吉和卡斯特罗·波索一样，隆巴尔多说明人们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本国现实。

隆巴尔多对多民族问题采取了苏联的立场。他想把各地区既变为无产阶级管理的生产中心而又不损害其民族文化，认为民族文化能通过教育与社会主义协调起来。他认为，1910年革命的一大优点是振兴了墨西哥的民族主义，使其力量见之于多样性中并作为一股反对外国影响的势力而发挥作用。他主张把地区政治单位调整为一些同种族的集团，并给它们以政治自主权，从而消灭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30年后使人们普遍认识到的内部出现的殖民主义。隆巴尔多建议开展一个反对大庄园制的全国性运动，它包括培养对土著人社会与文化完整性的尊重，以及使全国认识到保留印第安人文化能使国家富强。

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隆巴尔多认为墨西哥革命是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反帝的、改良主义的，但不是搞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村社制是波菲里奥统治时期的庄园在现代的变体，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按隆巴尔多估计，墨西哥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广泛变革，只有通过有文化的少数人进行社会主义再教育和对没有文化的多数人实施新的教育规范才能实现。他承认，殖民地时代教会指导下的教育也许曾灌输过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但随着基督教的制度化，它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支柱。因此基督教的布道在墨西哥被用来为阶级关系中的现状作辩护。在无神论者隆巴尔多看来，社会正义有其经济基础，而教会却赋予它以道德基础。他把墨西哥的斗争看作教会对抗国家，而不是革命反对宗教。他还认为宗教是墨西哥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劝告社会主义者不要直接攻击它，而应持

这样的想法，即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影响必将消失。

他认为，教会支配的殖民地教育已由改革时期的实证主义教育所取代，并把这一哲学维持到整个波菲里奥统治时期。他认为，墨西哥革命在推翻了波菲里奥统治以后，面临着使教育世俗化和把它改造为科学解释方法的任务。他认为这样一种教育制度由于墨西哥的大学教育专供特权者享受而不能自上而下地产生。他断言社会主义教育必须由宣传捍卫自身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纲领的教师工会产生出来。

隆巴尔多强调知识分子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责任，并批评文人们不愿为之牺牲财产或生命而往往寻求眼前的解决办法。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反而指责他太资产阶级化，而且他本人也并不肯舍己为人。例如，政治科学家约瑟夫·斯塔罗宾于1949年12月在墨西哥同隆巴尔多一起出席一次和平会议后，断定这个墨西哥人野心勃勃，靠同墨西哥政府的关系过日子，但在关于左派如何能有所得的问题上，他比墨西哥的共产党人更加现实主义。

隆巴尔多屡屡不同意墨西哥共产党的观点，后者称他为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不接受这一指责。1935年共产党人由于不相信资产阶级社会能实现社会主义教育而批评墨西哥宪法作提供这种努力的修改时，隆巴尔多同共产党的争执这到了最高点。他原则上同意修改，却认为教育能够以社会主义方向来帮助树立无产者的阶级觉悟。他坚持认为，该党的不妥协态度象征着左派的派别活动，它妨碍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墨西哥被接受。隆巴尔多抨击了共产党缺乏思想准备和没有千方百计解决墨西哥工人阶级特有的问题。与此同时

他批评了托洛茨基分子是制造分裂的宗派主义者，以致托洛茨基把他叫做资产阶级政治的肤浅爱好者。

在《隆巴尔多·托莱达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1966)一书中，赫拉尔多·温苏埃塔探究了隆巴尔多学说的基调。该书表明了隆巴尔多的思想如何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例如，隆巴尔多曾经期望，墨西哥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以某种未能解释的方式，从该国的社会现实中出现。他不时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哲学能带来社会和政治变革。他有时对作为实现变革的必要步骤的群众革命活动表现得几乎没有兴趣。温苏埃塔把隆巴尔多描述为在应用马克思学说于墨西哥方面犯有主观主义，并把他的社会主义人民党<sup>①</sup>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以与共产党的非法马克思主义相对照，而且指明隆巴尔多及其社会主义人民党愿意通过墨西哥政府进行合作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工人阶级的。

维克托·阿尔瓦认为隆巴尔多的马克思主义是抄袭的和没有政治分析的，并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在墨西哥的官僚主义学派的大师”。不过，他的人民党曾首先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即国家官僚机构的某些政治自主权已落入资产阶级手中，但这并无损于墨西哥的执政党，这一论点后来被人民党的继承者社会主义人民党抛弃了。

隆巴尔多标榜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受到思想界同行的批评，尽管他同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都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但他仍继续认为他能把墨西哥的左派团结起来，并能在人民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旗帜下随时设法领导无产阶级取得政

<sup>①</sup> 托莱达诺于1948年6月创建人民党，1960年10月改此名。——译者注



权。到了他的晚年，社会主义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毕生支持俄国革命的隆巴尔多开始认为，中国革命特别是它的土地纲领更适合缺乏工业化的拉丁美洲。他称颂中国和卡斯特罗的古巴已经达到人的尊严，但仍认为墨西哥还得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的名字在墨西哥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仍然引起争论，学者们觉得难以把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归类，但一致认为它是非正统而有灵活性的。不过，他是墨西哥工人阶级和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的成功的组织者、人道主义者和谋求和平的积极分子。他提倡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自决与政治民主，并认为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联合起来，与国际工人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就能在拉丁美洲达到社会正义。

### 阿隆索·阿吉拉尔·蒙特韦德

新左派经济学家、政治行动主义者阿隆索·阿吉拉尔·蒙特韦德一向把马克思、列宁、毛、托洛茨基和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添加进一种牢固的历史意识，这在他的《拉丁美洲发展的理论与政策》(1967)一书中可以明显看到。他赞成自己的同胞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的意见，即墨西哥革命已开始由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支配，后者一直企图避免资本主义固有的暴虐，但没有做到。阿吉拉尔尽管有时动不动就争论，但作为新时代出版社和《战略》杂志社的社长还是博得了很好的名声，该杂志一直代表了1920年前后墨西哥革命起义阶段已告结束而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在墨西哥得到巩固的那个时期的观点。

阿吉拉尔对墨西哥经济的广泛研究(着重那里的外国投资)使他断定,墨西哥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亏,在那里有着与强大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积累过程。他发觉,掌握经济的本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因而始终依从外国人的摆布。他认识到,墨西哥的统治阶级最近公然吹嘘要反对依附性,但它是从属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他坚持认为墨西哥存在着一个同国际资本结盟以求得其技术和追随其工业发展的统治阶级。

阿吉拉尔强调墨西哥具有一种资本主义的混合经营的经济,而且他擅于提出经济补救办法。他总以为他的经济措施一旦成功地施行,就会缓和该国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他认为,墨西哥不应再依重外国资本与外国经济思想,而必须集中建设本国的工业,并且必须抛开劳尔·普雷维什所提出的经济一体化思想和制定的计划,因为它们都是用来迫使墨西哥接受外国资金的手段。他主张尽量减少同美国的联系,因为后者从1889年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sup>①</sup>创建泛美联盟以促进美洲各国贸易直到现在,对墨西哥的政策一直基于侵略阴谋。他在《从另一方面看门罗迄今的泛美主义》(1968)一书中说明了这一意见,而在《拉丁美洲与争取进步联盟》(1963)一书中又加以论证,并把争取进步联盟描绘为既阻止左倾又使拉丁美洲在经济与思想上依附美国的巧妙办法。阿吉拉尔指控美国操纵的美洲国家组织所搞的泛美主义,主张拉丁美洲的方针是要摆脱其北方强邻而面向非洲和亚洲,他坚持认为这两洲才关心真正的发展。

<sup>①</sup> 美国国字活动家(1830—1893),1889年任国务卿时曾建议召开第一届泛美会议。——译者注

在国内政治方面，阿吉拉尔向来承认墨西哥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有时节制了非正义，减轻了剥削，缓和了冲突，建立了政治秩序，而这都是为了维护政权和现行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在他看来，这场革命始终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反封建步骤。它改革了农业并使之现代化，使一些资源有可能开发利用，把更多的资本集中于国家，实行了制度与规章的改革，使经济现代化，改进了教育和政府管理，对群众作了一些让步而主要是改善了小资产阶级的命运。

阿吉拉尔在他和豪尔赫·卡里翁合著的《资产阶级、寡头集团与国家》(1973)一书中指出，1910—1917年间，一部分曾在波菲里奥统治时期(1876—1910)墨西哥经济与外国势力紧密联系之际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资产阶级，重新接管了政权。这一批民族主义和反帝的新统治者曾经一度(1920—1940)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方面转移，以使公营企业为私营企业服务，并短暂地限制了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但很快又同国际资本建立了联系而脱离了任何社会主义倾向。此外，新的统治者还使用所谓革命形势下的“民族团结”的骗人话，成功地反对了阶级斗争。

阿吉拉尔相信，革命制度党及其墨西哥国家考虑到，要保持秩序就必须平息阶级斗争，其办法不外乎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把国内问题归咎于不公平的分配，并断言这是能够纠正的。阿吉拉尔声称，事实上是阶级斗争制约了发展进程，阶级斗争若得不到解决，分配问题必将继续存在。他强调，墨西哥的主权理论上属于人民，但墨西哥革命已把它给了一个把国家当作取得权势与资金的靠山而基本上以独裁方式行使职能

的官僚主义中产阶级所控制的政府。阿吉拉尔预料，权力集中在不主张根本变革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手里就会有很大危险，甚至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

阿吉拉尔认为，不管墨西哥革命引起了一些什么变化，其中大部分已被葬送。他主张对这场革命作出无产阶级的抉择。他看到这场革命的精神没有消逝，“仅仅过时”和不够革命，或者说缺乏动力。他指出，资产阶级已经推翻了旧寡头和改良派与反动派，而且控制了生产资料并保持着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密切联系。因此墨西哥有其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他不把资产阶级看作顽固不化的阶级，因而对未来的变革抱有希望。

阿吉拉尔是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气质的新左派思想的代表者，总想通过真正的革命来推翻墨西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政权，即消灭国家资本主义，其手段是大力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革命方面，坚持不断革命以建立一个基于直接民主而极少官僚控制的政府，让工人管理工业、学生管理学校，寻求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灵活道路。

### 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1922—)

在当代墨西哥得到最广泛承认的思想家之一是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他在被培养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期间就阅读了马克思、列宁、毛和乌拉圭人罗德内·阿里斯门迪的著作，随即在著名的法国学者费尔南德·布劳德尔的指导下写了哲学博士论文。布劳德尔是历史编年学派的成员之一，该学派贬低政治记叙的重要性而强调分析长期的结构与趋

势。后来冈萨雷斯·卡萨诺瓦作为墨西哥大学直言不讳的政治社会学教师很受尊敬，在该校主持过社会研究所，担任过政治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因能同激进学生交流感情而在60年代末的骚动日子里被任命为校长。

多年来冈萨雷斯·卡萨诺瓦一直受到各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主要不同意他的非正统观点。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象其他一直追随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一样，他始终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黑格尔主义的倾向，强调其浪漫与空想的方面，赋予它以更大的存在主义的而不是经济的重要性，并集中注意于异化而不是生产率。他有时把墨西哥看作两重性社会，其中由一个多元的统治阶级不受外部影响而独立作出决定。因此他分析墨西哥的发展经常使用扩散主义而不是依附性的观点。他可以被称为“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其著作揭示了一切制度中固有的矛盾。

他一直主张社会科学家进行创造性综合，把新方法与旧方法结合起来，并适应新的形势。例如，他始终强调社会科学和法律科学向来持有一种以欧洲政治经验为依据的思想来研究墨西哥社会的倾向，并把这种倾向叫做智力殖民主义。他一直为马克思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之间更广泛的智力合作而努力，但对这种合作的发展始终不抱太大希望。他一直受到惯于把资本主义制度孤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经验主义社会学家的批评，而他则始终极力主张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再把目前的社会主义时代置于其资本主义的过去背景下来考察。他认为那两种立场都过于极端，而两种思想方式的代表必须取得一致意见而不再谈论对方。他反对许多社会科学家使用的

经验主义的假严密性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

冈萨雷斯·卡萨诺瓦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往往不了解资本主义和生产力都已经变化。他主张提供一个定量模式来导致一种现代的和以经验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他对剥削的社会学研究中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排除了剥削是剩余价值对劳动价值之比的旧概念，并表明比例因情况而变化，所以必须研究有关情况才能懂得关于剥削的社会学。他还批评了墨西哥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经常把阶级与社会阶层的概念用于对社会的内部研究，而没有把它同国与国的冲突联系起来，反倒把殖民主义的概念只用于国与国的关系中。在《墨西哥的民主》（1965）一书中，他说明了两者如何相关联。

在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看来，马克思最有独创性的贡献是他用分析人与人的关系来理解剥削的方法。但他指出了马克思那个时代所有被剥削者生活在最低限度的活命水平上，而今天许多被剥削者的生活却超过了最低的极限。他坚持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识别不同类型的甚至可能超越了阶级界限的剥削。他指出，剥削既指经济成果的分配，也指参与生产过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冈萨雷斯·卡萨诺瓦指出，拉丁美洲统治阶级的民主纲领一向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有一种纲领建立了民主政权而不对工人阶级或者不在生产或资本积累方面作出让步。这源于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对经济实行更大干预的思想，它意味着不再由人民而是由国营企业更多地参与经济。他解释说，这是宣扬民主没有社会正义或民族解放也能存在的保守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

他指出，拉丁美洲争取民主的斗争历来就是争取独立、社会主义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独当一面而又与之有联系的力量。在他看来，古巴是拉丁美洲第一个争取一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另一种社会类型和真正的结构变革即社会主义和再分配的范例。到了1979年，他不再认为墨西哥的经验是革命的，面也许只是一场争取民主的战斗，但决不是争取新社会的斗争。他在考虑该地区的革命前途时，承认有两大派在从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一派认为必须为民主面战才能转向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另一派则坚持必须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墨西哥革命的问题上，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的非正统社会主义观点最为鲜明。例如，他把这场革命的经济列入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起飞”阶段，但自相矛盾地坚持认为墨西哥的统治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有政治上的认识。在他看来，墨西哥是在用通行的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和结构来设法发展其阶级分裂的社会。他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研究现存的落后结构而不是通过遵循纯净的思想体系，来找出解决当今各种问题的办法。他为墨西哥制订的目标是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而这得经过一个福利资本主义的阶段，其进程由国家指导，并设法减少操在外国手中的国内剥削现象。他认为，“只要墨西哥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充分发展，国内没有肃清殖民主义，就会保留一党制，两没有建立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和进行纯粹阶级斗争的条件”。

在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看来，一党制的政治制度近似墨西哥革命前的军人统治。在墨西哥，公正立宪只是理论而不是事实，因为权力不是分享的，而归于革命的领导人。但尽管

如此，他认为这场革命毕竟保持了和平，建立了得到政府帮助的混合经济，并且增强了墨西哥同美国及外国公司谈判的力量。在这几点上，他同意其夫人的叔父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的意见，后者认为政府象这样的所作所为是能够加速发展和独立的。

按照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的意见，整个卡德纳斯时代直到1940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结成了反对地主贵族和外国企业的联盟，以终止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而开始资本主义发展的国策。但1940年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却与外国资本家联合起来，着重于制造业并把城乡劳动者同化过去。他赞成马克思的看法，即“统治阶级越能把被压迫阶级最优秀的人员吸收过去，其统治也越顽固和危险”，而且他对墨西哥政府同化可能的革命者的巨大能力是了解的。

从根本上说，冈萨雷斯·卡萨诺瓦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同意老左派把墨西哥革命归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运动，其中工人阶级努力追求的是民主的民族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而且必须首先完成前一过程才能开始后一过程。为了证明这场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革命是未完成的，他列举了政府违背宪法、执政党具有独裁性质、总统专制和工会与农会办得不民主。在他看来，“只有人民分享收益、文化和权力，才有民主的存在，任何别的东西都是民主的市井之言和空话。

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告诫外界的观察家，不要被有教养的墨西哥人经常表现为突然左倾的现象所迷惑。他指出，在墨西哥连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某些影



响,许多大学生都经历过激进的积极行动主义时期,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动听言辞通常来自中间阶级而不是下层阶级。

他认为墨西哥的领导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足以组成一个阶级,只要国内仍有殖民主义存在,这种情况必将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缺乏阶级觉悟,尽管其言辞激进,却是改良主义的。他同意切·格瓦拉的看法,即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已通过某种民众对话的形式,不论其是否骗人而上台执政,并且保持着法制的门面;在这种情况下,古巴式的起义由于当地非暴力斗争的潜力尚未用尽而行不通。

尽管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对60年代的乐观主义已经减少,但他仍然赞成农民、城市工人和国营企业结成联盟,以完成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革命。这一论点的反对者强调,国营的资产阶级大都蜕化为政治与军事官僚,而不想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他提出政治革命的性质没有完成的论调,是因为这场革命既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治理的必然形式是民主,而他却否认墨西哥有民主存在。

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同墨西哥当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由于篇幅关系不能详细分析)相吻合。例如,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在若干论点上同著名的作家、政治行动主义者何塞·雷韦尔塔斯(1914—1976)意见一致。他们都寻求一种方法来说明人类如何能达到更高度的觉悟和如何向墨西哥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灌输更有创造性、更没有束缚和更少教条主义的态度。他们都看到了墨西哥革命的

突出弱点，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使帝国主义得以盛行的波菲里奥统治时期的实证主义思想体系。在他们看来，墨西哥革命缺乏改组社会所必需的明确而有条理的思想体系上的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这场革命没有出现任何无产阶级领导者。他们怀疑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与外界隔绝的迷宫》一书中对“墨西哥精神”的高度评价，断言它使不民主的选举和一党制的国家合法化，从而突出了墨西哥政治上采取异端的虚假形象。在他们看来，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阶级斗争而维护了阶级调和。

#### 鲁道夫·斯塔文哈根(1932—)

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墨西哥激进思想家主要关注的问题，在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的年轻同事鲁道夫·斯塔文哈根所写的几乎传奇式而有辩证法倾向的《关于拉丁美洲的七个谬论》一文中也都涉及到了。得益于巴索尔斯、席尔瓦·埃尔索格、隆巴尔多·托莱达诺、阿吉拉尔和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的著作，斯塔文哈根所讲的七个谬论如下：

一、他不接受这样一种理论，即拉丁美洲各国是“两重社会”，指既是封建的又是资本主义的。他断言它们并未被综合起来，并且象冈萨雷斯·卡萨诺瓦一样，着眼于国内殖民主义来说明它们的发展。

二、他不考虑这样一种扩散主义理论，即通过把工业产品传播到落后地区，进步就将在拉丁美洲出现。他坚持认为进步出现于城市地区是以牺牲内地为代价的，使内地失业人数增长，本地手工业则由于用现代方法制造的商品进入而被摧

毁。而且，现代化造就了新的经纪人阶级，他们从不发达地区吸取资本，从而造成这些地区同发达地区的贸易逆差。

三、斯塔文哈根否认这样一个前提，即古老的传统农村地区的存在妨碍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斯言，资本家阶级从来没有设法使农业多样化以满足国内市场，使原料转归本国使用，使工业化扩大，使农业得到再投资，或者使外国投资受到严格控制，以及使进口商品和生产非必需品受到限制。

四、他怀疑这样一种意见，即民族资产阶级对破除地主寡头的权力感兴趣，而指出这两种人经常在分享农业、工业和金融上同等的利益。

五、斯塔文哈根反对这样一种意见，即拉丁美洲的发展是主张民族主义的、进步而有生气的中产阶级的创造，拉美各国政府应竭力鼓励这一阶级。在他看来，“中间阶层”支持有统治权的权贵并力图加入其行列。他坚持认为，中间阶层的增长无助于解决拉丁美洲的重大问题，反而经常拖延了问题的解决或者加剧了冲突。

六、他谴责这样一种见解，即拉丁美洲的民族结合向来是人种混杂的结果，其理由是走向种族上更划一的社会并不改变阶级结构，真正的民族一体化要求每一个人有相同的价值和机会，而这种情况是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不希望发生的。他还断言，赞成人种混杂的人经常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致力于“白人化”即让印第安人逐渐绝灭。

七、最后，斯塔文哈根觉得这样一种意见是荒谬的，即拉丁美洲的进步只有依靠工农实现其利益一致的联盟才有可

能。在这一点上他背离了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和正统左派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联盟在历史上从未出现于拉丁美洲。例如，在土地改革属资本主义性质的墨西哥，农民已成了所有者。他还说明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经常不一致。例如，土地改革往往意味着向城市提供更少食品和为城市发展提供很少资金。城市工人得到的好处，比如增加工资，经常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他断言，农民革命意识的增强与其地位上升的可能性成反比，农民如有更多机会去城市，就更少可能热衷于政治。

斯塔文哈根所讲的“七个谬论”包含的问题全都同墨西哥革命有关，而且牵扯到我们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努力使墨西哥的民族主义利益同墨西哥革命分开或者协调起来而没有成功之后，便情愿相信革命，而只是在某些实质性问题上还有看法上的一致。我们这些思想家一致认为，大地主、农村商业资产阶级和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结合起来，在墨西哥形成了新的全国性权贵，并已产生了一种使村社小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工人一直遭受苦难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制度。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看来，新殖民地统治的现行制度从属于整个墨西哥经济和外国垄断集团。墨西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代表大部分宗派主义观点）认为，对外国势力的依赖加强了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也乐于相信，这足以使统治阶层越来越容易受到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压力。

#### 阿道弗·希利

我们分析过的墨西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向来表现出大量

的独立思想、非正统观念和革新意向。也许在结束这一章时，还应当提一下新左派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和政治行动主义者阿道弗·希利的著作。希利是阿根廷人而选中了墨西哥，他对墨西哥历史的分析在许多方面表明，他具有其墨西哥同伴们的著作中所表现的同样灵活性与创造性，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同他一样对理论与实践作出了贡献。

希利的《被中断了的革命：论1910至1920年墨西哥争取土地与政权的农民战争》一书写于1966到1970年他和一些托洛茨基主义同伴因违反墨西哥社会取缔法而被监禁期间。这部著作寻求对墨西哥历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希利提出了对墨西哥革命的三点解释：(1)按照他的“资产阶级看法”，它从1910年起就是一场改良主义运动，是在各届政府期间经历了发展有慢有快的不同阶段和多次中断的连续过程。在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看来它是延续不断的，但希利却否定地把它看作永远中断了的革命。(2)他还宣称这场革命可以归为有社会主义外表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如果是这样，那么1910年的大动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即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摧毁地主寡头的权力和消灭帝国主义这一目标。因此必须有另一场革命。这一解释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驳倒但斯大林使之再生效的民族社会主义理论。这种解释首先想到的是用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来适应墨西哥的条件，就象俄国、中国或古巴发生过的那样。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解释，就必须断定墨西哥革命已成了民族倾向和国内权贵的牺牲品，从而降低了其原来的目标。(3)希利还认为墨西哥革命可解释为已被中断了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运

动。这个他最得意的解释认为，起初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发出了对土地的威胁和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威势。但这场革命变成了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操纵。它在1919—1920年、又在1940年以及其后都中断过。在这方面希利应用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把墨西哥革命看作已经消逝。经济发展继续下去，而社会发展却未继续。在这种解释中，他认为新政权不稳定，并且指出用完全的专制来取代新政权的多次尝试终未得逞。因此，他称之为“波拿巴主义和过渡性的”已确立的统治者总有一天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与此同时，希利赞成墨西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看法，即坚信墨西哥盛行的官僚政治已兼并了农民革命的部分，以便对它加以控制。在对墨西哥革命的这种解释中是有矛盾的，即一方面希利非常乐观，但另一方面国内的官僚政治在权力很大的总统以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成分的引导下仍继续加强实力，而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墨西哥工人正在获得权力的迹象。

希利对墨西哥革命的互不相同的看法，连同他的同志们对这一运动的杂七杂八的解释，以及他们的各种理论中仍然没有解决的矛盾，都证明了墨西哥社会主义思想的多样性。这种情况最好用一句话来表达，即“各自看待自己的革命”。

## 第十章 古 巴

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无知。他们从来都非常习惯于向自己提出外国的问题，并且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而不知道自己缺乏接受革命的思想挑战的准备。一旦革命的现实在他们眼前爆发，而且具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的极大威力时，他们便开始在原来的怀疑态度与新的热忱之间摸索了。

——安布罗西奥·福尔内特

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开辟了阶级斗争的新战场，它的思想方式对于动员群众参加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在古巴革命之前，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就已经有人通过民众主义运动和一般非暴力的改革运动来谋求变革，例如玻利维亚的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危地马拉的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和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委内瑞拉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等等。但所有这些人的努力，都缺乏思想体系，也未能依靠工人阶级来进行有意识的自我调节。尽管他们都推行过某些对工商业的国家控制，并且力图减少对外国列强的依赖，但他们既没有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

没有消灭私有财产，因而不是最终成为反动势力的牺牲品，便是终于未能实现他们有可能实现的改革。

然而，以游击队起义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革命大概念中的组成部分作为手段之一而开展起来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运动，却达到了上述各种改革尝试所提出的许多目标。古巴革命如何打败了美国支持下的政府，并且建立起了一个如此靠近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古巴看成是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榜样，而且认为古巴的社会主义虽然和马克思所预想的不同，但在当今也许比这位德国学者的想法更为适用。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赞成游击战是人民斗争的一种形式，但他们并未象古巴人那样把它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联系起来。虽然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即先锋队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并指出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是不成熟的、缺乏准备和没有政党领导的革命的例子；而且恩格斯也指出过，由于统治阶级用新的作战方法完善了自己的武器和训练了自己的军队，从而决定了武装暴力行动所必须具备的水平，而这是要取得胜利的革命政党所必须加以克服的，可是卡斯特罗及其同志们却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错了。

古巴革命并不是从思想真空中产生出来的，它有许多先驱。早在1868年古巴的克里奥耳人反抗西班牙时，就有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在这个岛上出现，为首的是萨图尼诺·马丁内斯，他曾经成功地组织起一个烟草工人工会。古巴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由于城市工人对这个国家的实证主义者



上层人物不再抱有幻想，因而获得了一批人参加。这个运动一直活跃到 1925 年，由于当时的总统赫拉尔多·马查多<sup>①</sup>监禁和杀害了它的领导人才被迫解体。

与古巴的无政府主义者求生存而斗争的同时，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恩里克·罗伊格等人也开始在西恩富戈斯的《劳工报》和哈瓦那的《工人报》上著文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诗人和作家迭戈·比森特·特赫拉<sup>②</sup>（1848—1903）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他在法国认识的第二国际的追随者那里知道了社会主义，曾公开要求古巴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并且论证说，古巴一旦同宗主国断绝了关系，就会发觉自己要受到两大传统政党即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统治。他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把自己组织起来，这两个政党都会对它进行剥削。

古巴的工人表明了，他们愿意在 1892 年的全国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团结起来。大会的决议说：“工人阶级未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便得不到解放。”特赫拉利用工人的这种团结，在 1899 年创立了社会党。该党鼓吹，一旦西班牙人被赶出古巴，就要通过一条非暴力的民主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制度及其主要方针》（1897）一书中，他勾画了他对古巴社会主义的想法。他预期由一个古巴工人的政党来领导这个国家，把更大部分的生产收益拨给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他努力争取转变到社会主义，却反

---

① 古巴独裁者（1871—1939）。——译者注

② 古巴社会党创建人，曾为古巴独立而斗争。——译者注

对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会引起暴力行为。他坚信,古巴的问题不同于欧洲的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声称,为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拯救古巴的群众,必须进行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尽管他的想法在其生前对古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却影响了后来几代的古巴社会主义者,也影响了他的朋友何塞·马蒂(1835—1895),后者对古巴的历史进程曾起过重大的影响。

古巴具有把思想斗争和积极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传统,而这种传统的主要动力来自马蒂为古巴独立所作的努力。这位古巴的诗人和新闻工作者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却是反对美国在古巴的霸权的反帝战士。他多少熟悉马克思的著作,而且认识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变革的骨干的重要性。然而,他为古巴制订的社会和政治纲领却缺乏经济基础和科学的严密性。马蒂相信,一切战斗者都要团结起来,要形成一个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并可能转入武装斗争。可是,他不接受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他提倡平等和所有社会阶层进行合作的代议制民主,信奉私有财产和一种不会剥削穷人的资本主义,反对一个阶级或政党的政治支配。

马蒂认为,马克思应该受到尊敬,因为他支持弱者,赞成反抗和斗争。可是,他错误地把马克思描述为没有变革纲领的批评家,仅仅指出了哪里受伤而没有开出任何处方。马蒂在1884年为纽约的《美洲》杂志撰写文章时,曾经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为国家效劳的对人的奴役制。

共产党领导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曾经评价过马蒂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他说:

“人们决不可……把不属于马蒂和歪曲其真正意义的思想基础归到他的身上。对这位伟大人物彻底地探究一番，以便从他的身上挤出一点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的特色，这诚然是貌似有理的，但完全是矫揉造作的……如果正确地进行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任何人同何塞·马蒂相比，也不过是自己那个时代的幼稚孩提，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那个阶级的意志，不能更多地摆脱自己那个时代的习俗……因此，马蒂鼓吹的那种共和政体，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的，而其社会性质则是资产阶级的。”

古巴的何塞·马蒂研究中心主任雷韦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宣称，古巴并没有设法把马蒂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古巴却力图阐明马蒂的激进思想同现代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方式之间的联系。

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承认“七·二六运动”<sup>①</sup>受惠于何塞·马蒂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不过他宣称，这位19世纪的自由战士没有认识到，必须消灭这个国家的那种丑恶的资本主义，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

①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100多名青年攻打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圣地亚哥东北的蒙卡达兵营失败，1955年建立以这个起义日命名的组织“七·二六运动”。后来卡斯特罗流亡到墨西哥，又组织一批青年于1956年11月乘“格拉玛”号游艇在古巴奥连特省登陆，并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组织武装斗争。1959年1月1日胜利后，该组织于1961年与人民社会党（原名古巴共产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成立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2年改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1965年又改名为古巴共产党。  
——译者注

## 卡洛斯·B·巴利尼奥(1848—1926)

卡洛斯·B·巴利尼奥从来也没有获得过他的朋友何塞·马蒂作为新闻记者、自由战士和思想家的那种名望,但在许多方面却更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卡洛斯是由他的父亲、一个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强烈反对者卡洛斯·J·巴利尼奥用革命传统来抚育成长的。巴利尼奥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同古巴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烟草工人一起干活,20岁出头就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后来他到美国去游历,在那里见到了马蒂,并且直接观察了帝国主义。

巴利尼奥探索一种解放哲学,一种能够使他为古巴独立设计出一个方案的哲学。最初,他为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所吸引;但后来他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取代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而他是在1875到1881年在美国一家工厂工作期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在美国期间,他和塞繆尔·冈珀斯<sup>①</sup>有密切的联系,还参加了工人运动,到处发表讲演,并为各种报纸撰写文章,甚至自己出版报纸,来为古巴的解放和消灭帝国主义而斗争。

尽管他的战斗主张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何塞·马蒂则不然,但他还是同马蒂合作,在1892年创立了古巴革命党。20世纪初,巴利尼奥回到了古巴,努力传播这样一种见解,即同西班牙断绝关系并不会给古巴带来独立,因为美国已经支配了这个岛屿,而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基本结构也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他指出,必须获得经济自由,否则要

<sup>①</sup> 美国劳工领袖(1850—1929),美国劳工联合会首任主席。——译者注

取得政治自由的计划就得打折扣。他还强调，必须实行多种经济并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这对古巴的经济独立是必不可少的。

1903年，巴利尼奥创建了社会主义宣传俱乐部，这是古巴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两年以后，他组织了古巴社会主义工人党。与此同时，他出版了他最有名的著作，即小册子《社会主义真理》（1905），其中阐明文学艺术应当为一切人服务，而不仅仅是为特权阶级效力；宣称道德沦丧的弊端在于现存的制度，决非通过改革运动所能消除；谴责社会进化的观点会使人们乐于听天由命，或者信仰宗教；宣扬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计划和社会行动的方法，又是一种实现公平的愿望；论及诸如铁路国有化和医疗社会化等实际问题；声称条件和机会均等并非旨在剥夺人们的个性，或者限制其行动；并且表示相信罢工的威力能使被剥削的工人得到公平待遇。这本小册子代表了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个时代的最明确的要求，使古巴工人的处境同他们的国际兄弟的境况息息相关。

到了1918年，巴利尼奥已经倾心于俄国革命，甚至作了一首诗以表示这个运动就是自己的斗争。苏联的经验使他更加确信无产阶级的使命，继续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宣传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严厉指责了“普拉特修正案”，这是华盛顿当局在美西战争结束时坚持要塞入古巴宪法的条款，而据此美国便有权干涉古巴的事务。他认为，古巴与美国相处，其境况就象斯科特·尼尔林<sup>①</sup>在《美利坚帝国》一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情形。

---

<sup>①</sup> 美国社会学家（1883—）。——译者注

1921年,他把这本书译成西班牙文,并且写了一篇序言,指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从民主精神转向了仗恃霸权。

巴利尼奥积极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直到1925年,这时他同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一道创建了古巴共产党。他和梅利亚努力提高古巴人民的觉悟,迫使政府废除“普拉特修正案”,而古巴政府也终于在1934年这样做了。

除了指控美帝国主义,巴利尼奥还把古巴的许多问题归咎于本国的资产阶级,说它“伪善”,指责它不关心这个国家的饥饿、痛苦和无知的人民。他鼓吹要消灭他并非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古巴奴隶制”,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为外国人及其在古巴的帮凶所控制;他还鼓动要实现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使农民掌握生产资料,从而使古巴的普通老百姓得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大声疾呼反对歧视黑人,因为他知道,黑人在他所说的古巴奴隶制下受害最深。

巴利尼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到最后的一息。尽管他不是——一个深刻的或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但他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是他这一类人中的第一个;也就是说,在他的同胞的心目中,他是古巴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 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1903—1929)

古巴学者经常认为,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是卡洛斯·巴利尼奥的继承者,尽管事实上他们是同事,而且两人逝世的时间只隔几年。梅利亚给巴利尼奥的思想增加了份量,同样是古巴革命的重要先驱。

在20年代,梅利亚就读于哈瓦那大学,其间熟悉了秘鲁

马克思主义者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和阿根廷思想家阿尼瓦尔·庞塞的著作，并且受到了墨西哥革命和大学改革运动的影响。他看到大学改革是导致国家独立的、亦即跨向古巴根本而有系统的变革的一个步骤。他对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合作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并且象马利亚特吉那样，提倡大学生推进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达到此目的，他在1922年组织了古巴第一个革命的学生运动，即大学生联合会。这一运动成了古巴其他大学运动的先驱，而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是30年后从这些大学生运动之一中涌现出来的。

梅利亚批评了哈瓦那大学，把它叫做商业学校，因为学生到那里去学的，是如何在生活中赚钱，而不是致力于改进社会。他的这种不满促使他帮助成立了何塞·马蒂人民大学，把500多名工人同努力提高认识的大学师生结合了起来。在梅利亚看来，马蒂大学的目的是要促进新思想，而不是象哈瓦那大学那样反复灌输现行制度的各种观点。他把马蒂大学作为谴责在古巴尤其是在甘蔗种植园中非人的劳动条件的讲坛。该校由于其政治活动和反帝特别是反美的态度，在1927年被独裁者马查多宣布为非法，因而没有再办下去。

梅利亚在哈瓦那大学期间，继后又通过马蒂大学，探究了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立的缘由，并且设法加以解决。他领悟到，体力劳动者难以看到脑力劳动成果所产生的“价值”，因而总是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同资产阶级和现行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他恳求体力劳动者把脑力劳动者看成是自己人，也就是要认识到理论和实践二者对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写道，知识分子是力图实现脱离暴政

的人间正义的劳动者；这是他借用乌拉圭的何塞·恩里克·罗多的一种见解。梅利亚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取代业已失败的教士的作用，并且指出，只有为自由而努力的人才是知识分子，而空谈自由的人不过是伪善者。他虽不反对宗教，却反对教权，觉得教士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反对科学思想，在古巴的学校中影响太大。为了反对这种倒退的局面，他创建了反教权同盟。

梅利亚对俄国革命充满了热情，研究了苏联的教育方法，对于俄国工厂卓有成效地运用文化委员会的这种做法有着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一组织给工人带来了戏剧、艺术、音乐和历史。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鼓励工人，促进工人的教育，在创造性的艺术中表现工人，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更有价值，而这些都是他努力要在古巴推广的计划。他说，他从事这些工作，不是因为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对某些进步作出贡献。

梅利亚尽其才华写作激发人心但理论性并不很强的政论文和论战文章，以明确而带激励的方式唤起自觉和讲清楚社会主义的要旨。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和经济状况中的内在矛盾。他懂得有效的互通声息对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十分重要，因而写了一些文章论述写作的要领，强调文章要有中心思想，能够说明问题，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并要表现出群众观念，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者。

梅利亚还运用他的组织能力和写作技巧来提倡这样一种思想，即古巴人民只有具备了自我意识，也就是认识了自己的



文化,才会得到解放。他认为,象查理·卓别麟的电影和约翰·里德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这样的艺术形式,是极其有用的手段,可以使古巴人认识到自己如何受剥削,以及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变革。

另一方面,梅利亚认为,有些类型的文化虽然为大众所喜爱,但用来代替工作却是很不够的。例如,在他看来,有些体育项目如棒球,从贝贝·鲁思<sup>①</sup>时代就开始在古巴流行起来了;而加以提倡的目的或在于赚钱,或用以麻醉人们而让失业者不去注意自己的烦恼,或者使人们不把精力集中于解决社会问题。他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要是把中产阶级青年的精力从工作上转移开来;这一观点部分地遭到了卡斯特罗的否定,他认为体育运动既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又可以促进团体感或集体主义精神,还可以产生象拳击家特奥非洛·史蒂文森和短跑选手阿尔韦托·胡安托雷纳这样一些英雄人物,而这两个运动员就曾经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对社会起着团结因素的作用。

梅利亚认为,古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国际状况的组成部分。他主张拉丁美洲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并认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是能够阻挡美国势力的,所以这些国家特别容易进行根本的变革。他论证说,加勒比地区由于美国驻有军队以维持现状,所以在那里难以实行变革。

在他看来,华尔街是美洲各国的主要压迫者,它在门罗主

---

<sup>①</sup> 原名乔治·赫尔曼·鲁思(1895—1948),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译者注

义的幌子下并同拉丁美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进行活动。他宣称：“玻利瓦尔的理想应当成为我们的抱负，而门罗的设想则是我们的毁灭。”梅利亚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会由于资本主义的贪婪和作为阶级斗争的继续而爆发。他在法西斯主义一词流行以前，就用它来描述了那样的状况。

他说，国际主义就是同其他国家的被压迫人民休戚与共和团结一致，它标志着摆脱外国帝国主义枷锁的民族解放。他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同卡洛斯·巴利尼奥一样，部分地是从斯科特·尼尔林那里得来的。他们两人都赞成尼尔林的意见，即革命的矛头要指向美元，而不是美国本身。

梅利亚和巴利尼奥创立了美洲反帝同盟的古巴分部，作为走向国际主义和西半球团结的一个步骤。该分部的成员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开展了反对拉丁美洲一群独裁者的运动，其中有他们认为屈从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委内瑞拉的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和秘鲁的奥古斯托·B·莱吉亚。在该同盟内部，梅利亚还被确认为古巴最熟悉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专家。

梅利亚和巴利尼奥筹组了1925年8月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共产党成立大会。古巴的独裁者马查多对共产党成立的反应，就是在同年9月监禁了梅利亚。梅利亚立即进行了绝食斗争，于是被流放国外，最初到了洪都拉斯，后来又到了危地马拉。最后，他于1926年定居墨西哥，并且开始同墨西哥共产党一道工作。

1926年，他写了《何塞·马蒂思想评论集》一书，鼓励古巴人以马蒂反帝、反封建、赞成国际主义、赞成(黑人)平等权利

的态度为榜样。他说明了马蒂对古巴的热爱如何符合于为工人制订的国际团结路线。换句话说，梅利亚使古巴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一致起来。

1927年，梅利亚组织了古巴革命侨民全国协会。该协会在巴黎、纽约、马德里、波哥大和墨西哥城都设有分会，致力于加强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该会会刊《自由古巴》杂志上，他写了《古巴向何处去？》一文，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殖民地地位类似于波多黎各同美国的关系，还说明了古巴需要进行一场争取民族自由的民主革命来纠正这种局面。

他在为匡正古巴的弊端而提出建议的同时，还猛烈抨击了秘鲁的阿普拉主义运动，认为它否定了无产阶级斗争在拉丁美洲的重要意义。他坚决主张，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其他阶级；并且宣称，阿普拉主义是通过抵销真正革命者的行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他批评阿普拉主义者是改良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赞成私有财产而又反对帝国主义，但这种反对不是出于阶级的理由，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尽管阿普拉主义者也提到了“脑力劳动者”，但梅利亚仍然声称，他们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不是指劳动者而是指小资产阶级律师。此外，他还宣称，阿普拉主义是不科学的，是表达花言巧语的工具，所以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阿普拉主义方法。

梅利亚对阿普拉主义者的看法，受到了参加反帝同盟的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的支持，也受到了象艺术家迭戈·里维拉和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sup>①</sup>以及受人敬重的历史

<sup>①</sup> 墨西哥壁画家(1896—1974)，曾任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和里维拉等人从事壁画艺术复兴运动。——译者注

学家伊西德罗·法韦拉等著名的墨西哥人的支持。他们同梅利亚一起，在墨西哥共产党的喉舌《砍刀报》和反帝同盟的刊物《救星》杂志上，谴责了古巴的马查多政权。

专制统治者马查多的特务于1929年1月10日在墨西哥暗杀了梅利亚。象他的同胞何塞·马蒂一样，他成了古巴解放事业的殉道者。他对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权威解释，尽管用语朴素，但无论在动员其国人的思想还是在形成其国人的革命意识方面，都是起了作用的。梅利亚遵循马蒂的传统，但又赋予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古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的思想已经变为现实，体现于古巴革命及其宪法中，尤其是在有关结婚、离婚、限制财产权、土地改革、反对帝国主义、消灭文盲、公民不分肤色和性别一律平等方面。

#### 胡安·马里内略(1898—1977)

卡洛斯·巴利尼奥和胡利奥·梅利亚的同代人胡安·马里内略于1923年参加反对阿尔弗雷多·萨亚斯<sup>①</sup>腐败政府(1921—1925)的“坚决抗议”时，第一次闻名于全国。

马里内略声称，他和许多同事得到阿根廷社会主义者阿尼瓦尔·庞塞的著作的启发，庞塞最初使他们警惕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有害影响。他们还认为，秘鲁的何塞·马利亚特吉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明智地保护了拉丁美洲不受妨碍该地区全面发展的国际经济制度的损害。

马里内略是个多产的小册子作家，写过不同的题目，包括

---

<sup>①</sup> 古巴作家、政治家(1861—1934)，1921年当选古巴总统。——译者注

政治和国际经济，但长于文学批评和论述作家在革命中的作用。他的著作中有《拉丁美洲文学：人物与思考》一书，是研究古巴文学生活中的人物的。

马里内略对何塞·马蒂特别感兴趣，重新解释了马蒂的著作并认为马蒂是伟大的艺术家和古巴首屈一指的作家。他表明马蒂的自由主义如何成为古巴社会主义的先声。在他看来，马蒂由于主张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而迈开了摔掉古巴的压迫锁链所必需的第一大步。但马里内略指出，马蒂不是按唯物主义思考的。在《美洲作家何塞·马蒂：论马蒂与现代主义》（1958）一书中，马里内略表明这位古巴自由战士如何否认现代主义者艺术家。他指出，19世纪最后几年在古巴非常流行的现代主义，在马蒂看来是要保护美学领域不受思想和历史力量的威胁。在另一部著作《关于马蒂的十一篇论文》（1964）中，马里内略指出这位自由主义的古巴人受惠于西班牙古典主义者，并揭示了他的多面性和反帝反美态度。归根结底，马里内略认为马蒂是不愿落入俗套的。他称马蒂为“以特异手法表现现实、在自我内部改造现实、使现实成为其内心激动的一部分或其主导情绪之心态的一部分的诗人”。

马里内略断言，古巴一些第一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古巴的前卡斯特罗时代的暴虐出了力。他还强调除马蒂外，该国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巨匠也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给共产党人行动自由，从而充当了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人物”。然而他也表明，象何塞·巴罗纳<sup>①</sup>和马蒂这样的思想家，对帝国

<sup>①</sup> 古巴诗人、哲学家（1849—1933）。——译者注

主义抱有不同于列宁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是一种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不是有某种经济基础的现象。

胡安·马里内略在30年代作为《群众》杂志社社长为全国人所赏识，他利用该杂志设法激起古巴人民注意到自身在一场自己几乎或者完全控制不了的国际斗争中作为抵押品的险恶处境。他把古巴描绘为一个永远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内部冲突的回力冲击的附属国。

他了解欧洲极度的民族主义好战性导致紧张局势的原因，并预言争夺国际市场的结果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担心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不能挡住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逆流，而把法国和英国不能在西班牙内战中捍卫民主制度称为可悲的预兆。他谴责了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战争，而强调正义战争包括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阶级压迫而战。他认为，必须为国家的与国际的自由而战，为打败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恶势力而战。

马里内略于1940年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有利于寻求新市场的企业家阶级而不利于群众。当时他尤其同美国的劳动群众保持一致，认为他们决不希望一场使他们遭受重大伤亡的战争。在欧洲已爆发战争而日本尚未偷袭珍珠港时，他讲到了两种民主，即偏袒帝国主义的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古巴共产党人的反帝的民主。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揭示出了两种民主之间的矛盾，并表示希望这场全球冲突将为他喜欢的那种民主即人民民主开辟道路。

马里内略的见解已接近若干年后鼓吹“一致民主”的新左派的观点，这种民主由于不相信代议制而主张全体公民参与

政治协商并要求全体一致作出决定，而有别于自由主义的“敌对民主”。“一致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是表现公民友好关系的联合体这一概念的启发，而不是以国家是为私人目的服务的工具这一观念为出发点的。

马里内略看出，古巴站在同盟国一边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既促进了民主又反对了帝国主义。在列宁思想的指引下，他相信古巴有必要获得象英、美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前奏。他希望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会在古巴导败人民反对本国政府暴行的浪潮，并进而引向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帝国主义面目的揭批，从而推进到为社会主义面斗争的下一阶段。

马里内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是美帝国主义新时代的开始。他认识到，战时的迫切需要使拉丁美洲的大量经济依赖从欧洲转向了美国，这正是那个最强大的西半球国家力求保持和利用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不遗余力地保持古巴共产党的显著地位和合法性。他在政治上仍然很显眼，而到了195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其反对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府的战斗时，马里内略担任了古巴共产党负责人。卡斯特罗在1959年1月1日胜利后，马里内略对共产党同卡斯特的革命力量和解起了作用；这决不是简单的任务，因为后者不信任曾经公开和巴蒂斯塔政府合作过若干年的前者，而那时前者则坚持认为只有靠广泛统一战线和群众行动才能创造条件推翻巴蒂斯塔。后来卡斯特罗证明了下面将详细叙述的其他策略能够成功，而且巴蒂斯塔政权已被撵下

台，共产党和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之间已稍有和解时，马里内略便出任了哈瓦那大学校长。此后他把大量注意力转向写作辩论文章，特别是规劝其从事各种艺术的古巴同志们集中精力于发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象卡洛斯·巴利尼奥和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一样，马里内略也有助于在古巴普及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他采取的是稍微革新的方式。更有意义的是，他充当了马蒂一类自由主义的老一辈共产主义维护者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一类策划革命的起义者之间的主要纽带。尽管马里内略同古巴革命合作并对卡斯特罗那种独特而成功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但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来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他形成自己的想法以适应新形势，却继续以“迂阔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寻求许多古巴问题的答案。

### **布拉斯·罗加(1908—)**

胡安·马里内略的同志弗朗西斯科·卡尔德里奥，即更为人知的布拉斯·罗加，也从老一辈共产主义维护者转向了菲德尔主义。罗加比马里内略更称得上理论家，他在古巴政界和文学界中成名是在1943年出版了其著作《古巴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后。该书十分重要，以致卡斯特罗政权于1962年加以修订和重新发行。

罗加这本从历史角度论述古巴问题的入门书，说明了西班牙人如何把古巴本土社会变成奴隶社会。按照他的意见，废除奴隶制度后古巴进入了封建阶段，随后建立的资本主义中仍有某些封建主义的因素延续下来。罗加对新殖民地古巴



的阶级结构提供了全面、易懂的分析。在他看来，古巴在大庄园主的控制下国力已经凋敝，而这些大庄园主中有美国地主、受美国公司操纵的糖业资产阶级，以及古巴中产阶级的进口商与商人。再往下的古巴社会阶梯上，他排列的是非制糖业的工业资产阶级，然后是城乡无产阶级。

罗加还提供了古巴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简史，其中把卡洛斯·巴利尼奥看作190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宣传俱乐部的推动者，该俱乐部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声称与第二国际的纲领保持一致，并最终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罗加把革命前的古巴国家看作半殖民地附属国，并认为“普拉特修正案”削弱了民族独立的原则。在他看来，古巴符合列宁称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其中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不发达国家是否或多快发展，这在以农业和单一经营(糖)为方向的半封建大庄园类型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他认为，从美国支配下解放出来是古巴发展的前提条件，并把古巴周期性严重经济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及其如下事实，即每当支配国经历艰难日子甚至轻微衰退时，这个岛屿附属国就大受其害。他预言古巴在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状况变化的大小后果所支配。

罗加对拉丁美洲各国打破依附关系、进行社会改革的努力始终保持极大兴趣。墨西哥革命吸引过他的注意，而当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在美洲许多地区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时，罗加分析了卡德纳斯主义并发现，这是推进了墨西哥国家独立但没有使该国更接近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罗加还为古巴的变革寻求可能的模式。他曾经指望欧洲

尤其是天主教国家提供能造福其人民的主意。他发现，法国的工人教士运动有助于组织群众行动，并无意中使左派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尽管他的观察所得在古巴几乎没有引起最初的反应，但在后来的岁月里盛行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却证实了罗加的下述信念，即教会作为该地区文化机构之一，能在促进根本变革方面起作用。尽管他认为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倒是物质的产物，但他仍然强调古巴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捍卫着宗教自由而反对迫害教会，这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了卡斯特罗坚持的前提。

罗加还认为古巴歧视黑人的历史是出于向殖民地种植园提供劳动力基地的需要。他关于反黑人情绪根深蒂固而必须加以消除的意见，对卡斯特的革命政府有很大影响，使它在向黑人提供平等机会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他的著作始终表现了对农民的同情，而农民是这个无阶级社会中得益的另一类人。

布拉斯·罗加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并一度作为斯大林主义者，象他的同志胡安·马里内略一样毕生致力于建立古巴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曾经勉强地同巴蒂斯塔政府合作，以此作为保持自己党的合法性并为其党员提供安全保证的手段。巴蒂斯塔政权显然要垮台时，他们转而支持卡斯特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起义者。卡斯特罗取得胜利后，革命急剧向左转，这时罗加作为共产党即人民社会党的总书记，便成了古巴革命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和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共产党备受尊重的党员。古巴革命虽然改变了罗加运用可行性战略获取成功的社会变革的正统共产主义

信念，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迂阔的”解释，毕竟与古巴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大有径庭，后者总是用一些更富革新精神而有所变异的社会主义思想模式来适应古巴所特有的情况，这在下文将加以揭示。

###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1913—)

古巴人民社会党即共产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1958年6月被该党派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同卡斯特罗的游击队联系，所以他象布拉斯·罗加一样终于赢得了菲德尔主义者的信任。

罗德里格斯也是在哈瓦那大学开始其活跃的政治生涯，并在那里参加了1933年反对独裁者赫拉尔多·马查多的起义。这次起义第一次使古巴工人深深卷入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也使工人阶级以群众性规模开始了社会主义化，从而增强了卡斯特罗后来据以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革命传统。到1939年罗德里格斯已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的同志把他看作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与巴蒂斯塔联盟期间，他在这个独裁者的内阁中任职(1940—1944)。这期间他与斯大林主义同事布拉斯·罗加不同的是，他曾设法尽量避免左派宗派主义，并以其积极的工作和著述来增进古巴社会主义各派别的协调一致。

他的开拓性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古巴历史》于1944年出版，谴责了古巴大多数历史学家以资产阶级为注意中心。在他看来，古巴大多数历史学家向来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唯心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他表明了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和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工作方法的差异，并明确表示必须对古巴历史进行科学的、材料可靠的分析。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经济解释，其历史唯物主义就更不消说了，它研究各种社会关系。罗德里格斯说，马克思主义既不象兰克和麦考莱<sup>①</sup>那样根据条约、外交斗争和议会辩论说明历史；也不象卡莱尔<sup>②</sup>那样从各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研究历史；又不象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作绝对精神即自由理想的进展；还不象(受达尔文影响的)孔德那样从严格选择过程观察个体和群体斗争的实例；马克思主义不排除所有这些因素。他看出上述诸方面都受制于决定每个时代的观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他按照恩格斯的思想来分析古巴的历史时，发现古巴摆脱西班牙的独立斗争置根于宗主国西班牙和附属国古巴之间的政治与财产关系。他说，从19世纪头30年起，西班牙对这个岛屿的殖民关系并没有为古巴经济力量的发展作出贡献，甚至想要控制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古巴资产阶级也没有从中得到发展。罗德里格斯认为，19世纪中期古巴的中产阶级采取了革命态度，反对西班牙控制以保卫古巴的财富，因此同西班牙的斗争是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冲突的组成部分。他的这一论点已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塞尔希奥·阿吉雷所证实，后者同他一起工作并同意他的看法，即1868年起义是作为争取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运动开始的，而1895年大动荡则是民

---

① 兰克(1795—1886)，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麦考莱(1800—1859)，英国史学家。——译者注

② 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1795—1881)。——译者注

主的资产阶级捍卫民族解放的一次尝试<sup>①</sup>。

罗德里格斯的《古巴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1963年〕》(1978)一书是《马克思主义与古巴历史》一书的续编,在这部著作中他的学术成就有点不稳定了,因为他偶尔用了一些华而不实之词。在这部论述古巴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书中,他用了“共产主义”一词来指紧接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社会的更高阶段,以及生产资料开始转变为公共财产的时期,这就使我们推断他主张在古巴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称古巴为适用“新殖民主义”一词的世界上第一批国家之一,理由是古巴虽在1903年正式获得独立,但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却把古巴置于美国垄断资本保护下直到1934年为止。

罗德里格斯承认,马克思有关拉丁美洲的论述在理论上或事实上并非总是正确的,但它们都是从一种适用于全球的历史观出发而可供今天的思想家们据以进行推断的。罗德里格斯更喜欢列宁研究社会现实的态度,特别是后者抛弃老章法而用更适合当代生活的新方案的意见,更是卡斯特罗很好记取的训诫。罗德里格斯把列宁的殖民主义理论用于拉丁美洲,并指明列宁由于研究了东方社会构成的独特性而接近理解拉丁美洲的状况,特别是农民的处境。罗德里格斯遵循列宁分析社会现实和提出行动计划的方法,断言卡斯特罗抛弃了动用士兵和教士的老章法,而代之以工农政权的新方案,从

---

① “1868年起义”即古巴历史上称为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全民起义,“1895年大动荡”即马蒂等领导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革命运动。——译者注

而实现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

罗德里格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古巴看作走向社会主义的全球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个运动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全世界殖民主义的灭亡。更明确地说，他起初认为卡斯特罗在1953年攻打蒙卡达兵营是暴动而不是革命，但他描述古巴后来从卡斯特罗于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到1963年进入过渡时期，经历了非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时私人资本仍在形成，土地改革在有限度地进行，而把外国资产收归国有却是一桩反帝行动。

他认为，卡斯特罗把何塞·马蒂鼓吹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帝运动的方向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卡斯特罗深知历史上的改革进程逐走统治政权都是暂时的。卡斯特罗了解危地马拉于1944—1954年间、玻利维亚于1952—1964年间以及哥伦比亚于1948年实行的短命的改革运动的历史，使他认识到古巴需要明确而持之以恒的社会改组。

罗德里格斯指出，卡斯特罗在反巴蒂斯塔政府斗争的最后日子里，几乎着了迷似的要消灭统治古巴的政治阶级，这是菲德尔主义者一经掌权后完成得相当快的业绩。罗德里格斯还声称，古巴共产党的代表在“格拉玛”号游艇于1956年12月2日登陆后几周之内就同卡斯特罗会晤，于是卡斯特罗发动了对巴蒂斯塔政权的讨伐。他指出，到了1958年卡斯特罗已尊重和了解共产党人，并认为必须同共产党人结盟，但卡斯特罗不是一位意识形态上的同志，因为他仍抱有一生所受反共影响而形成的种种偏见。与此同时，菲德尔告诉罗德里格斯，过于明确地规定革命目标而使敌人警觉，在策略上有欠稳妥。

到了1961年4月，卡斯特罗对一批工人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但按照罗德里格斯的说法，在1963年秋季第二次土地改革到来以前，至少就农业而言，古巴没有离开过渡（即改革）阶段而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起步。

古巴革命一经站稳脚跟，罗德里格斯作为沟通自由主义革命者、共产党和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联络人就显得日益重要了，后来他担任过古巴外交部长、古巴民主选举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副总统，并成为以他的“坦率的”马克思主义意见指导古巴走向集体行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人。

####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27—1967）

出生于阿根廷的内科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是古巴革命最多产的作家、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和民间英雄。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政变推翻危地马拉社会改良主义政府的1954年，在那里由他后来的第一位妻子伊尔达·加德亚指导，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切懂得磨练意志作为革命斗争中必要手段的重要性。他作为一位实行家，感到不能不把自己的想法见诸文字，而且写得相当好，尽管有一种爱用晦涩或含糊的抽象词句的癖好。仔细研究他的著作，就能看出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伊曼努尔·康德、卡尔·马克思、弗·伊·列宁、列夫·托洛茨基、约瑟夫·斯大林、武元甲、弗朗兹·法农、米洛凡·吉拉斯、埃内斯特·曼德尔、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和保罗·巴拉恩对他的影响。传说切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也就是说他在英勇斗争中抽时间读诗。他强调马利亚特吉关于马

克思主义中的伦理学以及建立由阶级斗争形成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意见。他大概读过这位秘鲁思想家的著作《捍卫马克思主义》，该书曾在卡斯特罗的古巴再版。

切在卡斯特罗取得胜利后更深入地钻研了政治和社会理论。这时他象马克思和列宁一样热中于“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sup>①</sup>这一思想，并认识到为此必须从群众教育计划着手。他亲自向一批又一批古巴人讲授文学课，并向他们分发《堂吉珂德》这本小说，使他们树立信心和想望进步，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老师看作打败以前不可战胜的敌人的现代游侠骑士。

切在他指导的群众扫盲运动中强调艺术对革命的作用。他认为知识分子应既通过政治理论也通过艺术著作提供思想意识。在他看来，文化和艺术在传统上向来用于使人们在很长的工作日后（暂时）摆脱情感上的疏远。在革命前的古巴，人们靠与其周围谈心以解除情感上的疏远，而这正是一种思想上的逃避，即不承认艺术应作为抗议和变革的武器。他认为艺术过于经常地把社会主义的现在同已经消逝的过去结合起来。他抨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以19世纪带阶级倾向的艺术为基础而兴起的，因而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在真正表达自由。他追求能培育真正艺术自由（它与共产主义一起到来）的社会，并坚持认为，各种艺术形式都决不可把自然描绘为一种基本上“肯定的”社会现实，或者一种几乎没有革命

---

① 《列宁文稿》第2卷第144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页和第22卷第280页。——译者注



试图揭示的那些冲突和矛盾的理想社会。与此同时，他认为艺术能使人摆脱资本主义的极端实利主义，并让人产生美学上的满足以取代物质上的满足。

尽管切非常强调革命的文化方面，但他的世界声望却主要来自其作为游击战士、策略家和理论家的业绩。他的关于游击队的催化作用的思想背离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修正了列宁的观点。列宁教导只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时才能行动，这是60年代拉丁美洲实际上不存在的形势。但切认为用催化剂就能使拉丁美洲各国准备革命。

巴枯宁认为，社会革命能在政治革命之前开始，因为即使最优良的军队也不能战胜群众支持的非正规部队，而行动能给革命以最大鼓励。切受到这些意见的鼓动，主张在农村独立地开始起义来作为使革命扩散到城市的催化剂。他知道拉丁美洲人已看到了革命的客观条件，即遭受贫困、饥饿和压迫，因而他相信只要进行武装斗争就能具备主观条件，即意识到胜利的可能性。

格瓦拉不考虑在拉丁美洲有和平转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虽然马克思和列宁把城市无产阶级看作最有战斗力的革命力量而认为城市是发动战斗的地方，但切却断定农民能成为解放的工具。他强调农村游击行动在不发达的拉丁美洲更为可取，因为现政权最富镇压性的力量都在城市活动。象武元甲和毛一样，切主张游击队和农民结成联盟，后者靠实行土地改革就能加以动员。在他看来，农民将为土地战斗，从而构成第三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

切反驳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坚持的理论，即它们在同

执政的权贵开始较量之前，必须从选票箱上赢得政治胜利。他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并非总是来自书本，而能从革命进程得到。他虽不同意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sup>①</sup>，但没有忘掉理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革命者闹革命，而革命造就革命者”。他不顾列宁的“决不要拿起义当儿戏”的劝告，也无视毛的“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主张。

格瓦拉拒绝共处而宁愿选择对抗来作为处理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联盟和正在失去其帝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最妙办法。例如，他认为美国在1965年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sup>②</sup>激起了民族主义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干涉。他希望整个拉丁美洲的游击行动将引起美国的猛烈干涉，并使对抗发展为一场大陆战争，从而使美国资本主义最终败于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

就古巴革命而论，可以认为切有两个创新。第一，他把游击战看作完成胜利的手段，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游击战争理论家毛和武元甲则认为游击战争有某些局限。第二，切至少在古巴证明毛和林彪关于必须使农村人民作好准备以等待武装革命适当条件的论点不成立。在他看来，古巴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上要作相当多的随机应变。

格瓦拉承担组织古巴经济的任务时，鼓吹计划是发展的创造性方法。他还更喜欢中国的主张，即经济上自力更生比依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36页和第2卷第328页。——译者注

②. 1965年4月以卡马诺为首的多米尼加爱国军人起义推翻右派军人统治。美国派兵入侵，遭到多米尼加爱国军民抗争和世界人民谴责。——译者注

靠更发达国家为好。他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义务在斗争中互相支援，而不喜欢古巴过多依靠苏联的念头。

菲德尔·卡斯特罗变得日益倾向苏联，并要倾全力在古巴建设共产主义；而格瓦拉则趋向托洛茨基主义，并相信古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只有在第三世界开辟了新的革命战线才能实现和保持下去。切赞成托洛茨基关于在殖民地国家进行不断革命的看法，并且信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原来认为先锋队政党的作用是帮助创造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条件，但后来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先锋队必须参加群众日常斗争或者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见解，而赞成群众已经思想上献身于社会主义的看法。

格瓦拉同意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说法。他从理论上支持第三世界大团结这一重大战略，宣称这样就能利用他认为正在导致世界性爆炸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他还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将消亡而让路给新社会制度的预言，以及列宁关于人的行动能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断。

为了发动行动，他赞成游击中心论。就游击中心来说，他指的是游击活动的中心即核心，而不是基地。游击中心就是在特定省份作战而不是在一个地方驻扎的部队。游击中心可以看作一支力量，而不是一个中心点，也可以看作为建设人民军队提供领导、主观条件和革命热情的革命原动力。

曾在古巴和玻利维亚观察过格瓦拉的法国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声称，游击中心论不仅仅是一种战略。在他看来，这一理论代表了一种伦理哲学，即承认人的生活方式在逐渐决定其活动，并要求革命者成为以其行为而不是以其言论影

响别人的行动主义者。

游击中心论者坚持认为，正统的共产主义组织只有有益于城里人而忽视了农民。他们还认为，游击中心哲学利用存在着的形势来发动革命，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游击中心鼓吹者同较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见分歧，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游击运动不必由政党领导，只要建立起游击队伍并由它带来解放之后，政党就会出现。他们坚持认为，革命的下一阶段将由起发展生产和提高觉悟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指导。与此相反，共产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毛主义者却认为，游击战争需要多年作认真的政治和思想准备，所以他们把游击中心论者看作回避历史分析的不科学的冒险家。

不应当把切的游击中心论主张误认为一种小手小脚的打算。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曾经预言围绕游击中心开展以多国协作的人民战争为形式的广泛起义。他认为游击中心论能很好地用来对付古巴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和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所巩固的独裁政权。他还认识到，在政府已通过任何形式的人民协商（不论骗人与否）而上台执政从而至少保持着合乎宪法外貌的国家中极难发动游击战，因为合法斗争的可能性尚未告罄。但尽管如此，切仍然认为象委内瑞拉这样一些受美国经济和思想支配的国家，在其重大的社会变革一旦受阻时，建立革命的游击中心也许是值得的。

1967年格瓦拉企图在玻利维亚发动革命时被杀，此后游击中心论在拉丁美洲就得不到重大支持，而出现了一些更新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强调城市游击战争的理论。不过，切的游

击战著作继续被人们研究，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革命者。他们在仔细分析他的著作时发现，他是知道斗争最终必须在城市里进行的，并且认为城市行动主义者会象古巴经历过的那样，随着农村冒险行动的成功而成比例地增长。

切·格瓦拉曾经教导说，一个不了解思想方式的人可能成为游击队员，但不把它学到手就不能经受得住战斗。他认为，革命者的社会良心随着其军事技能而加强，但后者不能使他渡过战争苦难。在他看来，最好的战士是最懂得政治的人，即在胜利后胜任领导的人，因为他们比没有打过仗的人更实际也更革命。

古巴一经取得胜利，切就试图创立一种思想体系来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能得到发展和无产阶级有高度觉悟的社会里发生。俄国革命后，他们预期的物质基础显然不存在，因此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强调马克思所相信的那种精神鼓励。相反地，他们必须更多注意物质基础。切认为，古巴革命政府继承了包括物质刺激在内而与革命格格不入并有可能导致腐败的许多资本主义办法。他以空想的方式给价值观下定义，即依据的是道德和社会价值亦即人的价值，而不是供求关系。在他看来，劳动的价值从人的方面看比从经济效益方面看更为重要。他把经济上的人看作资本主义造就的怪物，并认为经济制度应为社会服务，金钱比不上人生任何部分有价值。

切不同意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下述看法，即认为首先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使它获得成功之后，才有基础来树立革

命精神。他同意毛的信念，即须立即树革命的雄心，否则就要冒追求资本主义刺激的危险，就象他认为苏联发生的那样。切相信精神鼓励能使人倾向集体，乐于自愿为社会利益收割甘蔗，而不是迫于社会的压力去勉强从事。他企图在古巴人身上发展一种不企求社会赞扬、不领受报酬，而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内在愿望。

他的精神鼓励思想来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即意味着消灭劳动力分配的市场工资制度。他知道，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的政策会妨碍古巴发展极其需要的生产。但是他也知道，在政治上选择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刺激，既能促进动员，又能使人民有更大的参与决策过程的感觉。从社会方面看，用精神鼓励取代物质刺激能帮助消灭阶级分化，促进收入均等，减少感情疏远和加强团结一致。

按照社会民主主义者迈克尔·哈林顿的看法，切不可否认物质刺激的客观需要，但不愿意用它作为根本推动力量。哈林顿说，切不可错误地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在民主地设计的和社会化了的富裕条件下能变成什么样子的想象力，在匮乏的社会中也起作用”。哈林顿认为切不可过于理想主义了，并认为精神鼓励在古巴行不通，要人们能互爱就必须有物质上的充裕，而切不可错误地估计人们在建设物质基础时会作出牺牲和忍受匮乏。

到70年代切趋向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的平衡。按照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古巴觉察到自己处于遵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前提的社会主义最初阶段。当时古巴接受了一种更传统的对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即以物质基础为基

础,随后是富裕,然后是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尽管精神鼓励想法的忠实拥护者们认为,改变政策会引起竞争和敌视而不会促进生产,但其他人却把这种改变作为“集体鼓励”而加以合理化。古巴领导人发现,甚至精神鼓励也能由利己主义的动机来促成,人们可能以物质为基础争夺精神鼓励。这就提出了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允许心理或精神实利主义的问题。

除了把精神鼓励想法引进古巴社会,切在革命取得军事胜利后,还追求另外两大目标,即为21世纪造就更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和发展适合新古巴生活的技术。他认为,只有同时进行技术和新价值体系的建设,才能在单一经营型的前殖民地附属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切追随卡尔·马克思和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阿尼瓦尔·庞塞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书,作出了这样一个决断:

“人在对自己劳动的态度方面还需要来一次精神上的完全更新,以摆脱其所受社会环境的直接压力,但又以其新的习惯同社会环境相联系。这将是共产主义。”

切断定,要达到个人自由和人的完善,人们必须在生产中不是被迫作为商品而出卖自己。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人需要有大量内在的才智、团结感和肯为群众服务,而且必须力求完全的觉醒。切象柏拉图一样,认为人的实现乃在于其群体之中。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无须压制个人以利于国家,并且着重指出个人与群众是互有联系的,而这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辩证统一;因而群众作为一个由个人组成的整体,又同领袖有相互的联系。切的观点因此维护了人在国家中的作用。他坚信,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古巴新人坚持精神鼓励的理论,

就能防止官僚主义。

切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看法是参照俄国和中国革命并适应古巴情况而形成的，在国外一直有相当影响。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些看法为美国、越南北方和拉丁美洲的激进组织所接受，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许多年轻共产党人以及哥伦比亚革命神甫卡米洛·托雷斯及其追随者。切·格瓦拉（而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了支持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联盟中极左一派即左派革命运动的主要鼓舞者和指导者。左派革命运动和阿连德政府中的其他派别赞成格瓦拉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精神因素，这表明他倾向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该联盟中最保守的组织则反常地认为切拥护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乃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不管格瓦拉在理论上有何长短，他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反对者和献身革命而带存在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英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切认识到古巴革命经常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知道拉丁美洲各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情况各异，因而恳求革命者在避免机械观点的同时要根据本国特殊的条件从事理论与创造性实践。他认为整个拉丁美洲都是他的祖国，而把古巴革命看作终将席卷并解放整个地区的更大斗争的开头部分。

在《社会主义与人》（1966）一书中，他想象未来掌握在青年手中，并预言总有一天当群众受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充分教育时，作为群众的先锋队的党就可以让位给群众了。他的思想，尤其是他那浪漫的游击战士形象，投合了全世界年轻人的心意。不幸的是，由于他给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灌输了他们唯



一的任务是拿起枪上山去开始社会变革进程的印象，因而也许已经有损于科学的革命。

###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7—)

多少代学者将会争论：中产阶级上层家庭出身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其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成了社会主义者。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卡斯特罗从青年时代起就显示了领导才能和激进倾向，也许甚至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菲德尔在40年代末当哈瓦那大学的学生领袖时就读过一些马克思著作，但也受到了热烈的民族主义者爱德华多·奇瓦斯的影响，使他相信在古巴资产阶级及其学生运动中存在着革命的潜力，并在后来利用其支持而取得了胜利。

卡斯特罗的讲演和著述一向显示出历史观念和何塞·马蒂的强烈影响，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第一次读到马蒂的著作了。菲德尔称马蒂为反帝改革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指明了马蒂在世时还没有成熟的条件在古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直到卡斯特罗在1959年控制了古巴，还公开地主张那是一场人道主义的革命。很熟悉菲德尔的政治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利昂内尔·马丁曾经指出，这位古巴领袖的正面是改良主义者而背而则向来是革命者，因为他从自身的宗教经历中产生出一种近似原始基督教的社会态度，即正义和与贫穷卑贱者认同的想法。到了20岁时，菲德尔已很熟悉他的同胞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的思想，并承认自己多少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了。

他去过哥伦比亚，并在那里目睹了那场使该国有志当总统的自由主义者豪尔赫·盖坦被暗杀而其运动受阻挠的“波哥大暴乱”后，于1948年回到古巴就参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并在那里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更深刻的了解。

1953年他帮助领导了他希望能激发一场人民起义以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对蒙卡达兵营的未遂袭击后，在狱中写了著名的演说辞《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篇演说辞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安东尼奥·吉特拉斯1934年的小册子《年轻的古巴》的启发，其中不仅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还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财产不是绝对的权利，而是一种最好置于控制着经济的国家指导之下的社会功能。最初支持古巴革命的哈瓦那大学教师莫里斯·霍尔珀林认为，吉特拉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卡斯特罗，从而使后者产生有关地下资源国有化、发展公用事业、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大地产和创建农业合作社的想法。

卡斯特罗将其早期革命活动建立在相信革命合法的基础上，这是从怀疑“王权神授”和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17和18世纪哲学家那里得到的观念。在一份为反对巴蒂斯塔1953年夺权而提出的法律辩护状<sup>①</sup>中，他竭力主张“一种以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则为基础的对国家、社会和司法制度的新观念”。

甚至在蒙卡达溃败前，卡斯特罗就相信群众和“伟大思想

---

<sup>①</sup> 即《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3年10月16日在圣地亚哥紧急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词》。——译者注

不可磨损的力量”，总而言之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一经掌握了群众就变成物质力量的名言”<sup>①</sup>。他蹲监狱的将近两年（1953—1955）中重读了马克思和列宁以及马里亚特吉、何塞·因赫涅罗斯、韦伯、巴尔扎克和高尔基的著作，从而更加坚定了上述信念。他在狱中写的一封信里特别提到读过维克托·雨果关于1848年革命及其后果的著作《小拿破仑》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并且评论说从这两部著作的比较中“人们就能体会到对历史的科学和求实的见解与纯粹虚构的解释大有径庭”；雨果认为“历史是偶然性，而在马克思看来则是受法则支配的进程”。

这时卡斯特罗已注意到古巴历史上的政治不稳定，并估计到进行国内社会和经济的根本变革的必要性，因而表达了消灭对美国一切形式的从属性的愿望。接着他把这些想法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了菲德尔主义即卡斯特罗主义。他认为，马蒂关于没有外国支配、种族主义和有产者政权的正义社会的梦想，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说毫无矛盾。

直到1961年12月2日卡斯特罗才公开宣告：“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会不顾一切对他的非议，而声明他先前的政治态度不适应古巴的现状；人们有权改变自己的见解；智力发展会促进一个人的思想和哲学的变化。

卡斯特罗终于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仅是理论和哲学，它还可以指导日常的思考来解决人类自古以来一直面临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0页。——译者注

的实际问题。他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寻找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消除异化和促进革命方面的作用抱有明确的看法。他把知识分子和从事美术与实用艺术的人想象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局外人，从而谴责了有文化者设法使劳动者为其工作的制度。他否认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社会的批判性良心”。因此在菲德尔领导下的古巴一直不赞成有一个知识阶级或艺术家阶级，而且不时劝止作家和其他艺术家对革命进行个人的“反集体主义”批评。

在智力产权的问题上，菲德尔声称个人才智的任何产品，例如一本不论是虚构类或非虚构类的书，都应当是全民的财产。例如，他认为著者应得报偿，但反对版权而主张书籍应在世界各地自由出版。

卡斯特罗尽管对古巴脑力劳动者的权利和责任有某种关注，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分子。虽然他每天的职责一直使他不能拿出很多时间从事理论工作，但他已多少成了实用主义哲学家和以其人民为对象的古巴革命的阐释者。

他曾指出，“凡是在开始革命行动之前就坐待观念去征服大多数群众的人决不是革命者。”这就是说，某个国家在特定时刻的战斗也许不是强制性的，但是任何地方的革命最终必须诉诸于战斗。

菲德尔断言，“许多时候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我们的人民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许许多多的、今天宣告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革命斗争这条路到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菲德尔看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经常针对眼前的情况而产生。例如，古巴革命本是以民族主义

方针开始的，但斗争导致了阶级意识的发展，又进而导向了社会主义。

到了他控制古巴时，菲德尔已懂得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各尽所能而按劳取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则所有的人都按自己的需要从事劳动。他断定，为了在他的国家处于社会主义阶段时消灭苦难和剥夺，必须同时建设共产主义。

与认为必须巩固了社会主义才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人不同，菲德尔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瓦解后，还残存着物质刺激、商品生产、利润动机和由市场关系联结成的社会主义企业网。因此他竭力主张建设没有旧秩序的共产主义，即在达到物质富裕之前具有志愿劳动和新的工作态度的共产主义成分。换言之，他强调消灭贫困有赖于牺牲精神和共产主义态度。这多少有点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摒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

菲德尔在背离苏联革命理论的某些方面的同时，仍遵循了苏联关于建立新的技术基础以增加生产的意见。与此同时，他努力造就切·格瓦拉主张的社会主义新人。象切一样，菲德尔起初不接受列宁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主宰革命的意见。古巴革命一开始，卡斯特罗就鼓吹必须有一个无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它可以由哪怕是无党派但渴望革命的人组成。

1962到1967年间，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不接受卡斯特的观点，因为他委派游击队员而不是共产党干部担任革命领导，并在赞成农村政治运动而贬低城市政治运动的同时，赞扬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为人民革命大军。

1971年菲德尔在智利对一个学生组织说：“一个革命的进程并不就是一场革命。”到了这时他才有了较清晰的理论框架，从而认为他在1959年所作的努力不是一场革命，而把它归入传统的、向革命发展的“阶段”图式中去。菲德尔认识到，革命不可能一个晚上闹起来，因而同意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他强调，不断巩固和加强革命核心是成功的秘诀。他反对左的宗派主义，坚持认为不应利用基本上属于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来排除可能的同盟者。他认为，加入运动的人无须具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认识，他们最初必须做到的是在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自身的必要性上求得一致。

1965年古巴新的共产党成立时，菲德尔明确表示该组织将奉行古巴人的想法和做法。他支持切的意见，即在拉丁美洲农民构成一个阶级，他们由于没有文化和被隔离开来而需要城市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从革命与政治方面加以领导。但他也知道，马克思从来没有预料到象古巴这样缺乏工业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不发达国家会发生革命转变。因此古巴奉行的是自己的革命战略，即少数组织得很好的、有献身精神的人能在有利时刻以吸引群众参加革命的行动夺取国家并保持政权。这就是被卡斯特罗的批评者们贴上“布朗基主义”标签的理论。

古巴革命证明了非共产党人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任凭人们想把古巴最初发生的事情叫做社会主义革命也好，第三世界革命也好，折衷主义革命也好，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古巴消灭了一个腐败的、得不到社会响应而由美国在各个层次上加以支持的政府所控制的新殖民地局面。新政权既强调反

美斗争,又为解决本国问题寻求和找到一些社会主义的办法。

卡斯特罗经常讲到摧毁旧秩序比创造为古巴工作的新社会如何容易得多。后来他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分析看作有助于实现后者的许多手段之一。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和辩证的学说,而不是哲学理论。它是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压缩成一种问答手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他看来,识别共产党人要看其行动和斗争中的表现,看他是否用科学观点来解释现实,看他的作风是否表现为“一个革命力量而不是假革命的说教者”。

卡斯特罗对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向来是既借用又加以批判。在这一点上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是集本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社会主义与反帝思潮之大成。到了80年代初,菲德尔已为古巴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社会风气,这是一种既能把批判性限制强加于社会,又能提高社会觉悟的风气。与此同时,他基本上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即在有世界革命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这位古巴革命家说,“我们还不至于愚蠢到认为自己能在十分孤立的情况下建成美好的共产主义小国。”他和20世纪任何一个人一样,始终积极地试图在第三世界传播社会主义。

人们不能因为古巴的资本主义旧秩序在未经阐明理论的情况下已被摧毁而怀疑古巴经验的独特性。革命的左派批评家一直指责古巴人把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变成了行动是建立理论的手段,而且特别提到活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的早期阶段中没有起过重大作用。卡斯特的革命控制古巴之后,他的政府赞助了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旨在获得其同样成就的运动。古

巴无法引发和维持西半球其他地区类似的革命，也许能使菲德尔相信理论作为指南的重要性，而随着古巴革命的进展，思想家已日益成为古巴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了。<sup>①</sup>

---

① 哈瓦那作为在拉丁美洲发起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中心是从60年代大致到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70年代中期从这个地区的反共独裁政权下出逃的政治流亡者大都选择了墨西哥城作为聚集地点。



## 第十一章 结 论

马克思主义已经如此深刻地渗透到历史中去，以致我们全都以这样那样有时认识不到的方式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道德的评价和分等，我们对未来的想法，我们对现状以及对正义、和平和战争的看法，总之每一事物包括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它现在已成为我们的智力生命线和我们的道德感觉力的组成部分了。

——奥克塔维奥·帕斯

这一章包含了本书第一、二两章和具体分国论述的各章中所未阐明的意见和结论，并试图把拉丁美洲的激进思想家不断提出、企图理解并解决、甚至经常取得一致意见的题目与问题联系起来。在下面的许多评论中，提出问题多于解答问题。但尽管如此，这些评论还是可以使人进一步看清拉丁美洲左翼思想家所从事的智力活动过程和努力。有时他们的著述就象他们所代表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不能分类。以下所述旨在使本书更加连贯，使引起拉丁美洲左派分裂的一些理论分歧得到说明。由于带有后一意图，这一章无疑会使一部分读者感到尴尬，而著者希望他们的异议今后会有助于辩证的过程。

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论证：当一个实例取代了另一个实例时便发生科学革命一样，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则一致认为，社会和政治革命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取代了资本主义前景时才能发生。我论述过的大部分思想家由于生活在充斥着头衔、荣誉和级别等地位象征和价值观的、有阶级意识的国度里，因而都是些鼓吹进步将贯穿到无阶级社会的乐观主义者。尽管他们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奉献给集体主义事业，却引起了对他们本人的极大重视。到头来，他们往往成了反高人一等的高人一等者。

他们许多人出身中产阶级，但其中大部分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而且大都有这样一个信念，即政治是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冲突的集中表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是按照19世纪主要思想家的提法来思考和解释人类的自然条件、社会与历史的。有些人则增添一些自己的独到方面。他们大多数不单纯是由于感到资本主义腐败而承认社会主义的感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一向是政治行动主义者，因此他们往往很少有可资利用的时间来进一步取得理论上的深造。政治行动主义有时使他们不得不依从党纪，或者支持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和教条，以致损伤了他们的理智识别能力，降低了他们作为批判性思想家的信誉。但尽管如此，他们中的最优秀者却是有学问而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强调造就并运用知识以缔造新的社会。一般地说，他们在不对自己的成就抱有虚妄的幻想时，仍然保持着激进主义的本色。

本书中提到的思想家几乎全都认为，压迫者的权力只要群众肯屈从就能存在。他们多少有点空想地认为，只要消灭了

私有财产并用工农业生产为所有的人提供富裕，就能使人类摆脱剥削和贫困。他们认为，民众主义和非暴力改革运动通常都无济于事，或者只能促进暂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正如本书已经表明那样，对达到他们的目标须要遵循什么样的理论、策略和战略，却存在着广泛的分歧。

对于正在从事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文化战线上争夺阵地战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拉丁美洲实践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已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力图完全改变其人民不能把现存秩序作为一种制度来思考的状态，并策动他们为社会主义而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消灭葛兰西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即强使公众接受资本主义的基本箴言。这位意大利理论家把那些官方代言人称为努力灌输资本支配者信念因而取得合法地位的专家，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要竭力取代这种代表官方的思想家。

拉丁美洲的激进分子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当是批判性评价和怀疑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传播知识，因而也才是最终有助于摒弃现行制度之“真理”的一种极好的进步手段。除了对从事解放神学的人而外，他们往往不愿公开议论宗教，因为他们深知宗教已成为拉丁美洲生活的组成部分。但在私下他们屡屡表示看不起教会，认为它在历史上一向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以同样的理由谴责自由主义，并认为自由主义不足以解决拉丁美洲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保守主义是在追求对人类缺乏同情的政权形式。

从理论上说，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遵循一种按情况和条件

不断修正其想法的辩证思维过程。他们一致认为，想法不是内在产生的，而是来自外在的物质世界，主要是来自随着生产制度的演进而变化的感性认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极不公平，并认为它需要维持不公正的财富分配以保住自身。他们一直相信臻于太平盛世的必然性，把它看作几乎是科学的事态发展。这种态度在许多方面同拉丁美洲思想家中流露的对进步的信念相一致，因为他们首先接触过启蒙运动思想。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及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表现从根本上有损于社会，并最终被群众抵制和消灭。他们既强调劳动是生产的主要成分，也不轻视技术对生产的重大意义。但归根结底他们与跨国公司不同，而坚持认为变革世界中的首要因素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技术。

这些注重理论的人一直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因为拉丁美洲的领导人有不重视灵活政治理论的传统：殖民地时代留下了绝对权威的遗产；独立后时期产生了否认政治理论是行动指南的军人领导的趋势；而 19 世纪的思想传统也一般不承认参与政治的重要性，并对其远景产生了悲观主义。

直到 19 世纪最后 30 年间实证主义被人们广泛接受，在拉丁美洲才发展了政治和社会理论必须直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信念。实证主义为应用政治理论树立了某种先例，但也提供了一种可能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杰出人物治国论的权力主义哲学。

由于 20 世纪的实证主义抛弃了它的历史循环论，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进程向合理目标进展这一思想的独到之处就更

明显了。到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已更深入地渗透到拉丁美洲的自由与改革思潮中，而不再象当地政治运动和劳工运动的薄弱状态所曾表明的那样了。

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一直力求理解政治与人类文化其他领域之间由历史形成而避免不了的联系。他们认为政治思想不发达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并试图从确定该地区人民能自我管理的社会共同体着手，来纠正这种局面。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认识到必须拒绝这样一种意见，即拉丁美洲已受传统政治模式的束缚，以及欧洲或亚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无须根据本地区情况加以修改就能采用并成功地实行。

以前各章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准则要适应拉丁美洲的情况是极为困难的。社会主义在少数几个方面的努力，例如发展妇女的前途和使妇女获得同等权利，在以上各章中均未谈到，因为这些努力在该地区一直是受到排斥的。拉丁美洲基本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向来是靠性别不平等对待，即用少付女工工资、向家庭妇女榨取无偿劳动和把妇女放到使她们多半无法组织工会的工作岗位等手段，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由于该地区极端注重男性并把妇女置于格外的从属地位而更加严重化了。

拉丁美洲主要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全都是男人，这很令我失望。我曾试图找出其贡献值得列入本书的妇女，但枉费心机。说起来同样可悲的是，直到最近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虽然反映妇女被排斥于这一队伍之外的性别歧视，却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始终实行传

统的大男子主义安排。自相矛盾的是，这些男人明知马克思把男女关系看作自然人的结合，却又认为研究这种关系能确定很多有关人类发展的问题。不过，这些男人的工作也为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女思想家铺平了道路，其中象智利的玛尔塔·阿内克尔和巴西的瓦尼亚·班比拉，则在其事业的早期就显示出智力活动的巨大潜力。

虽然欧洲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已有过多的著作论述通过性关系消除异化和性的唯物主义，以及把妇女作为性对象或劳动力加以利用，但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作家对这个问题却一直很少注意。而这种情况是在性抑制已使一切阶级的成员在身心两方面受到很大损害的这一地理区域发生的。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家从来没有写文章来论述屡屡促成性节制、性不满足和性挫折的社会关系。他们有时以人们不因缺少性生活而致死，来为自己忽视有关性行为的题目作辩解，但他们总不能抹煞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性行为往往会减少生命。

本书论述的作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弱点，但比其他分析方法提出更多问题、探究更多关系和研究得更深入。他们知道，马克思认为想象有一种本来的马克思主义那是荒谬的，马克思并不是按照为后继者制定的教条体系来思考，而是设计出一套反映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原则。他们力图使用这些原则去研究变化中的现实，以便发现变化的原因并帮助社会满足其需要。

大多数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知道，马克思期望人们以不同途径达到共产主义，并发展不同形式富有创造性的分析方

法与方式。如果说他们毕竟证明自己在实行变革方面比他们的资产阶级对手更为成功，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给社会开出的处方所依据的是拉丁式的革命想法，即一开始就进行逐国分析以得出解决整个地区各种问题的办法，而他们相信这样的解决办法既有国际根源又能产生国际反响。

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拉丁美洲传统的民族国家模式，认为它妨碍思想、政治和社会的解放。在他们看来，战争、犯罪、贫穷和异化不是社会的、而只是民族国家的永难割弃的赘瘤；并把民族国家看作过渡阶段即历史阶段。他们不接受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提出的下述假说，即各民族都有同其他民族的发展潜力相抵触的发展潜力，每个国家也都有各自必须捍卫的社会发展观念，甚至以之强加于持异议的国家。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属于哪一类别，都对拉丁美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作出了贡献。他们还承认，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该地区激起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别兴趣，但除了在短暂时期例如由阿根廷社会党<sup>①</sup>等组织执牛耳的20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在拉丁美洲起过支配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前景却鞭策了其他力量如阿普拉型政党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走向更彻底的社会与政治纲领和行动。多年来热心自由主义改革的政党已偶尔懂得并接受了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观点，并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意见和大量词藻纳入其民族主义纲领中，这在某些方面已使其马克思主义对手不

---

<sup>①</sup> 1896年成立。1918年党内革命左翼另建阿根廷共产党。——译者注

再显得那么突出和有感召力了。例如墨西哥革命、乌拉圭的巴特列主义、秘鲁的阿普拉主义以及 20 世纪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的以资本主义为方向的“民族革命”就经常出现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词藻。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研究该地区的问题经常采取现实态度，有时表现得才华横溢。作为“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始终显得比非马克思主义分析家深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信条已大大充实了拉丁美洲富有创造性而有才智的人士，这就提高了他们为理解各国面临问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所必需的历史觉悟程度，从而改进了寻求办法改善生活素质的社会科学。在这方面正如本书已经表明那样，没有比马克思主义对解决本地区印第安人问题的建议更能证明其独创性的例子了。

即使拉丁美洲追求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达到其必然的结论，但这一地区已经从它的远见中得到好处了。由于各社会的问题在 20 世纪成倍增长，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便为人类的成熟提供了乐观的前景，并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敏感性与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气魄。

本书自始至终指出，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没有担任公职的情况下，在哪些方面以积极的方式对政治施加了影响。社会主义的压力已经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如增加工资、土地改革、缩短工时、改善住房、改进教育和社会保险。马克思主义者还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从而使资本家得以巩固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者对使资



本主义更加进步也分担了一定的责任，尽管这也许不是出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48年作为联合国一个部门而组成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观点指引下，也求教于马克思主义来试图处理拉丁美洲的发展。该委员会提出一个中心（指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外围（指不发达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之间关系不对等的理论。为了改善拉丁美洲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该委员会强调国家必须在中央计划方面承担更大任务，各国必须实现经济一体化，结构改革必须改变现存阶级状况。得到城市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支持的这个委员会，实质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想法变成了一种改良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象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那样为促进拉丁美洲所需要的发展而采取的一些计划的落空，使拉丁美洲更多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资本主义，而到科学社会主义中去寻求解决社会退化的办法。他们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城市工人阶级（充分就业者）已有增长，并且经历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更能在政治上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葛兰西思想中找到了如何利用工人人数增加的一些答案。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工人阶级要掌握统治权就必须提高其管理生产力的能力以便超过资本主义的这一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拉丁美洲受到了相当普遍的欢迎。葛兰西坚持认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变革不能等待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反之社会主义者应当干预资本主义，并在改组各种机构方面要坚持领导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得到改造之前，通过赢得人民支持以确立议会中

起码多数的办法，在其体制内部扶植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行得通的。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取得古巴胜利和该国在社会主义下获得进展以前，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由于左派未能实现许诺而感到厌倦，经常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说它只是一种其创始人对拉丁美洲知之极少的哲理。古巴革命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重新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对本地区的适用性，更深入地发掘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阐释各种意见的理论，其中象葛兰西那样的思想可以创造性地运用于 20 世纪的情况。

到了 60 年代，古斯塔韦·莱蓬<sup>①</sup>在其名著《社会主义心理学》(1899)中提出的拉丁人不团结而有不肯齐心协力的个人主义传统的意见受到了谴责直至湮没无闻，该地区广为接受了很久的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的反经济决定论和反辩证法的影响也遭到了同样命运。上述观点就连拉丁美洲年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也终于认为是反对左派的宣传，他们感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无疑有其固有的抽象特征，但在涉及自然界、人和社会的学说中却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这些年轻学者大都从资本主义的“民主进程”的失败中清醒过来，而不再把社会主义看作由他们的生活中的文化演变产生出来却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进展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把它看作一种缺乏严密性并带点柏格森的意识流思维而不合逻辑味道的哲学体系。

为了说明拉丁美洲思想家更加接受左翼观点，我们特别

---

<sup>①</sup> 法国医生、社会心理学家、政论家(1841—1931)。——译者注

提出现在他们中有少数人已相信“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论。他们强调,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扩大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就能从民族解放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论调根据的是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在与农民、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其他进步分子结成联盟中发挥其革命潜力。这样的联盟从理论上说,便构成国家的民主政体,而在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掌握政权的就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领导人。这一理论的鼓吹者既不认为各国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以便形成一个有能力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也不相信资本主义是一种已经达到其极限的国际制度。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指导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但获得政治独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支配并非必不可少。他们坚持认为,过早地企图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会分裂进步力量而削弱工人阶级,并且为反革命开创发展的可能性,而进步力量的广泛联盟却能提供最好的革命前景。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中找到支持,因为他们在个别场合曾经承认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某种发展阶段走上共产主义,而无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尽管大多数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非资本主义道路”论的理由也不少,其中最突出的是认为它缺乏阶级观点,对非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持种种模糊概念,难以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但这一理论却表现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强调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完全符合下述事实的,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后,总有一个必须把社会主义力量组合起来的阶段。

卡斯特罗以后的一代拉丁美洲思想家不论是“非资本主义道路”论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表现出比他们前辈中的许多人更加通达世故。例如，他们懂得拉丁美洲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已经获得了理论上的政治主权而不再需要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的解放了，但在经济上仍然有依附性，因而决不是欧洲式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接替者。

许多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深知依附的含义，这个概念在18和19世纪已开始被表达但没有下明确的定义，接着为几代人所忘却，后来又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特别提了出来而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被拉丁美洲广泛接受。他们认识到经济依附会削弱政治和社会自主，并且明确了独立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差异。他们一般承认，对依附性的分析作为一种启蒙和提高觉悟的手段是有用的，但又确认它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其中没有包含反帝的行动纲领，也没有着手改变生产关系的计划，而且往往忽视了阶级冲突。

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识到，马克思只论述过爱尔兰的依附性，而从来没有讲到拉丁美洲式的依附性问题，他的意见没有同千百万人联系起来，因而不具有任何政治力量。不过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上台执政，他们就必须一方面代表和治理千百万人，一方面对付拉丁美洲式的依附性。他们能否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并在一个不习惯于有严格党纪的地区上台执政呢？尽管他们不时设法在大学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威望，甚至向一些学生讲授其基本原理，但是他们一般都不曾到有组织的劳工中去发展组织关系，因为劳工的增长一直受到缓慢的现代化进程和政府镇压的阻碍。他们

能否克服这种缺乏党纪传统和未能建立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的现象，从而纠正其经常不能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重任务协调起来的缺点呢？

在一个左派经常涣散和闹不团结的地区，特别是由于“极左观点”导致许多政见不同的集团从多数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分离出去并彼此争吵不休的情况下，能够希望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行道路吗？自相矛盾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些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却有碍于团结。

当左派在理论上作无益的吹求时，民族资产阶级则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畏惧而妨碍了他们为民族解放作斗争。其结果是使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者有可能经常提供反对社会主义的保证，甚至有可能支持资本主义的改革，就象 1968 年和 1980 年发生在秘鲁以及 1968 年巴拿马由国民警卫队接管<sup>①</sup>后的情况那样。

综观上述种种障碍，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论据来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拉丁美洲未必有可能自上而下地建立起社会主义。要使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成为制度，就必须象在古巴那样，在民族革命或改良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来最后担当起改造的重任。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致认为，古巴虽已证明非共产党人能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但保持革命却需要政党、理论和纪律。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人民团结

---

<sup>①</sup> 1968 年 10 月 11 日以托里霍斯为首的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新任总统的巴拿马主义党领导人阿里亚斯。托里霍斯执政期间实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措施。——译者注

政府缺少这些因素，所以智利从未进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社会主义思想家根据历史分析虽可作出结论(例如上面声言的需要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却不能期望历史完全符合一些具体的理论。他们认识到，要问谁在真正替马克思主义讲话，就象问谁最准确地替基督教讲话一样。他们指出，我们必须看出社会主义传统中被每一代人和每个知识分子改变得意义不明确的地方。他们赞同葛兰西的意见，即马克思主义“不是使普通人保持在他们所共识的原始哲学水平上，而是相反地把他们引向更高的人生观。因此，比方说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即城市工人阶级可能不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基本成分，而也许必须个别地吸收到革命中来，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准特权阶级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他们还认识到，由于农民阶级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农村劳动者正在开始失去其与社会的疏远感而增进其与社会的一致性，因而在政治上具有潜在的重要性。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受到社会主义的吸引，接受其存在着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的信念，醉心于其所作的历史在他们一边和在统一的左翼领导下美好日子就在前头的许诺。然而，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梦想却被他们不美好过去的历史所否定了。他们寻求更多的事实和证据，力求趟出准确而正常的道路，使自己摆脱中世纪逻辑学家多次把本地区领导人引入歧途的唯理性主张和心灵直觉论调的影响。

在450多年的时间里，拉丁美洲的宗教领导人往往跳不出“中世纪逻辑学家”这个圈子。最近这种情形已有改变，因

为古巴的社会主义发展很彻底，这在 60 年代给了许多拉美人以希望。菲德尔·卡斯特罗取得政权后，对左派运动的同情在该地区有所增长，因而在许多国家里将军们开始为“国家安全起见”而夺取政治控制权。由于军方势力越来越显赫，甚至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和秘鲁这些原来政治上民主的国家内，一些象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那样的天主教教士也发挥了新的作用，即表达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不满。

到 1968 年在麦德林召开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解放神学，要求教会负起帮助穷人、保障人权的责任，并为摆脱经济依附性而斗争。这一拉丁美洲对天主教的独特贡献，正如后来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在其《一种解放的神学》（1973）一书中所表述的，并非在实质上与天主教同类的思想学派，而具有其不同的冲击力。它一般地依据这样的信念，即人民设立教会，只要社会是自由和平等的，人民就必须掌权。解放神学把基督教关于人被疏远于上帝及其同类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在其中工作的制度促成其异化的看法结合起来。解放神学不提及彻底而长期的社会改组，而着眼于剥夺个人的生产资料并交给主要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高级机构以消灭异化。

不应把解放神学本身理解为一种属于革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它只是一种立足于历史而对信仰和基督教的解放使命加以认识的反思过程。

历史上总是把解放的实践看作实行上帝之爱。在拉丁美洲这一向是对制度化了的暴力的回敬，同时也是对依附性的

资本主义压迫的反抗。它的信徒坚定不移地记住，生活的各方面都包含着政治性，并通过为被压迫者而斗争来找到上帝。

虽然马克思主义认定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辩证关系，但解放神学家们却经常认为它忘记或忽视了历史已揭示和信仰已确定的辩证的紧张状态。因此他们强调同被剥削的各阶级团结，认为非正义的根子就在于罪孽破坏了与上帝和同类人的友好关系，因而要为根本的解放宣讲福音，并且强调他们的布道虽从信仰出发，却运用了科学的论证。

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成了向“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过渡的阶段或环节。麦德林会议后4年之内，在拉丁美洲各地出现了成千上万个鼓吹基督教思想和社会行动的“基层团体”，它们经常受“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的领导，从不承认教会的作用是充当捍卫天主教徒的传统信仰和资本主义的卫道者而去反对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卡米诺·托雷斯的启迪，因为他指出了基督教徒如何把自己的信仰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协调起来。

马克思认为，宗教只要帮助人们获得现世自由就会吸引他们<sup>①</sup>。教皇保罗六世以其自己的方式赞成这一意见，于1967年5月发布了“人民进步”通谕，就贫困现象批评了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失去人性的浪费。根据帝国主义企图使人民不团结、使基督教徒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以便挫败革命进程这一前提，巴西的累西腓大主教多姆·赫尔德·卡马拉同另外15名第三世界大主教于1967年要求教会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97页。——译者注



谴责资本主义，并与社会主义者一道努力实现社会革命。但直到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以后，“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才开始迅速发展。

到了1971年，仅仅智利就有80名教士公开支持“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传布福音的价值。他们不把宗教称为人民的鸦片，而说它是解放的促进因素。他们认为，不论上帝还是马克思，从根本上看都献身于人类。他们觉得上帝眼里是没有阶级的，这在他们自己实行等级制和权力主义的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

到1972年，“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它的第一次正式的拉丁美洲大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基督教神学受到必然各怀社会政治用意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制约。他们断定，拉丁美洲的失业、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酒精中毒、文盲、卖淫、贫富日益悬殊和种族歧视问题不是自然界欠充裕的产物或某个不留情的上帝赐与的。相反，他们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一种由人的意志决定的过程，即少数有特权的人凭其意志造就并保存了一个以利润和竞争为基础的不公平社会。他们还对某些经济增长的虚假模式、尤其是墨西哥和巴西的发展主义深感遗憾，因为它们推行曾经被认为是帮助工农，却给他们造成了危害，并且有损于革命目标。

1972年大会的出席者与大多数不信教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看到了他们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他们批评现行制度隐蔽了经济因素对阶级关系以及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的重大影响。他们大都赞成墨西哥的奎尔纳瓦卡主教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塞奥的下述想法：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予拉丁美洲本身所需要的可靠的发展……我相信某种社会主义制度更符合基督教的友爱、正义与和平诸原则……我不知道这种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什么形式，但我知道它是我应当遵循的总路线。按照我的一般观察，它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民主形式。”

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塞奥和“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都赞成恢复基督教的早期原则。他们认为“第二以赛亚”<sup>①</sup>中受苦受难的仆人就是被剥削的工人。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基督教是有历史性的。在理论上，两者的方针都是援助争取正义和人类解放的斗争，而且两者都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一贯利用基督教信仰，把它变为使其统治合法化的宗教。他们认为，天主教会总想赋予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以神圣的特性，并想象“博爱”和革命不相容。他们认为，教会歪曲社会基督教的概念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权竟成了统治阶级权利的同义语，并借此作为基督教信仰的要素使后者受到保护。“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断言，社会基督教致力于从资本主义弊病下解放人类，但历史分析表明，资本主义为自己的目的已不再利用社会基督教了。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社会基督教基本原则的信奉者已有必要向别处即向历史唯物主义寻找对人类困境的洞察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坚持认

① 指《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第40章以后特别是第40—50章的部分。

——译者注

为，公布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文件以揭露美国同这家多国公司合谋推翻智利 1973 年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政府一事，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是意外发现，但对接受过历史教训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不足为奇。

“基督徒争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铺平了道路，使之能以加快的步伐促进自主的发展，并能缔造出非常近似一种人与人的真正兄弟情谊的无阶级社会。他们认为，只要异化仍然是世俗社会的现象之一，宗教将继续是重要的；人类真正自由时，宗教才会消亡。

我们没有充分的历史远见来衡量解放神学和“基督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影响。我们确实知道，它们帮助揭穿了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即使在其改良主义甚嚣尘上时也对大多数拉丁美洲人有益的神话。它们动员了工人、农民和中间阶级下层的某些成员，为反对依然操纵着拉丁美洲的社会与政治并大沾资本主义之光的人而斗争。首要的是它们成功地驳斥了这样的意见，即阶级斗争和福音的要旨不相容，因为它的前提是仇恨，而仇恨则导致暴力。保守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于 1979 年驾临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出席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反对 1968 年麦德林会议制定的进步措施，后来于 1980 年 5 月下令罗马天主教教士脱离世俗政治，1981 年又向尼加拉瓜革命政府中担任最高职务的教士<sup>①</sup>重申此令，这一事实也许证明“基督徒争取社会主义”是果敢有

---

① 尼加拉瓜人民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斗争胜利后，有些参加过斗争的教士在民族复兴政府中担任了高级职务如外交部长等。——译者注

力的。

我们的研究已经确认，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意见一直影响该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甚至创造性地影响了宗教。我们的分析使我们同意非社会主义哲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的意见，他说：

“革命的共同性就其严格的意义而言，是西方思潮的所有共同性中最新近、最特别时髦的。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它已成为知识分子队伍中最受尊敬的共同性之一了。”

拉丁美洲激进的知识分子一直批判地揭示社会的特性，揭示其局限性、不公正行为和冲突。他们始终赞成马克思的下列信念：“我们为世界推出其现有原则之外的一些新原则”；历史体现出人的所作所为——人们在学会掌握自己的世界和支配自己的命运。他们力图使资本主义世界了解其自身，了解它的种种需要和创造一种为政治和社会变革所必需的新观念模式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程度往往太高，以致不足以有效地应付世间的日常情况。它多半更适用于研究广阔的历史概貌，而不太适用于研究那些从其关系和冲突中可看出拉丁美洲最普通问题的个别机构或组织的动态。我们探讨过的许多作家的著作陈述了使我们能够理解该地区弊病的总的看法，但对其治理却往往提供了很难如法炮制的复杂药方。

除了经常提出不切实际的抽象或深奥看法外，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时表现出不肯容纳相互的意见，并且对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人没有耐心。知识分子的妄自尊大，除疏远

了可能的皈依者或同盟者之外屡屡从内部分裂了左派。马克思深信,有些人尽管不同意他的看法,却没有作出不道德的判断,而是经常根据他们所处的关系以及他们阶级和个人的价值观作出正确的决定,因此他若看到拉丁美洲左派不时存在的顽固不化,一定会感到惊讶的。如果我们也有马克思那样坦荡的胸怀,那么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已经仔细考察过其著作的那些作家便无关紧要,而只要知道他们已经增进了我们对他们的社会及其社会内部革命转变的可能性的认识也就够了。

马克思主义比拉丁美洲其他一切形式的激进主义都更持久,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以及他的那些杰出阐释者的思想,较之其他革命家的思想更有力量。而且马克思主义一般地承认,该地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是向建立社会主义跨出的理想的一步,甚至是必要的一步。马克思主义避免虚无主义,而为未来提出了建设性纲领。此外,马克思的逻辑使革命对拉丁美洲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是以有理可循的历史哲学为依据的人类前进中的一步。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长青。”歌德在《浮士德》中的这一诗句,在列宁批评那些无视于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新发展的思想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者时经常被引用<sup>①</sup>。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者不断地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哪些社会或政治理论可以遵循,这些理论必须或者可以严格遵循到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531页;第24卷第25页;第26卷第387页。——译者注

什么程度，如何就这些理论举一反三或加以发展。例如，该地区正统的共产党人在传统上把拉丁美洲列为半封建国家，认为那里没有收益的农业阻挠了工业化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因此，那里的共产党都鼓励资产阶级同工农联盟以剥夺同外国势力勾结的地主的权力。这个理论包含着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接受的两个因素：它不是完全国际主义的，因为它主张在国家内部实现辩证进程；它在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经常支持改良主义的中产阶级政党。

我们研究过其著作的某些思想家一直不接受拉丁美洲属于半封建社会这一正统看法，而坚持认为它从殖民地时代以来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人看来，该地区由地主控制的单一经营乃是资本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障碍。他们看到城市商人同农业部门结成联盟，只能促进工业品的进口，而无助于实现工业化。他们强调，资产阶级同现存权力结构有联系并勾结帝国主义，因而不能指望它帮助打破现状。而且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放弃了把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旧打算，其理由是他们传统上向来是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将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统治的影响。

对拉丁美洲是否为半封建社会，或小资产阶级是否对革命有帮助这类问题的辩论，将会在本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继续下去。各派具体意见的普及率将时有变动，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一般地说将经历时盛时衰的发展的循环。为了表明上述各点，我们特别提出俄国革命胜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推动了拉丁美洲更广泛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自相矛盾的

是，当时斯大林主义思想在该地区马克思主义者中占了上风，因而经常妨碍那里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发展。

近几十年间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直顺着一定的趋势前进。1959年卡斯特罗接管古巴后直到70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唯意志论和依附论观点在该地区屡屡取代了更为顽固的“僵化”、“庸俗”和面向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政权被推翻后，遍及西半球的对革命运动和人民运动的镇压以及美国对反左翼的军国主义更加公开的支持，使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同民众阶级建立联系，使革命缺少有利的条件，这时该地区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开始抛弃了比较折衷的新马克思主义、唯意志论和依附论观点而赞成更有理论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包括经典的和结构主义的观点。

例如墨西哥的罗赫尔·巴特拉、厄瓜多尔的阿古斯丁·奎瓦斯这样一些学者，近来就一反依附论强调拉丁美洲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在16世纪这一地区变为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时便已结束的先例，而强调起结构主义观点来了。他们坚持认为，前资本主义结构仍然存在于拉丁美洲，拉美各国既相对自主又为阶级关系所分裂，而这些情况都根源于各种内部矛盾。

现在结构主义观点成了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批判性大辩论的起源。许多人接受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结构主义概念足以表明资本主义社会里，每当发生领导危机而权力集团中没有一批文人出而使统治阶级或该集团保持支配权时，不民主的控制形式是如何建

立起来的，因而它比其他任何理论能更好地说明拉美地区大批镇压性的军人独裁政权与其阶级结构的关系。

前面各章已经表明，在正统共产党人坚守自己信念的同时，另外一些理论例如上面刚提到的几种和先前提到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论，颇有成为新的正统观念的势头，从而辩证地对拉丁美洲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既有所抑制又有所促进。

拉丁美洲历来象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一样，没有任何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也没有成套的理论。我们只找到一些个人的和集体的判断与评价。但尽管如此，拉丁美洲还是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力阐述者，试图为该地区创立可以实用的理论。尽管他们的尝试常常看起来体现了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方针，但是由于他们的分析超越了国界，反而助长了地区性的一致。然而，他们为了把世界改造为更合理的境域而作的认识上的探索，在国际水平上并不是经常成功的，只不过在让个别国家更好地明确方向上往往取得非马克思主义的效果罢了。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国家对世界列强的帝国主义恶劣影响和反帝国际团结的必要性认识，有时更清醒得多。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在古巴、也许还短暂地在智利和局部地在尼加拉瓜得势之外，并未取得对拉丁美洲的政治支配，但由于他们不断向统治阶级挑战而在行动上为他们设置了某些限制。他们已经推动了某些经济和社会改革，唤起了对实际政治与人类解放之间最终会协调一致的希望，而且提出了塑造人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重新分配物质与精神财



富的人道主义方法。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活动也已经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一些英语国家中激发起变革。社会主义政府分别于1979年在莫里斯·毕晓普领导下的格林纳达、1976年在迈克尔·曼利领导下的牙买加和1957年在契迪·贾根领导下的英属圭亚那取得了支配地位<sup>①</sup>。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影响之大的，是它的反对者竭尽全力要消灭它。

由于技术和现代化事物增多，社会主义革命在工业上较先进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成功的机会减少了，何况这些国家集中了大多数的外国投资，而且由更有能力的权贵人物统治着。革命成功的希望较大的，是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这一点已于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sup>②</sup>所证实。该阵线摧毁了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镇压性国家，而开始代之以关心工农利益的新社会制度。桑地诺主义者用列宁、毛、胡志明、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观点及其20世纪初民众主义者和游击战英雄奥古斯托·桑地诺的起义思想，缔造出一种以尼加拉瓜民族精神为基础的灵活而非宗派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

---

① 1979年3月13日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发动武装政变上台后，以其创始人和领导人毕晓普为总理的政府宣称实行“社会主义政策”。1972年牙买加人民民族党在选举中获胜后，以其领袖曼利为总理的政府于1974年9月宣布实行“民主社会主义”。1957年8月以贾根为首的圭亚那人民进步党在选举中获胜执政后，表示要仿效当时提出搞“社会主义”的印度和加纳。——译者注

②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62年正式成立后，即投入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游击战，并于1979年7月17日取得胜利。——译者注

尼加拉瓜革命和古巴革命的性质，以及本书写作时萨尔瓦多发生的事情<sup>①</sup>，使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断定，他们能解释世界，但只有人民有巨大力量变革世界。鉴于资本主义世界要在拉丁美洲保持思想霸权的压力，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很难容忍政治反对派，连有选举程序和立宪政体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当权者也决不容许真正而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抗。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论其爱好是雷卡瓦伦、帕拉西奥斯、马利亚特吉、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小卡约·普拉多、卡米洛·托雷斯、切·格瓦拉主张的社会主义方案，还是本书中提到的许多论题的综合或变种，都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来反对自己的政府，反对那些已变得一知半解、不能辩证地思考、而且习惯于接受并非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的普通同胞。

---

<sup>①</sup> 萨尔瓦多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生活状况进行了长期斗争，并且开展了游击战，80年代以来规模更为扩大。——译者注